

杨奎松 / 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史研究

- 沈阳美国领事馆事件与新中国的“一边倒”
- 中苏结盟背后的民族主义碰撞
- 新中国出兵朝鲜的因与果
- 从援越抗法到促越和谈的政策转变
- 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
- 1960年代中国外交激进化的经过
- 中苏边界冲突与改变对美政策的困惑

2



江西人民出版社

本书选取沈阳美领馆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立、中苏结盟与中苏两党的民族主义碰撞、中国出兵朝鲜的因与果、两次台海危机的由来及其幕后、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对美缓和等对新中国外交政策及其对外关系具有重大影响的外交事件，比较系统地依照历史演进的过程，逐一进行了个案式的研究。像杨奎松的其他著作一样，本书眼光独到，但平实冷静。作者对新中国外交政策、对外关系变动的情况及其导致这一系列变动的内外因素的分析，相比既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研究，明显地有了较多新的思考，很值得关心国史的读者一读。

解密历史档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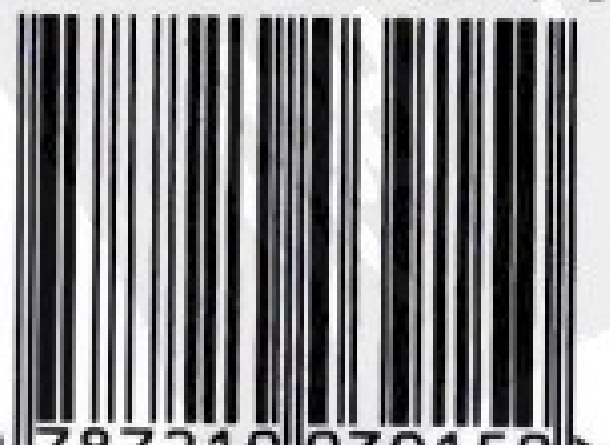
还原真实场景

钩沉重大事件

反思利害得失



ISBN 978-7-210-03915-0



9 787210 039150 >

定价：38.00元

上架建议：历史类

杨奎松/著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国史研究

2

江西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美苏冷战与中国革命	8
引言	9
1. 一个并非题外的话题：“俄国”	11
2. 意识形态：不可调和的分歧	17
3. 斯大林：一种观念，两种角色	23
4. 中共：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30
5. 冷战：在亚洲已经开始	39
6. 结语	47
第二章 美领馆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立	48
引言	49
1. 美领馆事件的发生	51
2. 中共“挤走”方针的形成	53
3. 要不要与美国建交？	57
4. 外交接触的尝试	61
5. 毛泽东宣布“一边倒”	66
6. 结语	76

第三章 中苏结盟与中苏两党的民族主义碰撞	78
引言	79
1. 毛泽东访苏的愿望与担心	81
2.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	84
3. 谈判桌上的“平等”之争	88
4. 民族主义的双重效应	90
5. 结语	93
第四章 中国出兵朝鲜的因与果	94
引言	95
1. 冷战的阴影	97
2. 莫斯科的目标	100
3. 错误的结果	105
4. 毛泽东决断决行	113
5. 优势缘何丧失?	123
6. 朝鲜停战不可免	131
7. 结语	142
第五章 新中国对援越抗法战争的策略演变	144
引言	145
1. 解放印度支那?	146
2. 走向日内瓦	152
3. 促成印支停战	161
4. 中越分歧的初现	169
5. 结语	172
第六章 两次台海危机的由来及其幕后	174
引言	175

1. 在和平共处方针提出的背后	177
2. 以打促谈的外交尝试	178
3. 赶超英美的背后	186
4. 炮击金门决策的摇摆	194
5. 斗争策略的再度调整	204
6. 和平外交方针的作用逐步削弱	209
7. 结语	213
第七章 19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转向的历史考察	216
引言	217
1. 和平共处,还是冷战共处?	218
2. 全面对抗,还是力求转圜?	224
3. 美国刺激中国,还是中国刺激美国?	231
4. 既要世界革命,也要统一战线?	238
5. 战备防美,还是战备防苏?	244
6. 积极避战,还是全力促战?	252
7. 全面激进,还是狂热失控?	256
8. “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	261
9. 结语	264
第八章 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对美缓和	266
引言	267
1. 中苏边界纠纷的由来	268
2. 珍宝岛事件的经过	272
3. 北京决策的内幕	276
4. 莫斯科的反应	279
5. 对战争的极度担忧	283
6. 中苏总理的机场折冲	285
7. 对美外交的意外启动	290

8. 结语	294
第九章 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中方变奏	296
引言	297
1. 在革命与缓和之间摇摆	299
2. “打仗是打仗,外交是外交”	302
3. “联美制苏”的奇想与挫折	308
4. “三个世界”观点的提出	313
5. 结语	319
参考文献及资料要目	320
图片来源	328

前言

由于落后国家的革命通常是以统一夺权在先，再继之以追求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在后，故这些国家的革命党，每每通过革命的方式获得了政权之后，紧接着的对外政策也会表现出很强的革命性。中国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是，落后国家革命党的革命性及其理念未必相同，影响到它们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继续“革命”的程度和方式，也往往会有很大区别。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中国近百年曾经经历过两度革命成功。一次是在1928年，那是在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宣告大功告成。一次就是1949年共产党革命的胜利。两次革命成功后，新生政权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革命程度，就相差甚远。国民党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后，其南京政府虽然也大力推动“革命外交”，力图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却是在承认过去的北京政府既有外交关系和承认各种外交条约协定继续有效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外交谈判的方式，利用各种曲折委婉的外交手段，来迫使列强各国放弃在华特权，从而逐渐达成国家独立和民族平等的革命性目标。这样一种“革命”，也难怪后人通常要把它打上引号，或者直接称

之为“修约外交”了。以当时国民党南京政府自身的力量 and 有效统治的局限性,既不想完全得罪各国列强,又要想通过外交谈判来求得列强同意废约或修约,难度自是很大,最终弄得虎头蛇尾,实效寥寥,也就可想而知了。

共产党就完全不同了。还在其军事革命胜利在望之初,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三项外交方针。第一,“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旧政府同外国政府所建立的外交关系及其所缔结的一切条约,任何国家必须在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断绝与国民党政权外交来往的基础上,重新与新政府进行建交谈判。第二,“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就是不急于取得资本主义各国的外交承认,要争取在肃清一切内外威胁和各种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及影响后,再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谈建交问题,以免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会用孙悟空钻进牛魔王肚子的办法,在新中国内部来捣乱。第三,“一边倒”。就是在美苏对立的国际冷战格局下,在政治及外交方面,坚决采取与苏联一致的政策和做法,决不因眼前利益在美苏之间做骑墙派和墙头草。依据这样一种方针,共产党的新中国不可避免地得罪了以美国为首的众多西方国家,从而长时间被隔绝于国际社会之外,但与此同时也轻而易举地废除了旧中国残留下来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且得以把在中国有着极大影响的西方势力一朝清除净尽,极大地满足了众多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促使新中国采取如此彻底的革命外交的方针,根本上在于共产党人有着完全不同于国民党人的意识形态。尽管他们都是民族主义者,但共产党人还是阶级斗争论者。共产党人不仅相信国内的人群是按阶级来划分的,而且相信在国际社会中,也一样充满了激烈的阶级斗争。因此,当新中国的桅杆刚刚伸出东方地平线之际,毛泽东就已经认定:帝国主义恨死中国革命了,它们一定会想尽办法颠覆中国新生的革命政

权。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的外交选择,带有鲜明的阶级革命的色彩,即使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新中国的对外关系,也就自然会波澜起伏,险象环生。从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新政府拘禁起诉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到中共中央在世界工人理事会亚洲委员会会议上公开鼓动各国人民进行武装革命,再到在北方大举出兵援朝抗美,在南方倾力实行援越抗法,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以至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和台海关系,二三十年间常常呈现出高度紧张的态势。

然而,本书并不准备把新中国的外交与革命简单地混为一谈。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共产党人很难纯粹基于意识形态和他们追求世界大同的革命冲动来设计中国的对外政策。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例证就是,今天被高度评价为中国和平外交标志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恰恰就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初共产党人还颇多革命热情的那几年。

不难了解的是,作为当年美苏冷战格局下落后国家的一个新生的共产党政权,新中国在外交及国际关系上能够选择的空间原本就极为狭小。从后来的种种事实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即使在中共新政权建立之初,莫斯科其实未必就是北京最好的合作伙伴。纯粹是因为意识形态的鸿沟和美国同样僵化的外交政策,一次又一次强烈地刺激了有着极强的民族悲情意识和逆反心理的毛泽东,才使得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在很长时间里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换言之,如果当年的美国政府不曾或者中途改变其僵化的不承认政策,改取尼克松后来的做法,中国对外政策的历史会否走上另外一条道路,也未可知。毕竟,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东方大国的首领,毛泽东也有着极强的民族自尊心,他不可避免地会高度关注自己国家的国际地位,包括自身的国际形象。对于与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关系,毛不可能不高度重视。何况,中国还有一个台湾问题必须要与美国当政者面对面才能获得解决。因此,毛尽管始终是一

个坚定的阶级斗争论者,但他对取得美国当政者的承认,竟然也充满了某种渴望。

毛泽东的私人护士吴旭君和毛的表侄孙女王海蓉等人对毛当年决策缓和中美关系的回忆,最能够反映出这位自尊心极强,又被世人视为最伟大的反帝领袖,内心里是如何看待与美国改善关系的意义的……

她们回忆称:在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濒于战争边缘之后,毛泽东改变了向来不肯向美示弱的态度,批准了中方代表主动恢复对美接触,以促成更高级会谈的对美外交方针。本来,这一过程到1970年初已基本实现,双方已同意进行比大使级会谈更高级别的外交接触。而尼克松在公开场合向中方公开示好,让毛更加迫切地希望与美国改善关系。

不料,这一年的3月间,受到中国支持的柬埔寨发生政变,美军从越南出兵支持了政变方,此举使原定中美更高层接触的计划难以迅速落实了。毛泽东随后还不得已于5月20日亲自出席了支持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合法政府的群众反美誓师大会,发表了著名的“五二〇声明”。但用基辛格的话来说,毛此举不过是“重复过去的革命言辞”而已,并无实质性意义。当美军很快撤出后,为公开向美表示善意,周恩来像往常关键时刻一样,马上就把毛泽东最信赖的美国朋友,前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请到北京来。

10月1号上午,照例举行国庆群众集会和阅兵式,但毛泽东却显得格外兴奋。吴旭君等帮他穿衣服时,他一再说:“今天要接待老朋友美国作家斯诺和他的妻子。”观礼过程中,周恩来特意把斯诺夫妇从侧台领到毛泽东的身边来,双方握手寒暄,然后就是专门安排的摄影师将毛泽东和斯诺夫妇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情景拍下来,次日公布在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上,实际上两人也并没有进行交谈。用毛泽东事后对吴

的说法：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此事过去之后，毛泽东一直在等美国方面的反映。直到12月13日读到《参考资料》上编译的斯诺的文章，注意到斯诺把毛反美的“五二〇声明”解释成中国并不排除与美国人联合反对帝国主义，毛颇为高兴。他当时虽然在感冒中，却紧急召见了还在睡梦里的斯诺，还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他在谈话中明确表示在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中间，他更喜欢敢作敢为的右翼的共和党人，提出很欢迎尼克松总统能来华访问。谈话之后，周恩来再度安排《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布了这一消息，并配以“毛主席语录：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记录，经外交部相关人员整理后，专门提供给了斯诺一份。但斯诺结合自己的笔记整理的文章，因种种原因，迟至1971年4月才得以发表在美国的《生活》周刊上。而这时，毛泽东已经等不及了。

1971年3月，中国于“文化大革命”后首次派乒乓球队参加日本名古屋的世乒赛。毛泽东高度重视，常常“像着了魔似的躺在床上三四个小时睡不着。平时起床总有一套事要做，比如穿衣服、擦脸、漱口、吸烟、喝茶等等。这些天他觉得做这些事是浪费时间，马马虎虎地做完就看文件”。天天催要相关信息和报告，想了解情况。

由于美国政府这时也在设法向中方示意，因此，在美国政府的暗示和推动下，美国乒乓球队主动提出了访华要求。不了解情况的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报告，主张不邀请美国队访华。周恩来也不认为此时邀请美国队访华是适宜的，因此于4月4日也批示“同意”，并转呈毛泽东。反复考虑两天后，毛泽东也批示同意，退回外交部办理。但报告退

回后毛思来想去,总觉得机不可失。最后,他终于下定决心。他当时已经吃了安眠药,在昏昏欲睡中突然对吴旭君说起话来:“打电话——王海容——美国队——访华!”

美国队成功访华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及其助手黑格亦先后访华,确定并安排尼克松总统访华事宜。由于黑格在转达美方口信时,突出强调了在中苏冲突问题上,美方愿意“维护中国的独立及其生存能力”的态度,让自尊心极强的毛泽东大发脾气。因而,不仅周恩来等当面严词反驳了黑格,上海地区的领导人更是马上通知黑格一行准备去的上海、杭州等地的相关接待单位:要马上“降温”,“脸无好脸,菜无好菜”,且“糖果减半”。可是愤怒归愤怒,毛泽东还是不愿意因此使中美缓和的进程受损。故得知上海方面的态度后,他当即要求一切照旧,不许降温,还要上海方面要设法挽回不良影响。他甚至亲自批示称:“糖果不能减,照送。”

终于,1972年2月21日,迎来了美国总统访华的日子。就在尼克松到来之前,毛泽东2月1日会见过巴基斯坦总统布托之后,刚刚患了一场大病。病虽初愈,但自2月中旬以来十天左右时间他都一直躺在床上,连起床和在床头久坐的时间都很少有,身体状况十分虚弱。毛自己也对自己的身体状况缺少把握。因此,外交部门也一直没有确定毛泽东与尼克松会面的时间。然而,从尼克松的专机到达上海后,毛泽东就一直有点心神不宁,犹豫要不要马上见这群美国人。他时不时就会询问身边工作人员,尼克松的飞机到了什么地方。终于,就在尼克松的专机将要在首都机场着陆时,他再也躺不住了。他艰难地欠起身来,告诉吴旭君:“你给周总理打个电话,告诉他,请总统从机场直接到游泳池,我立刻见他。”

吴旭君等劝说无用,赶快通知了相关人员,然后小心地把老人扶起

来,帮他一件一件穿上衣服,并请来理发师为近 20 天没有梳理过的毛泽东理发刮脸。由于对毛的身体状况毫无把握,吴等极度担心。叫人准备了食品,防止毛谈话中发生低血糖现象。叫医护人员准备好了所有必要的医疗器械和急救药品,连强心剂都抽到针管里,随时准备应急。


结果,人逢喜事精神爽。原定 15 分钟的会面,毛泽东一高兴,和尼克松、基辛格海阔天空地聊了 65 分钟。

尼克松走后,毛泽东仍意犹未尽,毫不感觉疲劳。他兴奋地告诉吴说:看来中美可以建交了。“中美建交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由此不难了解,在毛泽东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反帝革命主张的背后,还有一颗同样极强的自尊心。基于这种强烈的自尊心,他在内心深处实际上对美国的外交承认及其中美关系极其重视,对长期得不到美国的承认和受制于美国而无法成就中国的统一大业,极感不满。新中国建立 20 年里激烈反美反帝,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深受这一现实刺激和困扰的结果。正因为如此,美国政府透露出任何善意的信息,毛泽东都高度看重。一旦认准了有缓和两国关系的机会,虽然深知放弃反帝旗帜代价极大,他未必不会迂回而上,甚至冒险前行。他显然相信,只有得到世界上最强大和最先进的美国的承认,他及其在他领导下的中国,才算是真正踏上了受人尊敬的通往国际政治舞台的红地毯,诸如联合国席位及其统一台湾之类的问题也才有机会“迎刃而解”。毕竟,他既要从共产党的立场观点考虑问题,也要为新中国谋利益。

杨奎松

2009 年 6 月 25 日于上海虹桥怡景园



第一章

美苏冷战与中国革命

引言

战后中国走上革命道路,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以往的研究,比较多地分析了战后中国内部存在的种种问题和推动革命的种种动力,却多少忽略了对外部条件和作用的探讨。迄今为止,注意到分析说明战后中国革命外部条件的文章著作与那些强调中国革命内部原因的文章著作相比,可以说屈指可数。^①而不少谈到这一问题的学者又往往习惯于把这种刺激与反应的过程简单地归结为具体描述中共成功抵制外国干预或进行正确的战略选择的过程。因此,有关战后外部世界变动及其对中国革命所起作用 and 意义问题,似乎尚未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和深入讨论。

何谓战后中国革命的外部原因?通常,许多关注这一问题的人都习惯于把目光集中在战后苏联与中共的关系问题上。结果,中俄两国档案公布的迟缓就极大地妨碍了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准确的评估。但是,严格说来,战后国际环境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苏联究竟在何时何地向中共具体提供了些什么样的武器装备,它其实更重要地反映在,由于美苏关系急剧变动而出现的两国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

^①比较多地谈到中国革命的国际背景的著作,主要有杨奎松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牛军的《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沈志华的《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最高机密档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1998年版);张小明的《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Odd Arne Westad, *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4—1946*,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Michael M. Sheng,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等。在这方面比较重要的论文有任东来的《大国干预与共产党的革命战略——对中国和希腊的比较研究,1944—1946》,原文载于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美国史研究室编:《美国历史问题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

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世界政治关系的迅速分化与改组，给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和机会，它们又在多大程度上便利和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

关于外部因素和作用足以影响一个国家革命成败的情况，战后希腊和南斯拉夫的不同命运提供了一对最具可比性的例子。两国同在巴尔干半岛，两国共产党的力量当时在国内都占绝对优势，并且远较战后中共当时在国内的力量为强，结果却是一个惨遭外部干涉而失败，一个轻而易举就取得了全国政权。之所以出现如此迥异的结果，究其原因，就是因为1944年10月丘吉尔(Churchill, Sir Winston)与斯大林(Stalin, Joseph)有过一个划分双方在巴尔干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根据这一协定，希腊划在了英美一边，结果不仅英美敢于大胆干涉希腊革命，而且当希腊共产党人奋起反抗时，俄国人却不动声色，袖手旁观，眼看希腊共产党人被强敌所压倒。由此可见，一个国家革命的成败，并不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革命者是否有坚强的决心和能否独立自主，甚至也不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中革命一方是否居于优势的地位，外部条件有时会发生相当重要的作用。

由于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事实上把中国划入了美国的势力范围，苏联也承诺战后支持蒋介石，因此，战后中国革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条件，很大程度上恰恰接近于希腊，而不是南斯拉夫。这意味着，中国革命很可能会重蹈希腊革命的覆辙，遭到美国的武装干涉。斯大林强迫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美军在华北登陆助蒋接收……一切都显示共产党人正在陷入希腊共产党人曾经遭遇过的困难境地。但是，战争打起来了，美国并没有干涉，共产党只用了不过三四年的时间，就由弱变强，打败了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取得了世人意想不到的全面胜利。共产党真的不曾得到过苏联的帮助？美国人为何不敢出兵干涉？……十分明显，新中国的诞生，与美苏冷战的发生并非毫无联系。

1. 一个并非题外的话题：“俄国”

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美两国建交以来，许多关注中美关系历史的人都喜欢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即美国在中国的机会是怎样失去的？那意思是说，本来战时来到中国的相当一批美国年轻外交官早就认识到国共两党力量此消彼长的大趋势，提出了发展同中共关系的积极设想，仅仅是因为美国政府随后采取了扶蒋抑共的错误政策，导致美国与中共关系逐渐恶化，从而使美国在长达 20 多的时间里，失去了与新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机会。^①



约翰·S. 谢伟思(前右一)参加修筑延安机场的义务劳动

^①除了 20 世纪 60 年代 Anthong Kubek 所著《远东是怎样失去的》从相反的角度探讨美国丢掉中国的教训以外，约瑟夫·W. 埃谢里克编著的《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 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 年版) 一书大概是最早从论证美国与新中国早应友好这个角度谈问题的书了。



约翰·P·戴维斯(中)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

真的存在另外一种政策选择吗？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年轻外交官当年对中共的好感是建立在怎样的一种基础之上，也许会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谈论这个问题。

我们通常所说的那几位年轻的职业外交官，主要指当时在中国的约翰·S·谢伟思(Service, Jpjm S.)、约翰·P·戴维斯(Davies, John P.)和约翰·C·文森特(Vincent, John Carter)等人。^①文森特大概是最早尖锐批评国民党，主张给八路军以必要援助，并相信中共战后必然要在中国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的外国友人。以后，谢伟思和戴维斯就此做了更多的调查，提交了更多的报告。其核心内容不外以下几点：第一，中国无论在抗战中，还是在战后太平洋的战略格局中，都与美国利益攸关；第二，国民党腐败无能又一味反苏反共，而中共日益强大深得民心，与其一味支持蒋介石，迫使中共战后投入苏联

^①伊利·雅克·卡恩给这群在麦卡锡时代受到过不公正待遇的美国年轻职业外交官起了一个众所周知的名字，叫“中国通”。在他所列举的名单上，比较有名的还有雷蒙德·卢登、约翰·埃默森，以及迪克西使团团团长包瑞德上校等。参见伊·卡顿著，陈亮等译：《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

怀抱，使中国华北和东北落入苏联之手，不如通过援共抑蒋争取中共倒向美国，从而抵制苏联向远东扩张；第三，中共并非正统意义上的共产党，他们的政策实际上更接近于美国人的观念，与苏联的模式相差甚远。^①

在这里，不难看出这些美国年轻外交官们对中共的重视，是建立在怎样一种考虑之上的，这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保护美国的利益，不使苏联战后染指中国。而谢伟思、戴维斯等人正是在对苏联的问题上早就产生了强烈的担心。

还在1942年、1943年，当这些美国外交官还不那么信任中共时，他们就已经在高度关注战后在远东可能出现的美苏利益冲突了。谢伟思当时的警告是：延安的共产党政府可能不会实行美国意义上的民主。而且即使美国为避免共产党的敌意不再给国民党以物资和外交的援助，这个共产党政府还是可能会更倾向于与俄国而不是与英美建立友好合作关系。^②戴维斯与谢伟思一样，他怀疑中共的领导人骨子里仍旧是亲苏的，甚至还可能在接受莫斯科的指示。问题是，蒋介石并没有力量消灭中共却一味地指望用武力解决问题，这样难免会把美国卷入到与苏联的冲突当中去。^③换言之，这些美国外交官这时重视中共、力图接近中共的一个主要目的，正如他们反复强调的，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想由此“获知俄国在亚洲的目标何在”，并采取一切努力避免战后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而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严重问题恰恰在于，腐败专制的国民党难以指望，它不仅“不可能成为对抗俄国的力量”，而且其对中共的态度以及背离民众的种种做法，“不知不觉助成了俄国在东亚的优势”，最终不单是中共可能依据天时地利夺取华北和满洲造成苏联的卫星国，就连朝鲜、台湾都可能被驱入苏联的怀抱之中。^④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看到延安的新民主主义体制的成功尝试，发现中共与苏联几乎没有多少联系之后，他们自然而然地会把抵制苏联向远东扩张的希望，寄托到加强美国与中共关系的前景上来。他们正是为此

^①谢伟思的有关报告，主要部分已经收录在埃谢里克前引书中。戴维斯的有关报告，除了可以在约翰·佩顿·戴维斯的《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中看到相当部分摘要以外，还可以见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42, China, pp.226-228; FRUS, 1943, China, pp.258-266, 397-399; FRUS, 1944, Vol. 6, p.308, 667-671.

^②参见 FRUS, 1943, China, pp.193-199.

^③参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594—595页。

^④参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587—588、592—593、595页。



美国总统罗斯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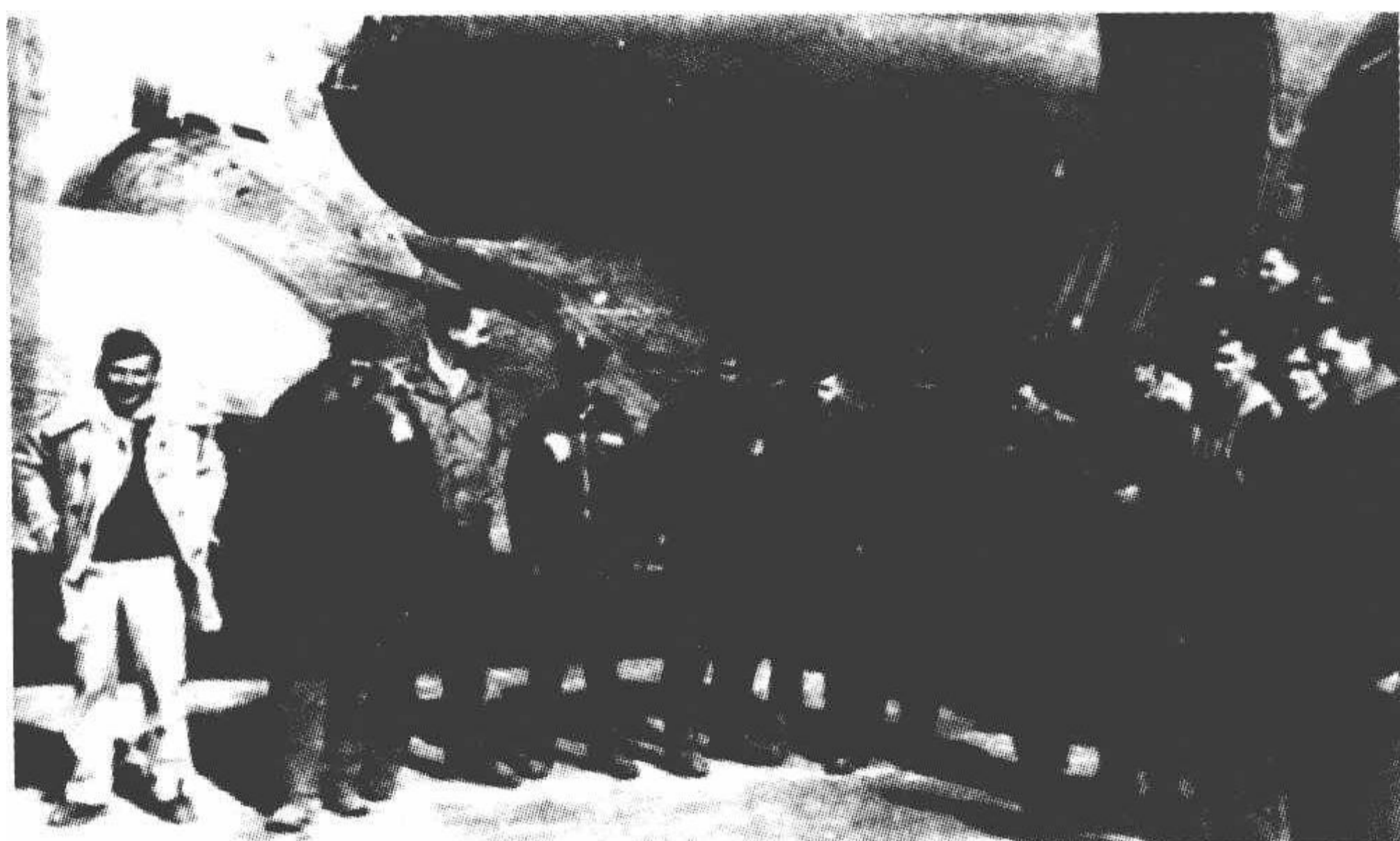
而大声呼吁：“把共产党人拉到我们一边，而不是把他们投入俄国人的怀抱。”^①

以分化中共与苏联的关系作为美国对中共政策的基本出发点，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即中共不能是正统意义上的共产党。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人当时抱有相当多的幻想。最早也是最具权威性的评价大概要算是美国总统罗斯福 (Roosevelt, Franklin) 1941 年“皖南事变”之后委托特使居里 (Currie, Lauchlin) 和联邦准备银行调查统计部主任戴普莱 (Despres) 向蒋介石转达的那个口信了。罗斯福明确讲：“予自万里之外观察中国之共产党员，似与我等所称之社会党员，无甚差别。彼等对于农民、妇女以及日本之态度，足值吾人之赞许。故中国共产党与国民政府相类者多，相异者少。”戴普莱对此更进一步解释称：“罗斯福之意见以为中国之有共产党，并不能认为中国有共产主义之实行，只能视作民主政治之实习。”^②罗斯福的这一看法，显然也是那个时候众多外国人的普遍认识。据外交官们报告：“访问过共产党地区的外国观察家们(包括美国人在内)一致认为，共产党政权的当前政策与正统共产主义相去甚远。它为政异常清廉；已经举行了普遍选举；个人的经济自由相对而言未受限制，这一政权看来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与其说它是共产主义的政权不如说它是农业民主的政权更为准确。”^③

①埃谢里克前引书，第 249—269、271—274、304—307、317、326—332 页。

②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一)，台北，1980 年版，第 542—545 页。

③FRUS, 1943, China, pp.258-266.



1944年秋美军观察组成员在延安机场的合影

在随着美军观察组进入延安实地观察，看到种种带有民主改良色彩的新鲜事物，如统一战线、土地改革、民主选举等深得民心的政策实践，听到毛泽东的种种许诺和保证之后，原本就对中共有些好感的美国年轻外交官们，开始把这些明显代表着中国大众和未来，又格外注重中国实际的生气勃勃的共产党人，同美国人的民主理想联系起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谢伟思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兴奋地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宣称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他们深知中国不能从目前的农业社会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后，社会主义才能到来。因此，他们“希望不通过暴力革命，而是通过长期的、有秩序的民主过程和受控制的经济增长来达到目的”。作为真诚的民主制度的拥护者，他们相信：“在民主制度下，经济可能有秩序地增长，通过私有企业阶段最终进到社会主义，而无需经过剧烈的社会动乱和革命。”他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将不会违反美国在中国的利益，共产党应该尽可能受到我们的同情和友好对待”^①。

如果说谢伟思对中共未来究竟是更重视理论，还是更重视实际这一点还有些不十分自信的话，那么戴维斯的看法更加直率。他说：中共只是号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罢了，他们其实与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MacDonald, Ramsay)一样，不过是些主张渐进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国共产主义的圣徒和先知们住

^①埃谢里克前引书，第221—225页。

在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里,过着俭朴的生活,幻想着奇怪的阶级妥协和政党联合之神降临,面带羞涩地拜倒在外国投资的金犊之下,并且渴望自己能按世界标准受到尊重。”他们现在追求的只是土地改革和政治民主。正因为如此,他们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唯一一个受到人民广泛支持的政党组织,也是腐败堕落的国民党所无法战胜的。中共命中注定将会控制中国,承认中共并与他们合作,他们就会保持其民主的一面而与美国友善。坚持援蒋,美国就会成为他们的敌人,并迫使中共变成俄国的附庸。何去何从,关系重大。^①

十分明显,谢伟思、戴维斯等人寄希望于加强与中共的联系来拒止苏联的想法,是建立在对中共性质和未来发展前景的上述判断上的。然而,这一判断是否符合实际,却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断言谢伟思、戴维斯的主张为美国战时对华政策指明了正确方向,实际上等于承认中共真的倾向于渐进改良、自由经济和民主制度,认识到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过火的做法”;等于说如果美国当年选择了谢伟思、戴维斯等人的政策,即使中共掌握了政权,新中国也不会倒向苏联,而且还会采取能够让美国人认可的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实事求是地说,谢伟思、戴维斯的这一看法,多少有点儿一厢情愿。而据此来指望分化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把中共引上美国式的民主道路,保证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无疑也是靠不住的。

既不了解共产党的历史,也不清楚共产党的理论,多半是造成谢伟思、戴维斯等人一厢情愿的关键所在。任何熟悉共产党历史的人都知道,共产党虽然通常以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相号召,但他们在不同的革命阶段,革命的手法和目标却是不尽相同的。共产党的理论也很清楚地规定了不同革命阶段的不同革命任务。在民主革命阶段,被谢伟思、戴维斯等人所看重的统一战线、土地改革以及对民主政治的诉求,本来就是其论题中的应有之义。仅仅因为注意到中共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条件下采取了温和的社会政策,就断定“中国共产党人向后倒退了”,强调他们是由于认识到“以往的过火做法”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妥协与和谐,因而决心“迁就人类意志薄弱的一面”,真诚地走向循序渐进的改良主义和独立于俄国的民族主义,这只能说明谢伟思、戴维斯这些年轻外交官,甚至也包括罗斯福等少数美国上层领导人在内,这个时候对共产党实在

^①参见 FRUS, 1944, Vol. 6, pp.667-671.

所知甚少。^①

当然,必须看到,对中共在政治上的同情,的确是因为许多美国人这个时候看到了一个与苏联截然不同的中共:一个独裁,一个民主;一个崇尚暴力,一个主张改良;一个坚持国家垄断一切的社会主义,一个强调要发展以自由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显然,后者更接近于美国人的民主理念。但这同时也说明,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其实仍旧是严守着一条意识形态的分界线的。他们从美国式的民主政治观念出发,对苏联以暴力革命和阶级专政为特点的苏维埃制度抱有强烈的戒心。谢伟思、戴维斯对战后苏联东扩的高度警觉与担忧,就突出地反映出他们在观念上是排斥苏联,并把它视为潜在敌人的。换言之,一旦共同的敌人德意日法西斯将不复存在,美苏之间,甚至美国与中共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都会逐渐凸显出来。抵制苏联,并殃及各国共产党人,是战后美国政治发展的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从这一点出发来认识问题,设想战后美国会实行联合中共拒止苏联的政策,或是设想中共会采取迎合美国疏远苏联的态度,都是不现实的。

2. 意识形态:不可调和的分歧

其实,随着欧洲战争接近胜利,西方国家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已经渐渐暴露出来了。而它所带来的影响,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美英与苏联之间的问题。

还在围绕着何时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争论中,苏联与美英之间就已经开始产生分歧。莫斯科怀疑美英有意坐山观虎斗,部分美国将领也毫不掩饰他们就是希望看到法西斯德国与专制制度的苏联两败俱伤。^②为了战后苏联自身的战略利益,苏联开始推动欧洲部分国家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南斯拉夫、波兰、阿尔巴尼亚、希腊等国 1943 年底和 1944 年初相继开始出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组织。苏军大举越过边界攻入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及保加利

^①参见 FRUS, 1944, Vol. 6, pp. 667-671.

^②时任东南亚盟军副参谋长的艾伯特·魏德迈就清楚地表示过这种态度。参见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第 156 页。



斯大林



丘吉尔

亚等国,也极力扶持共产党成为统治的力量。同样,面对东欧以及巴尔干等国共产党的崛起,英美政府的态度也十分明确:“我们决不能为了迎合那些野心勃勃的、下流的无名之辈的一时高涨的欲望”而抛弃这些国家的流亡政府,因为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只会毒化一个国家的政治空气,他们绝不可能体现出立宪精神,建立民主政治。^①在这里,人们事实上已很难区分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在双方政治和战略考虑中究竟有什么不同。无论英美还是苏联,他们在考虑战后世界的安排时,显而易见都是把意识形态的选择与实现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可能联系在一起。而他们各自的国家利益,包括自身制度的巩固和势力范围的设定,说到底其实都是建立在严格排斥对方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的。主要依据意识形态,而不是主要依据国家强弱和历史传统来划分势力范围,正是这场战争区别于以往历次欧洲战争的一个最明显的后果。

对欧洲战略地位重要的一些小国的争夺,最先触发了英美和苏联之间一度被战争掩盖了的意识形态对立。1944年2月,苏联在与波兰流亡政府代表的接触中,注意到其强烈的反苏态度,并获悉波兰流亡政府领导下的“国家军”准备在苏军进入波兰时抢先建立行政机关,据此,苏联迅速决定援助波兰工人党大量发展“人民军”,并随着苏军进入波兰境内,宣告支持波兰人民代表会议组成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作为波兰行政机关。此举不可避免地引起了英美两国政

^①参见温斯顿·丘吉尔著,北京编译社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5卷,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825—827、838页。

府的强烈反对。^①在这种情况下,波兰流亡政府乘苏军进抵华沙城外之机于8—9月间在华沙发动的起义,很自然地被斯大林视为是波兰流亡政府企图排斥苏联支持的卢布林委员会^②的重大阴谋。^③结果,英美和苏联之间围绕着应否援助华沙起义问题发生了自战争开始以来最激烈的争执。罗斯福和丘吉尔联名致电斯大林,呼吁苏联“立即向华沙波兰爱国者空投物资和军火”,“不然你是否同意火速帮助我们的飞机来进行此事?”斯大林对此断然回绝。他得到的情报使他有理由宣称波兰国家军的领导人完全是“一小撮权欲熏心的罪犯”,这个时候发动起义是别有用心,因此他不仅坚决拒绝“同华沙冒险发生关系”,而且也不同意帮助英美空军实施空投行动。可想而知,苏联的态度不能不引发一场激烈的批评。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Harriman, Edward H.)指责苏联“基于残酷无情的政治考虑”置抵抗战士于死地,丘吉尔则主张通过舆论揭露俄国人的这种“古怪而阴险的行径”^④。

^①参见叶戈罗夫主编,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第8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44—346页;苏联外交部编,潘益柯译:《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1卷(以下简称斯大林同丘吉尔和艾德礼的通信),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195—197、201—204、207—208、243、246—247、251—252、292—293页;苏联外交部编,宗伊译:《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2卷(以下简称斯大林同罗斯福和杜鲁门的通信),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128—129、153—156、178—179、181—183、184—185页。

^②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因设在卢布林而得名。

^③有关波兰国家军敌视苏联和苏维埃制度的程度,可以从苏军在华沙起义期间得到的下面这则国家军的传单中略知一二。传单称:

“波兰同胞们,在我们英勇斗争的紧要关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拥有对胜利坚定不移的信念,服从领导,准备为民族作出牺牲。我发布如下命令:

布尔什维克兵临华沙,他们宣称自己是波兰人的朋友,这是阴险的谎言。我们的边境地区,维尔纽斯和卢布林都在疾呼复仇。布尔什维克的敌人会遇到无情的打击,这种打击已使德国占领者摇摇欲坠。有利于俄国的行为是对祖国的背叛。波兰起义的时刻还未到来。我废除苏联走狗颁布的命令。国家军司令有权镇压一切支持苏维埃的企图。

德国人在仓皇逃窜。起来同苏维埃斗争。

自由波兰万岁。”

参见吴伟编辑《苏联与1944年华沙起义》中No.07925号文件:苏联驻波兰部队代表关于国家军发出反苏文件给朱可夫的报告(1944年9月19日)。

^④丘吉尔前引书,第6卷,第198、201、205页;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合著,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究室译:《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378—379、381—382、385、386页。

在华沙起义问题上所暴露出来的矛盾，实际上已经点燃了战后美苏冷战的导火索。只不过，这个时候不仅盟军在欧洲作战离不开苏联人，就是美国在远东战场上也还要指望苏联人帮忙，再加上盟军进展缓慢，苏军已进入波兰、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眼看就要染指巴尔干半岛，希腊、南斯拉夫又都出现了共产党同流亡政府争夺权力的斗争，整个形势对英美明显不利。因此，无论是罗斯福还是丘吉尔，都不能不一面要求盟军指挥官尽可能抢占欧洲地盘，一面对斯大林作出某些妥协。华沙的起义者刚刚放下武器，丘吉尔就压抑住强烈的愤慨，与外相艾登急匆匆飞到莫斯科，去与斯大林讨论希腊的命运问题了。

丘吉尔之所以如此重视希腊问题，是因为希腊卡在英国通过地中海接通其东方殖民地的咽喉处，对英国极具战略意义。而强大的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却突然间否认流亡政府，准备独立掌权，这等于说将来地中海的通道很可能会处于俄国人的炮口之下，丘吉尔当然要坐卧不安了。他这时在考虑用武力来对付希腊共产党了。他一面要求英军总参谋长准备紧急调动一万或一万二千军队进入雅典，呼吁美军协助英军行动，一面强硬地表示，万一事态恶化，希腊民族解放阵线“乘战争混乱之际使希腊共产主义化”，“建立一个专横的共产党政府”，英美必须准备鼓动和援助希腊人民反对布尔什维主义。^①

要对希腊共产党动武，丘吉尔不能不考虑到苏联的反应。因为，如果不能取得苏联的谅解，英军即使能够占领首都雅典，以后也未必能够真正取得对整个希腊半岛的控制权。早就熟悉了殖民主义那一套强强交易的丘吉尔，于万般无奈之中，不得不主动提议苏联战后可以取得对罗马尼亚的控制权，在保加利亚也可占有主要的优势，包括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也可以占有相当的优势，以此来换取斯大林承诺希腊为英美的势力范围。反正苏军已经大举进入罗马尼亚，并逼近保加利亚和匈牙利边境，南斯拉夫共产党又势力强大，英美事实上对这些国家最多也只能争取到如此程度。考虑到苏联在经济上和军备上还不得不依靠美国，在波兰以及以后占领德国等问题上也还必须设法取得英美的合作，斯大林很痛快地答应了丘吉尔的提议。据此，双方于10月9日商定，苏联占90%的罗马尼亚，英美占90%的希腊，各占50%的南斯拉夫和匈牙利，苏

^①参见丘吉尔前引书，第6卷，第167—168、171—172页。

联占 75% 的保加利亚, 英美占 25%。这就是著名的“百分比协定”^①。

不论后人对“百分比协定”有何种批评, 这一协定无疑是对这个时期英美与苏联在欧洲军力对比的一个清晰的写照。希腊共产党从此成为英军干涉的牺牲品, 但英美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罗马尼亚成为共产党人的囊中物。甚至不只是罗马尼亚, 就连 75% 的保加利亚、50% 的南斯拉夫和匈牙利, 也一个接一个地落入共产党之手。因此, 当希腊共产党的反抗遭到英军镇压时, 斯大林显然并不感到内疚。^②相反, 当时, 特别是英美在力量对比上明显变强以后, 对与苏联的这一交易始终有些耿耿于怀的, 却是始作俑者的丘吉尔本人。很明显, 如果说斯大林从来都是拿阶级划线, 坚持无产阶级必须依靠共产党专政的话, 丘吉尔则从来都是拿英美式的自由民主制度作为衡量是非黑白的政治标准, 对强调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主张深恶痛绝。还在华沙起义过程中, 丘吉尔就曾与罗马教皇大谈“共产主义的危险”, 他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让苏联人把他们的那一套推行到这么多国家中来呢? 他这时曾公开发表文告, 不指名地告诫欧洲人民不要接受苏联向欧洲推行的苏维埃制度。他宣称: 在当今世界, 只有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文明唯一正确的选择。如何检验各国人民究竟是否享有自由与民主, 就是: “有自由发表意见以及反对和批评现政府的权利吗? 人民对政府不满时有权把它赶下台吗? 是否存在着人民可用来表达自由的意志的立法途径? 司法部门是否超脱于行政暴力之外并不屈从于暴民威胁? 是否摆脱同某些政党的联系? 法庭是否将行使公开的、公认的法律, 而这些法律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同合乎情理与正义的准则联系在一起的吗? 是否对穷人与富人、平民与政府官员做到一视同仁呢? 除对国家应尽的义务之外, 个人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维护与尊重? 为了生计而日夜操劳、为了养活一家人而疲于奔命的普通工

^①丘吉尔前引书, 第 6 卷, 第 337—339 页; 哈里曼前引书, 第 399 页。根据苏方的档案记载, 当时经过莫洛托夫和艾登修改后的百分比协定对苏联更加有利: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三国苏联占 80%, 英美占 20%, 南斯拉夫各占 50%。见拉津斯基著, 李慧生等译: 《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 新华出版社 1997 年版, 第 575—576 页。

^②由于英军开进雅典, 支持保皇派的希腊军队和流亡政府回国, 希腊民族解放阵线一度在苏联的要求下与流亡政府妥协, 参加了联合政府。但随后英军司令斯科比下令民族解放阵线交出武器, 后者举行抗议遭到镇压, 民族解放阵线发动了起义。起义从 12 月一直持续到 1945 年 2 月, 由于民族解放阵线起义之初采取了扣压人质等一些丧失人心的做法, 再加上希腊面积有限, 军事上回旋余地过小, 又得不到苏联的赞同, 因此在英军的强大攻势下最终归于失败。



雅尔塔会议期间的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

人或农民,是否有免于恐怖的权利?”^①

毫无疑问,这绝不仅仅是丘吉尔个人的看法,它同时也是欧美大多数国家政治家的看法。因此,丘吉尔的讲话当时就得到不少美国官员的支持。哈里曼甚至已经开始担心苏联会把它在东欧的这一套照搬到远东去了。他为此曾接连提醒华盛顿说:苏联正在通过暴力手段向东欧国家推行其“秘密警察(这就取消了个人自由)、新闻检查、奴化教育等”的做法,“当他们能够向中国和太平洋方向觊觎时,这种政策就会伸展到那里”。美国决不应该让苏联为所欲为。^②

^①丘吉尔前引书,第6卷,第177—178、192—193页。

^②参见哈里曼前引书,第385、387—389页。

3. 斯大林：一种观念，两种角色

到了1944年底和1945年初，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经毋庸置疑了，但是，越是接近胜利，美国人就越是关心这最后的代价问题。为取得对日本作战的绝对优势，减少美国人的牺牲，罗斯福也不得不采取丘吉尔“百分比协定”的办法，通过与苏联交换某些利益，来取得苏联的合作。^①1945年2月的雅尔塔协定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达成的。

有一种看法认为，雅尔塔协定实际上划定了战后美苏各自在远东的势力范围，比如在中国，长城以外归苏联，长城以内归美国。但是从英美苏三国领导人签过字的秘密协定条文中可以看出，美苏两国并没有就此达成明确的协议。从斯大林再三提到其目的之一是要恢复沙俄因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丢失的权益，明确要求租借大连、旅顺两港和中东及南满铁路的要求，可知斯大林是有把中国东北划入其势力范围的某种打算的，但罗斯福并没有全盘接受。双方最后达成的条文规定：“1.维持外蒙(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2.恢复1904年日本背信弃义的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各项权利，即(甲)将库页岛南部及其全部毗连岛屿归还苏联；(乙)大连商港国际化，并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惠权益，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丙)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对通往大连的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进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惠权益，而中国保持在东北的全部主权。3.千岛群岛交给苏联。”在这里，一个“大连商港国际化”，一个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中苏合营，再加上“中国保持在东北的全部主权”，清楚地表明了美国不同意把东北划入苏联势力范围和坚持东北要门户开放的态度。^②

很难认为斯大林不清楚美国人的这种态度。问题仅仅在于，雅尔塔协定签字之日，欧洲战争尚未结束，莫斯科与英美间在欧洲还有许多麻烦要解决，况

^①有关美国当时需要采取这一妥协的原因，哈里曼的解释是有根据的。参见哈里曼前引书，第442—443页。

^②参见萨纳柯耶、崔布列夫斯基编，北京外国语学院1971届工农兵学员译：《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258页；哈里曼前引书，第443—447页。

且苏联在太平洋战争中从无建树,只凭一纸出兵许诺,就得到沙俄当年丢掉的在中国东北的主要优惠权益,不仅被美国拉入大国行列的中国因此无法就外蒙归属问题提出异议,而且可以在太平洋得到对自己极具战略意义的不冻港,可以取得逼近日本列岛的千岛群岛,这已经是不小的收获。提出更多的要求,斯大林这时还缺少足够的筹码。

随着红军在欧洲的节节推进和苏联在东欧诸国扶植共产党上台的步步成功,斯大林已经形成了一种凭实力讲话的坚定信念。他对此有过明白的表述,那就是:这场战争和过去不同,谁占领了地方,谁就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制度。军队到哪里,制度就建到哪里,只能是这样。^①雅尔塔会议刚刚结束,苏联政府就采取了一系列深受英美抗议的行动。包括逼迫罗马尼亚国王解散联合政府,在苏军的支持下成立以共产党为首的新政府;不允许英美派观察员或代表团访问波兰,不允许其代表前往波兰处理苏军在波兰解救的英美战俘问题,等等。当丘吉尔和罗斯福就此提出交涉时,斯大林的回答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你们在你们的占领地享有优先权,我们在我们的占领地享有优先权,我们怎么做自有我们的道理,别人无权干涉。^②

既然凭实力讲话,^③斯大林对自己势力范围的可能界限自然也看得十分清楚。苏联在自己的占领区内可以为所欲为,但对于英美盟军占领下的国家和地区,则明显地采取了旁观的姿态。斯大林对“百分比协定”的严格遵守,就连丘吉尔也无话可说。正因为如此,莫斯科对处于英美占领区内的各国共产党,无论其在民众中是否占据优势,都一概要求其与美国支持的当局合作。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抵抗力量最终解除武装,党的领导人加入政府,走上议会道路,就是这一政策的必然结果。斯大林在雅尔塔及其以后明白承诺支持美国的对华政策,并再三表态支持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政府,自然也是这一政策在远东的延伸。^④希腊共产党的遭遇,似乎也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斯大林

^①参见吉拉斯著:《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②参见丘吉尔前引书,第6卷,第618页;前引斯大林同丘吉尔和艾德礼首相的通信,第309—310、316—317页;前引斯大林同罗斯福和杜鲁门的通信,第195—198页。

^③用杜鲁门的话来说就是:斯大林只懂得一种语言:“你究竟有多少师?”参见《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519页。

^④参见邹说著,王宁等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页。



十月革命中的列宁

的观点,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个国家的政治前途,只能而且应该由苏联或者英美的军队来决定。共产党发动的在英美势力范围内的革命,都必然会遭到英美军队的武装干涉,最终归于失败。

熟悉列宁(Lenin, Vladimir Ilich)著作的读者都会了解,斯大林的这一观点与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得出的观点有很大的不同。列宁的观点是,世界已经进入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战争必然

导致革命,也只有革命才能制止战争。^①为此,列宁当时不仅坚决领导了俄国的十月革命,而且还采取了积极推动欧洲革命的方针。不过,斯大林有斯大林的道理,而且依据斯大林的逻辑,也并非违背了列宁的上述立场。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斯大林在回答有关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时就曾清楚地表达过他的看法。他当时写道:“一个已经取得胜利而又处在许多资本主义强国包围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能不能认为自己有充分的保证来摆脱武装侵犯(武装干涉)的危险,因而防止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的企图呢?如果没有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大力援助,我国工人阶级和我国农民能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像已经战胜本国资产阶级那样战胜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呢?”“列宁主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特别引用了两段列宁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这一观点。其一是说:“就完全保证防止资产阶级关系的复辟而言,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只有在国际范围内才是可能的。”这就是说,国际无产阶级的大力援助,特别是无产阶级在几个国家内的胜利,是完全保证苏联免除武装干涉和复辟企图、保证社会主义最后胜利的必要条件。其二是说:“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统治阶级即无产阶级只要愿意统治并继续统治下去,就应当也用自己的军事组织来证明这一点。”^②

不难看出,争取无产阶级在几个国家内的胜利和通过强大的军队来实现保护苏联的目的,始终是斯大林的基本战略考虑。斯大林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把强大军队和在几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的胜利联系起来,并突出强调其意义,更多的只是因为历史给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机遇,而这与列宁通过推动欧洲革命来巩固本国社会主义的目的,并没有丝毫的不同。显然,对斯大林来说,这场战争提供的机会实在是太宝贵了。如果不是因为这场战争给红军提供了大举进入东欧各国的机会,依照这些国家内部的革命条件,要建立起共产党的政权,尚不知何年何月。因此,斯大林非常看重这一机会,也生怕任何无序的革命会毁坏共产党人盼望了20多年才得来的这一系列胜利成果。更何况,要

^①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第80—82页。

^②《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68—169页。

医治长达四年之久的战争创伤,使苏联迅速成为世界最强国,以追求整个欧洲的社会主义化,在完全有可能利用战时与英美达成的谅解,争取到几十年和平发展时期的条件下,他也决不愿意把苏联拖入到新的军事对抗和战争危险当中去。^①

相信苏联社会主义的利益,代表了人类最根本的利益,不仅要求苏联共产党及其无产阶级,而且也要求世界各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无条件服从它的一切需要,这是生活在共产党意识形态观念之中的斯大林认识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不论斯大林多少遍地把俄罗斯的昨天和今天联系起来,也不论斯大林多少次地把自己说成是俄罗斯(或者说是苏联)国家利益的代言人,我们都不能把他简单地等同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或民族扩张主义者,不能简单地说他这时只是在谋求俄国的民族利益。必须看到,斯大林维护的首先是一个共产党政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苏联。所谓苏联国家的利益和安全,首先是与共产党的地位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俄国民族的利益是在其次的。因此,斯大林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共产党;从来没有忘记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认识世界和决定政策;从来没有忘记苏联根本上不同于现在世界上一切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从来没有忘记他和大大小小的丘吉尔、罗斯福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不是你战胜我,就是我战胜你的根本利益冲突。而这种情况实际上也就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走向,不管斯大林是否打算鼓励其他国家革命,它都不可避免会逐渐与资本主义的英美两国,特别是与一心想要在全世界充当自由民主的“守护神”的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陷入到新的军事对抗和战争危险之中。

雅尔塔会议之后苏联与英美之间的摩擦可谓层出不穷。这边围绕着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的争执尚难平息,那边苏联又向土耳其提出了领土和

^①根据近年公布的俄国档案,可知即使在战争期间苏联领导人也从未真正改变过对美英等国帝国主义性质的本质认识,但他们并不主张因此在战后推动欧洲革命的爆发。1944年1月11日苏联副外长迈斯基提交给莫洛托夫的题为《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原则》的报告明确主张:为了争取战后能够保持30—50年的和平局面使苏联治愈战争创伤,推进欧洲的社会主义化,苏联有必要在通过军队向周边国家推行苏维埃制度的同时,与美国和英国保持合作关系,为此应避免在欧洲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这会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冲突过于尖锐。报告相信,尽管美国是最具进攻性的帝国主义堡垒,但由于它的世界范围内需要扩张的地区十分广泛,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可能与苏联妥协的。



苏联红军占领德国柏林国会大厦

海军基地的要求,力图控制达达尼尔海峡,以拥有黑海的出海口;向伊朗提出了获得其北部的石油租让权的要求,以确保苏联对伊朗的影响。为达到目的,苏联甚至不惜在沿土耳其边境的伊朗和保加利亚一侧调兵遣将对土耳其示以武力威胁,在伊朗则采取拖延撤军和扶植亲苏的分裂政权的办法以相要挟。^①

^①参见张盛发:《苏联与战后初期的中近东危机:缘起与结果》,1999年3月20日首都师范大学“冷战”起源与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散发论文。



宋子文

不仅如此,苏联在远东也开始提出新的要求。当5月8日德国宣告无条件投降,大批苏军如约开始向苏联远东地区集结,准备投入对日作战之后,斯大林对占领中国东北较前也更加充满了信心。既然苏军将要占领中国东北,依照“军队到哪里,制度就建到哪里”的逻辑,苏联完全有理由在中国东北建立一个共产党政权。当然,从苏联长远的战略利益考虑,斯大林不会为此去违反与英美达成的协议。毕竟,雅尔塔协定涉及不少与苏联利益攸关的重要问题,包括需要美国政府遵守协定才可能落实的有关南库页岛以及千岛群岛等领土的重新归属等问题,苏联方面对协定的任何变更都可能造成不利的后果。但是,轻易地根据协定中的主权规定就把东北交还给国民党,斯大林也心有不甘。因为国民党过于亲美,而美国一旦根据门户开放原则进入东北,对苏联的安全不能不是一种威胁。这也就是为什么,斯大林在7月与国民政府代表宋子文的谈判中,利用雅尔塔秘密协定措辞不严密的空间,提出了许多大大超出协定规定的具体条款的要求,并且以中共即将进入东北相威胁。^①斯大林新要求的实质,说

^①有关斯大林过分要求的细节可详见邹谠的解说。邹谠前引书,第240—241页;并见FRUS, 1945, Vol. 7, pp.967-969.

到底,其实就是想要逼迫国民政府在实际上承认,中国东北主要是苏联的势力范围。

围绕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具体条款的谈判,引起了美国的高度重视,并公开出面加以干预,^①这使中苏谈判多少有些起伏。但斯大林最终还是相当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不仅如此,斯大林很清楚,一旦百万苏军跨过中苏边界,到时候苏联还可以有所作为,无论是蒋介石还是美国,都没有多少回旋余地。当然,基于雅尔塔协定的约定,斯大林也作出了今后一切道义的和物质上的援助只提供给国民政府的承诺。^②并且在签订了条约之后,斯大林还专门致电毛泽东,要求毛立即到重庆去与蒋介石谈判和平统一问题。^③斯大林这时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很清楚,只要东北能够基本控制在苏联的手里,在美国势力范围内的中国,与在英美势力范围内的欧洲一样,都不应该爆发革命,因为这不仅可能引起美国的武装干涉,而且可能破坏美苏之间的合作,影响苏联的长远战略利益。为此,毛泽东完全可以向法国共产党学习,而没有必要像希腊共产党那样自讨苦吃。他显然没有想到,不过一个多月之后,他所寄希望的美苏合作就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4. 中共: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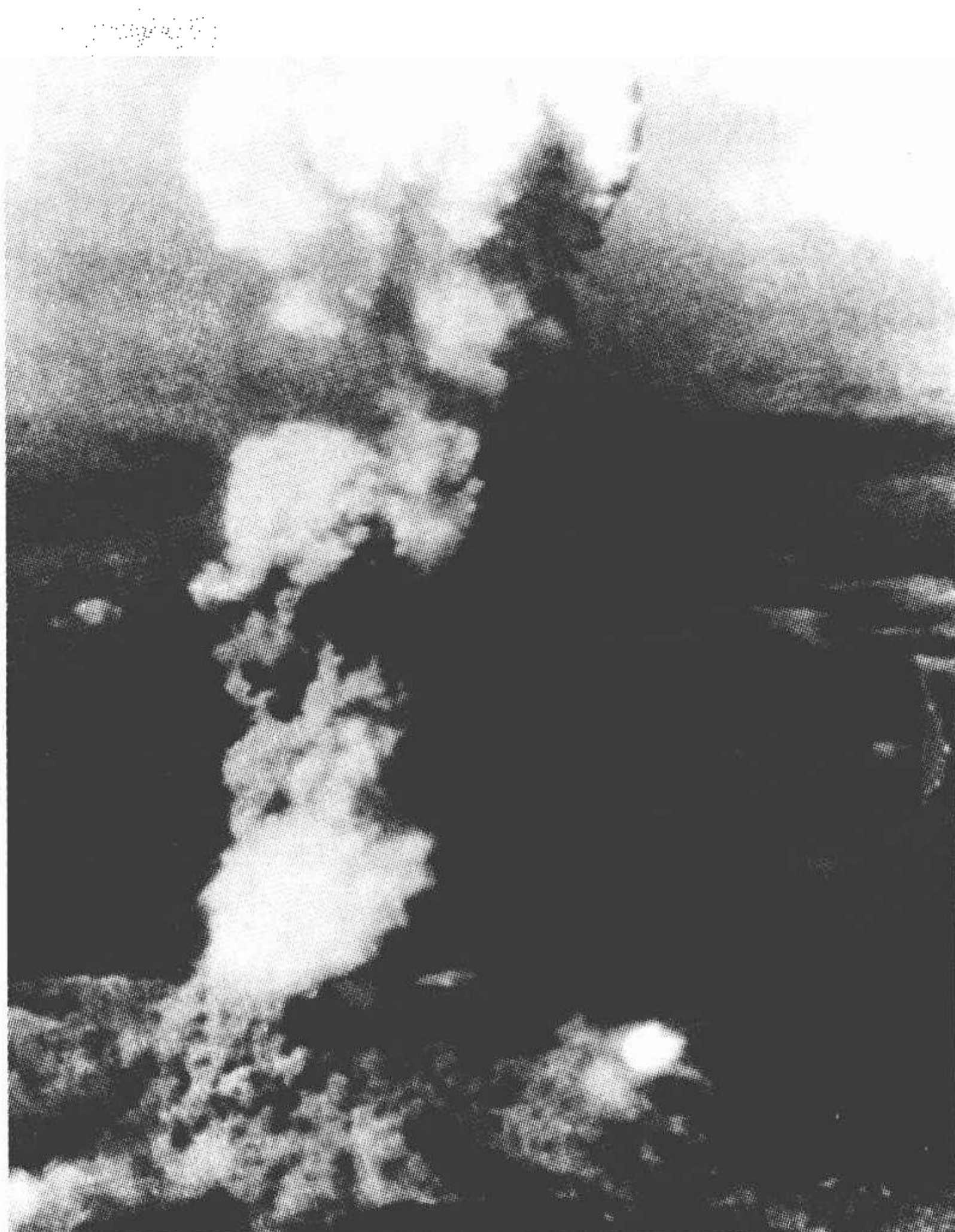
还在德国刚刚投降不久,美国政府内部围绕着要不要重新修订对苏政策和重新讨论雅尔塔协定的问题,就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助理国务卿格鲁、前总统胡佛等人坚决反对为争取苏联早日参加太平洋战争而牺牲美国在远东必须达到的各种政治目标。他们明确认为,斯大林与希特勒没有什么两样,一旦苏联进入太平洋,它定会取代日本在东亚和太平洋的地位,不仅外蒙、满洲、朝鲜都将逐渐纳入其轨道,整个中国,甚至日本,最终也将受其控制。^④随后斯大林

^①参见 FRUS, 1945, Vol. 7, pp. 960-965, 965-966.

^②综合蒋介石给宋子文的指示,可以看出蒋对苏联的中心要求即在中共问题上。前引战时外交(二),第 593—594、596、621 页。而美国的态度虽一度强硬,但苏军进入满洲后,也明显软了下来。可对照美国政府 8 月 5 日和 11 日给哈里曼的指示电。FRUS, 1945, Vol. 7, pp. 955-956, 969-970.

^③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78 页。

^④参见 FRUS, 1945, Vol. 7, pp.869-870.



广岛原子弹爆炸时的蘑菇云

在中苏谈判中坚持要控制东北铁路和大连主要行政权，并且要依照沙俄的旧例划定军事区的种种情况，不可避免地使美国政府内部对苏联的敌意进一步加强。正在莫斯科的戴维斯和已经调赴华盛顿担任国务院中国司司长的文森特，都明显地改变了过去的观点。戴维斯多少有些悲观地预言：中共看来必定会在苏联的轨道上运行。而有了中共的支持，苏联无疑会在远东，特别是会对满洲、华北和朝鲜采取行动。而文森特则提议，美国必须支持国民政府采取坚定立场，反对蒋介石对苏联作出超越雅尔塔协定的让步。即使因此达不成协议，最终在解决满洲问题时，我们也会处于比现在更有力的地位。^①此前始终主张争取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美国军方，这时的态度也明显地开始发生了改变。他们不仅命令太平洋战区盟军司令麦克阿瑟(MacArthur, Douglas)务必独占日本和朝鲜南部，以闪电动作阻止苏军进入，而且主动制定了一个帮助蒋介石占

^①参见戴维斯前引书，第405—406页；邹谠前引书，第247—248页。



1945年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进入大城市

领包括上海、烟台、秦皇岛在内的几个重要港口的计划。在决定投掷原子弹之后，国务卿贝尔纳斯(Brynes, James F.)甚至明确表示，十分希望能在俄国人介入之前结束对日战争，特别是在他们进入大连和旅顺港之前。陆军部长史汀生(Stimson, Henry)后来更是声称：原子弹其实是炸给苏联人看的，为的就是可以使民主国家在外交上获得一种急需的均势，以对抗共产国家战后的庞大势力。^①

1945年8月9日，苏军外贝加尔方面军和远东第一、第二方面军总共150万人，从东西北三面向满洲日军发动了进攻，很快就攻入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第二天，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美英中三国发出的最后通牒，但要求不损害天皇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眼见俄国

^①参见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一九四五至一九五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James V. Forrestal, *The Forrestal Diaries*, ed. by Walter Millis, New York 1951, pp. 202-203; Current Richard, *Secretary Stimson: A Study in Statecraft*,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4, p.237.

人已经大举攻入满洲,一直没有就此松过口的杜鲁门(Truman, Harry S.)这时改了口,说是由于俄国人正在深入满洲,有可能乘势占据中国领土,并支持中共,因此批准就此作出妥协,以限制苏军南进。与此同时,美国陆军部紧急向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Wedemyer, Albert C.)发出指示,要求美军除了要迅速占领中国各重要港口和交通中心以外,还应该迅速运送国民党军队到关键地区。强调美军占领区只能转交给国民政府的机构和军队。而为了避免远在西南的国民党军队赶不及调运华北、华中和华东的各个战略要地及主要交通线,杜鲁门还特别批准了“利用日本人阻挡共产党的行动”。据此,美蒋与日军开始联手阻止中共军队进占各战略要点。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Marshall, George C.)甚至要麦克阿瑟转告日本人,威胁说,任何向中共交枪的日军部队将来都得不到遣返。^①

美国对苏态度转为强硬,还进一步直接反映在9月11日开始在伦敦召开的五大国外长会议上。美英与苏联外长发生尖锐冲突,争吵不断。美英指责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没有个人自由,苏方反唇相讥英国在希腊搞法西斯;苏联外长莫洛托夫(Molotov, Vayacheslav M.)要求讨论苏联在达达尼尔海峡建立海军基地的问题,英国外相贝文(Bevin, Ernest)和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坚决拒绝。而最让苏方感到不满的,是美方一开始就反对讨论对日本共同管制问题,不允许苏联插手削弱美国对日本的独占权。即使在莫洛托夫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援引盟国共同占领德国的例子,于24—25日两度坚决提出要求,主张将美、英、苏、中四国共同管制日本问题列入议程,贝尔纳斯也依旧置之不理,只同意在华盛顿搞一个远东顾问委员会,让苏联去“顾问”。贝尔纳斯的态度使莫洛托夫极为恼火,严厉斥责美国要当“世界独裁者”。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几大国外长会就开成了“现代最不幸的国际会议之一”^②。

拒绝苏联参加对日本的管制和占领,这或多或少损害了斯大林作为世界第二大强国领袖的自尊心。但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历来是苏联的一大威胁,斯大林下决心对日作战,本身就含有要彻底削弱日本的意图,战后参加占领和管制日本对苏联未来安全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而为了取得美国对苏军占领日

^①参见邹谠前引书,第270页。

^②《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台北“中研院”近代研究所,1990年,第172—188页;Sumner Welles, *Where are We Heading?* New York, 1946, p. 380.

本北海道地区的同意，斯大林甚至还在苏军完全可以单独占据整个朝鲜半岛的情况下，就接受了美国关于苏美两军以三八线为界分别占领朝鲜的提议。想不到如今美国却欲排斥苏联，独占日本。考虑到美苏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斯大林基于对防止日后美国扶助日本再度威胁苏联远东的强烈担心，迅速开始调整了其对中国东北的政策。^①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开始鼓励中共武装大举进入东北。

还在8月苏军出兵东北之后，中共中央就急于派兵进入东北，但始终无法与苏联取得协商，不清楚苏方态度，因此只能派临近东北的地方部队就近与苏军接触。苏军当时对中共部队的态度，因无莫斯科的明确指示，虽一般表示友好，并明显同情中共而厌恶国民党，但碍于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条约，尚不敢公开承认和帮助中共武装。9月中旬，这一情况开始发生改变。苏军开始要求已经进入东北的部分中共地方武装改换名义，协助维持地方秩序。苏军代表并亲飞延安说明苏军希望中共中央派负责同志前往东北，以便就近具体协商双方行动。考虑到苏联在外交上的承诺，苏方强调原则上中共的八路军和国民党的军队一样，都不应进入东北。但私下应允，如果不用八路军名义，不公开与苏军接洽，苏军将采取放任态度。^②而这时进入到察哈尔、绥远地区的苏军，更是主动派出代表与八路军接洽，要求八路军准备接防苏军即将撤出的地区，并全力加以控制，战略中心千万不要南移，以免国民党占领这些地区后再度割断双方联系。如果八路军需要，他们可以秘密提供武器援助，即使将来八路军在抵抗国民党进攻时受挫，也可以靠近外蒙边界，甚至撤到外蒙去。苏联驻重庆大使彼得洛夫(Petrov, Apollon)也向还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明确提出：中共当前战略重心，应当是集中兵力，“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之线，防蒋进攻”^③。很显然，这一系列变动都是来自莫斯科的指示。也正是基于这一重要的情况变化，中共中央才提出和制定了对中共此后军事发展极具战略意义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方针，决心放弃南方的部分根据地，将兵力北移，

^①参见 James Matray, *Captive of the Cold War, The Decision to divide Korea at the 38th Parallel*,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50, no. 2, May 1981, pp. 145-168.

^②参见《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14日。

^③《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17日；《重庆代表团致中央电》，1945年9月20日。



中共军队干部与苏军在一起

努力控制热河、察哈尔及河北东部，同时在东北沿海配置数万兵力，争取占据东北。^①国共争夺东北的斗争由此揭开序幕。

就在莫斯科对东北政策发生变动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更加严重的情况。这就是：美军在既无条约作依据，又没有与苏联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开始在中国华北沿海港口大举登陆。9月底，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在青岛登陆，其第一加强陆战师也开进了天津，设立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两栖作战军司令部，并北上秦皇岛，迅速沿铁路线展开，协助国民党军抢修通往山海关的铁路交通，甚至亲自担负护路任务，掩护国民党军向东北推进。美军的这一系列举动，更直接地对东北苏军形成了严重威胁，这不能不进一步刺激了斯大林，其利用中共武装阻挠美蒋势力占据东北的意图更加明确。

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在外贝加尔方面军近卫军第六集团军克拉夫钦科上将、图马尼扬中将等多名将领的陪同下，专门招待了刚刚到达东北不久的中共东北局负责人。他不仅热情称赞中国共产党，而且

^①参见《中央关于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279页；《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5年9月18日。

高度赞赏中共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方针。鉴于东北局对控制全东北把握不大,强调要做背靠苏蒙朝三国边界的军事部署,他明确表示反对,主张应该在山海关方面部署 15 万主力部队,在沈阳周围部署 10 万部队,全力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他声称:“你把南边,特别是山海关方向抓住(长春路是商办,谁若运兵须要交涉),北面自然是你们的。东三省人力财富主要在南边,又是门户,把这里掌握了,北面还有什么要紧。”^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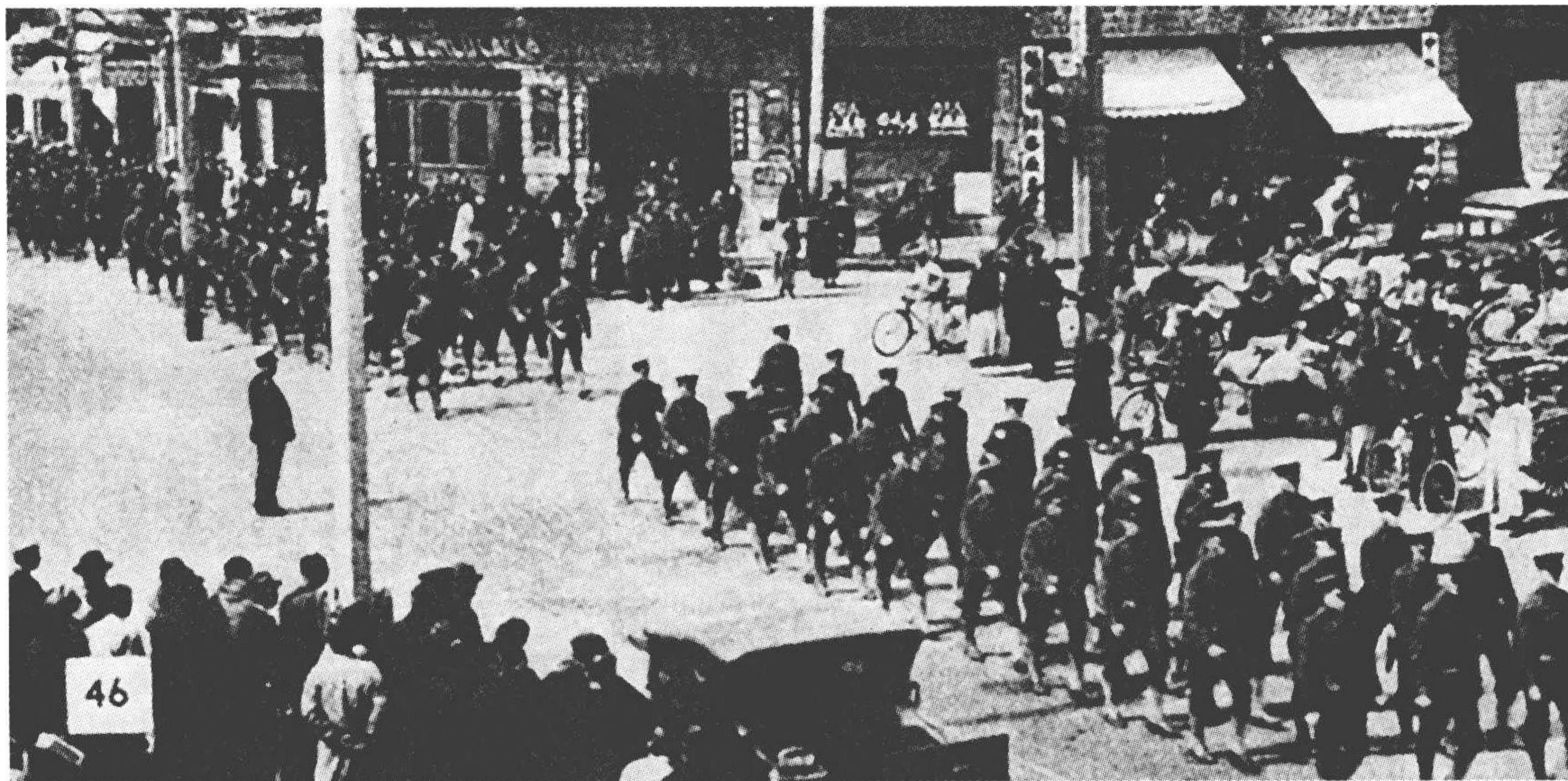
为了增强中共方面的信心,4 日苏方就通知中共东北局说,苏军准备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街、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如数转交给中共接收,并说明这些武器弹药可以装备几十万人。这次会谈后不过两周时间,已知中共方面就得到了大量的武器弹药。^②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刚从重庆回到延安,就当机立断,决定依目前部队调动情况确保山海关一线虽暂时做不到,但仍可按照苏方建议,“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③。

为协助中共夺取东北,苏军这时可以说也是尽其所能。它先是不顾美蒋方面的外交交涉,拒绝美舰运送国民党军在大连登陆;然后把美舰可能登陆的东北营口和葫芦岛两地转交中共军队接收,宣称苏军对两处可能发生的任何冲突将概不负责;同时把南满的大批兵工厂、武器弹药仓库,甚至一些重型武器和飞机统统交给中共接收;还将中共武装引入长春市郊及机场附近布防,要其严防国民党军通过空降进入东北。苏军代表 10 月 25 日甚至通知中共东北局说:“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如果国民党军在 11 月 15 日苏军正式撤退之前敢于进入东北,苏军将协助中共打击国民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关内作战的军事形势也明显对中共有利,毛泽东雄心勃勃地提出了“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归人民自治”这一十分强硬

^①《东北局致中央电》,1945 年 10 月 3 日。

^②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34 页;高树桥:《东北抗日联军与苏联远东军》,《东北抗日斗争史论集》,第 2 集,第 228 页;周家美:《关于我军进兵东北接管辽西的回忆》,《锦州文史资料》,第 1 辑,第 44 页。

^③《中央关于目前东北发展方针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 年 10 月 19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 卷,第 36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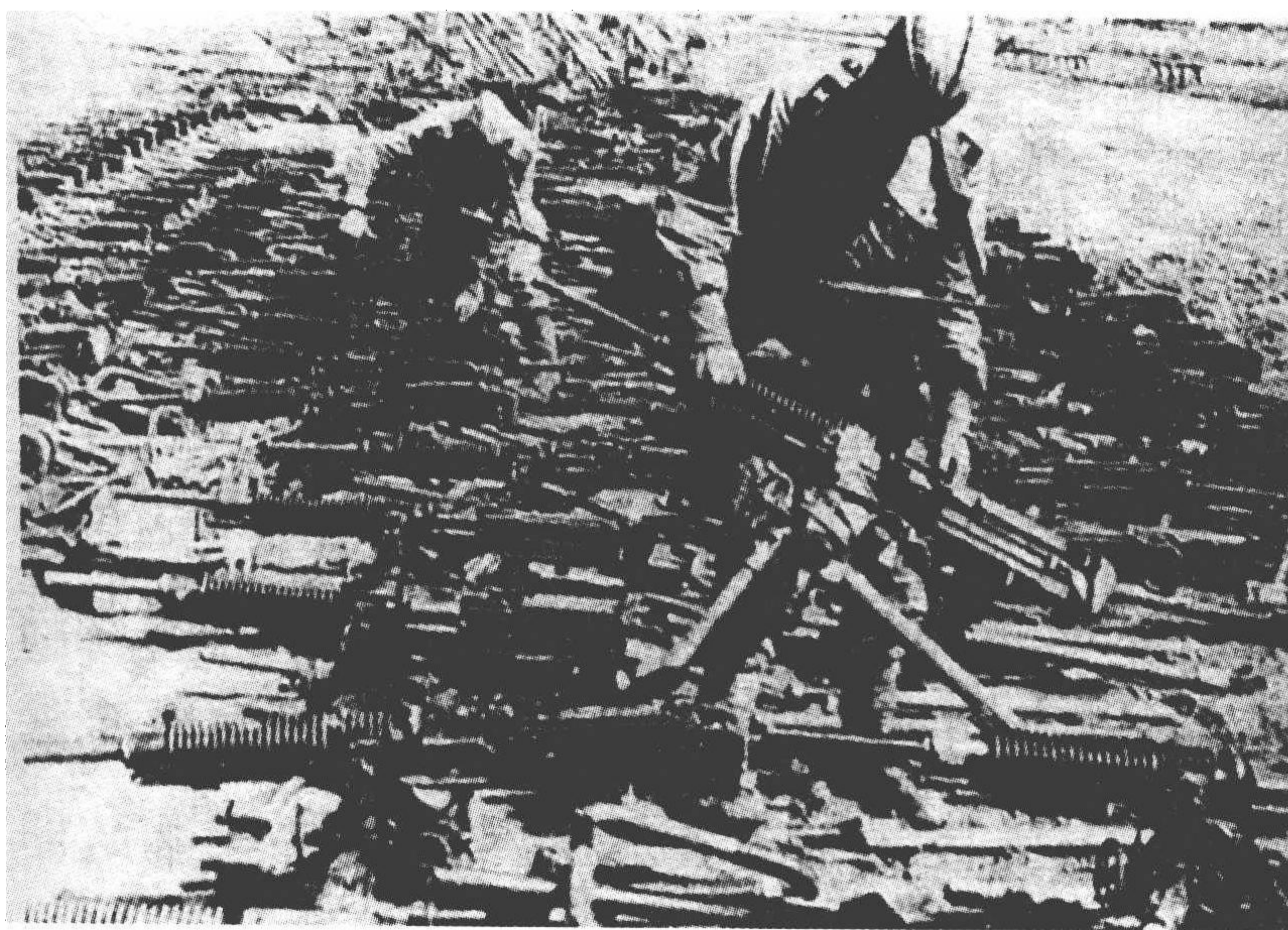


1945年9月美国海军陆战队进入天津市区

的政治主张,主张公开宣布:“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中央军不得开入。”^①

但是,斯大林显然没有料到国民党会以退为进,发动外交攻势。11月17日,眼看大批中共军队开入东北,苏军又处处掣肘,给国民党制造麻烦,接收东北已成泡影,国民党派往长春与苏军接洽接收行动的东北行营奉命撤回关内,蒋介石并将苏方违反条约的行为告到了杜鲁门那里,美国海军因此也调派军舰接连在苏军驻守的大连附近海面向苏军示警,弄得15日刚刚开始苏军撤退行动不得不中途停止不说,还被迫紧急向大连空投了一个师的兵力,并向沈阳增兵至四个坦克旅和一个炮兵师,同时把部队又开回了前已放弃了了的营口重新布防。

^①《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下我方条件致周恩来等电》,1945年11月3日。



苏军在东北缴获的日军武器

苏联支持中共夺取东北,为的是阻止美国人进入东北。中共如果能占据东北,则整个山海关以北就可能实现与中国的分治,成为既依托于苏联,又可以有效保护苏联的受中共控制的一道理想的防护堤。即使中共不能完全占据东北,引进大量中共武装,并建立起相应的根据地,也足以对美蒋在东北的地位形成严重牵制,避免东北成为反苏的跳板或桥头堡。但是,这一切都需要在确保苏联外交利益的情况下实现,对苏联才是有利的。如果因为苏军公开援助中共,违反了自己在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中的外交承诺,造成美英推翻雅尔塔协定,其后果就远不止是一个中国东北问题,势将影响到苏联通过雅尔塔会议得到的许多利益,甚至引发苏美两军之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正因为如此,莫斯科的态度马上就发生了一个180度的改变。苏军代表很快就通知中共东北局:凡长春路及沿线城市的中共军队必须立即

全部撤出,凡有苏军之处,均不许有中共军队存在。^①结果,中共中央也不得不改变刚刚确定了的夺取全东北的战略方针。它明白告诉东北局:现在方针必须顾及苏联国际信用,因为“这是一个严重的世界斗争”。据此,中共中央放弃了独霸东北的计划,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新方针,主张部队多占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准备背靠苏联、外蒙和朝鲜,长期坚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②

从上面的情况中不难看出,随着苏美关系的渐趋恶化和苏联在中国东北问题上的态度反复,中共中央推进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也在随之发生着相应的改变。不论这种改变与变动的内容中共是否都那么喜欢,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由于苏美关系变动而造成的莫斯科对国民党的严重不信任,给中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强大的实力支持(使中共得以不战而得到东北的相当部分地区)和重要的军事援助(使中共获得了渴望已久却从来没有得到过的大量现代化武器装备和充足的弹药)。

5. 冷战:在亚洲已经开始

1945年11月17日蒋介石下令撤退东北行营当日,他在给杜鲁门的电报中特别强调了苏军公然支援中共军队进入东北的严重情况,并且声称:“当前之东北局势不仅危及中国之领土完整与统一,实已构成东亚和平与秩序之重大威胁。”^③魏德迈对这种情况也有着更加清楚的说明与估计。他报告称:目前在华北的中共军队十分强大,它们威胁着所有的交通线,而苏联明确表现出要在华北和东北造成对中共有利的形势,为此它正在为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设置层层障碍。事实上,中国已经变成“美苏这两个世界最强大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竞技场”,“美苏在华北和东北争夺实力地位的斗争已经展开”。如果中共在这

^①参见《东北局致中央电》,1945年11月18日。

^②参见《中央关于东北工作方针等给东北局的指示》,1945年11月19日;《中央关于让出大城市及铁路线开展东北满工作给东北局电》,1945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第429—432页。

^③电报称:“当日军投降时,东北诸省原无中共军队,此一事实即斯大林元帅亦曾予以证实。彼于八月下旬与哈利曼大使谈话中曾经如此中说(该谈话经赫尔利将军告余)。最近东北诸省境内有大部中共军队存在,自系由于苏军之支援。”苏军并且“使中共军队入占营口、葫芦岛等港口,以阻挠中国军队在该各地登陆”。前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战后中国(一),台北1981年版,第149页。

场斗争中取胜,中国就将变成苏联的傀儡,苏联就会在实际上控制亚洲大陆。但是,如果美国直接干涉国共冲突,就有可能卷入同苏联的战争,势必要动用大量的美国军队,而这无论从美国国内民众的愿望来看,还是从美苏关系的全局来看,事实上又是办不到的。因此,他的结论是,除非蒋介石与苏联和中共达成协议,否则他不仅不可能得到东北,就连控制华北也难。^①

显然,美国政府并非不了解苏联已经在支持中共。^②但是,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美国国会,即使是其中最激烈的反苏反共分子,也没有人主张像英国在希腊那样,直接派军队投入到打击中共的军事行动中去。为什么?邹谠的分析有三:第一,对中共的性质与意图的估计错误;第二,国民党政府的无能及它顽固拒绝美国劝告的态度;第三,美国对欧洲共产主义势力日益发展所感到的焦虑与美苏之间日益剧烈的争吵。^③但第一个因素这个时候其实已不复存在,因为大多数美国外交官和政治家都已看出,中共已经与苏联走到一起去了,不管其性质或意图如何,两者结合的结果不可能对美蒋有利。第二个因素也并不具有决定意义,因为这时英国支持的希腊政府,以及此后美国支持的某些反共政府,情况未必比国民党政府好多少,它们不是照样为之出兵?说到底,第三个因素才最重要,这就是,美国这时更关心的是欧洲,美苏之间日益剧烈的争吵,涉及与美国利益攸关的问题也主要集中在欧洲和中近东,中国远在其次。因此,如果美国直接干涉国共冲突,有可能要卷入对苏联的战争,那对美国来说是划不来的。何况美国是个不得不注重民意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民意是渴望和平,美国的政客们都极力在要求政府裁军问题上做文章,以争取选民的好感。这也不能不极大地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④

^①参见FRUS, 1945, Vol. 7, pp. 627-628, 681-684;《魏德迈报告》,台北光复书局1959年版,第309页,转见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4—165页。

^②美国政府始终声称他们没有得到确切的情报证明苏军向中共提供了直接的军事援助。但严格说来,这多半只是其避免公开与苏联冲突的一种借口罢了。

^③参见邹谠前引书,第310页。

^④根据邹谠披露的资料,美陆军在德国投降时约有829万人,由于美国民众和国会的强烈要求,到1945年12月,其陆军已削减了将近一半,只剩下将近423万人,半年后又削减了一半多,只剩下不足190万人。一年之后,即到1947年6月,美国海陆空三军全部加起来也只剩下了不到100万人。由此可见,美国国内即使在对苏联的恶感迅速增加的同时,也很少有人赞成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参见邹谠前引书,第317—318页。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张群和周恩来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监督下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与《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

因为不能采取军事的方式阻止苏联通过中共在中国进行扩张，又始终幻想可以继续影响中国的政局，保持自己在中国的地位，牵制苏联，结果就出现了马歇尔出使中国积极调处国共冲突这样一种局面。但是，在这样一种条件下的调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要失败的。因为，马歇尔根本没有打算，也不可能解决苏联最关心的问题，即美国独占日本后苏联所感受到的安全威胁问题。不仅如此，就在马歇尔使华的几乎同时，苏联为了能够既不违背其外交承诺，又能有效地阻止美国插足东北，别出心裁地向国民

政府提出了中苏在中国东北实行全面经济合作的建议。对此,国民政府从一开始就暗中抵制,有意在谈判开始之前先把谈判代表张嘉敖派到华盛顿去走一圈,征询美国政府的意见,美国政府自然更是从中作梗,声称:“美苏间绝无满洲为苏俄势力范围之默契”,坚持“美国继续主张满洲门户开放”,表明了必欲插足东北的决心。^①当谈判开始后,美国不仅正式向两国政府发出照会,扬言“中苏政府就满洲的工业进行谈判”违反了门户开放原则,歧视了美国人,而且与英国一起公开了雅尔塔秘密协定,致使苏联遭到中国民众和舆论的强烈抨击,把东北纳入自己势力范围的努力严重受挫。^②

斯大林这时的态度已经非常明了,那就是逼着国民政府摊牌:“你们要么和我们一起,要么就反对我们”,在美苏之间必须作出选择。而要倒向苏联,仅仅不许美国人染指东北还不够,还不能让美军驻在中国。他明确告诉这时到莫斯科去的蒋经国:“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③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即苏军此前之所以联合中共阻挠国民党接收东北,就是因为国民政府把美国兵引到中国来了。只要驻华美军不走,苏联就不会轻易把东北交给国民党。想不到,国民党执迷不悟,跟定了美国,这自然也就使苏联很快就彻底破灭了与国民政府在东北合作的希望。

马歇尔使华的头两个月,正值苏联寄希望于国民党谈判东北经济合作问题的过程中。因此,苏联政府虽拒绝参加调处,对马歇尔使命倒也没有表现出反感。美英苏三国1945年12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外长会议,反而比9月在伦敦召开的五国外长会议显得气氛融洽,会议公报中美国甚至和苏联一起承诺不干涉中国内政,双方都要尽早从中国撤军。^④在这种情况下,马歇尔利用美苏这种暂时的并且是表面的“合作”,左右开弓,一时间也成功地促使国共两党互相

^①参见《张公权日记中有关东北接收交涉经过(五)》,《传记文学》,第36卷,第4期。

^②参见前引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卷,第617页。

^③哈里曼前引书,第600页;FRUS, 1945, Vol. 7, pp. 848-859;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北幼狮书店1973年版,第15页。

^④在莫斯科会议上,莫洛托夫曾反复就美国在华海军陆战队问题质疑,坚持要美国说出撤军时间。FRUS, 1945, Vol. 7, pp. 841-844, 845-846; 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2-323页。

有所妥协,达成了一纸停火令和几个政协文件。但从1946年2月美苏因中苏经济合作谈判引发一系列冲突之后,美苏间敌对气氛明显加剧,国共妥协的趋势自然也不可能持续下去。

2月间美苏关系恶化的最典型的反映,是美国驻苏联代办凯南力主遏制苏联的著名长电,和苏军再度鼓动中共在东北抵抗国民党。凯南22日的这封电报对华盛顿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以致成为一年后美国对苏冷战政策的基本依据。凯南在电报中断言,苏联领导人作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他们绝不相信苏联能够与资本主义世界长期和平共处。他们的外交政策是从苏联正在遭到资本主义包围这一观点出发的。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采取一切方法,包括参与国际活动和暗地里搞颠覆与离间,来削弱西方和加强自己。美国政府和人民决不应再对苏联抱有任何幻想,应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同时坚定自己对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信仰,并用以指导世界各国人民,不使共产主义有可乘之机。^①

就在凯南发出这封电报的当天,苏军代表再度找到中共东北局,一面说明苏军主要负责人希望与东北局负责人见面,一面传达莫斯科的意见说:苏方正全力争取在除大连、旅顺外的整个东北插足,与国民政府谈判经济合作,就是为了迫使其承认苏方在东北的地位。但苏方努力必遭美蒋阻挠,为此中共应在政治上保持强硬态度,在军事上加强进攻,予以配合。中共在武器方面有任



美国遏制政策的创始人, 时任美国驻苏大使馆代办的乔治·凯南

^①参见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50—52页。

何要求,苏军都将尽可能给予满足。有关细节及组建炮兵、坦克部队和设立训练基地的问题,可做进一步研究和磋商。在第二天双方负责人的会见当中,苏方更进一步表示:过去苏军因顾虑与美国冲突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态度较软,如今态度已变。苏方不论与国民党的谈判成功与否,支持中共确立在东北的主人地位的目标将不会改变。因为国民党借英美公开雅尔塔秘密协定煽动反苏运动,美国假门户开放之名必欲深入东北,已显示美蒋决心取消苏联在东北的经济优势地位。因此,苏方建议中共再迅速增调大批干部和部队到东北来,准备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主人地位。^①

美苏之间的冲突在1946年2月以后已日趋白热化。两国在成立朝鲜临时政府问题上这时也开始发生争吵。在中近东,双方更是剑拔弩张。在土耳其,因为怀疑苏联可能对土动武,美国竟采取了强硬的炮舰政策,派出战列舰密苏里号开抵土耳其以访问为名炫耀武力。在伊朗,美英逼苏联撤军,苏联心有未甘,坚持要成立由苏联控股的苏伊石油公司,并策动阿塞拜疆分离主义势力制造事端,但美英态度强硬,苏联极感被动。

美苏关系的全面恶化,十分明显地促使国共两党的态度都迅速强硬起来。2月中旬,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对军队国家化方案在实际上采取抵制态度。国民党也很快撕毁了政协决议,蒋介石甚至还乘机公开煽风点火,告诉美国记者说,美国应当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②面对这种情况,苏联终于开始不顾外交条约,还美蒋以颜色。

3月8日,苏军首先撤出抚顺、吉林,并通知中共东北局,沈阳一周内也将撤退,沈阳以南地区一概不向国民政府办交接,中共军队可以自由行动。但苏方行动似乎并未引起美蒋的恐慌,蒋介石由于已经有5个多军开入东北,因此态度倨傲,十分强硬,根本否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不承认东北有同关内一样的停战问题。为此,中共中央、东北局和重庆代表团三方意见发生分歧。东北局力主夺取全部苏撤区,不怕与国民党开打;负责与马歇尔谈判的周恩来等强调长春路及其沿线存在接收问题,主张让出以实现停战;毛泽东意识到东北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愿意和平,但只同意将已占领的部分苏撤区让给国民

^①参见《东北局致中央电》,1945年2月23日。

^②参见前引《中间地带的革命》,第426—427页;FRUS, 1946, Vol. 10, p. 166.

党。苏方明显对中共方面的这种态度不满,苏军领导人在会见高岗时特别问:你们为什么答应让国民党开5个军到东北来?听说你们中央对美国人很客气,为什么?^①据此,毛泽东考虑再三,终于决定按照苏军愿望,争取控制自四平、本溪以北的大半个东北。他因此提出:“我党方针是全力控制长(春)哈(尔滨)两市及中东(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②

4月初,苏方代表接连通知中共东北局说,苏军将于15日和25日分别撤离长春和哈尔滨、齐齐哈尔,请中共军队立即前进至三市近郊待机,并入市侦察,以便届时就近占领。苏方代表并且说明,美国利用国民党接管东北来反苏,蒋介石利用美国来反苏反共,苏联目前因谈判不成受外交限制不能直接插足东北,但希望中共全力坚持东北,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造成美蒋被动。^③而为了帮助中共作战,苏军还进一步向东北局转交了大量日军武器弹药。根据苏军的建议和中共中央的决定,东北局开始在东北做出全面部署,拦截国民党军北上的阻击战迅速在四平和本溪打响。14日苏军撤出长春,中共军队立即对城内国民党军发动了大举进攻,并第一次使用了包括坦克和大炮在内的重型武器。19日,得知部队完全占领长春后,毛泽东十分兴奋,指示东北局要“做长期保持计划”,要准备以长春做我们的首都,首先成立东北自治政府。^④

1946年4—5月间,国共之间在东北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攻防战。尽管毛泽东再三强调的“不惜重大伤亡”、“不惜任何牺牲”的四平保卫战历时一月有余,最终未能阻止住国民党军的推进,但苏方对此次作战评价甚高。在长春得而复失后,苏联政府为阻止国民政府进一步以武力向北满推进,甚至通过其驻华外交官非正式地向美国驻华外交官发出警告,扬言苏联对中国问题始终采取不干涉政策,但是,如果美国继续鼓励国民党实行这种对苏联带有进攻性的政策,苏联将不会坐视不管。此举不能不引起美国方面的高度警惕。马歇尔随后极力压蒋停止向北满追击,与此不无关系。^⑤

^①参见《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年3月10日;《重庆代表团致中央电》,1946年3月11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3月13日;《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年3月1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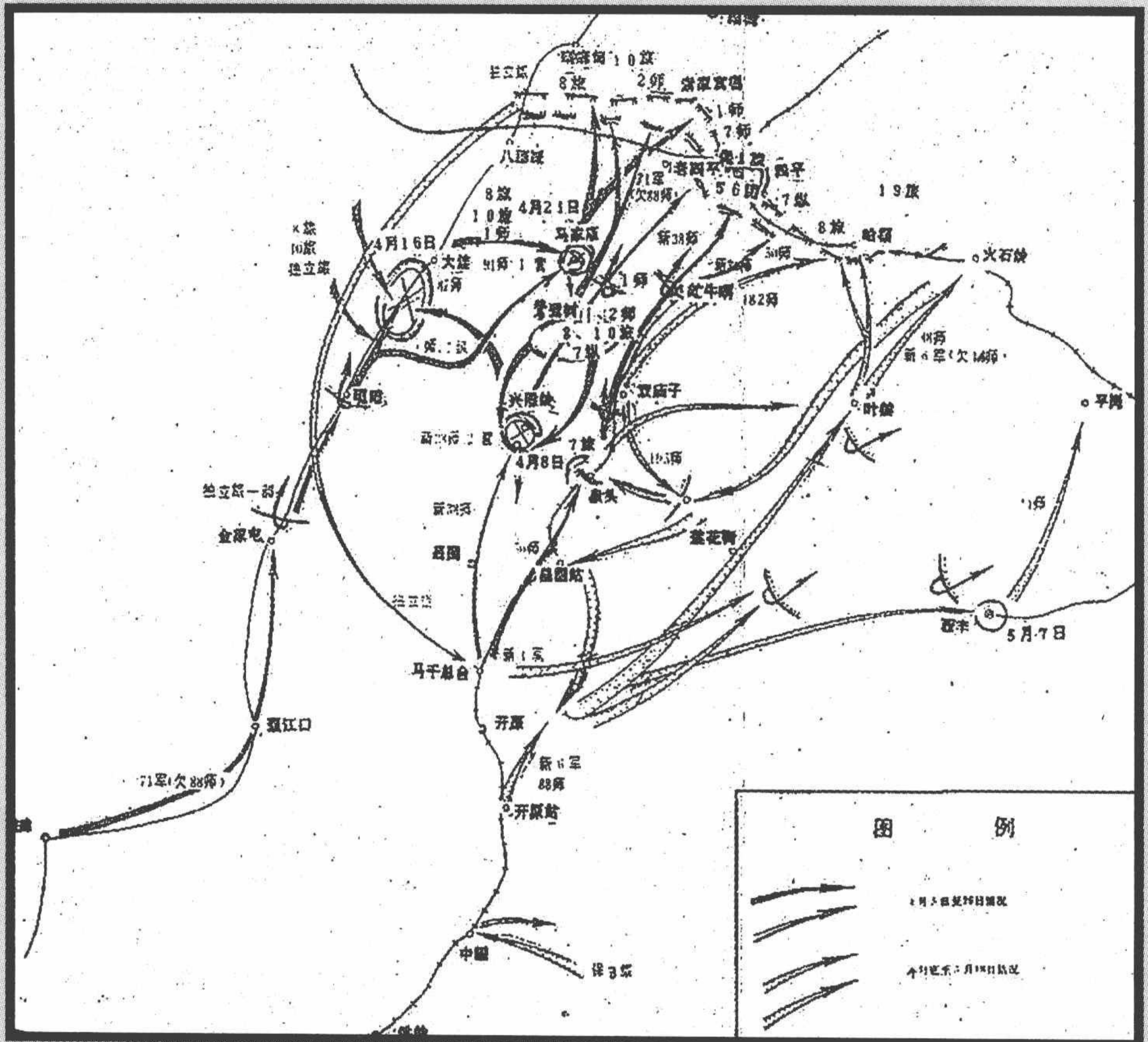
^②《中央关于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致东北局电》,1946年3月24日。

^③参见《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年4月3日。

^④参见《中央致东北局电》,1946年4月19日。

^⑤参见FRUS, 1946, Vol. 10, pp. 1046-1047; Vol. 9, pp. 1042-1044, 1082-1083.

四平保卫战战役经过要图



四平保卫战作战经过要图

但是,时至于此,不论是美苏之间的冲突,还是国共之间的战争,都已经不可能停下来了。苏方明确支持毛泽东在关内实施“报复作战”,并陆续通过东北局向关内华北华中各主要根据地秘密输送武器弹药,已知5—6月里就从东北运送三批军火前往山东。7月间仅一次提供的可供转运山东的军火就有100多车皮。中国的内战已经名副其实地全面爆发了。蒋介石顿时捉襟见肘,在东北被迫转入了守势。极大地决定着此后中国革命命运的东北根据地由此得以奠定巩固的基础。

6. 结语

就在中国内战全面打响之际,美苏还在中近东进行着激烈的较量。欧洲的战略地位,中近东的石油,所有这些都更直接地牵动着美国政府的神经。美国国务院开始全盘接受凯南的“遏制”理论,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秘密拟定了“对于一旦爆发对苏战争的计划”。问题是以双方力量对比的情况,苏军兵力上在欧洲明显占据绝对优势,在远东更是大大强于美英。军方估计,届时美国在远东只能不惜一切代价来保住日本。^①这种情况进一步决定了美国介入中国内战的可能性只能是极其有限的,从而也就注定了腐败和顽固的国民党政权在与充满活力的共产党人的战争中只能日渐陷于被动。当然,这种情况出现得越多,就越是容易感觉到苏联威胁之可怕,美国政府和国会领导人所共有的那根意识形态的神经就会绷得越紧,直至引发全面对抗和遏制政策的出台。

美苏冷战实际上已经开始,只是缺少双方的宣言罢了。而冷战格局一旦形成,中国革命走向及其新政权的政治选择空间,也多半会被锁定且难有回旋余地了。

原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①参见华庆昭前引书,第97—98页;《新华日报》,1946年9月12日。



第二章

美领馆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立

引言

很难设想,在没有美苏冷战的国际大背景下,新中国的外交走向及其国内政治演进的步伐,将会发生与如今我们所看到的怎样不同的历史变化。新中国建国前夕爆发在中共与美国之间的沈阳美国领事馆事件,又称华德事件,及其随后双方围绕着新政权与美国关系所进行的一系列接触,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如果不是因为存在着美苏冷战这样的大背景,未必不会发展出与后来的情况多少有所不同的方向。这也正是包括谢伟思在内的许多美国人在1970年代中美缓和并建立邦交之后,会再三感慨当年“机会”的丧失是如何可惜。

不过,在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这一切看来都无可挽回。这是因为,中共开始从农村进入到城市中来,最初就不可避免地要从中国东北开始。而东北地区,因受外蒙古、苏联和北朝鲜三面环抱,全都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中共尝试与资本主义各国发生外交关系,一开始就无法单纯从自身的利益来进行选择与取舍,而必须要考虑到苏联的安全与利益。尤其是这个时候的美国坚持要在中国东北的沈阳,保持一个领事馆,作为其立足中国东北的一个前哨站,这就不能不在中共与美国之间造成一种令双方都注定会极为尴尬的局面。理论上,美国这时不仅是苏联的敌人,而且也是中共的敌人,因为美国政府一直坚持支持中共的敌人——国民党政权。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必欲将美国的势力赶出中国东北,绝对不允许美国人有所染指;中共也不能不顾及到美国是自己敌人的“帮凶”这样一种事实。结果,苏联所揭露的美国外交人员的间谍行为,和中共依据苏联情报所破获的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为美国情报人员提供帮助的事实,都促使中共在占领沈阳之后,不能不采取驱

逐美国外交官的强烈做法。

所谓沈阳美国领事馆事件，指的是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Ward, August I., 又译为瓦尔德)在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沈阳后不久，因拒绝交出电台以及涉嫌间谍活动等原因，被长期软禁，直至1949年11月受到审判被驱逐出境一事。这一事件的整个过程，正跨越了新中国成立前后这个重要时段，正足以用来考察新中国对美政策确立和变化的前后经过。毫无疑问，它可以说是新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随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严重冲突的一个开端。只不过，如果我们注意到中共军队入关以后外交政策的变动，特别是占领南京之后，中共中央指导南京市委相关外交人员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接触和交涉的经过，我们就会发现，即使是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其实也还有出现其他转机的可能。问题仅仅在于，中共中央和美国当局当时都无法脱离冷战思维来考虑两者关系，因此，任何契机都不可能被他抓住。^①

^①关于这个问题目前国内尚未见有专门的研究论文，许多专门研究这一时期外交史或中美关系史的著作，也往往是一笔带过。如吴东之主编的《中国外交史(1911—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华庆昭的《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以及牛军的《从延安走向世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等，几乎都只是把这一事件当做中美关系中的一件并不十分重要的小插曲，顺便提到而已。目前只有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曾经用了几百字来谈论这一事件的原因。但她也只是认为此事在美国有重要影响，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则多半是只出于对继续支持国民党的美国的警惕和急于彻底取消“治外法权”，而采取的一种未作“过细的考虑”的外交行动。章百家的一篇文章也简单地提到这个问题，但认为这个事件纯粹是东北局按照苏联人的要求而采取的行动，并未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故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此“极为恼火”。见《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第2期。美国学者关于这一事件的研究说明，特别值得重视的有爱德温·马丁的《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的反应》(美国肯塔基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该书已于1990年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了它的中文版。其他还有伯纳德·格茨曼的《人质危机：三十年前》(1980年5月发表于《纽约时报(杂志)》)等。在美国学者中，对这一事件描写得比较全面的，只有陈兼1993年发表的论文。见Chen, Jian, *The Ward Case and the Emergence of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1948-1949*.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32, July 1993.

1. 美领馆事件的发生

1948年11月15日是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上午10时,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接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二号公函和第四号通令。上面明确要求除军管会特别批准者外,任何中国和外国公民与机构,凡有电台及其收发报装置者,均须在36小时之内报知该委员会,并送交其保管。华德最初似乎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在他当天给军管会的公函中,他甚至提出:如果“本地当局仍希望敝总领事馆之继续存在与工作”,就请“准予继续使用该项电台”,因“敝领事馆之存在须依赖此项电台之继续使用”^①。华德看来相信,共产党不会采取过分的行动,只会“采取一种更为合作与友好的态度”^②。

华德的乐观估计不是没有理由的。自从共产党11月1日下午占领沈阳之后,一切迹象都表明,共产党没有任何企图敌视留在沈阳的美国外交及商业机构的计划。不仅如此,新任命的共产党市长朱其文上任伊始,就立即发出就职通知,并于11月5日以官方身份正式召见了美、英、法等国驻沈阳的领事,表示将严格保护一切外国人和外国机构的安全,并愿意为外国机构提供各种必要的服务,包括发放通行证、为机动车提供标志旗等。三天后,朱市长又对美、英、法领事馆进行了回访,明确肯定他们的领事身份,并饶有兴致地参观了美国新闻处设在沈阳的一个图书室,强调中美之间不仅需要进行技术方面的合作,而且也需要进行文化方面的交流。^③这自然使得受命留在沈阳与中共地方当局以非正式的和私人交往的形式“建立工作关系”的华德深感振奋,直到11月16日白天,华德打给美国国务卿和驻南京大使馆的电报的调子都是相当积极的。他乐观地等待着朱市长和军管会的召见,准备像前几次那样与他们友好

^①《驻沈美国总领事华德致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函》,1948年11月15日。

^②《驻沈阳总领事(华德)致国务卿》,FRUS,1948年,第573页。

^③参见《驻沈阳总领事(华德)致国务卿》,1948年11月16日,FRUS,1948,Vol.7,p.573.

地讨论关于保留美国领事馆继续使用电台的权利问题。他甚至断言：“共产党的意图是承认我们，并允许我们作为美国官方机构行使职责的。”^①

从15日10时开始的36小时期限过去了大约30个小时之后，华德的信心才真正有些动摇了。他预期中的与朱市长或军管会主任的讨论，迟迟没有能够到来。虽然16日晚10时之后并没有出现他所担心的行动，但17日他继续寻求与朱市长接触的努力仍旧没有成功。直到18日上午他才得到了他所盼望已久的召见通知。而在下午2时开始的谈话中，负责接见他的军管会副主任没有表现出任何灵活的态度。华德反复解释电台是美国政府的财产，并一再说明交出电台后他不能进行正常工作，但对方毫不动摇，坚持当日下午5时将派参谋人员前往领事馆接收一切，美国领事馆对外联络方面今后重要电报可经军管会审查批准后由新华社代发。终于，华德意识到，形势与前有所不同了，共产党方面的决定是不可改变的。下午4时，华德匆匆忙忙地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通知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大使，沈阳领事馆的电台将就此关闭并被没收。同时，他还草拟了一份明码电报交给沈阳军管会，请其代为发往华盛顿，以验证此种联络方法是否可行。^②很显然，联系到此前的乐观估计，华德不能不感到十分沮丧。

其实，事情才仅仅开了一个头。华德无论如何没有想到，拒绝主动交出电台还会引起更为严重的后果。在18日下午5时的期限过去之后，又过了整整42个小时，沈阳军管会才正式派人前来执行没收电台的任务。但这次不再是简单地没收几部电台的问题了。在20日中午1时，即沈阳军管会开始进入美国领事馆没收电台之后不久，华德得到了一份措辞严厉的书面声明。声明不再承认华德的领事身份，而称其为“先生”，同时强硬地提出：“因先生等蔑视本会之命令，今后除经市政府准许外，特禁止旧美领馆全部人员与外界自由来往。”随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各类人员及其家属，立即被分别软禁在领事馆、美孚油行院和总领事私宅安息日院三处。并且，三处的电灯、电话和自来水供应也被

^①FRUS, 1948, Vol.7, p.826; 华德：《沈阳事件》，《外事处日志》，1950年2月15日，参见Chen, Jian 前引文。

^②参见FRUS, 1948, Vol.7, p.837；《驻沈美国总领事华德致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转致华盛顿电》，1948年11月18日。

全部切断。但直到这时,华德仍旧不能理解,中共政策上的这种 180 度的转变究竟是怎么回事。^①

2. 中共“挤走”方针的形成

从上述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注意到,沈阳军管会及市政府对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态度,在 11 月上旬和中旬,确有明显的不同。在 11 月上旬,至少到 8 日朱市长回访美、英、法领事馆为止,沈阳市政府所表现出来的希望保持和发展与美国人在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方面的合作的态度,至少在形式上还是较为积极的。而在此之后,这种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今天或者很容易找到某种答案。因为有资料表明,朱市长 8 日回访的某些说法次日就受到了中共东北局的批评,东北局并为此就接待外国人的问题作出了极为严格的规定。^②此后,沈阳当局对各国领事馆的态度自然与前不同,变得极为谨慎。

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在 11 月 15 日军管会宣布没收一切电台之前,沈阳市政府仍旧以官方形式接待了领事馆的官员,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而 15 日递交给华德的关于送交电台问题的第二号公函,也仍旧继续承认其官方身份,称其为“总领事”。这也就是说,没收电台的行动看起来最初似乎并不包含着后来的一系列根本否认华德等人官方身份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计划在内。^③那么,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后来那种地步呢?这当然不简单是因华德拒绝主动交出电台所致,而是另有背景。这里首先应当提到的是当时苏联驻东北外交人员的态度。

据目前查阅到的资料,可以肯定,沈阳军管会 11 月 14 日正式签发的没收

^①参见《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致瓦尔德(华德)先生公函》,1948 年 11 月 20 日;《驻沈阳美国总领事华德致沈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转致香港美国总领事再转国务院和大使馆电》,1948 年 11 月 22 日。

^②陈云在 8 日当天的军管会会议上就批评朱其文对各领馆的回拜“不妥当”。没有意识到对方是帝国主义,许多问题,有些不必讲,有些不应讲。10 日会确定外事原则:“少见、不见、允许才见。”见李南央编:《李锐日记(1946—1955)》(一),(美)溪流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34、236 页;并见《东北局致中央电》,1948 年 11 月 11 日。

^③一些文章认为,从 11 月 15 日开始,沈阳当局就完全否定了美英法各国领事的官方身份,这看来是不正确的。参见 Chen,Jian 前引文。



高岗

电台的通令,主要还并不是一个针对美国等国驻沈阳领事馆而采取的一个外交行动。它只是根据中共中央在部队进入沈阳之前就已经下达的一个关于必须注意收缴城市中一切电台以确保部队军事行动的指示,而向所有中外机关和个人发布的一个泛泛的通告。它确实不包含着具体地否认和打击美国在沈阳领事馆的计划在内,因此沈阳军管会在发出通令之前甚至没有再具体请示中共中央。导致事态向后来的方向发展的,是军管会宣布没收电台第二天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里宁给东北局书记高岗

的一个电话。马里宁在电话里明确要求中共立即派人没收美、英、法驻沈阳领事馆的所有电台,并说明“这是关系到苏联的很大的事情”。高岗当即答复说:驻沈阳卫戍司令部已经通知各领事馆必须于36小时之内交出所有电台,而我们对美、英、法留在沈阳的领事馆的策略,则是“挤走”的方针。马里宁当即对此表示欢迎,并称苏联领导人将会因此感到高兴。一旦美、英、法领事馆不再起任何作用,人民也憎恨他们,他们最后就只好滚出东北。^①显然,把没收电台的行动直接同反对美、英、法领事馆在东北存在的方针联系起来的,确实同马里宁的这个电话有关。

但我们能不能说,没收电台的行动事先中共中央一无所知,事后也明确反对呢?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上述资料的话,恐怕还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从上述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事态的发展同中共中央的态度也

^①苏联人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留在中国东北之敏感,由此可见一斑。在科瓦廖夫的回忆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据他说,他当时也曾向中共方面提出过封锁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建议。见冈察洛夫:《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对话》,(俄)《远东问题》,1992年1—3合期。《高岗致毛主席电》,1948年11月16日。

有密切关系。因为高岗在电话中明确表示,我们对美国等国留在沈阳的外交机构的态度是已经决定了的,这就是“挤走”的方针。这里所说的“挤走”方针,事实上还在沈阳当局决定没收当地所有电台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经明确提出来了。那是在11月10日,中共中央针对东北局提出对坚持留在沈阳不撤的美国等西方国家领事馆应如何处置的问题,曾发出指示称:美、英、法等国既然不承认我们的政府,我们当然也不承认他们的领事。为此,我们有必要利用目前的军事管制,达到封锁和孤立美、英等国在沈阳的外交机构的目的,不给他们自由活动的余地。只要坚持这样做,相持日久,他们自然会被迫撤走。^①不难看出,正是苏联方面这时的态度,使得这次没收电台的行动迅速同中共中央内定的“挤走”美国等国在沈阳外交机构的外交行动联系了起来。17日,毛泽东复电中一句“同意你所取挤走沈阳美、英、法领事馆的方针”,为沈阳军管会把没收美国领事馆电台的行动升格为封锁与孤立美国在沈阳外交人员的行动,正式开了绿灯。只是,如何具体实施这种封锁与孤立,还颇费了一些周折。

沈阳军管会在发出没收电台通令时,完全没有估计到可能引起外交纠纷,因此,当美国总领事华德表示拒绝主动交出电台之后,由于不了解卫戍部队是否有权利进入外国领事馆强制执行,他们迟迟未能采取行动,以致出现了上文所提到的情况,在11月16日晚10时36小时期限过了之后,没收行动竟又拖延了三天半之久。对此,毛泽东自然颇不满意。^②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的指示电明确提出:既然美国旧领事故意违抗命令,就应派队入室检查,并将电台带走。“凡驻在该旧领事馆的人员因其蔑视中国人民政府限期交出电台的命令,将禁止其与外界自由往来。如有需要须经市政府特许,方准外出(在核准其外出后,应有武装随行保护)。你们如此办理,可达到我们内定之挤走美、英、法等国领事的方针,而形式上则以双方无正式外交关系并实行军事管制,首先给美国旧领事以限制,使其知难而退。”^③

^①参见《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96页。

^②所谓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极为恼火”不过如此。从他致电东北局质问:“你们没有事先请示自己做了限期三十六小时交出电台的决定,并已发出了通知,限期已满又不去取,等候中央回电是否同意。难道中央不同意你们就准备取消限期交出电台的命令吗?”可以看出,此种“恼火”只是就外事纪律而言,并非反对“挤走”方针和采取相应的策略。

^③《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8年11月19日。



解放战争期间的周恩来

接中央来示后,东北局当晚即召开会议,确定:“要取电台”;“要断绝交通,来往人,电灯,电话断”;“美法同时动作”;“英法美侨民也同时动作,使之闭塞”;“明日下午一时动作(情愿挑大粪)”。即万一形成僵持局面,造成不好影响。会议决定:革命革大了,无办法,非学不可,“准备碰钉子,力争不碰”。为此,军管会组成了临时委员会,由伍修权、陈云、朱其文、李立三组成。并提出:防止“左”倾,“保护生命,衣食住。禁(止)人身侮辱。立场,执行者不说话,不拿物,不受物,(否则)纪律处理。”具体工作手续:“1.取电台、发电机。2.写一通知、命令,断绝出入,均列入。3.准备收条。4.别无损失,签字,(准备对方)不签。5.去的人不带武器。”断绝与外界联络办法,允许分开居住,但相互一律不准来往,汽车

通行证亦全部取消,同时切断电源。电话只能通市府,信件只能由我方代送,并只能送市府,我保证其生活用品的供应。^①

下午一时,通知下达,军管会随后采取了没收行动。当场没收700瓦收发报机7部及发射电台一部。^②与此同时,军管会不仅将美、英、法领事馆的人员统统软禁起来了,而且还全面切断了领事馆的电灯、电话和自来水供应。这回又是在毛泽东出面干预,情况才多少有了改观。尽管已经开始的对美、英、法三国在沈阳的领事馆人员的软禁和断电等,一时难以立即改变,但沈阳方面的中共领导人毕竟已经注意到必须区别对待英、法人员,而以主要力量对付美国人了。

3. 要不要与美国建交?

中国共产党人针对沈阳领事馆所采取的带有敌视性质的行动,并不意味着他们准备与美国全面对抗,也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希望得到西方国家的外交承认。问题在于,基于中国革命的反帝性质和意识形态特点,他们这时很少幻想西方国家,特别是积极支持国民党反对自己的美国会迅速承认中国的革命政权。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在这一时期中共外交政策上所出现的种种变动。特别是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刚刚召开过政治局会议,会上人们多半相信:“根本打倒国民党大概要五年左右”,因此与会者甚至完全没有谈到外交问题。只有毛泽东简单地提到一句:一旦我们成立中央政府,至少以苏联为首的国际人民民主力量会跟我们合作的。^③从这句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领导人这时唯一寄予希望的只是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国家,他们对美英等国政府极不信任。当然,一旦这种外交承认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从共产党人自身利益着想,他们中许多人未必不会对西方国家抱以某种希望。事实上,注意到中共部分领导人第一次开始在沈阳处理与美、英、法等国领事馆的外交接触问题时,一度极力争取后者的好感,积极主动地去做联络工作,就可以看出,他们确

^{①②}参见《李锐日记》(一),第248、249页。

^③参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1948年9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页。

实存有这样的希望。即使是中共中央,最初也并没有把美国等国领事馆继续留在沈阳看成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他们只是不清楚,按照国际惯例和外交条约,应当如何对待这些坚持留在自己控制区域里却承认国民党政权的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当然,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在东北的中共领导人,他们很快就了解到自己应该怎样做了,因为东北毕竟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地方,在那里的苏联人十分明确地反对任何美国人继续留在这一地区。他们尖锐地指出,美、英、法领事馆坚持留在共产党控制的中国东北地区,这完全是“别有用心”,中共方面必须“提高警惕”^①。

越是距离新中国的诞生不远,毛泽东就越是寄希望于苏联的承认与支持。在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强大的资本主义阵营威胁的情况下,一个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只有加入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强大阵营中去,才有可能生存和发展。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中共中央必须重视苏联方面的意见,因此,毛泽东在得知苏联方面的考虑之后,即明确表示:“关于东北以及全国的外交政策,我们一定和苏联协商处理,以求一致。”^②当然,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共产党只能亦步亦趋地根据苏联方面的劝告去做。一向重视统战策略和斗争手法的毛泽东,还在周恩来刚刚起草了中共中央有关“挤走”美国等国驻沈阳领事馆的方针的文件之后不久,就再度发出指示,强调区别对待英、法与美国,“对于英法,似应较对美稍微缓和些”,明确认为即使在外交斗争中,也要注意策略问题。^③

区别对待的方法,长期以来就是毛泽东运用娴熟的一种斗争策略。何况整个“挤走”方针,其实也并不是根本不要与这些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问题的实质仅仅在于,在目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政府一般的还不可能放弃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但并不等于说这些国家完全没有分化的可能。因此,“挤走”方针的本身完全可以包含斗争的手法问题。至于先“挤”谁后“挤”谁,则应完全视需要而定。重要的只在于孤立美国,因为美国是一切帝国主义的总头子,是国民党的总后台,它不仅保持着与国民党的外交关系,而且还在处心积虑地援助国

^①《东北局给中央的电报》,1948年11月6日;《中央给东北局的指示》,1948年11月1日,等。

^②《毛泽东给高岗的电报》,1948年11月17日。

^③参见《毛泽东给周恩来的批示》,1948年11月18、21日,等。

民党反对共产党。因此,毛泽东主张“对于英法,似应较对美稍微和缓些”,在沈阳不必禁止其出入,过一时期更应准其修复电灯、电话。再度由周恩来拟稿的中共中央 11 月 23 日的指示,更进一步对毛泽东的意见作了具体的说明。指示称:我们目前坚持不承认国民党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是为了使我外交立于主动,“并不等于我们永远不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外交关系,也不等于对待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毫无区别。挤走美、英、法三国驻沈领事馆的一般方针,……并不一定在东北以外的解放区都实行,而且对英法和对美必须有所区别”^①。

比较一下同是周恩来起草的 11 月 10 日和 11 月 23 日这两封解释中共中央“挤走”方针的指示电,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两封电报有一点是显著不同的,那就是,在 11 月 10 日最初提出“挤走”方针时,中共中央并没有在政策上做任何区分。它只是笼统地提出封锁和孤立美、英、法,既没有提出区别美国和英法,也没有提出区别东北与关内。而在 23 日的指示电中,则不仅提出了区别美、英、法,而且宣布说“挤走”的方针在东北以外的地区并不一定要实行。要了解这种改变的背景,还必须注意到 11 月中旬毛泽东对革命胜利时间估计的改变,因为恰恰是这种估计的改变,使得中共中央此前此后对于未来外交的前途,一度开始有了颇为不同的认识。

11 月 10 日的电报,中共中央仍旧是以 9 月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五年左右胜利的估计为依据的,因而它对早日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不抱多少希望。但就在这封电报发出的第二天,毛泽东即改变了形势的估计。11 月 11 日,毛泽东在给各方面负责同志的电报指示中,明确指出:“九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五百个正规师,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九、十两月的伟大胜利,显然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要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正是从这种新的估计出发,23 日的电报对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英法两国建立一种外交关系的可能性,较前有了更多的灵活性。而毛泽东对此似乎更乐观、更大胆。他明确提出,即使是在东北地区,是否挤走英法也还要看那个时候的具体情况;即使是“挤走”美国,最后的决定权也必须操在中央手里,况且就是挤走也并不意味着

^①《中央关于挤走美英法领事馆给东北局电》,1948 年 11 月 23 日。

将来不与美国建交,因此做事也要留有一定的余地,比如电台所有权可仍属美方,由我代管,“将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时退还”^①。

一方面没收电台,封锁美驻沈领事馆,软禁其人员,一方面估计不久的将来有可能同美国建交而主张留有余地,这清楚地表明,毛泽东这时固然对帝国主义的头子美国不信任,但并没有根本否定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为此,中共中央甚至很快电示东北局,对美国领事馆的封锁也不宜像监禁一样,分别软禁在三处的领事馆人员及其家属,应该允许他们自由来往。但这样一种相对积极的做法,突然被25日收到的一份东北局的电报打断了。

这份24日发出的电报报告说,沈阳方面于软禁美国总领事华德等人之后的次日,破获了一起重大间谍案,全部系美国特务,直接由美国驻沈阳领事馆提供各种收发报装置、经费并领导,任务是刺探并递送有关苏联、外蒙古和中国解放区的各种情报。^②这一情况的出现,对中共中央外交政策冲击之大,是出人意料的。苏联人关于美国坚持留在东北是“别有用心”的说法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因此,恢复沈阳美国领事馆三处人员自由来往的指示暂时停止了,对沈阳美国领事馆事件的性质估计迅速开始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又再度不加区别地提出“逐步挤走”美、英、法三国驻沈阳外交人员的主张,并且开始提出:“我们不应允许资本主义国家记者留在解放区发新闻”。而更加火上浇油的是,几天之后,毛泽东又获悉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某种方式承认中国即将产生的新的联合政府,通过恢复与新中国的贸易,鼓励对新中国的投资等方式,分化中国现在的统一战线,努力造成新的联合政府中的反对派,以抵抗共产党。毛泽东不禁勃然大怒:武装援助蒋介石打不败共产党,现在竟亲自出马搞起孙悟空钻进牛魔王肚子的卑鄙勾当来了。他愤然批示:“此种阴谋必须立即开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阴谋在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中得逞”,“决不允许”那些心怀鬼胎

^①《毛泽东关于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基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指示》,1948年11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挤走美英法领事馆给东北局电上的批语》,1948年11月23日,等。

^②关于这一案件的较为详细的情况,在以后审判华德时曾经部分地加以公布。从当时东北局的报告和被捕特务人员的交代材料来看,应该肯定此一间谍组织确曾一度利用了沈阳领事馆,只不过,经过长期侦察和审讯,关于华德是否知晓此一间谍组织,并负有直接责任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证明。参见《东北局致中央电》,1948年11月24日。

的外国人到解放区来。^①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周恩来很快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待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及新闻人员态度的指示,明确指出:“现时帝国主义外交人员及冒险分子都在寻找机会企图钻进解放区来,进行挑拨和破坏民主阵营的工作,我应严正地注视这一发展,并在适当时机用适当方式,揭露其阴谋,打破其幻想。”故对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中要求进入解放区的外交人员、记者等,一概拒绝;各种问题,一律不予答复。对于坚持留在我解放区,包括今后留在平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区的外交人员,只当外国侨民看待;对于留在这些地区的美国武官(连同原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在内),因美国军官正在助蒋作战,故应以武装监视;对于留下来的外国记者,因其均为反共报纸或通讯社的记者,故亦不承认其为记者,不给以任何采访和发电之权,军管期间还应监视其行动,发现其有破坏行为,即予惩办直至驱逐出境。^②如此强烈的反应,当然不能不对他们此前的外交形势估计产生严重的影响。

4. 外交接触的尝试

1949年初,中共中央接连召开会议,讨论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外交问题第一次提上议事日程。但对帝国主义阴谋保持高度警惕,成了人们议论的重点,外交承认问题反而被放在一边了。由于即将成立的新政权还带有联合政权的性质,政权内部还包含有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国内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对美帝存在程度不同的幻想,这使得刚刚得到政权的共产党领导人对美国人的阴谋极其反感和担心。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的革命是带反帝国主义性质的,帝国主义恨死了我们的革命,尤其是美帝在中国失掉了威信,它当然不会甘心。美帝的对华政策就是两手,一是帮国民党打我们,二是通过某些右派,甚至利用特务从我们内部破坏我们。从现在情况看,国民党失败后他们是可能承认我们的,这样他们就能够钻到我们内部来同我们作斗争了。因此,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应当不给他们这种机会。我们要等到中国全部解放了,我们已经站稳了脚跟,并且把帝

^①参见《毛泽东对雷和文谈话摘要的批语》,1948年12月4日,等。

^②参见《中央关于战争期间拒绝一切外国记者采访解放区的指示》,1948年12月23日,等。

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和基础统统搞掉,再说承认的话。他这时有过一句很形象的说法,叫做“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而他亲自起草的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则向全党明确宣布了对美国的这种强硬态度。^①

战争时期,军事胜利就是一切,既然注意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人员及其记者都可能同帝国主义阴谋有牵连,那么,为了保证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不加区别地限制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人员的自由,否认他们的权利,也是理所当然的。1月19日,中共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再度明确规定:坚决否认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在华代表及其机关的权利,其各种电台及其收发报装置一律没收,对美国武官必须“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对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一律不予承认,概不给以任何采访发报之权。^②不过,引人注目的是,几天之后,即1月25日,中共中央又很快下达了一个关于外交工作的“补充指示”,提出对原指示中的两项内容须暂时变通办理。其一是对平津两地外国领事馆所有的电台,包括美国领事馆在内,“暂置不理”;其二是对平津两地的外国记者,连同美国记者在内,亦暂取放任态度,并可考虑经过一个时期的考察后,令所有外国记者重新登记,对其中合乎我们需要的外国记者给以采访和发报之权,其他则不予批准。^③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既是同这时苏联方面的意见有关,也是同这时国内政治形势突然出现的重要变化有关。

还在1月上旬,南京政府就积极谋求苏联出面调停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当1月10日斯大林向毛泽东通报这一情况,征求毛泽东意见时,毛泽东最初曾断然予以否定。但考虑到强硬地拒绝和平谈判,可能会给美国干预中国革命带来借口,斯大林一再劝告毛泽东务必在策略上做出某种姿态,包括对美国也不宜采取过于激烈的敌对态度。在反复考虑了斯大林的建议之后,毛泽东最终同意采取比较灵活的做法。这既包括策略上赞同与南京政府进行谈判,也包括

^①参见《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1949年1月8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1页。

^②参见《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卷,第45—47页。

^③参见《中央对于外交工作的补充指示》,194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卷,第78—79页。



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与其秘书傅泾波

在外交上避免采取过于生硬的做法。^①斯大林的态度显示出,苏联这时并非一味地有意要使中共与美国之间保持紧张关系。

在此之后,蒋介石突然于1月21日宣布下野,国民党代总统桂系李宗仁及华中一带国民党军队最高将领桂系白崇禧等又积极密谋和共反蒋,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有急转直下的可能,这时在政治上和外交上保持一种较为积极的态度,对于影响和分化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种势力,包括美国的势力在内,益显出其必要性。况且,和平解放北平前后,中共中央也注意到了灵活运用外交策略的重要条件。

自1949年1月上旬以来,中共中央就不断收到来自美国方面的信息,显示美国方面的态度也并非铁板一块。长期与中共领

^①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397页。

导人有着友好关系的美国记者斯诺、史沫特莱和路易斯·斯特朗不用说了,就是多数美国在平津的记者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也并非带有挑衅性。^①不仅如此,这时,就连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也通过其秘书傅泾波辗转送来密信,转达大使的两点希望:“(一)伪府因迷信武力,失却民心,致此田地,希中共以收挽民心为先决条件;(二)美所望于中国者,为主权独立,政治、经济、文化能达自由。”而后,又有情报显示,即使南京国民党政府决定撤往广州,美国大使以及多数西方国家的大使仍将继续留在南京,准备与共产党方面进行接触。^②紧接着,美国国务卿也就其在沈阳领事馆人员被软禁一事,通过其在北京和香港的总领事,以文书形式向中共最高当局提出询问。^③所有这些在中共中央看来,当然意味着美国政府确实有曲折承认共产党为未来中国新主人的可能性。

当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共产党自1月下旬以来外交手法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多少灵活的态度,是其外交方针的改变。在3月上半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等人仍旧再度重申了他们在1月会议上提出的那些观点。毛泽东肯定地说:尽管美国人想承认我们,我们却不忙于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关系。他再度强调了帝国主义“内部破坏”的阴谋问题,并形象地比喻说,这是为了防止孙行者钻入牛魔王的肚子捣乱,而“孙行者即美帝是也”。而与此同时,毛泽东高度评价了中共与苏联之间的盟友关系,并坚决表示,我们是和苏联站在一起的,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就要公开发表文告来说明我们的这种坚定态度。^④这表明,不论这时共产党人的外交政策是否变得多少灵活一些,至少在内心深处,他们仍然是把美英等国,特别是把美国,看成是自己最危险的敌人。问题仅仅在于,即使把美国当成敌人,是不是就一定不能同美国等国发生外交关系呢?1949年4月,来自斯大林的一份电报和来自上海陈铭枢将军那里的一则信息,终于促使中共中央重新考虑对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策略了。

4月中旬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前夕,中共中央得知美国大使开始正式出面

^①参见《史沫特莱致朱将军函》,1949年1月;《鲍大可、司徒雷登致毛主席的信》,1948年12月29日,等。

^②参见《傅泾波致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诸先生函》,1948年12月8日。

^③参见FRUS,1949,Vol.8,pp.901-903,907-910.

^④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434—1437页。

谋求与中共方面疏通和解。从上海来的陈铭枢将军的代表雷仲仁报告称：几个月以来，美国方面一直极力寻找途径与中共疏通。为此，“司徒大使偕傅泾波于三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冒恶劣天气乘专机抵沪在友家与陈先生会见密谈三小时，三月二十六日下午又密谈三小时。并要求陈先生为中国及世界和平计往北平一行，向中共中央解悉美国政策，俾得与中共化仇为友，与苏联合作建设世界，制止第三次战争”。司徒大使表示美国顾虑中共者二：“（一）美国怕中共站在苏联一边与美国为敌，助长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危险性；（二）怕中共武力统一中国后放弃民主人士及民主联合政府，而实行赤化亚洲，独裁中国。”司徒大使称：美国希望中国即日停止战争，实现和平，清除贪官污吏，希望中共真正实行民主，成立一个真正和平独立民主自由的联合政府，同时并希望中共能够改变对美之态度，制止反美运动。如此，美国定愿与中共实现友好并援助新政府复兴与建设新中国。^①紧接着，就在中共决定开始渡江战役的几乎同时，针对毛泽东去电征询斯大林关于新中国政府建立及其有关政策问题，斯大林给毛泽东回了一封很长的电报。回电中特别说明了他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建议。他提议：只要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能够正式放弃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支持，那么，中国民主政府就不要拒绝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因为这样做将有助于使美国放弃其分裂中国的计划。^②

司徒雷登的主动和斯大林的建议，无疑给了中共中央表现其灵活性的一个适当的机会。毛泽东很快将司徒雷登的要求通知了斯大林。而与此同时，不管毛泽东内心深处是否相信与美国政府接触的实际意义，中共中央这时毕竟开始考虑向美国方面传递某些积极的信息和在可能条件下发生外交关系的问题了。

4月6日晚，中共中央曾收到新华社驻香港分社来电，报告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Wallace, Henry A.)介绍来华的索尔·密尔斯已经到达香港，要求前往华北解放区。由于华莱士是力主消除美苏分歧，结束冷战的前美国总统候选人，苏联方面自然大开绿灯。但最初，像以往一样，中共中央没有做出任何反

^①关于司徒雷登的这一大胆的秘密尝试，至今无论是在司徒雷登公布的个人档案里，还是在美国政府所公布的外交档案里，都没有记载。唯一可以作为理解司徒雷登这一行动的参考的，就是他在3月10日发给国务卿的一份电报。在这份电报中，他第一次明确要求国务院授权他与中共高层领导会谈。参见FRUS, 1949, Vol.8, p.174;《陈铭枢先生报告美大使来沪密访二次事》，1949年3月26日。

^②参见冈察洛夫前引文。

应。只是在收到斯大林的电报之后,即中共中央4月中旬初决定以4月20日为过江最后期限的同时,它才破天荒地致电自己在香港的代表,宣布批准密尔斯进入华北解放区,访问天津和北平。毫无疑问,在数不清的外国记者、外交官以及其他各类外国人,甚至是像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Strong, Anna Lovis)这样历来受到中共领导人欢迎的美国人,几个月来全部都被拒之门外之后,密尔斯是有幸能够得到这种殊荣的第一位美国人。尽管这位美国前纽约产联理事会总书记、纽约州美国劳工党副主席,名义上是代表美国将近10家公司前来中国与中共领导人谈生意的,但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在这个时候宣布让这位具有重要政治背景的美国人到北平来,其政治上的意义远较双方对生意上的考虑要重要得多。^①

一度关死的门打开了,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只具有策略意义,但毛泽东并没有像一个月以前那样把建交的门封死。由于对国民党已经在军事上取得了无可争议的优势,共产党人不再需要像几个月以前那样把向外国人封锁军事消息放在外交考虑的重要位置。当务之急是避免美国可能的军事介入和尽可能快地结束对国民党的战争。为此,毛泽东首先通知前线领导人注意不要在外交上出问题,并提出:鉴于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两天以后,即4月30日,他进一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的名义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但“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②。

5. 毛泽东宣布“一边倒”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拿下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而以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为首,多数国家的使节都留在南京没有动。为了设法了解美国对自己

^①参见《密尔斯备忘录》,1949年;密尔斯:《赴华使命》,1949年;《密尔斯与周恩来谈话纪要》,1949年5月18日。

^②《毛泽东关于稳住汤恩伯及外交政策问题致总前委电》,1949年4月28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85页;《毛泽东选集》,第1464页。

及对国民党的政策动向,并便利与司徒雷登的接触,中共中央专门派原燕京大学的学生黄华前往南京担任军管会外事处处长。而司徒雷登自然也急于与中共最高层进行某种方式的联络。^①于是,双方由此开始了一段在新中国与美国关系史上相当引人注目的外交接触与对话。

5月6—7日,司徒雷登两度派其秘书傅泾波与黄华接触,主动要求安排与黄华的直接会面。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当即致电南京市委与华东局,表示同意安排见面,但多听少说,“以侦察美国政府之意向为目的”,绝对不可给美国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共有求于美国。^②

5月13日,黄华与司徒雷登及傅泾波在司徒住处会面。^③人们事实上可以把这次谈话看成是新中国成立前夕中美双方的第一次重要的外交接触。但是,从这次接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双方的看法和愿望相距甚远,甚至难以调和。中共中央重视的是:“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而司徒雷登实际上却相信:只要国民党政府仍然存在并得到美国承认,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多半不会因为中共的军事胜利而迅速改变。中共中央最重视的是:美国“永远不要干涉中国内政”,而司徒雷登却暗示,美国的承认要视新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广泛吸收“民主分子”参加。这在共产党方面看来,其实就是要干涉中国的内政。难怪南京市委总结司徒雷登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联合政府内应吸收美帝走狗。”^④

5月17日,5月31日,傅泾波又两次找黄华谈话,再三表示美国政府与国会之间在对中共的政策问题上存在着极大分歧,司徒雷登是力主与新中国建立友好关系者,因此中共方面对司徒雷登应加以信任和谅解。根据他的提议,在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之后,黄华主动约司徒雷登和傅泾波于6月6日在外事处再度面谈。黄华表示,既然司徒雷登有意建立中美人民新的外交关系,那么,就不应当回避与国民党断绝关系和停止继续援助国民党的关键问题。司徒仍旧坚持,今天在中国没有一个新政府,因而不存在承认的对象。况且如今国共

^①参见《中央给南京市委及华东局的指示》,1949年5月10日。参见FRUS,Vol.8,p.741;并见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

^②参见《中央给南京市委及华东局的指示》,1949年5月10日。

^③参见FRUS,1949,Vol.8,p.746;《新中国外交风云》,第26页。

^④FRUS,1949,Vol.8,pp.744,746.



黄华与妻子何理良

各占一部分地区,按照国际法,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与尚有存在条件的旧政权断绝外交关系,他突出强调的仍然是,未来中国的政府里是否能够尽量吸收一切民主开明的人士参加,并说明,承认问题将视此而转移。因为要了解美国政策,一句话就够了,那就是,美国害怕共产主义,害怕世界革命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在美国人眼里,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对华政策的问题,而是关系世界和平的大问题。如果中国能够实现民主自由,那么,美国与苏联的关系也就好解决了。^①

^①参见 FRUS, 1949, Vol.8, pp.752-753;《南京市委给中央的报告》,1949年6月7日。

司徒雷登大概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些颇有挑衅意味的说法进一步证实了毛泽东的担心,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愈益提高了他们对美国阴谋的警惕性,对于美国断绝与国民党关系的可能更加不抱幻想。继续保持接触,看起来仍旧与斯大林有关,因为这时中共代表与美国大使的整个谈判过程,几乎都是在斯大林的密切关注与建议下进行的,毛泽东不断地在向斯大林详细地通报这种接触的最新结果。^①斯大林甚至明确认为,未来新中国的恢复和建设如果能够得到美国在经济上的某种帮助,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因此,尽管中共中央这时对司徒雷登事实上已无信任可言,它还是在继续推动这样一种接触。这也就是为什么,当6月8日傅泾波告诉黄华说,司徒雷登有意在返回美国之前,赴北平面见周恩来时,中共中央很快表示同意。^②然而意想不到的,傅泾波关于司徒要求访问北平并表示,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司徒雷登的正式认可。此事自然节外生枝。^③

6月27日,傅泾波携来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16日给司徒雷登的信,称毛

^①根据笔者1994年4月与齐赫文斯基谈话的笔记及齐赫文斯基在近代史所所作报告。

^②关于此次谈话还有一种格外引人关注的说法,即所谓黄华突然改变了两天前的态度,转而强调美国的经济援助对中国的恢复是决定性的。(见FRUS,1949,Vol.8,pp.377-378)。马丁的《抉择与分歧》一书不仅肯定这种说法是真实的,而且还以此来支持另外一种神话,即至今仍在引起广泛争论的所谓周恩来5月31日通过澳大利亚记者基翁转给美国政府的口信。这个口信宣称,中国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并强调中共党内存在着开明人士(见前引书第357—360页,并见马丁书第38—47页)。马丁相信,这两种说法之所以如出一辙,就是因为黄是按照周的“新方针”行事的。但资料表明,黄就此次谈话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丝毫没有上述内容,恰恰相反,报告谈到,关于美国经济援助的重要性的说法,是傅泾波在提出司徒希望能够去北平与周恩来见面时,自己强调的。而黄华当时的答复是:美国对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若无正式表示,司徒去平要求恐怕不会得到回答。再从黄向中央报告的谈话内容看,这时傅已得到所谓周恩来的口信,因此,他极力表示美国政府方面许多人都了解周,也对周近来向人表示的意向感到鼓舞,并知道中共内部见解并不一致,而他们是赞成毛泽东、周恩来并反对亲苏派的。对此,黄明确予以了驳斥,称之为“造谣挑拨、老调重弹”,完全是“美国对我阴谋”。可以想见,如果黄照所谓“新方针”行事,必不会如此表示。

^③对照当时美国大使馆给国务院的报告,和南京外事处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可以看出傅泾波在司徒雷登和黄华中间经常捕风捉影地传递甚至制造一些假信息。比如,他曾多次向黄华谈到美国国务院有意让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新中国的第一任大使,多次谈到美国国务卿表示司徒雷登可以先回美国做短期停留即返北平协助国务院做中共工作。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在已经公布的美国国务院的档案中是不存在的。甚至,到了7月21日,司徒雷登正在办理离境手续之际,傅泾波又一次向中共传出美国国务院希望司徒雷登去北平的消息,但中共方面不仅对此已经不感兴趣,而且对傅也已再无信任可言。中共中央甚至警告傅:日后切忌不要“招摇撞骗”。

泽东已宣布你来访燕京之意,我估计当局可能予以同意。^①事实上这也确实是毛泽东的意思。在6月21日中央给南京市委及华东局的指示当中,毛就特别就司徒有意访问北平一事做了专门的批示,称不管他是否再提,在司徒雷登返美前10天左右,即可表示,“如他欲去平,可获允许,并可望与当局晤谈”^②。然而,溥涇波却矢口否认司徒有此意图,让司徒对此感到十分惊异,不知用意所在,并且司徒除了乘坐美国军用运输机前往北平外,时间上几乎没有可能再去北平了。因此,他只能报告美国国务院,由上面来作决定。言外之意,此事纯系中共中央方面的主动表示,而司徒本人则是被动的。此种情况立即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极大不满。周恩来电称:司徒雷登去燕京及希望与当局晤谈,均为司徒雷登所提,“决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藉口”。事实上,同意司徒雷登前来,也只为分化美蒋,“我们对美帝亦决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③。

如上所述,中共中央这时已经相当清楚地了解到美国不可能改变其现行的对华政策,因此,不论中共中央这时同意司徒雷登来访的目的何在,他们当然不会幻想给予司徒雷登一种较高规格的邀请就能够使美国断绝与国民党的外交关系,转而承认自己。既然如此,司徒雷登来与不来,对于他们其实也并无丝毫损害。从6月30日起,中共中央明确表示对于司徒雷登来北平问题不再有任何兴趣。当然,7月1日美国国务卿也明确指示司徒雷登不得访问北平,此事自然不了了之。随后,司徒雷登于9日正式申请于7月18日返美,15日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双方这次主要围绕着建立外交关系而展开的非正式的外交接触与对话,也就宣告结束了。而双方这次对话,可以说丝毫也没有找到可能达成谅解的基础。如果说对话的双方在某一方面确实取得了一致,那就是双方的感觉。因为他们通过对话竟一致意识到:幻想改变对方的政策,纯粹是徒劳的。因此,到8月2日司徒雷登“夹起皮包走路”之后,双方不是更接近了,而是更敌对了,更仇恨了。^④

^①参见《陆志韦致司徒雷登函》,1949年6月16日。

^②《中央给南京市委及华东局的指示》,1949年6月21日。

^③《中共中央给南京市委及华东局的指示》,1949年6月30日。

^④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492页;FRUS,1949,Vol.8,pp.405-407,801-802.

能不能说,中国共产党和美国政府之间,在上面这个时期存在着相互接近的机会呢?关于这个问题,今天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双方这时政策的考虑上确实相差太远,而它们之间的这种距离,绝不是双方的政策制定者当时所能改变的。在共产党方面,撇开意识形态的基本考虑不谈,当时对美国政策的怀疑和敌视之所以根深蒂固,根本上还在于两大因素。一是历史因素,是他们对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军事侵略、政治干涉和经济压迫的惨痛记忆,他们看不出帝国主义有可能自动地放弃它们在中国的特权和利益,看不出除了根本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以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够使中国人真正独立自主、扬眉吐气;二是现实因素,是他们从美国顽固地坚持武装援助国民党来消灭共产党的战争中,从美国处心积虑地利用外交官做掩护,在苏联东欧各民主国家,特别是在自己的解放区从事间谍活动、从雷和文以及司徒雷登等人赤裸裸地主张在新中国政府中支持民主人士抵抗共产党的政治攻势中,所深切感受到的,他们看不出美国有自动放弃干涉中国内政,反对和颠覆共产党政权的帝国主义阴谋的可能,看不出他们除了把这个世界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当成是自己的头号敌人,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并且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以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它对自己的统治造成危害。显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必像弱小的民族主义者那样机会主义地来保护自己,他们清楚地了解自己在世界政治斗争中的位置,也格外庆幸他们能够与世界上几乎同美国一样强大的苏联结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同盟。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1949年最终宣布了自己政治上将坚决地站在苏联一边,即实行“一边倒”政策。

让人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写作和宣布“一边倒”政策的时间。因为它恰恰是在毛泽东表示欢迎司徒雷登到北平来访问和晤面的同时。很清楚,毛泽东并没有改变原来的设想,即在一个适当的时候公开宣布自己与苏联的同盟关系。而这个时候一天天地来到了。当中共中央了解到6月6日司徒雷登赤裸裸地表示了美国政府坚决敌视共产党政权,必欲扶持中国的所谓“民主开明人士”抵制共产党,同时蓄意挑拨中共与苏联关系的态度之后,他们就已经考虑以更加明确的方式就此作出反应了。而6月10日,傅泾波有意把中共领导人划分为“开明”和“教条”两派,明显地挑拨中共领导人关系的进一步的谈话,更使得打

破美国政府的试探与幻想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①

中共中央这时采取的第一个针对美国政府的强硬行动,就是在6月19日突然公布了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本来,在5月中旬美国政府表示将关闭沈阳领事馆之后,中共中央考虑到当时与司徒雷登的接触与对话,并没有具体考虑是否要追究华德等人的间谍案责任问题。直到6月初,中共东北局方面对于华德等人的软禁也相当放松,华德也已经得到美国政府同意关闭领事馆的指令,并已得到沈阳当局的认可开始做闭馆和撤退的准备。但这时,鉴于司徒雷登及美国政府拒不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并考虑到这一时期包括司徒雷登在内的美国在南京、北平和上海的外交官,通过各种方式指责中共违反国际法,强烈要求中共解除对沈阳领事馆人员的软禁,同意他们关闭那里的领事馆,撤出全部外交人员,中共中央经反复研究,终于就此做出反应,披露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参与间谍活动的真相。显然,这一决定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做出的,他们甚至来不及具体通知中共东北局,并且还没有具体研究是否应当追究华德等人的间谍案责任问题。但这恰恰反映出,他们在一段时间的等待之后,对美国绝不可能放弃其必欲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本质,已经更加确信不疑了。毛泽东6月24日亲自批示公开广播《英美外交——特务外交》一文,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种情况。^②

中共中央这时采取的第二个多半是更为引人注目的强硬行动,就是公开宣布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实行“一边倒”。如前所述,他们尝试过采取某种策略手段,适当灵活地处理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外交人员的关系,甚至为此在表面上与苏联有关人员也保持适当的距离,试图以此来促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停止援助国民党,并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加速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推迟了公开宣布“一边倒”的时间。然而,与司徒雷登的对话表明,美国政府的条件远不止于此,他们根本上就反对中共与苏联站在一起,不论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甚至他们根本上就反对共产党,不论共产党是不是愿意与它们改善关系。况且在事实上,要否认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或者

^①参见《南京市委给中央并华东局的报告》,1949年6月10日。

^②参见《人民日报》,1949年6月19、24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27—328页。

在重大的国际政治问题上不表明自己的亲苏态度,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是不是公开宣布“一边倒”,对美国既定的对华政策其实都不会有什么影响。考虑到新政协筹备会的召开和新中国政府即将成立,公开宣布自己的基本国策事实上已经刻不容缓,毛泽东很快在新政协筹备会的讲话里,特别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里,公开表明了自己亲苏反美的强硬态度。在毛泽东看来,这样做同样也是为了对付美国。^①

毛泽东的表态为整个新中国的对美政策定下了调子,从而使得一度根据某些小道消息,猜测有可能引诱毛泽东等部分中共领导人远离苏联的司徒雷登们,彻底地失望了。司徒雷登极其沮丧地承认:“毛现在不会被收买。”但他似乎并没有特别重视毛泽东的表态中所包含着的更为深刻的政治目的。^②

6月30日,毛泽东正式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的活动,正式批准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等一千人进行公开审判。随后,鉴于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白皮书的发表,毛泽东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接连为新华社写了五篇旨在批判这一白皮书的重要评论文章。其重视之程度,可以说空前绝后。毛泽东要干什么?那就是,要彻底打破在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和中间阶层中存在着的对于美国的幻想,要彻底摧毁司徒雷登以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之流所寄予希望的一切“社会基础”。这个工作,毛泽东自从抗战胜利以来始终在做。先是同党内“恐美”思想作斗争,现在是同社会上的对美国的幻想作斗争。他已经断定,在武装干涉难以实现之后,美国用以推翻共产党统治的手段,只能是内部的破坏与颠覆,而在中国,确实存在着可供美国政府利用的足以用来颠覆共产党的“社会基础”。毫无疑问,根本否定英美外交也好,公开宣布“一边倒”政策也好,其实更多的只是要让举国上下认清这样一条是非界限,是要警告那些仍然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中间派”、“中间阶层”、“落后分子”,或者“自由主义分子”、“旧民主主义分子”、“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万万不可倒向另一边。毛泽东知道,有这种“错误思想”、“糊涂思想”、“反人民的思想”的人,在中国还

^①毛泽东在此之后多次说过:我们是弱国,不是强国,美国怕苏联,但是不怕我们,因此,我们一定要联合苏联,要以苏联为首。这样就可能“使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470、1477—1480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13页,等。

^②参见FRUS,1949,Vol.8,p.407.



1949年10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占相当数量,如果说国民党被打倒之后,还有什么势力能够被用来对共产党的权威挑战的话,那就是他们。“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因此对于他们还只能说服和争取。毛泽东显然把打破这些中间派头脑中对美国的幻想的工作,看成是一件关系到新中国生死存亡的大事情。他相信:一旦“争取了他们,帝国主义就完全孤立了,艾奇逊的一套就无所施其技了”^①。为此,毛泽东明确提出,把矛头对准主要敌人美国,一方面使其威风扫地,以利恢复民族自尊心;一方面则将其赶出中国,以利根本破灭中间派的幻想。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与此同时,新中国政府对于美国的政策也基本确定了。就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而言,它不否认有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必要。作为新中国暂时基本大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②但是,正如周恩来所解释的那样,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态度”是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提出的“一边倒”为依据的,这是一个是非界限问题,是一个认清敌友的问题。而考虑到目前新中国还有许多问题,基础还十分不稳固,新中国政府实际上决定暂时不忙与美国,甚至也不忙与英国建立外交关系。至于何时再考虑与美国建交,毛泽东这时相信,它可能需要一个比年初的估计还要长些的过程。^③

从1948年11月中共中央确定“挤走”方针开始,至此经过了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自己的外交政策又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具体考虑,但他们最终还是回到原先的起点上来了。而这一次,他们的态度却更强硬了。毛泽东的结论是: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

^①《毛泽东选集》,第1487—1520页。

^②《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公告》,1949年10月1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卷,第13、21页。

^③参见周恩来:《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草案的特点》,1949年9月22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卷,第19页;周恩来:《新中国的外交》,1949年11月8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90页。

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制裁他们的犯法行动,‘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①

6. 结语

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它的巩固与安全成为首先面临的问题。而这种巩固和安全的最大隐患,就是美国的干涉和破坏。为了减少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其在中国的半合法地位进行政治破坏和思想影响的可能性,根据毛泽东既定的方针,新中国政府很快采取严厉措施以打击美国政府继续在中国待下去的信心。10月31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等因对中国雇员使用暴力,受到中国雇员联名起诉而被拘押。随即,沈阳市公安局再以间谍案对华德等人提起公诉。11月下旬,华德等人很快被分别处以数月徒刑,缓刑一年,然后驱逐出境。^②而12月初,中共中央进一步讨论了挤走美国在华所有外交人员的策略,随后于1950年1月6日下令征用美国等国驻北京领事馆根据辛丑条约占据的旧兵营,最终迫使美国关闭了在中国的全部领事馆,并撤走了全部政府人员。^③对于这一结果,正在苏联访问,争取和苏联正式缔结同盟条约的毛泽东看上去颇为满意,宣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耀武扬威了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者,才会如此丢脸,如此灰溜溜地离开中国,而“拿我们没有办法”。当然,这样做根本上还是为了巩固新政权。在几年之后,毛泽东谈到当时外交的战略考虑的时候说得很明白,即:这时,“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有了外交关系会给我们许多困难”。我们需要“先扫自己的房子”,而与美国这样的国家有外交关系则困难得多,暂时不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就使他们没

^①《毛泽东选集》,第1490—1491页。

^②华德最后被驱逐出中国的时间是1949年12月11日。参见《新华月报》,1949年12月11日,1950年新年号,合订本第620—624页。

^③参见《新华月报》,1950年2月号,合订本第853页。

有机会在我们内部制造麻烦。因此,建交与否,这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态度,“实际上我们希望‘客人’迟一些来。我们希望他们来时使他们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使他们处于后悔的地位”^①。

原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

^①《毛泽东与波立特等人的谈话纪要》,1955年9月18日,等。



第三章

中苏结盟与中苏两党的民族主义碰撞



引言

新政权与美国交恶，虽然背后存在着苏联的巨大作用，但却并不意味着毛泽东的新中国一定会成为苏联的手足。共产党，固然都是以信奉共同的意识形态和主张国际主义为其特征的，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本质上却又几乎都是民族主义者。或者说，他们在国内政治问题上，更多地会显示出其共产主义者的特质；而在国家关系问题上，却会较多地表现出其民族主义者的性格。这一点，在苏联的历史上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共也早就给了世人以同样的印象。十分熟悉毛泽东，也深为毛泽东所欣赏的美国记者斯诺，这时就在美国公开发表文章提醒美国人：毛泽东决不会成为苏联人的傀儡。但是，当毛泽东公开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明确声明向苏联“一边倒”之后，要这时已经开始被卷入到麦卡锡主义漩涡之中的美国当局寄希望于毛泽东，肯定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其实，就在 1949 年新中国建国后不久，由于毛泽东访苏，中共与苏共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就已经开始显露出来了。不少敏感的美国人都或多或少地注意到了其中的蛛丝马迹。^①但是，基于意识

^①包括一些当时在北京的美国传教士，就曾公开表示过类似的想法。如燕京大学音乐系主任兼总务处代主任的范天祥，就告诉中国学生说，毛泽东在莫斯科待了那么长的时间，双方之间肯定发生了什么问题。

形态和冷战思维，几乎所有人都没有能够意识到中苏之间磨合过程中的这种迹象可能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而仅仅几年之后，我们就能够从毛泽东的各种谈话当中发现他对这次访问及其结果，曾经多么不满和沮丧。

造成外人几乎无法窥测到中苏分歧内容的一个实质性原因，是美苏冷战条件下中苏两党两国战略利益的相互需要性。毛泽东早就对苏联及其共产国际不满，苏联领导人早就认定毛泽东及其中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者，这在1949年也并不是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但是，与这些历史上的摩擦或分歧相比，更让外界把中苏视为一体的，则是中共领导人一而再、再而三的亲苏言论。除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外，刘少奇的《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1949年以来中共中央和联合政府所发布的一系列涉及国际关系问题的声明与宣言，都极大地掩盖了中苏之间存在的矛盾。同样的情况，斯大林也常常不得不设法来缓和与修复与毛泽东的关系，包括向毛泽东做出在他看来是十分重大的让步。正是双方这种共同的努力，最终使毛泽东1949年底1950年初的这次访苏，形式上达到了共赢。而双方之所以会努力让步，原因也都在于它们当时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敌人——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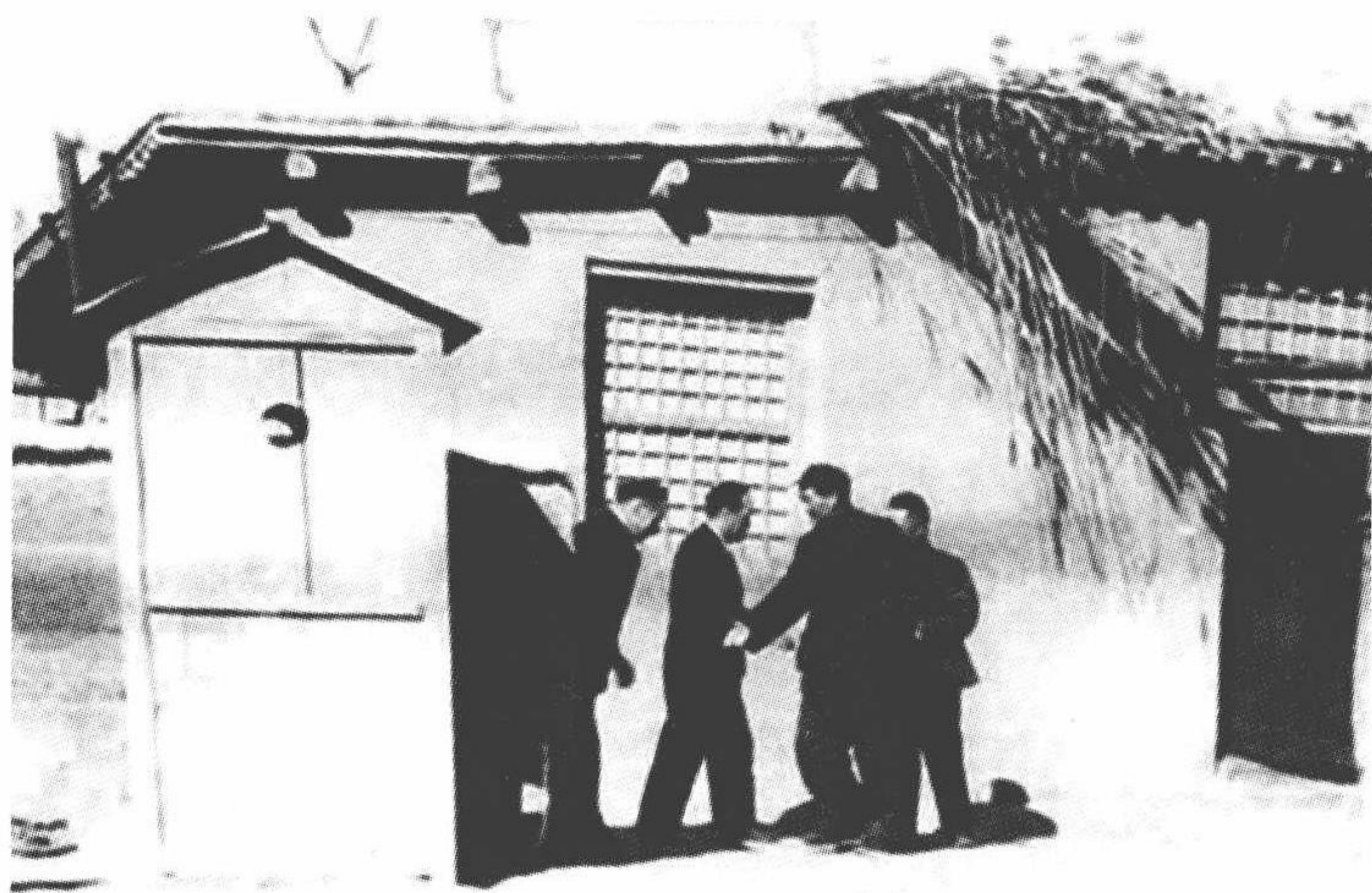
1. 毛泽东访苏的愿望与担心

中共领导中国革命能够成功,一是靠运用阶级斗争的理念,发动和组织广大的贫苦民众;一是靠高举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的大旗,联合一切真心救国救亡的力量。因此,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共中央很清楚,新政权能否巩固的关键,也就在于:第一,对内,它能否尽可能地满足贫苦民众翻身做主人的强烈愿望;第二,对外,它能否切实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第一个问题对于革命的共产党人来说,自然不是问题。然而,第二个问题却不是中共单方面所能决定的。

对于新政府而言,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独立严格说来并不是什么难事。中国过去之所以始终处于一种半独立的地位,根本上是因为中国始终没有能够彻底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与一切国家重建外交关系,这原本就是新中国对外政策的一项基本方针,因此,废除和取消一切可能对中国完成独立构成妨碍的外交条约和外国特权,理论上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新政府也正是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它的外交关系的。但是,横亘在新中国彻底迈向民族独立台阶的一个最大的障碍,不是别的,正是它与苏联的关系。这是因为,旧中国保留下来的最重要的一个不平等条约,就是1945年7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由于这个条约,中国被迫放弃了对外蒙古的主权,承认了它的独立;被迫同意租让中国东北的旅顺港作为苏联海军的基地;被迫同意与苏联共同管理从满洲里到大连的中东铁路。^①十分明显,由于中共与苏联之间的特殊关系,中共没有办法按照它对其他国家的那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这个问题的存在,无疑是对中共新政权能否真正像它所宣称的那样,使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一个最大的考验。

莫斯科当然不会不了解中共的处境和新政权在中苏关系问题上所面临的

^①参见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下卷(第二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1—272页。



1949年1月底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村时与毛泽东见面握手

这种挑战。还在新中国宣告成立之前,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联共(布)中央就特地选派了政治局委员米高扬(Mikoyan, Anastas)秘密前来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阜平西柏坡村,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就新中国建立之后可能面临的各种问题交换了意见。在会谈中,毛泽东似乎不经意地,但却明显带有试探意味地讲述了“一个女资产阶级社会活动家”提出的问题,“即革命政府在中国掌权后,苏联再在旅顺保有军事基地就没有意义了,而收回旅顺,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件大事”^①。与此同时,他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希望看到外蒙古重归中国版图的个人愿望。^②对此,斯大林的态度很清楚。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写道: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即将掌握政权,苏联决定一旦对日和约缔结,美国军队从日本撤走,它就废除这项不平等协定,并从旅顺撤走自己的军队。但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立即撤退苏军为好,苏联愿意满足中共的这个要求。对于外蒙古,斯大林表示相信外蒙古不会放弃它已经获得的独立地位,事实上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③

显然,苏联之所以坚持租用旅顺港和继续管理中东铁路,一个重要的原因

^①列多夫斯基:《米高扬赴华的秘密使命》,彭卓吾译:《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4—27页。

^{②③}参见列多夫斯基前引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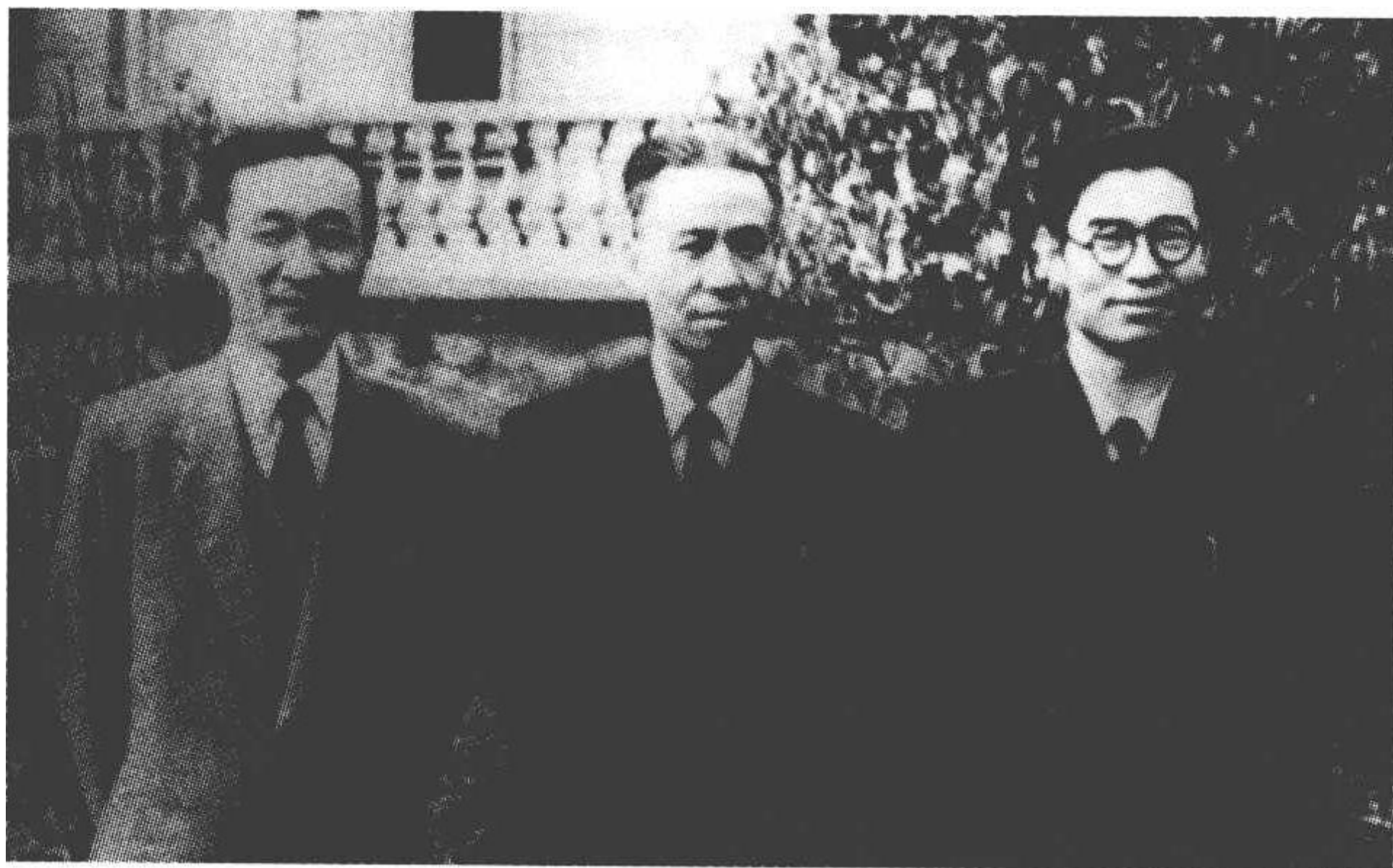
是为了防止美国把中国东北当成进攻苏联的重要基地，同时也便于威慑俄国的夙敌日本。新中国建立后，它本身就必須防备美国和日本，苏联自可不必继续在中国东北驻军。但是，让中国重新拥有对外蒙古的统治权，使中国的版图可以直接嵌入苏联欧亚交接的腹地，对苏联的安全却未必是一件好事。同样的情况，考虑到国内民众的舆论，斯大林也不想马上放弃对中东铁路的管理权。用他的话来说，这条路当年毕竟主要是由俄国出资建成的。

与米高扬的会谈已经显示出双方之间存在的分歧，且沟通颇为不易。几个月后，即1949年6月底，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了莫斯科。面对双方之间存在的分歧，中共中央再度通过讲述国内各界对苏联在旅顺驻兵、外蒙古独立和苏联从中国东北运走机器等问题上存在不少议论，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特别是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基于新政府在外交上准备“另起炉灶”，不承认且废除一切旧条约的方针，中共中央显然也希望苏联能够同意双方另外再订新条约。但顾虑到双方的特殊关系，刘少奇在提交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对此还是不能不表达得十分婉转曲折。他写道：一旦新中国与苏联建交，中国政府既愿意宣布全部承认这个条约继续有效，也愿意“根据原来条约的精神，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一个新的苏中友好同盟条约，以便根据新的情况在文字上和内容上有所增减”。当然，也可以暂时维持这个条约的原状，等适当时机再签新约。^①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外交工作，包括全面审查过去国民党政府与各资本主义国家缔结的各种条约的工作，迅速提上议事日程。在这种情况下，对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如何处置，再度成为中共中央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显然是赞成“另起炉灶”的。何况，无论中苏条约平等与否，其相关协定毕竟存在不平等的情况，国内各民主党派和青年学生对此始终议论纷纷。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厚苏薄美，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共产党的政治形象。因此，当毛泽东决定尽快实现访苏之后，他即再三向苏方表达了希望签订新条约的愿望。^②然而，斯大林对此始

^①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6页。

^②参见《A.拉夫连季耶夫同王稼祥会谈记录(摘要)》，1949年11月10日；《罗申与总理兼外长周恩来谈话记录(摘自罗申日记)》，1949年11月10日。(见沈志华等编译有关苏中关系档案资料，以下简称苏中关系资料。)



1949年6月秘密访问莫斯科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主要成员王稼祥、刘少奇、高岗合影

终没有作正面的回应。由于担心此次访问可能难以达到预期的结果,毛泽东甚至没有带上党和政府的相关人员,作为新中国的最高领袖,他此行竟然只带了一个秘书、一个翻译和几个工作人员,足以见他对此行颇不看好。

2.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

1949年12月16日中午,毛泽东乘火车到达莫斯科北站,前来迎接的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Molotov, Vayacheslav M.),以及苏军元帅布尔加宁(Bulgakov, Mikhail A.)等人。新中国最高领袖抵达莫斯科,苏联最高领袖斯大林没有到场亲自迎接,这在众多中国人看来显然不够礼貌和尊重。特别是受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民族主义激情鼓舞的众多知识分子和社会各界名流,心态尤其不平衡。“中国新闻总署”很快就通报了他们的反映。称:“许多人对斯大林没有亲自到车站迎接毛泽东表示惊讶。上海工商界人士和旧社会出身的一些人对此表示不满。……一些人说,毛泽东亲自去苏联‘损害了国家的威信’。”^①

^①中共中央新闻总署通报(No.50):《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表现》,1950年1月1日。见苏中关系资料。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车站,右一为布尔加宁,右二为莫洛托夫

16日当晚,斯大林率领苏共政治局全体成员,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会客厅会见了毛泽东。双方立即展开了第一次会谈。会谈刚刚开始,毛泽东就提出了中苏条约的问题。斯大林当即表示:最好暂时不要改动这项条约。他说:“众所周知,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等)。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和英国同意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是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在斯大林看来,中苏条约不平等的关键,在于旅顺口驻军问题。只要撤出了苏军,就足以堵住资产阶级的嘴了。^①

为了恢复自己的主权,要使苏联承担可能失去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危险,这让高度重视国际主义的毛泽东顿感为难。他当即表示对此十分意外,但能够理解,并表示愿意放弃原来的想法。^②

对于毛泽东心情的沮丧,斯大林自然也很容易了解。为了不让毛泽东产生误解,在随后举办的为斯大林祝寿的大会上,毛泽东特别被邀请同斯大林一同步入会场,接受欢呼,并被安排第一个致贺词。但是,毛泽东深知,此行如果不能弄出一些对中国有利的东西来,势必有损自己和新政府的形象。因此,他还是希望能就借款、通商、航空等问题签订一系列协定,并召周恩来前来完成协定签字的手续,以示隆重。没有想到,斯大林并不理解这种中国式的礼节程序。在他看来,与其要政务总理周恩来来莫斯科签订这些条约,不如由身为国家主席的毛亲自签署更能突显其重要意义。^③

斯大林的态度终于让毛泽东生了气。据毛后来多次回忆,他以后几天曾不止一次地对苏联方面的联络人员大发脾气。不论其实际生气的的时间和程度与其后来回忆的情况有无差距,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毛确实感觉到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④而这并不仅仅事关个人颜面,它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毛民族自尊

^{①②}参见《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见张木生译,沈志华编注:《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5期。

^③参见尤金著,李玉贞译:《与毛泽东同志谈话记录》,1956年3月30日,载《国际社会科学与经济》,1995年第2期。

^④对于毛生气程度和时间的考证,可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96—299页。



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出席斯大林70寿辰庆祝会

心的一种强烈反弹。

从12月22日苏联政府大型祝寿宴会之后,毛在莫斯科似乎销声匿迹了。这不能不引起一些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动向的外国通讯社的极大猜疑。而中国新闻总署关于“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表现”的通报,看起来也触动了斯大林敏感的政治神经。在进一步听说英国也有加快与新中国建交步伐的消息之后,斯大林终于发现,争取毛泽东和新中国的友谊,远比过分担心美英的反应对苏联更为实际。于是,他在1950年1月1日主动起草了一份以毛泽东名义答记者问的新闻稿。在这份稿件中,斯大林出人意料地写上了准备解决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贷款、通商等各项问题的内容。当毛泽东看到这一文字稿时,自然是又惊又喜。他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以他的名义发表这篇答记者问。^①他随即电告国内的领导人,一定要让人民了解这一消息。废除旧约,签订新约,最大的好处就是“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

^①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辑,第206页。

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同时,他亦特别叮嘱周恩来动身前,一定要召开政务院会议,明确宣告此行即为谈判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还应召集在京所有政府委员宣告此事。^①与毛半月前出访时的轻车简从不事宣传的做法相比,不难了解毛此时内心的鼓舞程度。

3. 谈判桌上的“平等”之争

不过,中苏之间的分歧其实并没有真正解决。这是因为,苏联方面同意重订中苏条约,并不意味着它想要一并放弃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而中国方面却显然想要借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1月23日,双方正式开始举行会谈。首先由苏方提供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24日,经过一天紧张的内部讨论,当天午夜,中国大使馆参赞戈宝权受命将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修改后的草案交还给苏方。中方对条约内容未做重要的修改。^②但在第二次会谈中,周恩来即根据刘少奇关于中长铁路问题的来电精神和与毛泽东讨论的结果,提出了三项重要的意见。一是中长铁路历史上已经过六次波折^③,照目前经营的现状和中国民众反映的情况看,苏联如果不要,将对中苏两国的团结更加有利。二是如果对日和约三年尚不能缔结,应规定届时即将旅顺口及中长铁路归还中国。三是大连现时为苏联代管和租借的企业由中国政府接收。

中方的要求大大突破了苏方原定的方案,这使苏方领导人极为被动。可是,既然下决心加强中苏关系,注意到周转述的中国国内的舆论与民众的情绪,权衡利弊之后,斯大林不得不最终接受了中方的建议。中方马上由周恩来主持起草了《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的草案。除了在过渡时期铁路管理方面的领导职务采取轮换的办法同意苏方的意见以外,中方的草

^①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辑,第213页。

^②参见苏中关系资料。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37页。

^③所谓六次波折,主要是指在1904年日俄战争,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谈判,1929年中东路事件,1935年苏联让售日满,以及在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中,中长铁路问题始终成为掣肘中苏关系的一个负面因素。

案与苏方的预案已极大不同。第一,中方主张立即一揽子解决所有协定的重新审议问题。第二,中方提议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同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中方要求目前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均由中国政府接收。第四,中方希望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所有。第五,中方在同意苏军于对日和约签订后撤出的前提下,要求加上如果“由于某些原因阻碍了对日和约的签订,而本协定生效已超过三年期限且未再缔结相应的条约,则苏军将立即撤出旅顺口地区”^①等文字。

在同意由中方提出方案后,苏方已很难拒绝中方所提出的全面收回东北权益的要求。鉴于此,为取得中方的好感,苏方干脆痛快地承诺,苏军最迟三年自该地区撤退,大连行政及其苏管企业立即交中国政府接收,中长铁路至迟三年无偿移交一切权利和财产。苏方唯一不大舍得的,只是旅顺口基地的军事装备及其相关设施,还希望有偿交给中国。与此同时,出于铁路交给中国后,还需要向旅顺驻军运送物资等,故苏方希望中方能够在铁路运输方面给予苏联方面以优惠。比如,第一,对于苏联三年内运入、调出旅顺口的物资和原料免征一切税收;第二,上述物资和原料免受中国海关检查;第三,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②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中方谈判代表周恩来的反应却是,“一、二两条均可照办,唯运送军队和军用物资的规定,必须增加相应的条款,即“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将自由地从满洲里车站经过赤塔—新西伯利亚—阿拉木图到伊宁市(新疆省)调运,并沿西伯利亚和土尔克斯坦—西伯利亚之间的铁路以及阿拉木图—新疆运输线返回,其运费按苏联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

周恩来提出这样一种建议,当然不是因为中国军队确实有此需要。它仅仅是周恩来力图在形式上求得民族平等的一种用来应付内部民族主义压力的政治策略。然而,苏联方面的谈判代表米高扬却难以理解:“作为同盟者,苏联无

^①《周恩来致少奇同志并中央政治局电》,1950年2月8日;《维辛斯基致斯大林》,1950年1月26日。见苏中关系资料。

^②参见《周恩来致少奇同志并中央政治局电》,1950年2月8日。

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中国却连苏联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意同意。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①

关于军队调动问题的这场争执，最典型不过地反映出中苏双方各自不同的历史情结与民族立场。由于中国有着近百年被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欺压的惨痛历史，几乎每一个成功的政治领袖都不可避免地会具有相当强烈的悲情意识，对民族平等和权利对等问题高度敏感。而俄国人没有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历史，他们对弱小国家长期处于优势地位，因此他们更关心的往往是既得利益的得失，更习惯于为自己的小恩小惠得到弱小民族的感恩戴德而自满自足。他们往往很难体会中国人对民族平等的渴求，与力争平等权利以扫除历史屈辱感的强烈愿望。当然，周恩来坚持两国权利对等的态度到底还是使苏联领导人在思想上受到了一些触动。

中国领导人对来自国内的民族主义压力相当敏感，还可以通过2月8日，即中苏两国有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谈判基本告一段落后，周恩来向国内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的一份电报内容中清楚地了解到。电报从1月22日斯大林和毛泽东会谈讲起，逐一介绍了自1月23日谈判开始以来中苏两国代表着重讨论和解决的问题及其具体经过，并特别强调整个谈判，包括条约起草，都是按照中方的意见进行的。而事实上，根据已公布的大量档案文献资料，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稿，并非是中国方面起草的。电报所以强调谈判始终是在毛的指导下，并且都是中国方面居于主动地位，显而易见是用于满足国内民族主义的心理需要的。^②

4. 民族主义的双重效应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正式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2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动身回国了。此行迫使斯大林同意改订新约，无条件

^①《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谈判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1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5期。

^②参见《周恩来致少奇同志并中央政治局电》，1950年2月8日。



1950年2月14日,斯大林与毛泽东出席《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

放弃中长铁路和旅顺港,其收获之大,不仅超出毛泽东最初动身时的想象,与毛初到莫斯科时所陷入的困境相比,更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带着这样一种成就感返回北京,他们的心情应当可想而知。4月11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针对中苏条约问题的讲话,就清楚地反映出这一点。他当时曾高度评价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一个平等条约,是建立在国际主义基础上的。他并且讲:“新中国今天还有许多困难,特别是要面对‘国外的帝国主义’。因此,在国际上‘我们需要有朋友’。今天与苏联结了盟,‘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①。但令人意想不到的,不过几年之后,中共领导人对这次莫斯科之行的评价,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除了毛泽东对斯大林当初拒签新约一事耿耿于怀以外,最让毛泽东不满的,一个是补充协定的问题,一个则是合营公司的问题。

根据以往的说法,对苏联提出的补充协定,毛泽东、周恩来得知后即表示

^①《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4月11日;《毛泽东关于周恩来去苏联参加谈判问题给中央的电报》,1950年1月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13、290—291页。

异议,只是由于斯大林一再坚持,“为了照顾中苏团结的大局,只好让步”。事实上,苏联提出这个限制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新疆的提议,固然是为了确保苏联的中亚和远东地区的安全,却也在相当程度上适合新中国巩固边疆地区安全的现实需要,因此毛、周当时都不认为这些协定存在着有损自身利益和形象的内容,因此都未提出异议。^①很显然,他们只是在回国后,才逐渐意识到该协定形式上中苏享有的权利相等,但这种要求毕竟是苏联方面提出,并且是苏联方面才真正需要的,并非是中国方面的自主要求,因而容易给人以误解,好像苏联把中国的东北和新疆当成了它的两块势力范围。

如果说毛泽东对补充协定看法的改变,存在着相当复杂的因素,还难以简单地从他们自身民族主义情感的角度来加以解释的话。那么,对中苏合营公司看法的改变,却很明显地反映出民族主义心态的升高可能带来的影响。

中苏合营公司,指的是中苏之间这时“按平权合股原则组成”的中苏民用航空股份公司、中苏新疆石油股份公司、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和中苏船舶公司。成立这样一些合营公司的最初建议,实际上是国内的中共中央最先提出的,并非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②。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来电后,毛、周显然也是同意的。在毛、周与斯大林首次会谈中,毛即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③在随后的谈判中,周恩来更具体提出了双方合组几个合营公司的设想。^④苏方同意后,双方就此一一达成协议,在毛、周回国后陆续完成了签字手续。而中共中央为此也曾专门表示过充分肯定的态度。《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的社论还特别解释了这种合作的重要意义。^⑤

然而,在驱逐一切外资出中国,寻求完全独立自主的凯歌声中,引进苏联资本的做法,在国内受到了相当多数知识分子的反对。北京、南京等一些城市甚至有大批学生为此上街游行抗议。这种情况显然也刺激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当斯大林此后仍不知趣地接连建议由苏联出资在中国建罐头厂、建橡胶

^①苏方2月10日提出补充协定草案,毛只是把文中“协议如下”改为“双方达成本补充协定”;将“租让”改为“租让权”。参见《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12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5期。

^②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

^③参见《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

^④参见《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3日。

^⑤参见《欢迎有利中国经济建设的中苏经济合作》(社论),《人民日报》,1950年4月5日。

园之类的事情发生后,毛泽东自然也开始对中苏合营的方式感到不快,取消这几个合营公司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不仅如此,毛泽东从此对以任何方式利用外资都持坚决排斥态度。从几年后毛尖刻批评建立这几家合营公司的谈话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实际上更多地还是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在起作用。他告诉俄国人说:当年是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才搞中苏合营公司的,苏联为什么坚持要搞这四个“合作社”,还不是因为“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但只要搞“合作社”,就涉及所有权问题。为什么要各占百分之五十,还不是要控制,要租借权,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理由?①

5. 结语

从最初以经济恢复与发展为基点,主动提议、积极支持建立中苏合营公司,到把建立合营公司同民族歧视和侵害主权相提并论,甚至声称是斯大林强迫所致,这再典型不过地折射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等人民族情感发展变化的轨迹。对于一个历经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欺凌,却拥有数千年灿烂文化的古老民族而言,它的复兴与崛起不可避免地会与民族主义的革命结为一体。而任何引导革命成功的革命党及其领导人,都必然会充满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特别是在国家统一、政权巩固、经济恢复等重要革命指标渐次达到,整个民族完全摆脱被侵略、被欺侮的悲惨地位,开始以崭新的独立自主姿态展现于世界面前之际,人们内心的民族主义情感自然会表现得异常亢奋。但是,上百年的屈辱历史和国家贫弱落后的现状,毕竟是深深地刻在人们内心深处的一道依然在流血的伤口。越是自尊和自信,其心态上也就越是容易转向敏感,对一些问题作出过度的反应。毛泽东在中苏合营公司问题上的反映,就多少属于这种情况。而且,随着中国国力的进一步增强,这样一种心态和情绪,还会持续地影响着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对外关系。

原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①参见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



第四章

中国出兵朝鲜的因与果



引言

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并不意味着新中国就被牢牢地拴在了苏联阵营的战车上。两党领导人之间存在的种种历史恩怨，本来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双方之间的相互信任，更何况双方各自的国家利益，也很难经常保持一致和并行不悖。至少，斯大林还不会把毛泽东看成是一个可靠的同盟者。直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特别是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中苏之间并不牢靠的同盟关系，才一下子变得牢不可破了。

许多研究者怀疑，朝鲜战争的爆发，原本就是一个陷阱。是斯大林故意制造出来，迫使中国人彻底破灭对美国幻想，并造成中美对抗的一着险棋。斯大林自己在1950年8月25日给捷克总统的电报，似乎也很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不论斯大林是否确有如此计谋，中国出兵朝鲜之举确实导致了中美隔绝20年这样一种历史后果。

1950年，中国刚刚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内外战争，整个国家经济不仅极为落后，而且百孔千疮，新政府为何毅然决然出兵朝鲜，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强国美国打仗？这场战争到底该打不该打，不打行不行，打对新中国究竟意义

何在？相关各国历史学家对此曾有过很不一致的解释。^①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由于档案资料的局限，人们往往只能根据各种外围的线索进行推理和猜测新中国政府出兵朝鲜的种种原因。但随着苏联解体，俄国政府将保存于俄罗斯总统档案馆和俄罗斯外交政策档案馆中有关这场战争的大批重要档案解密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如今，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揭示了当年发生在中、苏、朝三国（三党）之间的种种内幕，^②因而，利用这些新的档案资料和研究成果来说明当年中共中央出兵朝鲜的决策经过，也不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了。而尤为重要的是，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对美作战的前因后果，也是了解新中国与美苏关系，尤其是理解新中国对美政策形成和演变的一个关键所在。

①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研究的重要著作，要数 Allen S. Whiting 的 *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Macmillan, 1960) 和 Bruce Cumings 的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Princeton, 1990) 最为有名。俄国档案尚未公开之前大陆有关这一课题研究较为引人注目的著作，当数徐焰的《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0 年版）。

②1990 年代初俄国档案开放后引发的对朝鲜战争的研究热潮，仅从 1996 年笔者与沈志华、齐德学合作编译的《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观点》（军事科学院 1996 年印）一书中收录的美、俄、韩等国学者重要论文 27 篇，就可一窥究竟。近年来更有相当多的英文和中文著作都直接利用俄国档案来研究此一问题。沈志华的《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和《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是中文出版物中最具深度的研究成果之一。

1. 冷战的阴影

1945年8月,苏军在出兵中国东北的同时,也乘势解放了北朝鲜。由于冷战格局形成后,美国方面先后在德国和朝鲜都采取了同苏联对抗的方针,坚持在自己的占领区内成立分裂政府。1948年2月下旬,美、英、法三国先是在伦敦召开排除苏联的三国外长会议,就合并三国在德国的占领区,成立分裂的西德政府达成了协议。对此,苏联方面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于3月20日宣布退出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随后美、英、法三国通过单方面改变币制,使西德彻底摆脱了与德国苏占区之间的关系,莫斯科则下令对西方占领的柏林西部实行陆路封锁,必欲把西方国家赶出柏林,从而引起了著名的柏林危机。朝鲜的分裂事实上也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同样也是美国向苏联发起的挑战。它于5月间不顾苏联关于建立统一朝鲜政府的主张,在南朝鲜帮助建立了反共的李承晚政权,迫使苏军也不得不于9月间在北朝鲜帮助金日成建立了亲苏的劳动党政权。但十分明显的是,斯大林不想同时在东西两个方向与美国同时发生冲突。为了消除苏美直接在朝鲜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集中力量对付德国问题,苏联采取了单方面从北朝鲜撤军的行动,以逼迫美国也撤离南朝鲜。据此,1948年12月,苏军率先撤出了北朝鲜。

在南北朝鲜分裂的现实下,苏军的撤离,只是暂时避免了美苏之间在东亚发生直接冲突的可能性,但美苏坚持以南北朝鲜为各自势力范围的方针,却无法使双方对南北朝鲜两个对立政权之间的冲突置身事外。结果,军队是撤出来了,南北朝鲜之间的紧张关系却照样刺激着莫斯科与华盛顿的神经。

苏军撤离后,美军一时尚未撤出,北朝鲜政府所受到的压力自然增大。金日成政府在1948年12月和1949年1月两度向苏联方面要求缔结朝苏友好互助条约和提供武器援助。然而,在柏林危机难以解决,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抗加剧的情况下,斯大林不想进一步在东亚刺激美国人。何况,这样做反而可能促使美国也把它同南朝鲜的关系同盟化,这无论如何不是斯大林希望见到的。因此,他不仅没有同意与北朝鲜缔结互助条约,而且对给金日成的武



金日成



李承晚

器类别也进行了限制。^①

金日成 1949 年 3 月对莫斯科进行了访问,希望说服斯大林加强对北朝鲜的支持,但在 3 月 5 日与斯大林的会谈中,斯大林对此没有做任何承诺。^②但是,4 月中旬,金日成从莫斯科回国不久,莫斯科就从朝鲜人那里得到情报说,美军准备在 5 月全部撤出南朝鲜,而李承晚打算在美军撤出后,于 6 月对北朝鲜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争取两个月结束战斗。斯大林这时正在为解除柏林危机,向美、英、法等国寻求妥协的办法,如果北朝鲜缺少作战经验的三个步兵师不能有效地做出抵抗,以致丢掉北朝鲜,苏联的损失就更大了。为此,他迅速批准了帮助北朝鲜组建机械化兵团、航空兵师及其他炮兵部队的计划。与此同时,他明确建议金日成向正在胜利进军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寻求兵员上的帮助。因为如果能够设法说服毛泽东同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有战斗力的朝鲜族官兵编入北朝鲜人民军部队,势必会大大加强北朝鲜军队的作战能力。^③

^①参见什特科夫电,1949 年 1 月 19 日,见 Russian Presidential Archive(APRF),245/m/arf/5.

^②参见 APRF,45/1/346/13-23.

^③参见维辛斯基致什特科夫电,1949 年 4 月 17 日;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49 年 5 月 1 日;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49 年 5 月 2 日,APRF,245/m/arf/25,37-40,41-44.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不了解莫斯科所得到的这份情报的说法,值得怀疑。

根据莫斯科的提议,金日成很快就派劳动党中央委员、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作为特使于5月上旬秘密访问了刚刚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北平,向毛泽东说明了北朝鲜面临的严重局势,并转交了金日成给毛泽东的求援信。毛泽东很同意金日成的担心。他承认,北朝鲜与南朝鲜之间随时可能发生军事冲突。但毛泽东强调,没有必要为此担心,苏联和中国都站在你们一边,一旦情况需要,“我们可以给你们悄悄地增派中国士兵去,都是黑头发,谁也分不清”。但他还是劝告朝鲜同志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主张等待更有利的形势。说因为中共军队主力均已南下,一旦美国干涉,“不可能迅速地有力地给予支持”^①。

金一此行的最大收获是得到了中共领导人关于在北朝鲜受到进攻时将给予实际援助的具体保证。而毛泽东也很爽快地同意把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三个朝鲜族师及其装备,统统移交给北朝鲜。并明确表示,布防在东北地区的两个朝鲜族师,即在长春的以李德山为师长的164师和在沈阳的以方虎山为师长的166师,随时可以编入北朝鲜人民军,另一个师等到战斗告一段落,也可以交给北朝鲜。^②

很明显,冷战后的美苏对抗是造成朝鲜半岛分裂,形成东亚新的战争策源地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而苏联在柏林危机问题上的极端被动,则促成了斯大林必欲保住北朝鲜的决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来自北朝鲜的紧张消息,使北朝鲜人轻而易举地增强了军事实力。到了这一年的9月份,包括重型武器在内的大批苏联军事装备已开始运抵北朝鲜,人民军也迅速扩展到近9万人,与南朝鲜已不相上下。这不可避免地鼓舞了一心想要早日统一朝鲜的北朝鲜领导人,他们第一次明确提出:人民军完全有能力对南朝鲜采取进攻行动了。据苏联驻平壤外交官向莫斯科的报告说,在金日成看来,如果国际形势允许,“他们能够

^①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根据俄国档案文献的最新证据》,《史学集刊》2007年第9期。

^②参见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5月15日,APRF,245/m/arf/45-48.实际上中国向北朝鲜提供的这种人员帮助自1946年即已开始。金光侠、姜健、崔光等当时即分批带领在中国东北境内的800余名朝鲜族军事干部和军事学员回到北朝鲜,构成了北朝鲜人民军第一师团骨干力量。此次李德山师和方虎山师又为北朝鲜人民军输送了约21000官兵。1950年春,中共方面又将14000余名朝鲜族官兵分两批送去北朝鲜。

在两个星期之内占领南朝鲜,最多是两个月”。当然,莫斯科没有答应金日成的这一要求。^①为此,北朝鲜方面转而游说中共领导人,中国方面也没有支持他们的看法。

2. 莫斯科的目标

就在金日成紧锣密鼓地寻求苏联支持增强自身军事实力,准备统一朝鲜半岛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也向莫斯科提出了几乎相同的要求。这是因为,自从1949年春天的国共和谈破裂,解放军迅速渡江,占领了南京、上海和东南沿海的大部分地区,但国民党却把它的大本营撤退到有一海之隔的台湾岛上去了,而要想完全统一中国,中共就必须征服台湾海峡,夺取台湾。而这个时候既无空军,也无海军,要靠简陋的渔船渡海作战几无可能。为此,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刘少奇于6月底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的时候,不能不向苏联提出援助的要求。刘少奇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明确提出了请苏联出动空军和海军援助的问题。但是,斯大林除了答应提供200架左右的飞机并代训飞行员,争取赶上在进攻台湾的战役中使用以外,拒绝了直接介入进攻台湾的可能性,说是这样不仅会引起美国的介入,而且也不会得到久经战争创伤的苏联人民的理解。^②

由于对国民党的战争进展过于顺利,毛泽东这个时候也并不十分在意俄国人的援助。直到1949年10月24日发起金门作战失利,他才开始意识到渡海作战非要得到苏联技术支持不可。当时,毛泽东批准了夺取福建沿海岛屿金门岛的作战,因不熟悉渡海作战的特殊规律,登岛部队三个团又四个连近9000人全部损失,这成为中共这段时间几乎是最重大的一次军事失利,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使已成惊弓之鸟的国民党人,又拾回了一些信心。^③

1949年12月,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在16日见到斯大林的当天,他就

^①参见顿金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9月3日,Russian Foreign Ministry Archive(AVPRF),05a/5a/11/136-138.

^②参见《刘少奇给联共(布)和斯大林的信》,1949年7月4日;《刘少奇与斯大林会谈纪要》,1949年6月27日,等。转见《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2期。

^③参见徐焰《金门之战》,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

委婉提出：“国民党的支持者在台湾建立了一个海空军基地，海军和空军的缺乏，使人民解放军占领这个岛屿更加困难。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的一些将领一直在提议，请苏联援助，比如可以派志愿飞行人员或秘密军事特遣舰队协助夺取台湾。”但是，斯大林只答应提供一些指挥人员和军事教员，对于其他形式的援助则婉言拒绝。^①

斯大林两度拒绝中共中央的求援要求，根本原因在于苏联受制于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根据斯大林的理解，美苏通过雅尔塔协定已经交换了各自在远东的势力范围，苏联得到南库页岛、千岛群岛和恢复前沙皇政权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其条件是承认中国长城之线以南应属美国的势力范围。当中共发动对国民党人的大规模攻势之际，莫斯科始终强烈地担心美国直接干预的危险性。即使在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之后，围绕着要不要废除1945年8月莫斯科与国民政府在雅尔塔协定基础上签订的那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苏共领导人也颇多疑虑，担心因此可能会影响到雅尔塔协定的效力，使苏联丧失对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主权。^②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当然不可能派苏联的飞行员和军舰去帮助中共进攻台湾。何况这时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也尚在未定之间，几乎无法确定，对台湾的进攻会不会引起美国的军事干预。^③

应当了解的是，无论是对金日成还是对毛泽东，斯大林这时的拒绝都只是基于一种策略的考虑。对毛泽东夺取台湾的设想，斯大林并没有表示反对，只是提议，中共应该主要靠自己的力量，比如空投或派遣有力人员到岛上去，组织暴动，然后来一个里应外合。对金日成的计划，莫斯科态度也很明确：问题的关键在于北朝鲜人并没有为进攻做好充分的准备，难免形成相持的局面，“这可能为美国人对朝鲜事务进行各种干涉提供借口”。目前最主要的是要全力加

^①参见《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转见《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5期。

^②有关莫斯科强烈担心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会影响到苏联对南库页岛和千岛群岛的主权问题，在1949年12月至1950年1月苏联领导人与毛泽东的谈话当中曾多次提到。参见《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5期。

^③苏联驻平壤代办1949年9月14日致电维辛斯基称，美国在大陆遭到失败之后，必然会比在中国时更坚决地干涉朝鲜事务。这一观点多半也可以看做是莫斯科此时的看法。AVPRF,059a/05/3/11/46-53.

强人民军,开展南方的游击战争,准备发动全民起义,同时加强和平统一国家的宣传攻势,在政治上争取主动。^①不难看出,如果条件具备,莫斯科不会反对毛泽东和金日成发动进攻。

这样的机会在毛泽东访苏前后意外地出现了。

还在1949年12月,斯大林就意外表态支持刘少奇在世界工人理事会亚洲委员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亚洲各国应当学习中国革命,组织人民解放军,展开武装斗争的公开号召。紧接着,12月3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48/2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利用中苏之间的分歧,和将美国的太平洋的战略防线设置在菲律宾、日本和琉球门群岛一线的政策设想。两天后,斯大林就一改此前对废弃旧的中苏条约的犹豫态度,转而表示赞同与毛订立一个全新的互助条约。1950年1月6日之后,欧洲共产党九国情报局机关刊物也接连发表文章,严厉督促日本,包括印度的共产党人,学习中国革命的办法,走武装斗争的道路。这一切都清楚地显示,苏联在亚洲的战略正在作出重大调整。等到1月上中旬美国总统与国务卿公开表明了美国不准备为台湾和南朝鲜的安全诉诸武力的态度,下旬苏联在中苏谈判中正式决定两年后将其太平洋舰队撤出中国的旅顺港之后,斯大林很快就通知金日成说,他愿意具体讨论金日成所期望的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计划。^③

斯大林所以会选择首先支持金日成,应当不难理解。第一,由于日本是苏联在远东的夙敌,对于苏联的安全而言,毗邻苏联远东的朝鲜比台湾要重要得多。当年美军之所以能够占领南朝鲜,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当时斯大林想要以此作为条件来换取美国同意苏军部分占领日本,而主动放弃了占领整个朝鲜的机会。想不到美军占了南朝鲜,杜鲁门总统却坚决拒绝苏军进入日本。结果是苏联既不能实现其直接惩处日本的夙愿,又不能借助朝鲜半岛对可能重新对苏联构成威胁的日本保持威慑力。冷战格局形成后,美国扶植日本对抗苏联的态度日益明显,杜鲁门甚至公开扬言要以德国和日本来做抵抗苏联扩张的

^①参见《莫洛托夫致什特科夫电》,1949年9月2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第71次会议决议》,1949年9月24日,APRF,3/65/776/30-32,33-38。

^②Acheson press conference, January 5, 1950,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January 16, 1950, p.81.

^③参见《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1月19日;《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1月30日,AVPRF,059a/5a/3/11/87-91,92.

堡垒。斯大林自然深感不安。日本不能占领,如果能够通过一场“内战”使整个朝鲜落到共产党人手中,进而实现从朝鲜威慑日本的目的,并为苏联太平洋舰队(时为第五和第七舰队)取得新的不冻港,也是好的。^①第二,美国固然宣称其安全线不包括台湾和朝鲜,但对苏联而言,支持朝鲜在陆地作战和支持中国跨海作战,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斯大林很清楚,美国宣布的这一政策是以苏联不介入为前提的。要越过台湾海峡去进攻台湾,非要苏联的飞行员和舰艇不可;而进攻南朝鲜,苏联人却可以不派一兵一卒。因此,相对来说,统一朝鲜的战争美国卷入的可能性也要小得多。

1950年3月,根据斯大林的建议,金日成又一次访问了莫斯科。斯大林显然同意了金日成的计划,因为他清楚地讲:“现在的形势与过去不同了,北朝鲜可以开始行动。”但他同时也很清楚,必须做最坏的打算,因此,斯大林强调:“这个问题必须同中国同志和毛泽东本人讨论。”当然,金日成相信,只要斯大林同意,毛泽东不可能表示反对。他并且告诉斯大林:在他前往莫斯科之前,他已经通过他的大使通知过毛泽东,他想就朝鲜统一问题拜访毛泽东。而毛的反应是积极的。毛告诉朝鲜大使说,他欢迎金日成的来访,如果金日成对朝鲜统一已经有了具体计划,这种访问可以秘密进行。^②也就是说,毛泽东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

5月13日,金日成和朴宪永出现在北京中南海的怀仁堂。在当晚的会谈中,金日成首先通报了他与斯大林会谈的结果。毛泽东对此似乎有些意外。他很清楚朝鲜战争的爆发将会对自己正在紧张准备的进攻台湾行动造成何种影响,他多少有些不理解,斯大林怎么会如此轻易地就赞成统一朝鲜。在简单地

^①有关美国扶植日本对抗苏联的情况,可见迈可·沙勒著,郭俊禾译:《亚洲冷战与日本复兴》,台北金禾出版社1992年版,第91、105页。关于斯大林突然改变决定,转而支持金日成统一计划的原因问题,沈志华在《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一书第四章中有详细的讨论。作者的观点是,导致这种政策性改变的决定性原因在于斯大林在与毛泽东的谈判中被迫同意签订一个新的条约,并不得不同意将他从国民政府那里得到的大连和旅顺的不冻港——这是俄国人始终梦寐以求的——两年后交还给中国新政府。为此,斯大林想到他们曾经想得到、后来为了换取占领日本而主动放弃掉的朝鲜仁川和釜山两个不冻港。但是,把苏联支持朝鲜战争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斯大林下决心要通过战争冒险来取得不冻港,似还有讨论的必要。见沈志华前引书,第178—222页。

^②参见《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5月12日;《罗申致菲利波夫电》,1950年5月13日,APRF,45/1/33/51-53。

交换看法之后,毛泽东很快中断了这次谈话,表示他必须要请苏联大使向斯大林核实一下。随后,他派周恩来紧急前往苏联大使馆,要求罗申大使立即给斯大林发电证实金日成的说法。

第二天晚上,苏联大使拿着斯大林的电报来见毛泽东。电报全文如下:

毛泽东同志!

在与朝鲜同志的谈话中,菲利波夫(斯大林使用的化名)和他的朋友们表示如下意见:由于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同意朝鲜人着手实现重新统一的建议。但有个附带条件,即问题最终应该由中国同志和朝鲜同志共同来决定。如果中国同志有不同意见,那么对问题的解决就应延迟,直到进行一次新的讨论。会谈中的细节朝鲜同志可能会向您转述。^①

鉴于斯大林已经明确表态,一向不满意莫斯科干预中国革命的毛泽东自然也不能扮演一个碍手碍脚的角色。但是,他确实感到不满。几年之后,他在与苏联大使以及与米高扬、赫鲁晓夫等人的谈话中,曾经多次重提这件事,认为自己实际上是被蒙在鼓里,直到金日成跑来告诉他说斯大林已经同意了,他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但不论他是不是感到窝火,他已经只能表示赞成了。

5月15日,毛泽东再度与金日成等会谈。他告诉金日成,原来他考虑的是应当首先解放台湾,在此之后再解决朝鲜问题,那样中国将会更充分地援助北朝鲜。但既然统一朝鲜的问题已经在莫斯科得到批准,他同意首先统一朝鲜。他强调,作战计划要有充分的准备,部队行动要迅速,包围主要城市,但不要为占领城市而延误时间,要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过,毛泽东提出,如果两万至三万名日军参战,战争有可能长期化。而万一美国参战,中国将派兵帮助你们。因为苏联受到与美国的条约限制,不方便参加战斗,中共没有这种义务。对此,金日成并不担心,他断言:斯大林已经说过,帝国主义不会干涉,因而不必加以考虑。据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当时讲过这样的话,那就是:帝国主

^①《罗申致菲利波夫电》,1950年5月13日;《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1950年5月14日,APRF,45/1/331/55.

义的事,我做不了主,我们不是他们的参谋长,不能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不过准备一下总是必要的。我们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也不管;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①

不难看出,战后美国在日本占领问题上对苏联的排斥,冷战开始后美国刻意扶助日本对抗苏联的行动本身,都是促使斯大林越来越渴望把苏联的势力范围扩大到整个朝鲜的重要原因之一。其1950年1月作出赞成进攻决策时,较1949年9月决定反对进攻时的力量对比,在朝鲜半岛几乎没有多少改变,在美苏之间也是一样。^②如果说这期间情况有所变化的话,那就是斯大林对金日成和毛泽东所说的那个“国际形势”。而这个形势,无疑就是指杜鲁门和艾奇逊就美国安全线范围所做的声明。既然莫斯科心存夺取整个朝鲜半岛以压制日本这样的战略目标,只要它发现美国不打算干涉朝鲜人之间内部的冲突,朝鲜战争的爆发就是不可避免的。

3. 错误的结果

从斯大林答应与金日成具体讨论以军事手段统一朝鲜的计划以后,莫斯科就加紧了向北朝鲜的武器供应和其他军事援助。而整个作战计划,也是在苏联瓦西里耶夫中将和苏军顾问组协助下制定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按照这个

^①参见韩国外交部:《六二五真相——俄罗斯政府公开的韩国战争秘密文件》,1994年11月;《毛泽东与米高扬谈话记录》,1957年7月14日。

^②有关北南朝鲜双方军队力量的变化,北朝鲜军队人数由1949年9月的将近9万人,这时已增加到11万人左右,重武器的数量也较前有所增加。但另一方面,莫斯科所强调的南方游击队活动的规模,这时却远较1949年秋天大大缩小。见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朝鲜战争》(上),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中译本,第4页,转见沈志华前引书,第193页注2。有学者强调说,这时影响到斯大林决心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苏联掌握了原子弹。但苏联爆炸原子弹是1949年8月,而莫斯科照样在一个月之后作出了反对进攻的决定。以后的几个月里,苏联的原子技术并没有取得足以令斯大林可以向美国示威的进展。斯大林很清楚,苏联只爆炸了一枚原子弹装置,不仅同美国近300个原子弹的贮量不能同日而语,而且其运载手段也远未达到可以有效攻击美国的程度。参见 Weathersby, Kathryn. Conference Report: *The Korean Warm, An Assessment of the Historical Record*, Korea-America Society, Georgetown University, 1995. 7; 罗格·丁曼著,杨奎松译:《朝鲜战争期间的原子外交》,前引《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观点》,第404页。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朝鲜人民军很快攻占了汉城

显然得到莫斯科批准的名为“先发制人的进攻作战计划”,人民军也需要20天左右才能实现解放南朝鲜的军事行动。^①而这个时间对于美军从日本向朝鲜进行增援,已是绰绰有余了。莫斯科不了解的是,4月14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又通过了第68

^①有关这一军事计划的细节,最早发表于1992年9月12日的《纽约朝鲜时报》上。但韩国学者朴文洙在引用这一资料时的说法存在着时间上的差异。在转述透露这一文件内容的俄国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的说法时,他使用引文说:“北朝鲜人民军将在两个星期之内完全消灭南朝鲜军队,解放整个朝鲜半岛”,但在随后的正文中又写道:“根据这个作战计划,北朝鲜军队每24小时将推进15~20公里,并在22~27天内结束军事行动”。朴文洙著,沈志华译:《斯大林的对外政策与朝鲜战争》,见前引《关于朝鲜战争的新材料和新观点》,第166—167页。

号文件,改变了原来的计划,明确提出:鉴于中国革命的成功为苏联进一步控制亚洲提供了跳板,美国必须担负起保卫自由世界的责任来。^①

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当天就向联合国提交了议案,利用苏联代表缺席无法行使否决权的机会,通过了谴责北朝鲜发动武装进攻,号召联合国各会员国援助南朝鲜的决议。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更进一步宣布出动美军支援南朝鲜,同时以台湾未来地位尚未确定为由,命令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台海两岸任何一方发动进攻,以防止战争蔓延。联合国这一天也进一步通过决议,要求各会员国采取紧急的军事措施以援助南朝鲜。^②

由于美国第七舰队直接介入,原定1951年春天进行的夺取台湾的作战准备被迫中止了。中共中央在内部指示中,承认由于自己目前还没有与美国现代化的海军进行海上较量的资本,只好把“打台湾的时间往后推延”^③。与此同时,鉴于美国出兵南朝鲜,中国东北边防以及可能的增援朝鲜问题日益紧迫,中共的战略重点也被迫转向东北地区。至此,进攻台湾的准备工作实际上逐渐停顿下来了。

7月2日,在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进行了一个下午的讨论之后,周恩来约见了苏联大使罗申,向他说明了中国政府对于美国和联合国的声明将采取坚定的政策。与此同时,周恩来说,毛泽东在与北朝鲜领导人的几次谈话中,都谈到了美国干涉的可能性,强烈担心朝鲜人民军军事行动受挫,以及美国从仁川等地区实行登陆作战的可能性。据此,毛泽东明确表示了中国愿意出兵援朝作战的意见,并转告了苏联方面。考虑到种种可能的情况,为防备万一,中共中央迅速决定在中朝边境集中9个师的兵力,一旦朝鲜方面需要,即准备以任何便捷的形式进入朝鲜,协助朝鲜人民军抗击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周恩来为此还特地向苏联方面提出,就这个问题,中国政府希望能够听取斯大林同志的意见,同时希望苏联空军能够对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④

^①参见周桂银:《美国全球遏制战略:NSC68决策分析》,沈宗美主编:《理解与沟通:中美文化研究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4—102页。

^②有关杜鲁门政府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反应的具体情况,可参见Glenn D. Paige, *The Korean Decision*, June 24–30, 1950,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5; Rosemary Foot, *The Wrong War: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1950–1953*,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③萧劲光:《萧劲光回忆录》(续),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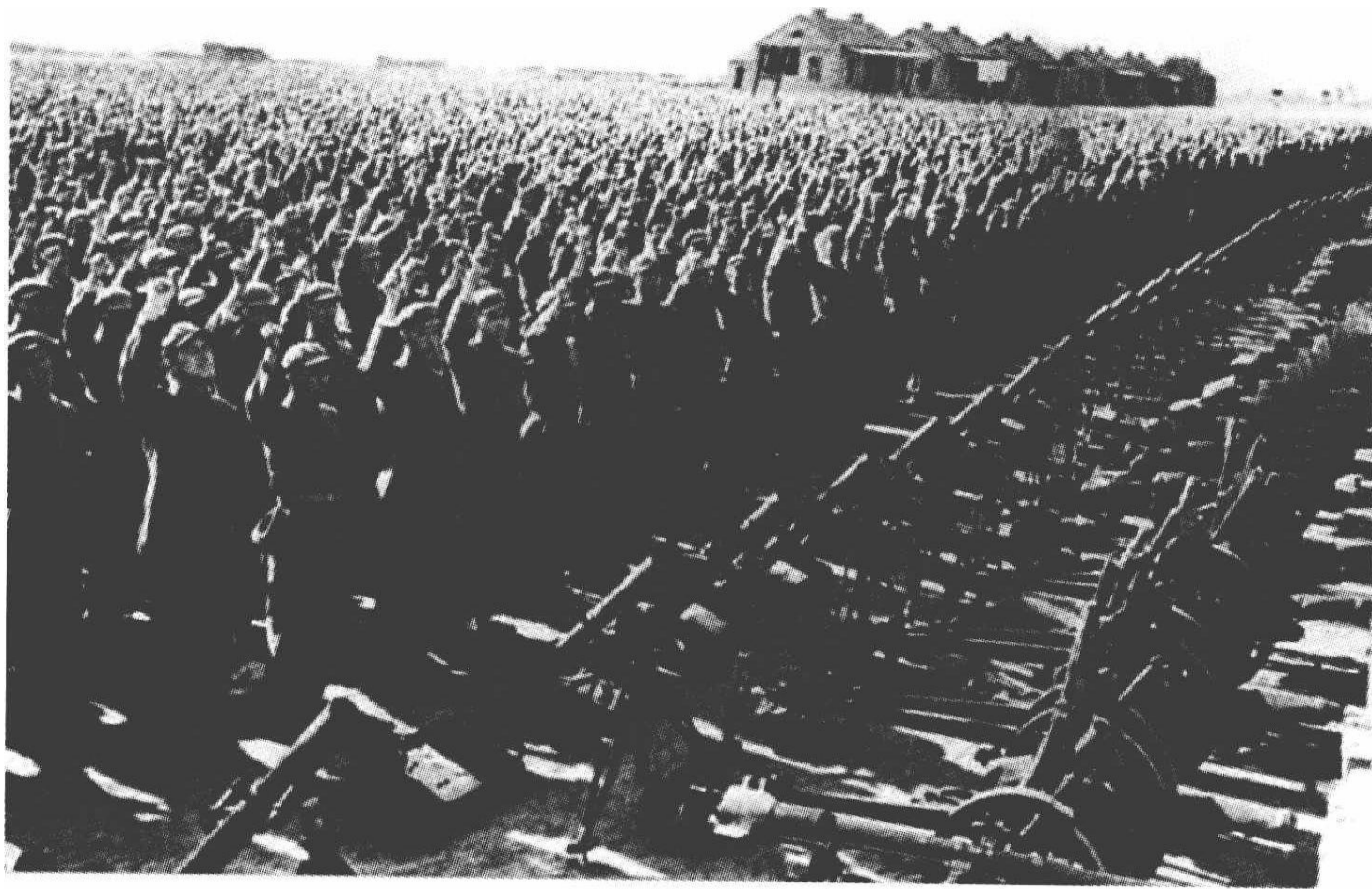
^④参见《罗申致菲利波夫电》,1950年7月2日,APRF,45/1/331/75–78.

战争刚刚开始几天时间,人民军的作战十分顺利,因此,斯大林这个时候对战争形势的估计仍然是乐观的,并不认为有必要采取行动阻止美国扩大干涉的企图。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苏联这时本来是有机会阻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任何不利于自己的决定的。但苏联代表自从1月份因抗议台湾国民党继续占据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拒绝出席联合国会议以后,就再未回到安理会上去。尽管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提出了这种危险性,斯大林却没有派他的代表返回安理会去行使否决权。他事后解释说,如果美国的注意力能够转向远东,并被朝鲜和中国牵制在朝鲜半岛,对苏联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情。但实际上,苏联这时是进退两难。不回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将通过决议谴责北朝鲜,并发动武装干涉;回到联合国,就必须投否决票,那则意味着自己是北朝鲜的支持者,从而公开与美国和世界舆论处于对立的局面。两害相权取其轻,斯大林还是选择了置身事外的做法。

这样,1950年7月7日,由于苏联代表的缺席,美国代表轻而易举地促使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组织“联合国军”的决议,麦克阿瑟被任命为总司令。甚至,当英国人通过驻莫斯科的大使委婉地向苏联提出,希望苏联施加影响,促使人民军退回三八线,以便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时,斯大林仍很坚决地打电报给中国和北朝鲜政府称:“我们认为英国人的这项要求是无礼的和不能接受的。”在斯大林看来,以当时朝鲜战场军事推进的情况,即使联合国通过了军事干涉的决议,也未必来得及投入足够的兵力扭转战局,故战争获胜的把握还是很大。当然,他还是留了一手,那就是,赞成中国政府尽快在中朝边境部署9个师的部队,以防万一。斯大林要罗申转告周恩来,说明:“我们认为,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集中九个中国师在中朝边境以便志愿军入朝作战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①

7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通过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决定抽调作为国家战略预备队的第13兵团及其所辖的第38、39、40军和已经在齐齐哈尔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第42军等部,共52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准备必要时

^①《菲利波夫罗申转告周恩来电》,1950年7月5日;《菲利波夫致罗申电》,1950年7月13日,APRF,45/1/331/79,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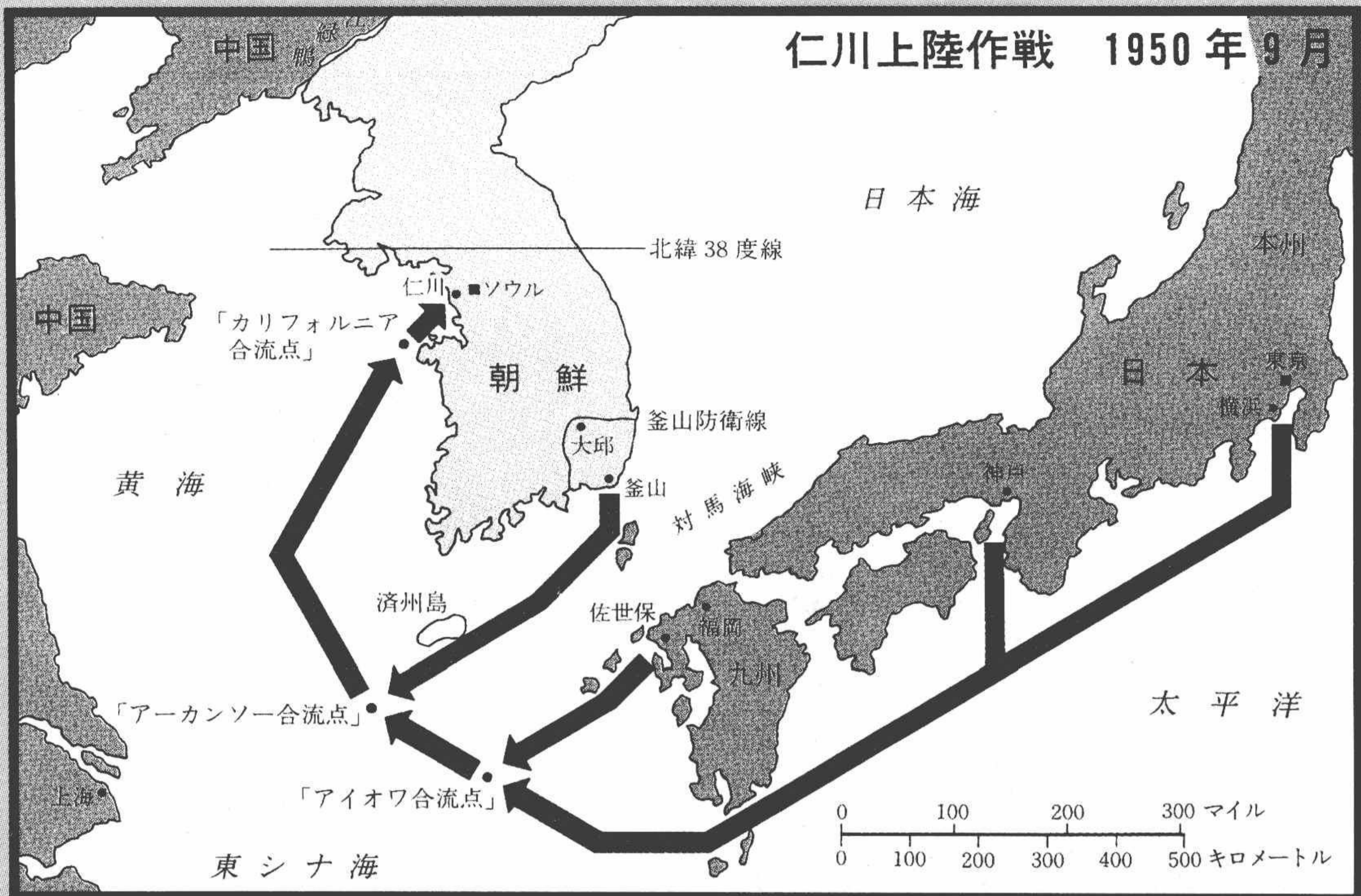
1950年7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图为边防军某部召开的誓师大会

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①

一直到8月中旬为止,朝鲜人民军的作战都还比较顺利。7月底,人民军已经进抵洛东江,整个南朝鲜军队只剩下几万人,而由于近10万美军登陆增援,北朝鲜人原定的战争计划已经难以实现了。随后又进行了大约半个月时间的攻坚战,人民军才突破了由美军第八集团军沿着洛东江建立起来的防线,但尽管金日成发布命令,要求人民军务必在8月底之前将美国人赶出朝鲜,人民军前线距离美韩军队最后的控制点釜山港几乎近在咫尺,却再也没有能够向前推进了。

注意到朝鲜战局的进展,中共中央明显地感到担心。8月上中旬,毛泽东再度提出了中国要准备出兵的问题,强调“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如果美帝得

^①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428页。



1950年9月美军仁川登陆战略示意图



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

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周恩来也肯定地说:朝鲜战争要取得彻底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后,(才)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①。在这段时间毛泽东、周恩来与苏联大使、专家以及军事顾问的谈话中,不止一次地说明,中国有决心成为北朝鲜的坚强后盾,解放军不怕与美国军队作战,并主动提议将解放军化装成人民军去朝鲜助战。但是,对于中国方面的表示,斯大林始终不表示自己的态度。

到8月底,注意到人民军进攻釜山的作战严重受阻,美军已在釜山地区构筑成坚固的防御线,毛更相信形势严峻,担心美国人有可能抽调足够的机动部队来发动对人民军的反击。他为此提醒苏联人,战争即将长期化,同时发布指示,要求军委为应付可能到来的战争,应“集中十二个军以便机动”^②。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多次主动提出派部队帮助朝鲜巩固后防,并提醒金日成美军有登陆汉城、仁川,遮断朝鲜人民军后方的极大可能。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啃不动釜山这块小骨头,也让斯大林感到事情有点儿不妙。来自朝鲜的种种情报显示,面对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大队美国攻击机和美国陆战队在火力方面的优势,人民军的士气受到明显影响。但是,斯大林并不希望中国军队进入朝鲜,因此他只能一个劲儿给金日成打气。他在8月28日给金日成的电报中写道:“俄国人在1919年英、法、美武装干涉时期的处境比现在朝鲜同志的处境要坏得多。”“金日成同志不要因为和外国干涉者的战争没有取得连续的胜利而不安,不要因为推进中进攻受阻,或因某些局部的失败而沮丧。在这样的战争中没有连续的胜利。”^③可是,斯大林再打气也不能改变朝鲜战场上严重逆转的形势了。

9月15日,经过周密准备之后,麦克阿瑟指挥美军18000人在朝鲜仁川实施了登陆作战,并一举取得成功。大批美国军队迅速插到半岛中部三七线附近,不仅重新占领了汉城,而且很快切断了整个人民军主力与平壤的联系,使正在半岛南端作战的人民军主力第一、二集团军受到全军覆灭的威胁。

还在美军在仁川登陆的第二天,莫斯科就紧张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当美

^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454、469、485页。

^③《冯西(斯大林化名)致什特科夫转告金日成电》,1950年8月28日,APRF,45/1/347/10-11。

国陆战队开始推进到汉江南岸,而美国飞机完全控制了朝鲜的制空权之后,斯大林沉不住气了。他一面下令国防部长紧急制定一项出动苏联空军去保卫平壤的计划,一面致电金日成,要他迅速从南方回撤4个师,在汉城以北和以东建立防线,以确保南北通道不被切断。^①

朝鲜战争进行到这个时候,中、苏、朝三方仍旧缺少直接的军事情报沟通。从这一阶段中苏两国领导人的来往电报可以看得很清楚,金日成一直没有直接向北京提供有关朝鲜战争进程的消息,中国在朝鲜也没有派驻自己的军事观察机构就近及时取得相关情报。中国驻平壤大使馆,也是直到8月中旬,即朝鲜战争已经开始近两个月后才开始工作。即便如此,平壤也没有向在那里的中国大使通报美军在仁川登陆的消息。

9月17日,毛泽东相信中国不出兵不行了,为此指示中央军委派出一个五人先遣小组随驻朝鲜武官柴成文赶赴朝鲜熟悉情况,勘察地形,做战争准备。^②周恩来18日则紧急约见苏联大使,要求苏联政府迅速提供有关朝鲜战局的更加准确的情报。中共中央显然极为担心朝鲜的战局,但斯大林对于中国出兵问题仍旧迟迟不表示态度,甚至还寄希望金日成能够自力更生,不靠中国人,自己就能扭转危险局面。^③考虑到整个战争,包括北朝鲜的一切,都是在苏联支持与协助下进行的,北朝鲜领导人自然不能向中国政府直接提出求援的要求。在21日召开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上,金日成明确否认了向中国求援的意见,认为这将会使莫斯科产生侮辱感。^④

9月27日,在汉城的抵抗完全停止之后,苏联顾问团关于人民军第一、二集团军处于一片混乱,几乎所有重武器都已经丧失,运输及指挥联络系统均告瘫痪的报告也已送到斯大林的办公桌上。斯大林终于意识到这场战争已经打不下去了。他召集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决定要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立即寻找机会与美国国务院代表接触,寻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同时

^①参见曼绍洛夫著,沈志华译:《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与中国决定介入朝鲜战争》,前引《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观点》,第148—149页。

^②参见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③斯大林这个时候对中方的不满也有所了解,但只是解释说,北朝鲜人无法及时通报战况是因为他们与前线联络困难。这种解释无疑过于牵强。曼绍洛夫前引文,第148—149页。

^④参见沈志华前引文。

要苏联军事顾问全力组织北朝鲜人民军的撤退工作。斯大林批准了苏联赴朝鲜代表团关于向中国方面要求后勤援助的提议。不过,在给代表团团长马特维耶夫的电报中他强调说,向金日成建议请中国朋友派遣司机等人员时,切记“不要提莫斯科”^①。

28日,根据苏联代表团的建议,金日成召集了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承认,由于大部分人民军主力未能撤回来,汉城陷落后已无法阻止美军越过三八线,北朝鲜的陷落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必须向苏联和中国要求直接的军事援助了。^②

4. 毛泽东决断决行

10月1日凌晨2时50分,斯大林收到了苏联大使转来的金日成的正式求援信。信中恳切地请求苏联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当然,金日成也估计到苏联可能不会出兵援助,因而补充说:“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时,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组织国际志愿部队,给我们的斗争以军事援助。”^③

在拿到金日成的求援信不过10分钟,斯大林就口授了他给苏联驻北京大使的电报,要求他尽快转告毛泽东或周恩来:“朝鲜同志的情况变得令人绝望。”“根据眼下的形势,你们如果认为能用部队给朝鲜人以帮助,那么至少应该将五六个师迅速推进至三八线,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师可以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当然,仍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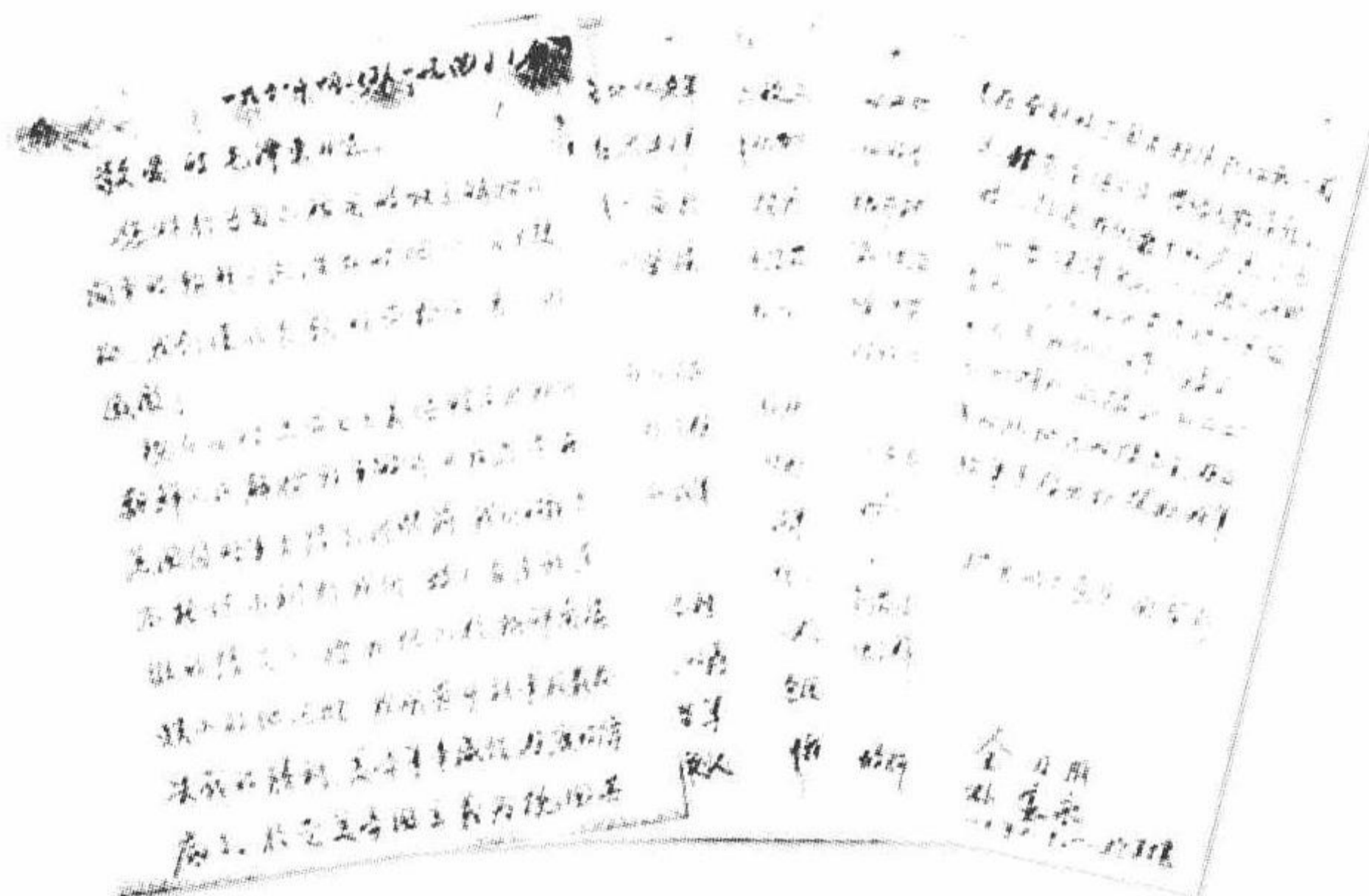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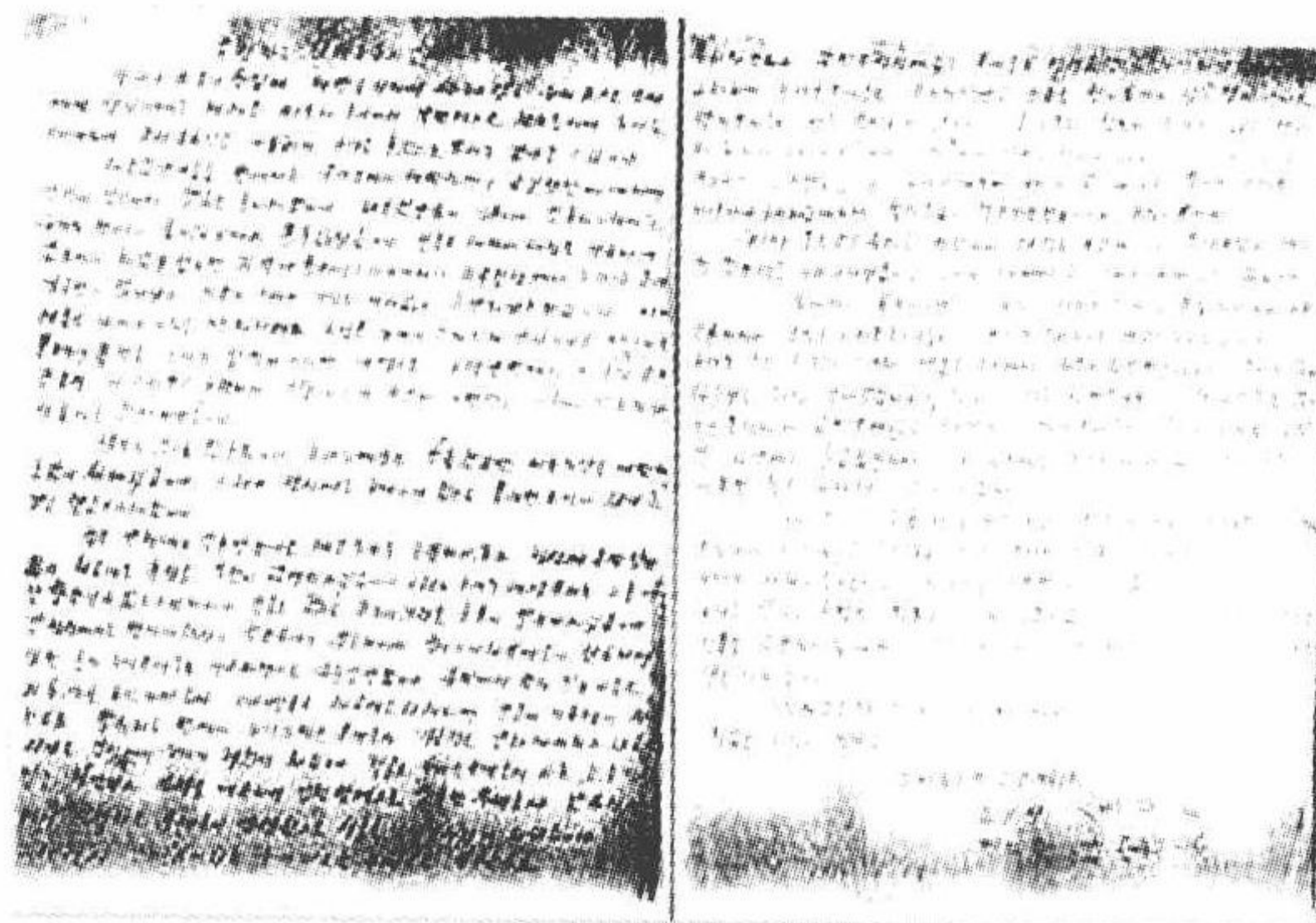
斯大林的电报与金日成特使朴宪永送交的求援信于10月1日当天先后到达北京的中南海。毛泽东当晚召集书记处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和刘少奇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毛泽东的意见是:这件事一定要管,否则不仅对朝鲜,对中国

^①《马特维耶夫(苏联赴朝特别代表团团长)致冯西电》,1950年9月26日,APRF,3/65/827/90-93,103-106.

^②参见《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9月30日,APRF,45/1/347/41-45,46-47.

^③《什特科夫转金日成致斯大林电》,1950年9月30日,APRF,45/1/347/41-45.

^④《菲利波夫致罗申转毛泽东、周恩来电》,1950年10月1日,APRF,45/1/334/97-98.



1950年10月1日毛泽东收到的金日成求援信

乃至对整个东方都不利。但是,打到这个地步,谁管,谁就要冒风险。关键在于这个风险究竟有多大,会议显然围绕着这个问题有过具体的讨论。

首先,美军在釜山的有效抵抗、实施仁川登陆大举围歼朝鲜人民军主力,以及对北朝鲜的狂轰滥炸,都显示出美军在装备上、火力上拥有巨大优势,在指挥上和战术上也不可小视。要管,就要能够解决问题,至少要能够在朝鲜境内形成与美军长期相持的局面。根据周恩来列举的数字,美军一个军仅70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就有1000多门,同时还有坦克近500辆,而解放军平均一

个军才有这样的火炮 36 门,东北边防军一个军最多也只有 190 门,况且还没有坦克。再加上美军拥有制空权,解放军的第一批空军最快也要到 1951 年 2 月才能有 300 多架飞机可以投入作战。在装备及火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条件下贸然投入对美作战,是否有利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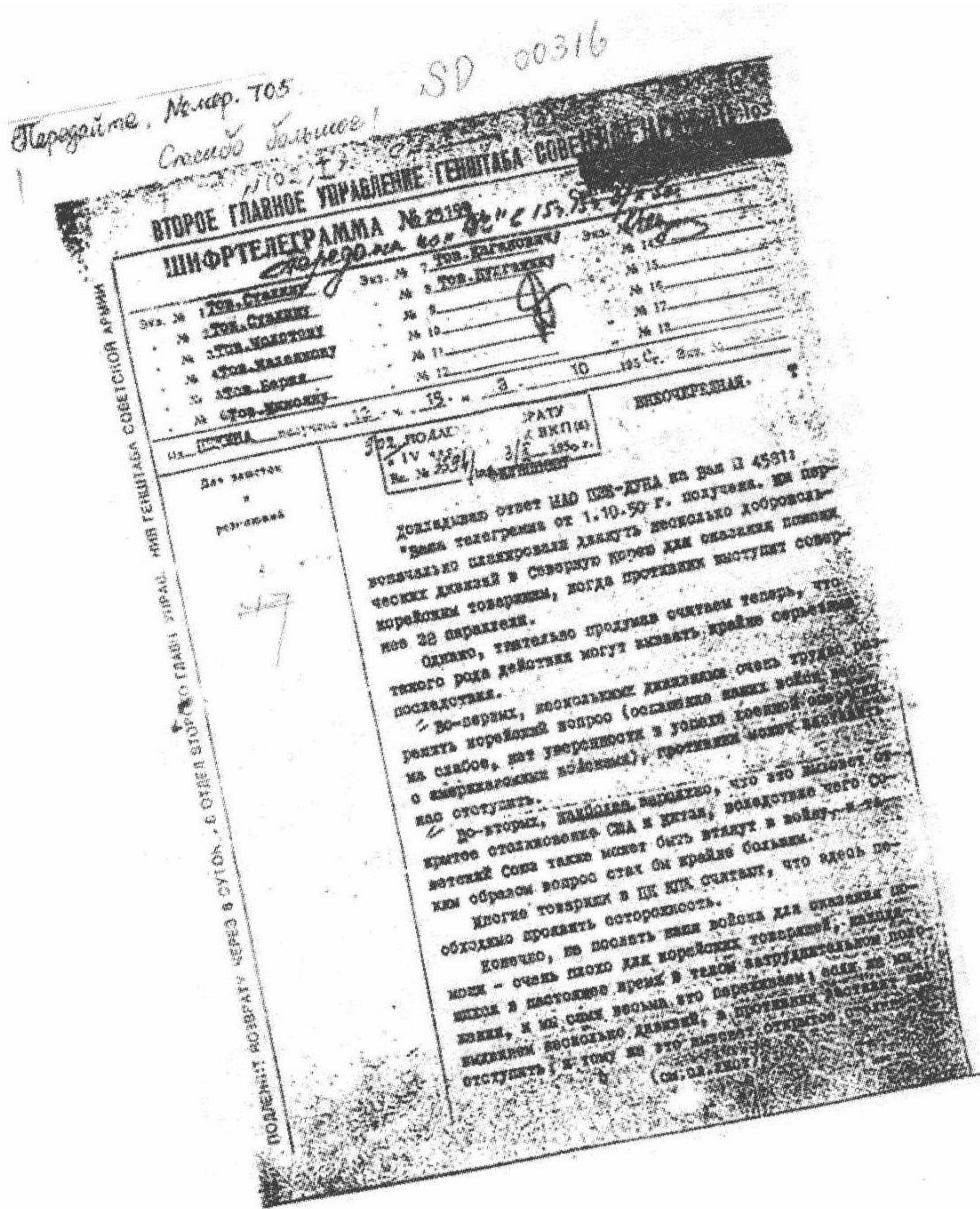
其次,在经过了多年战争之后,人民刚刚得到和平和稳定,国家刚刚开始进入经济的全面恢复时期。对美国作战,除了在物质上拼消耗以外,还不能不考虑美国向大陆宣战的严重可能,因此也就不能不准备美国使用空军轰炸大陆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海军,包括动用台湾国民党进攻大陆沿海地区,结果如何不难想象。

同此前中共领导人的乐观态度相比,朝鲜战局的急剧恶化使得他们对出兵条件的估计变得谨慎多了,也顾虑多了。除了毛泽东以外,多数与会者对迅速出兵感到没有太多的把握。而毛泽东却更多地注意到自身的优势,如解放军比北朝鲜人民军有多得多的大规模作战经验,同美国人在朝鲜打仗自己一方后方近、兵力多,只要有苏联在武器装备的支援和空军的掩护,未必不能打败美国军队。而他最关心的是,如果不能把美国人挡回去,一旦美国人占领了整个朝鲜,陈兵鸭绿江边,以后中国东北这一最主要的工业基地就再无宁日了。

10 月 1 日晚的会议上似乎没有人提出更有力的反对意见,因为尽管与会者一致同意第二天白天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出兵问题,毛泽东还是迫不及待地书记处会后,即 2 日凌晨就起草了两封决心出兵朝鲜的电报。^①

毛泽东起草的两封电报,一封是给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高岗和当时负责东北边防军的第 13 集团军司令员邓华,要他们命令东北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入朝作战;一封是给斯大林,说明:“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如果在朝鲜打胜了,那么,即使美国向中国公开宣战,这个战争也打不长,打不大。而中国军队能否打败美国军队,则取决于苏联提供装备的情况。毛泽东在列举了美军与解放军在火炮及其他重武器上的差距之后,开列了一个长长的清单,要求苏联迅速提供武器装备,争取使每个军能够有 500 至

^①参见《毛泽东致斯大林同志电》,1950 年 10 月 2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538—541 页。



1950年10月3日凌晨毛泽东约见
苏联大使罗申时口述的电报

600门火炮。他强调：目前，“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十二个师于十月十五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的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争取在实战中，用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①。

①前引《毛泽东致斯大林同志电》，1950年10月2日。

毛泽东看来没有想到,在当天白天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几乎所有领导人,特别是在东北指挥了几年大兵团作战,他认为最适合于指挥入朝作战的军事将领林彪,都对现在出兵朝鲜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①

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我们今天不能不面对两封内容截然不同的电报了。一封是我们上面提到的被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作为第一手文献资料收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10月2日的那封电报,另一封则是俄国学者1995年从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中找到的毛泽东在3日凌晨约见苏联大使罗申时口述的电报。在后一封电报当中,他说:

我们原先曾计划当敌人向三八线以北推进时,派几个师的志愿军到北朝鲜帮助朝鲜同志,但是,经过全面考虑之后,我们现在认为采取这种行动可能会招致极其严重的后果。第一,靠几个师很难解决朝鲜问题(我军装备极差,与美国军队作战没有胜利的把握),敌人可能会迫使我们后退。第二,这样做极可能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结果苏联也会被拖进战争。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了。……中共中央的许多同志认为,对此表示谨慎是必要的。……如果我们派去几个师,敌人却迫使我们后退,同时还导致美国与中国的公开冲突,那么,我们整个的和平建设计划就会被彻底破坏,这会引起国内很多人的不满(人民受到的战争创伤尚未恢复,我们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还是耐心一些,不派出军队,积极准备力量,这样做在把握同敌人作战的时机上将比较有利。

当然,毛泽东最后表示:“关于这个问题尚未作出最后决定,这是我们的初步电报,我们希望与您商量。”^②

^①参见《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36页。

^②《罗申致菲利波夫电》,1950年10月3日,APRF,45/1/334/105-106。由于两封电报内容截然相反,中俄两国学者在美国和香港的会议上曾有过完全不同的解释。沈志华对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做过令人信服的考察和分析。沈志华前引书,第245—256页。

由于此前莫斯科从北京得到的有关出兵问题的消息都是积极的,因此,毛泽东的答复让俄国人深感意外。一心指望靠中国共产党人来阻止美国军队占领北朝鲜的斯大林,对此自然更是难以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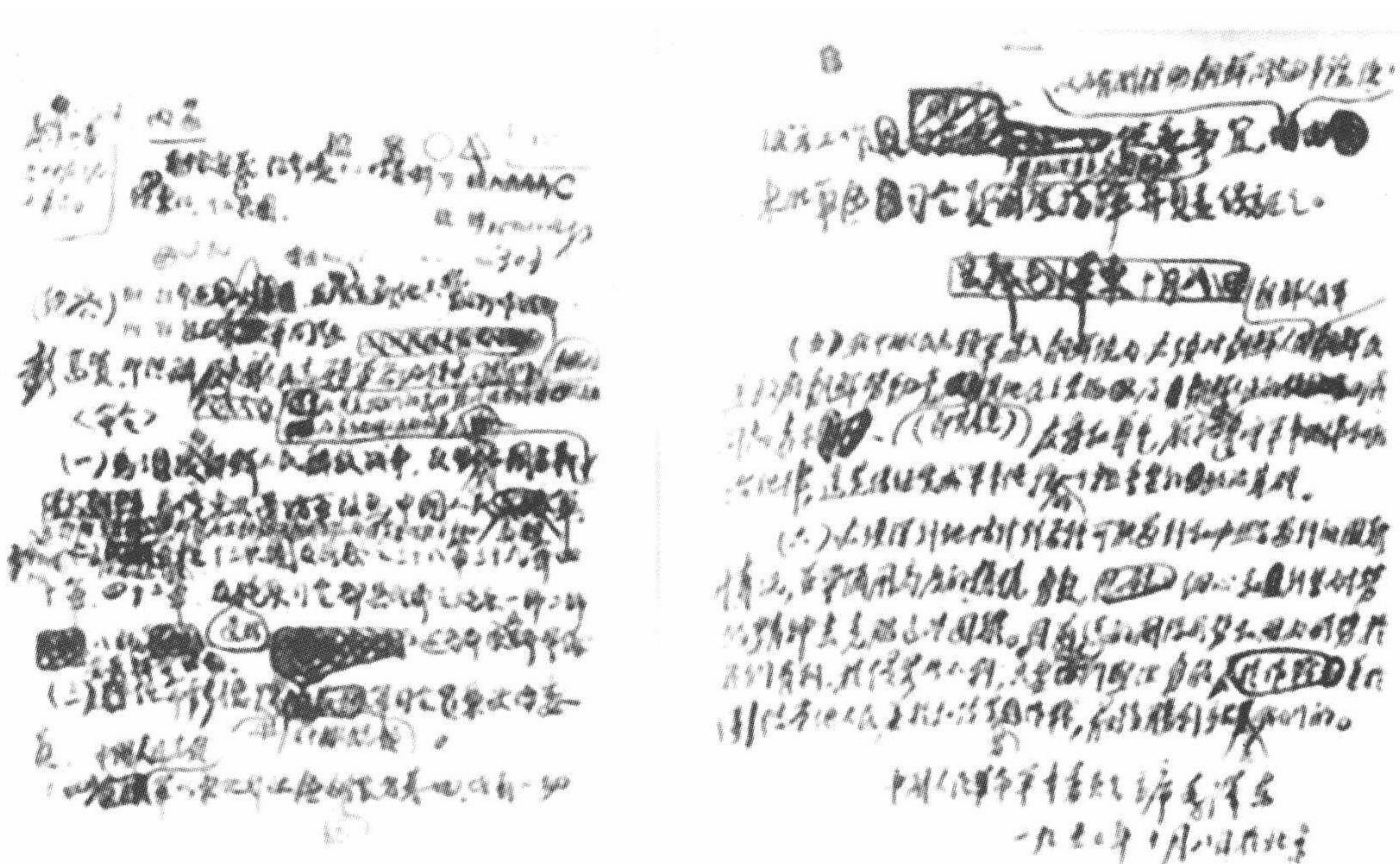
10月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挽救朝鲜局势的办法。所有的与会者都确信,即使放弃北朝鲜,也不能让苏联卷入直接与美国冲突的战争中去。斯大林仍旧希望能够劝说中国人把美国人挡回去。他在会议结束后立即又给毛泽东发去了一封电报,要毛泽东放心。他断言:美国目前不准备打大仗,如果中国参战,美国只好放弃占领朝鲜的计划。如果只是消极等待,不能令人信服地显示中国的力量,中国不仅得不到这些让步,而且也别想指望美国会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让步。他甚至许诺说,不要怕影响到苏联被卷入战争,既然中苏之间签订了互助同盟条约,如果美国对中国宣战,苏联当然不会置之不理。“这需要惧怕吗?在我看来,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我们联合起来要比美国和英国更强大,而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德国(目前它不可能给美国提供任何帮助)就不是什么重要的军事力量。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那就让它现在就来吧。”^①

事实上,毛泽东并没有放弃争取出兵的努力。问题仅仅在于,如何说服军队领导人。为了找到合适的指挥官,毛泽东在10月2日会后就要周恩来派专机去西安把在那里的彭德怀火速接到北京来。4日,彭德怀赶到北京,听了毛泽东的说法,他承认:“苏联完全洗手,我们装备差得很远,只好让朝鲜亡国,是很痛心。”在反复考虑之后,他开始站出来支持毛泽东。在10月5日的会议上,即斯大林电报到达之前,毛泽东已经联合彭德怀等说服了多数政治局领导人,作出了成立志愿军的决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彭德怀担任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委,同时派周恩来去莫斯科商谈苏联的军事援助问题。^②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于10月6日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进一步统一军队领导人的思想,并听取军人们对入朝作战所需装备的意见。在取得了军队领导人的同意之后,毛泽东6日当天约见了苏联大使,要他转告斯大林,他同意斯大林来电的基本观点,并准备过一些时候派9个师入朝作战,只是有关入朝作战和苏联援助的种种问题,还需要派周恩来和林彪前往

^①《冯西致什特科夫转金日成的信》,1950年10月8日,APRF,45/1/347/65-67.

^②参见王焰等著:《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402—403页。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修改的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手迹)

苏联与斯大林进行详细的讨论。^①但两天后,即10月8日,毛泽东已经正式发布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并通知了金日成。^②毛泽东同时通知苏联大使,并要其转电斯大林说:“我党中央全会一致同意您的意见,我已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兼政委,高岗同志负责志愿军的后勤保障。他们已于今天早晨(10月8日)乘飞机离开北京前往奉天。部队大约能在10月15日前开始入朝。我已将派中国志愿军入朝的决定通知了金日成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林彪同志已于今晨8点乘飞机前往您的所在地。他们的使命请予保密。”^③

^①参见前引《冯西致什特科夫转金日成的信》,1950年10月8日。

^②《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致倪志亮(驻朝大使)转金日成电》,1950年10月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543—545页。

^③转引自沈志华前引文。

8日,即在毛泽东发布组成志愿军命令的当天,周恩来与林彪飞抵莫斯科,然后于次日转往斯大林在黑海附近的休养所。中苏领导人很快展开谈判。周恩来当时带去了两种意见,苏联能够迅速提供中方所需的装备,特别是提供空中掩护,就出兵,否则就不出兵。^①应该说,由于斯大林此前几度表示过愿意为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显然也不曾有过怀疑。让周恩来感到意外的是,他发现苏方并不打算马上提供空中掩护,而且提供掩护也只限于在鸭绿江中国一侧。

还在北京最初设想出兵问题时,中共领导人担心的最大问题就是空中掩护,并为此专门询问了斯大林。正在做出兵准备的志愿军总部领导人这时所强调的,也是“三两月内新的装备确有保证(尤其是空军能够出动),则可按原计划进行”,否则只好推迟出兵。斯大林突然改口,自然就引出了一段波折。周恩来和林彪明确表示出兵的困难与危险,斯大林虽再三劝说也无济于事。经过反复讨论,斯大林才勉强同意提供16个苏联志愿空军团到东北进行后方掩护,但也还要在两个半月以后才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和林彪明确认为中方也不可能马上出兵。于是,10月11日,双方最终决定放弃北朝鲜,让金日成及其政权和军队暂时退到中国的东北地区去,并据此分别通知了北京和平壤。

电报称:

我们交换意见后,弄清了以下情况:

1. 计划派出的中国援军没有做好准备,装备差,缺少大炮,没有坦克,执行掩护任务的航空兵至少两个月后才能到位,用于装备和培训上述军队的时间至少需要六个月。

2. 如在一个月內不用相当数量的、装备精良的部队提供直接援助,那么由于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军队无力支撑,朝鲜将被美国人侵占。

3. 因此,为朝鲜人提供的像样的援军只能在半年后,即在朝鲜被美国人占领,朝鲜已不再需要援军的时候才能到位。

基于上述原因并考虑到周恩来同志报告的因中国参战而给国内

^①参见沈志华前引文。

带来的不利因素,我们一致决定:

1. 尽管国际形势有利,但中国军队因目前尚未做好准备,就不要越过朝鲜边境,以免陷于不利。
 2. 如果部队已经越过边境,也只能在靠近中国边境一带的山区而不应深入。
 3. 一部分朝鲜军队应在平壤和元山以北的山区组织防御,另一部分军队要转入敌后打游击。
 4. 把战时应征入伍的朝鲜人中的优秀分子及指挥员分批悄悄地调入满洲,在那里把他们整编成朝鲜师团。
 5. 要尽快对平壤和北朝鲜山区以南的其他重要据点进行疏散。
- 至于中国同志所需的用于重新装备中国军队的坦克、大炮和飞机,苏联将充分予以满足。^①

斯大林并同时去电北朝鲜,将这一消息告诉了金日成。

收到周恩来和斯大林联名发来的中国以目前条件暂时不能出兵的电报之后,毛泽东显然颇感意外。他在复电同意的情况下,立即下令暂停执行部队出动计划,并电召已经前往鸭绿江边做出兵动员准备工作的高岗和彭德怀来京会商。13日,彭德怀、高岗到达北京。毛泽东于当天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讨论这一新的形势。不难想象,与会者对来电报谈到的种种困难未必没有同感。但是,把美国人放到边境上来,直接威胁中国东北,中国再难出兵的前景,却是与会者最不愿看到的。与这种前景相比,武器装备一段时间的差距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经过反复讨论后,毛泽东劝说政治局领导人一致同意,出兵朝鲜仍是最好的选择。据此,毛泽东于会议当天和次日接连三电给已经回到莫斯科的周恩来,说明“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

^①毛泽东和周恩来还讲过类似的话,如毛回忆说,当时“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周回忆说:“我们只要苏联出点空军,这样我们就可以去了,没有空军有困难。斯大林说空军不能派。”“我们问,能否派空军?他(指斯大林)动摇了,说中国既有困难,不出兵也可,说北朝鲜丢掉,我们还是社会主义,中国还在。”《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52页。

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至于作战,在装备较差的情况下,打伪军还是有把握的。可以等到苏联的装备到了,等到我们在空中和地上均占优势时,再取攻势。“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故请周恩来留在莫斯科几天继续与斯大林商议,第一,请苏联用租借办法援助中国作战装备;第二,要苏联保证在两个月内至迟不超过两个半月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同时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①

13日,毛泽东将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通知了罗申。他告诉罗申说:过去我们的同志所以举棋不定,是因为他们对国际形势、苏联的军事援助、空中掩护等问题还不清楚。现在,所有这些问题已经清楚了。中国人没有理由不出兵。中国方面的唯一要求只是,“必须有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它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也不应迟于两个月”。有了前面的经验,斯大林对此将信将疑,但他还是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了金日成,要金日成暂缓执行昨天要人民军北撤的电报。因为自己“刚收到毛泽东的来电,他通报说,中共中央再度讨论了形势,决定不管中国军队多么缺乏武器装备,还是要给朝鲜同志军事援助”^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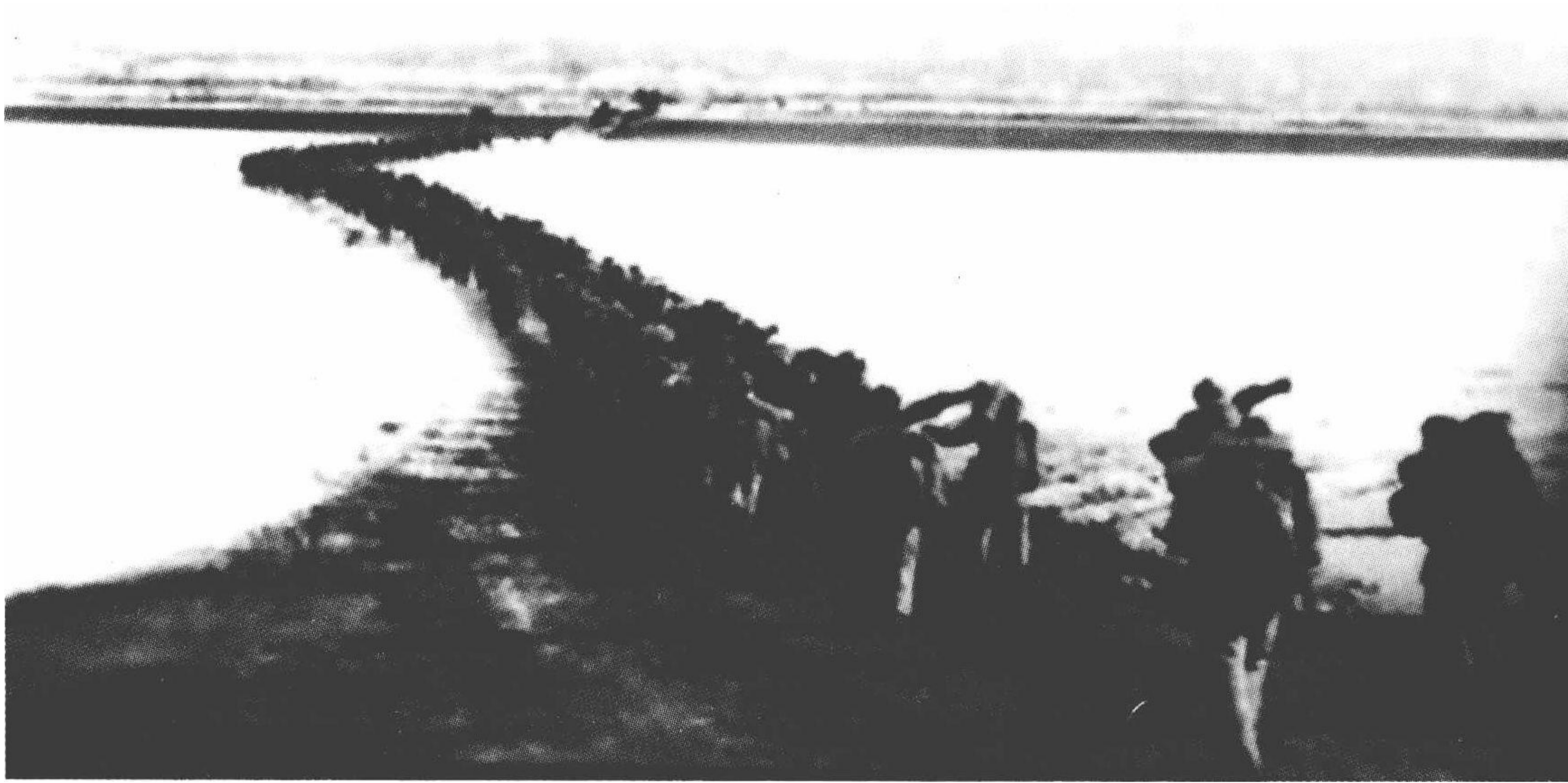
14日,斯大林得到了周恩来的正式通报。这回,斯大林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一些年后,陈毅甚至肯定地说,斯大林当时被感动得掉下了眼泪。不管斯大林是否真的被感动得落泪,他肯定是十分兴奋地通知了金日成,说:“经过摇摆和作出若干临时性的决定之后,中国同志终于下定出兵援助朝鲜的最后决心。有利于朝鲜的最终决定终于下定了,我为此感到高兴。”^③

1950年10月19日晚,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志愿军先头部队第40军跨过了鸭绿江。紧接着,第38、39、42军也全部隐蔽入朝。作为战役预备队的第50、66军随后跟进。10月25日,志愿军与联合国军正面交锋,战争全面打响。与

^①毛泽东在电报中说:“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军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注意到毛在这里使用了“帮助我们在朝作战”的提法,似乎毛这时并不了解苏联空军并不负责掩护志愿军入朝作战这一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556页。

^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558—560页;《罗申致菲利波夫电》,1950年10月13日;《冯西致金日成电》,1950年10月13日,APRF,45/1/335/1-2;45/1/347/74-75。

^③《冯西致金日成电》,1950年10月14日,APRF,45/1/347/77。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历史照片

此同时,苏联防空兵开始部署到中朝边境一线,苏联空军也在斯大林的命令下开始进入朝鲜上空为志愿军提供空中掩护了。这种情况显示,中苏两党,特别是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猜疑与不信任,开始烟消云散了。

5. 优势缘何丧失?

还在8月初,眼见联合国作用巨大,斯大林已不得不指示他的代表利用当月苏联人轮值安理会主席的机会重返联合国,以便设法改变联合国已经形成的决定,从而改变联合国的倾向性。当然,在联合国安理会几乎所有成员国已经就朝鲜问题形成了一系列正式决议之后,苏联人的这些外交努力是很难奏效的。在此期间莫斯科取得的唯一一项外交进展,是安

理会在9月29日通过了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讨论有关美国侵略台湾问题的一项议案。但是,这个时候朝鲜战局已经全面恶化了。

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出兵朝鲜之后,战场情况迅速开始向有利于中朝一方变化。先是志愿军一个战役把已经前进到鸭绿江边的美韩军队挡回到平壤一线,随后又一个战役把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重又赶回到三八线附近。两次战役,联合国军败退300公里以后,仅美军就损失近两万人,第八集团军司令撤退途中车翻人亡。到这个时候,朝鲜战争可以算是战罢了一个回合。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双方可以说是打了一个平手。因为南北朝鲜军力上的损失已不相上下,站在南朝鲜一边的联合国军,与站在北朝鲜一边的志愿军的损失也差不了太多,而战线已经回到它最初的起点上来了。显然,朝鲜战争再度进入到一个关键时刻:是要继续打下去,还是乘势把战争停下来?

12月5日,眼看志愿军步步推进,以印度为首的11个中立国家的政府联名向北京发出了呼吁,要求中国和北朝鲜的军队务必停在三八线上,以便终止这场战争。与此同时,印度以及英国在联合国的代表积极活动,一面与已经来到联合国的中国代表伍修权频繁接触,了解中国方面停战的条件,一面提议建立由联合国大会主席等三人组成朝鲜停火委员会,在朝鲜先停火后谈判。要不要举行停战谈判的问题由此提上了议事日程。^①

事实上,还在得到印度等国停战呼吁之前,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就已经得到指示,要他向苏联政府探询:在目前形势下,美国有无提出朝鲜停战的可能,应如何应付,志愿军应否越过三八线?苏联派驻联合国代表维辛斯基也倾向于赞同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然而,在12月5日王稼祥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谈话中,葛罗米柯却表示:第一,现在美国方面还没有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意图;第二,鉴于目前军事上的胜利形势,志愿军当然应当“趁热打铁”^②。苏共中央政治局随后也明确否定了维辛斯基关于应当在朝鲜实现停火的建议。莫斯科的电报指示称:目前的所谓停战提议,多半只是美国为了改变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失败局面而采取的缓兵之计。

^①参见彼得·卡尔沃科西雷编著,王希荣等译:《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670—672页。

^②《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日记摘录》,1950年12月5日,APRF,3/65/371/35-37.

莫斯科的答复大概也符合毛泽东的想法。由于战争进展出乎想象的顺利,他显然希望能够把美国人赶出朝鲜去。因此,他一反出兵时的小心谨慎,歼敌的胃口越来越大了。11月初,志愿军入朝作战第一次战役刚刚结束,苏联的武器装备还没有到,他就已开始提出一役歼灭美军四五个整师的战役设想来了。他甚至得出结论说:“美国军队比起蒋介石的某些能战的军队其战斗力还要差些。”到11月中下旬,包括在给斯大林打电报时,他都是信心十足地认为:只要再给敌人一两个较大的打击,我方就能够由防御转入进攻了。^①因此,这个时候中共对印度等国关于停火的建议实际上没有认真地予以考虑。

周恩来于12月7日凌晨3点通知苏联大使说,中国政府打算答复印度等国说:要停止在朝鲜的军事行动,联合国必须同意下列条件:

- 1.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 2.美国军队撤出台湾海峡和台湾岛。
- 3.朝鲜问题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
- 4.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参加联合国并从联合国驱逐蒋介石的代表。
- 5.召集四大国外长会议准备对日和约。^②

在这里,中国方面想要进行什么样的谈判,通过这种谈判想要得到些什么,可以说一目了然。

斯大林到底是更精于计算一些。他告诉周恩来:“我们完全同意您提出的在朝鲜停止军事行动的条件。我们认为,不满足这些条件军事行动就不可能停止。”但是,至少“在汉城尚未解放之前,还不到中国亮出自己所有底牌的时候”。因为这不利于利用矛盾。中国方面应该公开表示赞成结束在朝鲜的军事行动,但要求美国就此提出具体条件,把球踢回去。^③

12月9日,依照斯大林电报的精神,伍修权在联大对印度代表表示了愿意看到联合国和美国就停战问题提出具体建议的态度。此举使中立国家代表备

^①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40、658、678、687、689页。

^②《罗申致莫斯科电》,1950年12月7日,APRF,3/65/336/17-19。

^③参见《葛罗米柯致罗申转述菲利波夫组周恩来的电报》,1950年12月7日;《周恩来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12月8日,APVRF,059a/5a/3/11/196-197;13。



中国政府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左一)

受鼓舞。经过紧张活动后,印度等国提出的停火案在 14 日的联合国大会上获得通过,随即成立的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很快致电中国政府,表示愿意与中国谈判停战问题。

实际上,对志愿军的作战来说,这个时候已经暴露出许多弱点。注意到第二次战役部队减员甚大(主要是冻伤),汽车损失严重,补给线拉长,兵员及物资补充都很困难,彭德怀在占领平壤两天之后,即 12 月 8 日就致电毛泽东,主张暂时不要过三八线,等准备充分之后,来年春天再战。但是,无论毛泽东、斯大林,还是北朝鲜人,没有谁赞成现在停下来。特别是在联合国成立停火委员会,有意恢复三八线的分界线之际,暂时把攻势停在三八线上,就难免弄假成真。还在第二次战役结束时,围绕着部队要不要继续向南追击的问题,苏联驻朝鲜大使就已经与彭德怀发生争执了。如果真的停下来,不可避免地会在中、苏、朝

三方内部引起更大的意见分歧。^①因此,毛泽东接电后很快即告诉彭德怀:“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不仅“必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猜测,民主阵线各国亦必有些人不以为然,发生许多议论”^②。

这个时候,毛泽东得到消息说,美国正试图把中国干涉朝鲜案列入联合国大会的议程,意欲把中国推上被告席,而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在到日本和朝鲜前线视察后,则认定美军没有组织长期防御的可能,已经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美军做撤退准备。这无疑都更加激励了他要把美国人赶出朝鲜去的决心。斯大林也明确肯定了毛泽东的看法,强调说现在越过三八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他主动提议,为志愿军再提供 2000 辆汽车,以便解除彭德怀的后顾之忧。在这种情况下,志愿军紧接着发动第三次战役,大举越过三八线,势在必行。

12月22日,在志愿军准备发起第三次战役之际,周恩来受命公开发表声明,实际上拒绝了联合国的停火协议。

第三次战役从12月31日起,一直打到1951年1月8日。中朝军队不仅再度占领了美军的补给基地仁川港和南朝鲜首都汉城,而且把战线向前平均推进了100公里,几乎打到了三七线。这一局面再度使联合国里面停战的呼声高涨起来。就连美国政府领导人也开始对继续战争发生了动摇。

还在1950年12月29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通过了一个给麦克阿瑟的秘密指示,要求他准备在一旦战线不守时,务必将部队安全撤出朝鲜。志愿军的第三次战役进攻似乎证实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担心,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后来明确讲,那个时候华盛顿领导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③。他们不能不一面指示麦克阿瑟做好撤出朝鲜的一切准备,一面被迫表示接受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1月11日突然提出来,并且得到英国等国同意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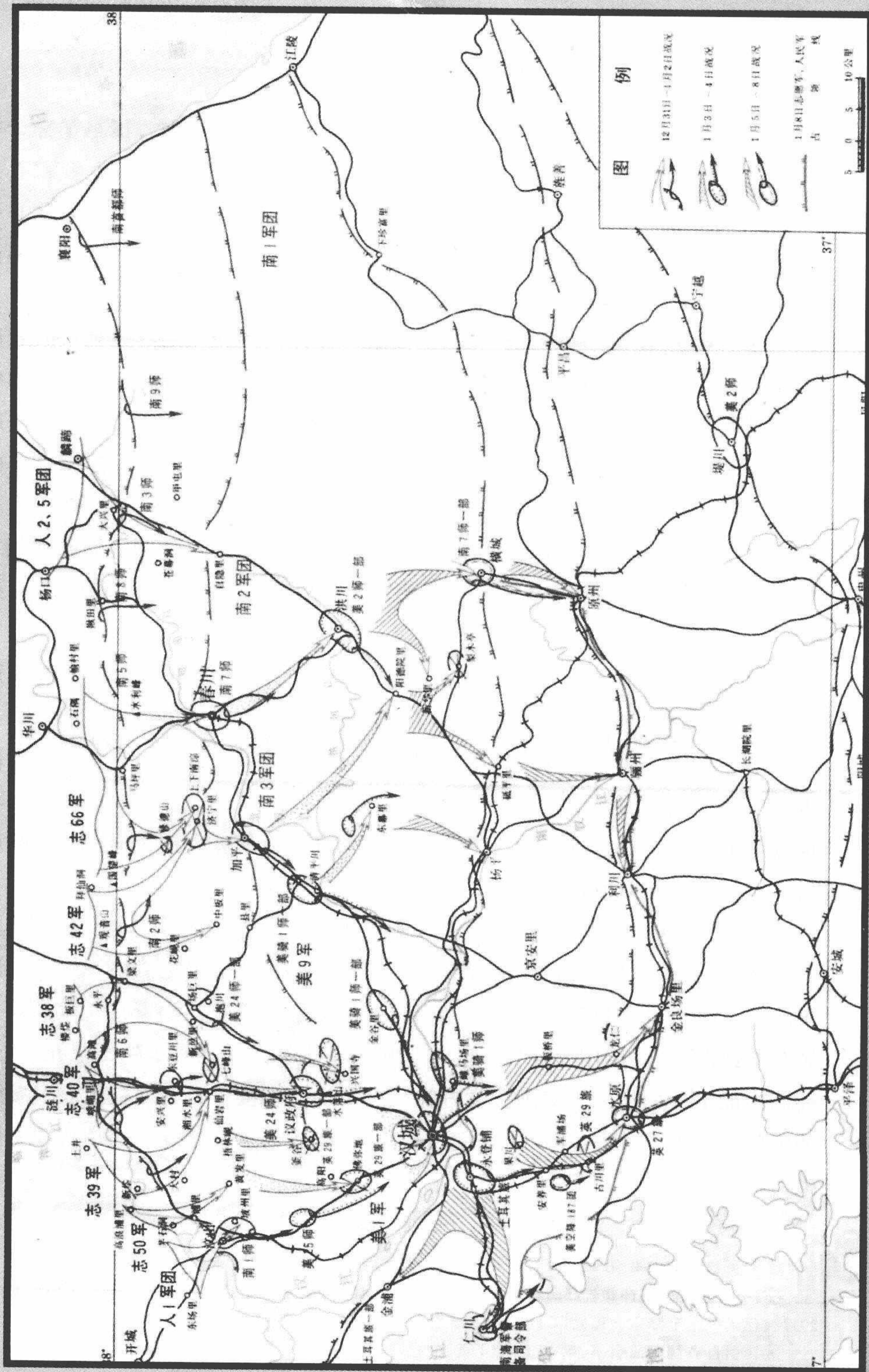
^①参见徐焰前引书,第62页。

^②《毛泽东致彭德怀并告高岗电》,1950年12月13日;《毛泽东致彭德怀并告高岗电》,1950年12月29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722页。

^③转引自齐德学前引书,第113—114页。

第三次战役要图

(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后来在回忆这段情况时承认，自美国将中国干涉问题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以来，它就在不遗余力地试图让联合国通过决议将中国推上“侵略者”的被告席。但军事上的失败和印度等中立国家的停火呼声使得美国政府进退两难。仅仅是出于担心失去联合国多数支持的考虑，国务院煞费苦心选择了支持三人委员会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五步方案的做法。然而，“我们热切地希望并且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从而我们的盟国会回到比较清醒的立场，并追随我们把中国人作为侵略者进行谴责”^①。

1月13日，由于美国投了赞成票，联合国第一委员会顺利通过了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步方案，即：

- (一)立即实现停火；
- (二)举行一次政治会议以安排恢复和平所应采取的进一步措施；
- (三)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并采取措施以实现联合国关于建立统一政府的决议；
- (四)在实现第三条步骤之前，制定出管理朝鲜和确保朝鲜和平与安全的临时性办法；
- (五)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国代表举行会议讨论远东问题，其中包括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②

可以肯定，不论艾奇逊事后如何表示，承诺赞同撤退外国军队，特别是同意把台湾问题与朝鲜问题连在一起来解决，这些毫无疑问是美国领导人当时对朝鲜军事形势感到绝望的结果。很难说如果中国方面公开表示接受联合国的这一提议，吃亏的不是美国。毕竟，五步方案中关于讨论解决中国的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问题，都是中共梦寐以求的，只会对美国不利。而更重要的是，这时入朝的约40万志愿军作战部队，三次战役减员已近10万人，特别是大踏步向南推进后，补给线长达500公里，有400公里没有空军

^①艾奇逊著，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研究组译：《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69年版，第381页。

^②FRUS, 1951. Vol. 7, p.61.

掩护,接连三次战役又几乎没有间隙,士兵疲惫不堪,粮弹供给早已发生严重困难,极大地影响了部队连续作战的能力。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中国方面接受了停火提议,不仅可以把停火线置于汉城以南的三七线,而且可以使部队得到充分的休整补充,包括让一部分部队用刚刚运到的比较现代化的苏式装备武装起来。^①然而,毛泽东却有不同看法。

注意到第三次战役期间敌军撤退之迅速,毛泽东深信此前关于美军即将撤出朝鲜半岛的情报是准确的。^②在他看来,敌军已无还手之力,其下一步或者是“进行微弱抵抗,然后撤出朝鲜”,或者是“在釜山一大邱地区进行顽抗,一直到确信抵抗徒劳无益为止,此后将撤出南朝鲜”。既然如此,再打一仗,大局可定,是否还有必要与美国人就朝鲜的政治解决讨价还价?^③何况,联合国的五步方案固然对中国有利,但承认联合国有权依据它所制定的原则在朝鲜建立统一政府,以及承认联合国有权暂时管理朝鲜,北朝鲜人也未同意。

在征得了斯大林的同意之后,周恩来于1月17日致电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主席,拒绝了这一五步方案。尽管印度等中立国家看出周恩来电报所提谈判条件与五步方案仍有某些可接近之处,因而再次提出修正方案,但美国已经不必再在这个问题上敷衍了。美国代表借机大谈中共的战争狂热,并迅速提出了中国侵略朝鲜案。2月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美国提出的谴责中国“侵略”的提案。而与此同时,朝鲜美军也转而由退却转入大规模进攻。朝鲜战场的形势开始发生逆转。

严格地说,毛泽东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抱定了要把美国人赶下海去的战争目标的。北朝鲜人的迅速失败,无疑也给他留下了美军强大的某种印象。出兵

^①齐德学认为,既然美国并不想真的停火,就不存在谈判的时机问题,中国不接受五步方案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但笔者更赞成徐焰的观点,即这个时候利用联合国的建议实行停火,不仅可以占据已经占有的并不巩固的地盘,而且即使停火失败,也可以获得宝贵的时间以重建进攻的潜力。参见齐德学:《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几个问题——兼谈如何看待和运用俄罗斯已解密的朝鲜战争档案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期;徐焰:《朝鲜战争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1期。

^②关于联合国军1950年底1951年初溃败之狼狈与混乱,在李奇微将军的回忆录中和韩国出版的朝鲜战争史著作中,都有详细生动的描述。参见李奇微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朝鲜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09页;金阳明著:《韩国战争史》,南朝鲜日新社,1976年,第211页。

^③参见《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1年1月15日,《毛泽东致彭德怀转金日成电》,1951年1月16日,APRF,3/1/336/31-32.

前对双方装备及火力差距的种种担心，也曾促使他再三叮嘱部队入朝之后务必“暂时避开(如果可能的话)美英军”，先打南朝鲜的军队，并一度设想过“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①。志愿军最初的军事胜利刺激了毛泽东强烈的好胜心，他显然希望在朝鲜进一步证明他的“纸老虎”理论和以弱胜强的革命哲学。^②他开始忽视两军装备、火力等方面的巨大差距，相信“正义之师”的力量，认为依靠部队的勇敢精神和灵活战术，“我军对于具有高度优良装备及制空权的美国军队，是完全能够战胜的”，以至相信部队完全有能力集中兵力一举歼灭美军一个甚至几个师的主力。^③正是在这样一种心态下，毛泽东拒绝了来自联合国的，本来是对中国共产党人极端有利的外交调停。结果，他们没有能够抓住被打得懵头懵脑的美国人在朝鲜战争中的这难得的一次恐慌，保持住已经到手的军事胜利。

6. 朝鲜停战不可免

志愿军最初的军事优势是建立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基础上的。由于后勤线过长，部队粮弹补给困难，第三次战役的进行已经十分勉强。部队的大举推进，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的恐慌与溃逃。而最为重要的是，投入作战的6个军装备大部分比较落后，而且耗多补少，再加上连续作战近三个月，减员严重，也疲劳过度。但毛泽东仍旧主张再打一仗，彻底解决朝鲜问题。^④

1951年1月25日，志愿军还在休整期间，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即开始向汉城方向发起试探性进攻。第四次战役由此打响。由于美军这次摸清了志愿军只能背一个礼拜的干粮和弹药作战(所谓礼拜攻势)，和由于装备差多半只能

^①《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0—141、160、163、165页。

^②毛泽东在1946年曾经在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过著名的“纸老虎”理论。强调“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不过样子吓人罢了。对反动派，战术上要重视，但在战略上要藐视。这一理论其实是基于他的另一革命观念，即一切新生的弱小的事物都是最有生命力的，必定会战胜强大的敌人。

^③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选》第6卷，第191、200、213、217、243页。

^④参见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92页。

靠夜战来突破美军的装甲防御(所谓月夜攻势),专门利用志愿军粮弹耗尽,疲惫不堪,作战能力几近衰竭之际大举反击,志愿军自入朝作战以来第一次受挫。尽管此役志愿军仍给美韩军队以大量的杀伤,甚至在2月中旬的横城反击战中一次即俘获美韩官兵8000人之多,但这一仗志愿军不仅损失了5万多人,放弃了刚刚占领不久的仁川和汉城,而且全线被迫后退了100多公里,重又撤回到了三八线以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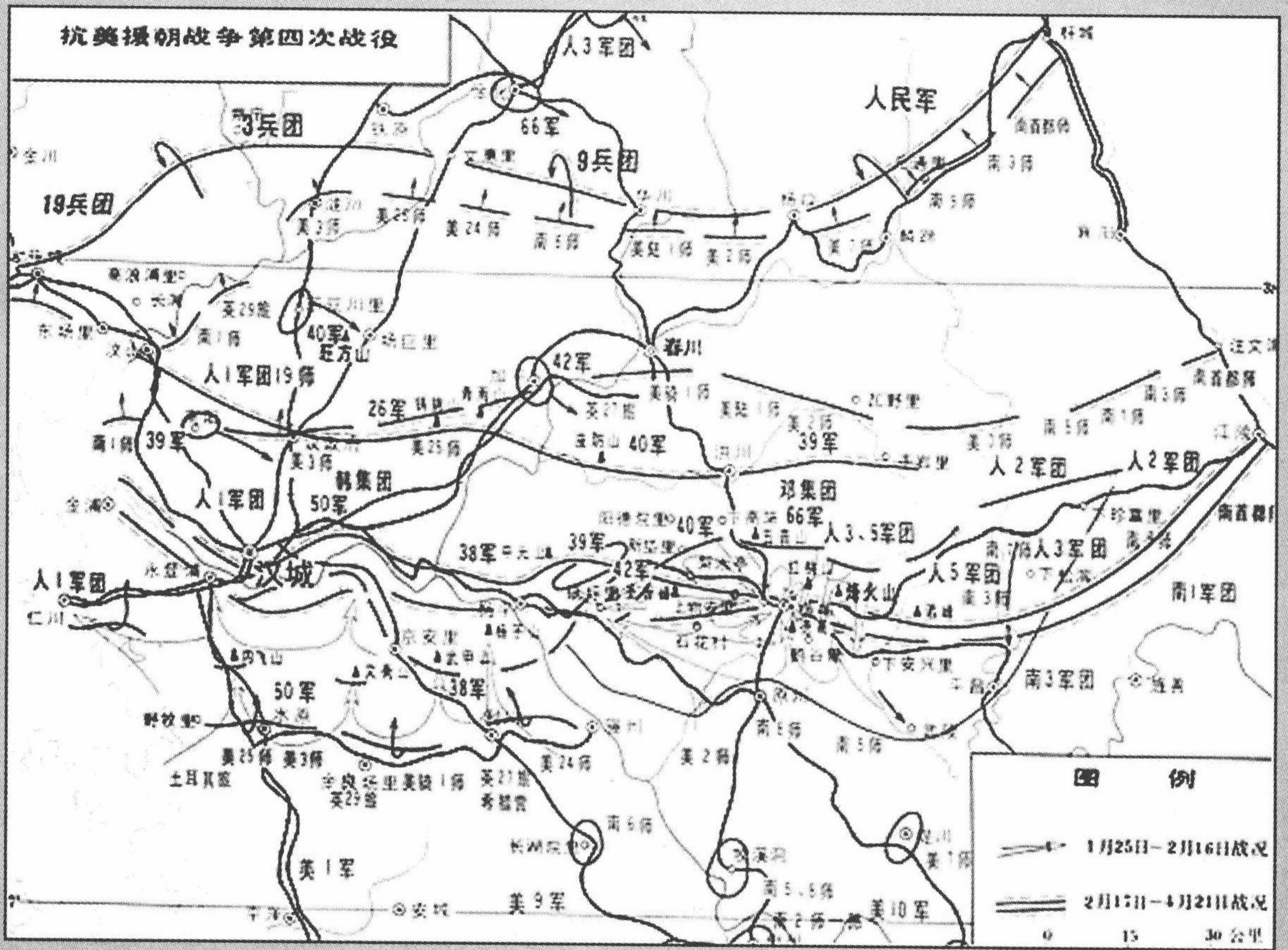
在美军突然发动全线反击之后不久,毛泽东虽多少意识到自己此前对朝鲜战局前景的估计过于乐观,提出实行志愿军轮番作战的方针来解决部队疲劳和补充不及问题,但其仍抱“大量消灭敌人,彻底解决朝鲜问题之目的”^①。随后,彭德怀赶回北京汇报了志愿军兵力及补给等方面所面临的严重困难,毛泽东在3月1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已经看到,由于我在朝鲜境内运输线过长,没有空中掩护,30%~40%的补充物资因为被炸不能到达前线,再加上在朝鲜的9个军减员10余万人,3个军已无作战能力,在前线作战的6个军也因得不到补充和减员过大而难以抵抗美军进攻,因此,撤退到三八线不可避免。并且估计,由于美军拥有火力上的强大优势,并能获得大量补充,“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但他仍然没有放弃“在数年内歼灭美军几十万”,“迫使美国人将其部队撤出朝鲜”,彻底解决朝鲜问题的想法。^②

斯大林显然比毛泽东更渴望看到这场战争的胜利。他早就表示不同意退到三八线,特别是不同意放弃仁川和汉城。但毛泽东提出的困难,很大程度上与苏联有关。特别是空中掩护问题,最初斯大林坚持苏联空军不能越过鸭绿江,以后志愿军的战线向前延伸了,苏联空军也把它的掩护范围扩大到了清川江以北的朝鲜境内。可是,清川江以南还是完全没有空中掩护。即使清川江以北,由于苏联人害怕让美国抓住苏联参战的证据,对飞行人员制定了种种清规戒律,比如不能用俄语联络,不能飞到海上,以免被击落落入美国人手中,因此,有空中掩护的地段效果也不理想。^③结果是,因为缺少空中掩护,不仅中国军队在前线几乎只能昼伏夜出,而且粮食弹药接济不上,作战只能打打停停。

^①齐德学前引书,第132—133页。

^②参见《毛泽东致菲利波夫同志电》,1951年3月1日,APRF,45/1/337/78-82。

^③有关苏空军实行空中掩护问题的具体情况,Jon Halliday有过很深入的研究。参见哈利迪著,曲爱国译:《朝鲜空战——苏联方面的故事》,前引《关于朝鲜战争的新材料和新观点》,第212—228页。



第四次战役作战要图

当美国人明白志愿军的作战方式之后，就很容易利用其装备上的巨大优势来取得战场的主动权了。

面对这种情况，斯大林下决心提供更多的援助，包括：(一)同意将原先设在中国东北安东地区的两个苏联歼击机师移到朝鲜境内的机场上去，“以便在前线的战役中运用它们”；(二)从苏联再调拨一个大型歼击机师到安东地区去，接替原先那两个苏联歼击机师的空防任务；(三)下令为在朝鲜修建几个机场提供金属跑道、高射炮和其他必需的物资；(四)为确保苏联歼击机飞行员能够保持充沛的体力进行频繁的空中作战，下令超出战斗师的编制，专门为进入

朝鲜作战的每一个歼击飞行员配备 10 个后备的飞行员；(五)无偿为中国提供 372 架最新型的米格-15 喷气式歼击机，用以改装 6 个米格-9 歼击机师，从而使在苏联援助下建立起来的 10 个中国歼击机师全部成为最富有战斗力的空军师。与此同时，斯大林还同意紧急为中国方面再提供 6000 辆汽车，以满足志愿军后勤的迫切需要。^①

由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没有改变彻底解决朝鲜问题的战略目标，苏联早先答应的 37 个步兵师的装备和其他重型武器陆续到达，新开进的部队多已换上较先进的苏式装备，又有用苏联火炮组建的 4 个炮兵师和 4 个高射炮师开入朝鲜，志愿军各种火炮的数量增至 6000 多门，因此，当第四次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并没有真正吸取教训。它这时明确主张：朝鲜战争准备长期，但要“尽量争取短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结果，新组织的第五次战役，最初决定主要在三八线地区打击敌人，战役开始后却很快就改变了计划，决定打回三七线以南去了。^②

第五次战役开始不久，彭德怀就发现战场形势十分不利。不仅美军掌握了志愿军的作战规律，而且利用其机械化程度高和火力强等优势，协同掩护，节节后退，使志愿军无法发挥运动战的特长，几乎抓不住敌人。不得已，他急忙改变作战目标，毛泽东也看出形势不利，来电叮嘱彭德怀要积小胜为大胜，对美军每次的作战胃口不要太大，力求歼灭其一个营就够了。为了歼敌，可以考虑把美军引到北面打，只需不让敌人占了平壤—元山一线就可以了。但有了人民军惨败的经历后，北朝鲜人，甚至莫斯科都很难同意志愿军后撤。斯大林即亲自出面干预毛泽东的战术，提醒毛说：你们在前线后方没有预先设置强固的防御工事，美国人很容易识破你们的计划，在向北推进时一道道地建立起自己的防线，那时候，志愿军要想转入攻势必定要付出巨大的牺牲。^③

斯大林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考虑到志愿军在前线后方确实没有构筑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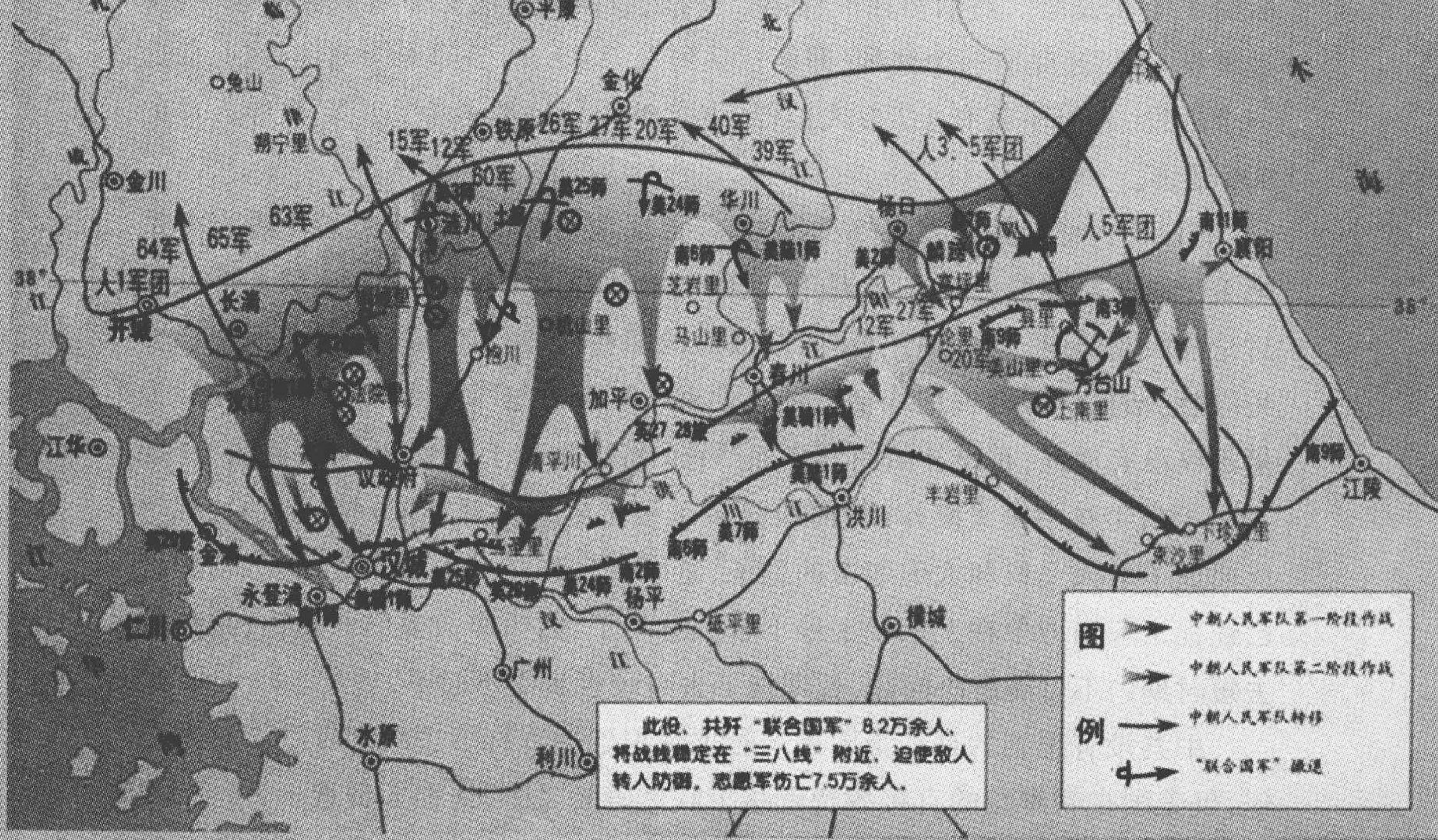
^①参见《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1951年3月3日，3月15日；《华西列夫斯基、什捷缅科夫致斯大林电》，1951年4月12日；《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1951年5月22日，5月26日，APRF，45/1/337/118；45/1/338/87,91；3/65/828/140-142。

^②参见齐德学前引书，第144—145页。

^③参见《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1年5月27日；《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1951年5月29日，APRF，45/1/338/95-97，98-99。

第五次战役作战经过要图

(1951.4.22-6.10)



第五次战役作战要图

固的防御阵地，一旦被敌人强大的装甲部队插入后方将十分危险，毛泽东转而致电彭德怀，要他务必要在守住第五次战役开始时的防线的基础上来打小歼灭战，同时要加紧在这条防线以北另外构筑第二道防御阵地，以防万一。^①但志愿军还没有来得及抽调预备队构筑防线，美军就开始了大举反击。结果，志愿军全线被迫后撤约40公里才勉强阻止住敌人的推进。整个战役明显地再度受挫，且损失严重。不仅志愿军的战线这次未能向前伸延，反而比战役发动时平均

^①参见《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51年5月3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344页。

后退了十几公里。特别是在战役第二阶段,有两个军的兵力被敌分割包围,险遭覆没。最后还是有一个整师,即第三兵团六〇军一八〇师未能归还建制。仅此一个战役,志愿军就有 1.7 万人被俘,占了整个朝鲜战争中志愿军被俘人员的 80% 还多。

第四次,特别是第五次战役的失利,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志愿军没有力量把美国军队从朝鲜赶出去。5 月下旬,第五次战役尚未结束,中共中央军委开始讨论前线局势时,就已经注意到,开战时的那些优势已经不复存在。原想靠多兵取胜,结果最多时连前线带后勤总共有 130 万志愿军进入朝鲜,实际作战力量不仅没有加强,相反补给问题更加严重。特别是由于战场过小,道路狭窄,远不同于当年在中国大陆作战,前线兵多了根本施展不开,到处挤成一团,有时反而成了敌人飞机和大炮轰击的靶子,造成许多伤亡。面对这种情况,与会者已经提出应当力争在三八线上停下来的意见了,因为多数人已经看出,再打下去短时期内不可能解决问题,长期拖下去财政也承受不起了。^①

中共没有想到的是,美国人这时也认识到继续打下去的困难了。打了一年,仅美国在朝鲜花的直接战费就达 100 亿美元之多,伤亡人员近十万。按照第五次战役的情况,每推进 1 公里,都要付出数百人的伤亡。接替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司令的李奇微明确认为,如果再向鸭绿江方向推进,除了要再损失十万人以外,必然要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战争中,对美国毫无意义。^②还在 4 月 5 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得出结论:“‘单靠军事行动’,是无法解决朝鲜问题的。”5 月 17 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此作出的决定:争取结束在朝鲜的敌对行动。31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正式下达命令给李奇微,要他在努力使中朝军队付出重大牺牲的情况下,争取“缔结合理的停战协定,终止敌对行动”^③。随即,美国前驻苏联大使凯南受命前往会见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探询停战的可能性。^④

6 月 2 日,毛泽东得到了凯南 3 天前向马立克表示美国希望谈判结束朝鲜

^①参见聂荣臻前引书,第 741—742 页。

^②参见李奇微前引书,第 152—153 页。

^③Omar N. Bradley and Clay Blair, *A General's Life: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3, p.840.

^④参见 FRUS, 1951, Vol.7, pp.483—486, 507—511.

战争的消息。军事上的不利局面和党内的意见使毛泽东也不能不考虑这一新的情况。但在尚未得知苏联和朝鲜的态度之前,他这时对是否应当在三八线上停下来还颇为踌躇。在6月4日给斯大林的电报里,他只字未提是否应当考虑停战的问题。他在说明了第五次战役的不利情况和火力太弱的现状之后,只是委婉地表示,目前形势下已不可能加速朝鲜战争的进程了,怕是必须准备打一场持久的消耗战,志愿军仍准备反击,但只能在三八线附近稳扎稳打。^①

斯大林明显地没有考虑到停战问题。他甚至担心中国人会失去彻底战胜美国人的信心。他在5日给毛泽东的回电中说:“我同您一样认为,不应加快朝鲜战争,因为持久的战争第一能够使中国军队在实战中学习现代战争;第二将会动摇美国杜鲁门政府和打破美英军队的军事神话。”他鼓励毛泽东说,你们目前遇到问题并不十分严重:只要按照目前计划在接近前沿的后方构筑强大的防御工事,加强敌后游击队的活动,进一步装备新的大炮和其他必需的武器,情况就会改善。他甚至抱怨说:您既然说志愿军大炮和反坦克武器少,两个月前我就已经告诉您我们可以提供给您新的大炮和其他武器,为什么始终没有收到您的订单?在他看来,目前最重要的是要给敌人重大打击,因为几度后撤使志愿军的士气已出现问题。“如果不准备和不实行对敌人的重大打击,消灭其三四个师,就不可能消除这些不健康的情绪。”^②

但是,就在斯大林来电的同时,毛泽东与前来北京的金日成举行了会谈。金日成也已得到了有关美国有意谈判的情况通报。经过这两次战役,他已看出靠武力统一朝鲜不可能了,因而也倾向于赞同停战。既然金日成自己如此主张,毛泽东自然可以放手考虑要不要停战的问题了。他在5日傍晚发给斯大林的另一封电报中明确提出要派高岗前往莫斯科,就“我们在朝鲜战争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严重问题”提出报告,请求指示。在得到斯大林的同意后,毛泽东第一次在电报中暗示了中共中央想要寻求停战的意向。在9日的电报里,他通知斯大林说,高岗此行准备报告我们“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想法。^③当然,诚如一些研究者所说,

^①参见《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1年6月4日,APRF,45/1/339/4-6.

^②《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1951年6月5日,APRF,45/1/339/17-18.

^③参见《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1年6月5日;《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1951年6月7日;《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1年6月9日,APRF,45/1/339/23,26,28-29.



毛泽东与金日成

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进攻的计划。^①

6月13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听取了高岗和金日成就朝鲜战争问题进行的汇报。他很痛快地答应了中国方面提出的关于补充提供60个师的武器装备的申请订货单和毛泽东提出的为彭德怀派遣军事顾问的要求，并告诉高岗说，志愿军的装

^①Weathersby 认为，斯大林和毛泽东这时主张停战只是想休整补充军队进一步进攻而已。但她的文章既没有看出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的不同，也没有清楚地说明他们在谈判问题上的想法是如何变化的。Weathersby 利用的主要是《毛泽东致高岗、金日成电》，1951年6月13日，APRF，45/1/339/57-60；《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1951年6月13日，APRF，45/1/339/47等。Kathryn Weathersby, *China's Strategy to End the Korean War, Conference on New Evidence on the Cold War in Asia*, Hong Kong, 9-12 January 1996.

备与敌人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必须加强坦克和火炮的数量。然而,当高岗代表中共中央开始提出,是否可以考虑以三八线为界举行停战谈判的问题时,斯大林显得十分不安。他有些激动地表示:你们现在打得很好,为什么要停战?害怕打下去的应当是美国人,不是我们。我了解美国人的心理,你们多打死一名美国兵,他们多往国内送回一具棺材,他们国内反对这场战争的压力也就越大,最后要停战的一定是美国人。在高岗和金日成反复解释了中朝方面面临的困难之后,斯大林最终作了让步,说如果你们一定想停战也可以,那就试一试吧,也许是件好事。在会谈后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斯大林只简单地提到了一句:“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①

6月23日,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马立克利用在联合国发表演说的机会提议:朝鲜“交战双方应谈判停火与休战,并把双方军队撤离三八线”^②。25日,中美双方都非正式地表示了愿意和平谈判的意向。紧接着,根据苏联方面的建议,朝鲜战争交战双方前线司令官在6月30日和7月1日就直接谈判停战问题交换了意见,正式确定以位于双方军事接触线中朝一侧的开城作为谈判地点。随后,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了。

从谈判一开始,中国方面就不得不放弃了一些过去它最为关心的问题,如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等。^③事实上,还在凯南与马立克会谈时,他就明确表示了美国反对将这些问题列入谈判内容的立场。而现实的军事形势,也不容许中国为此与美国讨价还价,包括中朝方面开始时提出的所有外国军队限期撤出朝鲜半岛的提议等。比较1951年1月13日美国曾经投票赞同过的那个五步方案,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相当大的让步。

甚至,谈判开始时,就连以三八线为界的问题,美国方面也坚决不答应。按照美国人的解释,联合国军目前所占三八线以北的面积远远多于中朝方面所占三八线以南的面积,再加上美国在海上和空中占有绝对优势,因此,还应当考虑到“海空补偿”的问题,中朝军队应从实际军事接触线再向后撤,来划定军

^①前引《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1951年6月13日。

^②ERUS,1951, Vol. 7, pp. 546-547;《毛泽东致高岗、金日成电》,1951年6月13日,APRF, 45/1/339/57-60.

^③毛泽东开始就认为没有必要提出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但主张应当提出台湾问题作为讨价还价的条件。见前引《毛泽东致高岗、金日成电》。



被志愿军俘虏的美国士兵

事缓冲区的界限。双方为此争论了一个月之久,最终还是于8月23日宣告谈判破裂,双方又回到战场上去较量。重新打了大约两个月以后,美国人发现用军事手段向前推进所付代价太大,才不得不放弃了原先的要求。

10月25日,双方重开谈判。中朝方面也决定“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且由此线各后退二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美方表示同意。这样,双方在1951年11月27日就军事分界线问题在原则上达成了妥协。

随后的谈判出乎意外地卡在战俘问题上。本来,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斯大林,都十分乐观地相信:“该问题不难达成一致意见”,认为“敌

人很难对此提出异议”^①。想不到,中朝方面坚持战俘全部遣返,美国和南朝鲜坚持“自愿遣返”,两方就此相持不下,以致其他问题解决后,朝鲜战争还是长时间不能停战。

战俘问题的关键在于双方俘虏的人数相差悬殊。根据双方公布的数字,美方俘虏朝籍战俘 11.2 万人,俘虏中国籍战俘 2.08 万人;而中朝方面俘虏的战俘,只有美英籍战俘 4417 人,南朝鲜战俘 7142 人。^②确定自愿遣返的原则,对战俘远远多于联合国一方的中朝方面显然十分不利。最初,联合国方面只同意遣返 7 万人,其中只有极少数中国人。一直到 1952 年 7 月 13 日,美国才把它同意的遣返战俘人数增加到 8.3 万人,但其中仍只有 6400 人是中国人,还不足被俘的 2.08 万名中国人的 1/3,7.6 万人都是北朝鲜人。

由于美国空军始终没有停止对北朝鲜的狂轰滥炸,而北朝鲜可以得到的战俘数又不比实际被俘的战俘数少太多,急于兵员和人力的平壤方面自然乐于就此解决问题。但毛泽东难以接受,认为它“必然会使敌人更加自负傲慢并有损我们的形象”。对此,斯大林明确地支持了毛泽东。他显然乐于看到战争继续打下去。他告诉周恩来说:“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他明确讲:“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美国人是一批商人,每个美国兵都是投机商,都做买卖。德国人 20 天就占领了法国,美国已经打了两年了,却对付不了小小的朝鲜。这算什么实力?”“当然,”斯大林也强调,“要理解朝鲜人,他们有很大的牺牲。”“对朝鲜必须帮助、支持他们。”“为了朝鲜我们不惜一切。”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策略,斯大林建议:可以考虑宣布照比例交换战俘,美国人扣留多大比例的战俘,中朝方面也宣布扣留多大比例的战俘;如此不行则可考虑由中立国进行调解,先解决停战问题。^③

^①APRF, 45/1/342/16-19, 100.

^②中方俘虏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人数少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根据中共历史上的传统,凡是战场俘获的俘虏,大都当场释放或编入部队之中。志愿军入朝作战伊始,毛就下令对俘虏“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后因北朝鲜方面要求,南朝鲜军俘虏相当部分补入了人民军。参见《毛泽东致彭德怀、邓华、朴一禹并告高岗电》,1950 年 11 月 18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 册,第 672 页。

^③参见《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952 年 7 月 18 日;《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1952 年 8 月 20 日;APRF, 45/1/343/72-75;45/1/329/54-72, 91-101.

由于在战俘问题上陷入僵局,停战谈判在1952年10月被迫长期休会。这种情况直到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逝世才得以改变。

除了斯大林以外,苏共中央领导人早就对无休止地继续进行这样一场战争感到筋疲力竭,难以忍受了。因此,斯大林逝世不几天,莫洛托夫就提出,朝鲜战争拖延至今,给苏联以及中朝两国都造成极大的负担,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要立即停止这场战争的时候了。苏联部长会议紧接着通过了相应的决定。^①既然如此,毛泽东自然不能单方面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立场。很快,中共公开表示有条件地接受美国的所谓“自愿遣返”原则。又经过了一系列的交涉,双方终于就战俘问题于1953年6月8日达成妥协。7月27日,交战双方正式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至此,朝鲜战争结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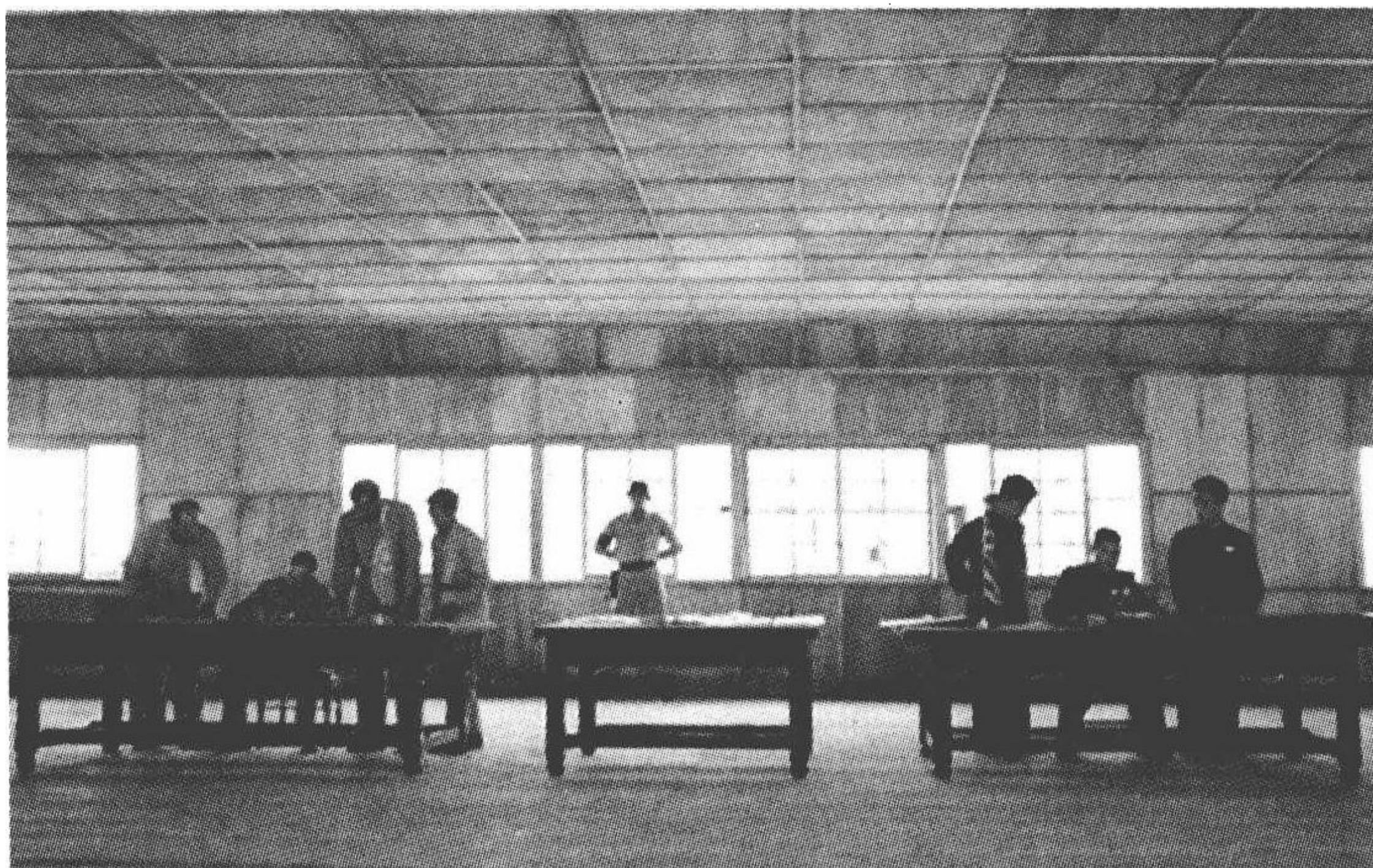
7. 结语

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国军事力量介入台湾海峡,新中国使得台湾问题的解决变得更为棘手,不可避免地使自己彻底站到了美国的对立面。中国出兵朝鲜,成为美国在亚洲的最具威胁的敌人,成必然之势。这场战争,中国方面至少付出了50万人的伤亡,直接军费消耗掉约20亿美元,其他间接的经济损失更难以统计,^②对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的毫无疑问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但是,至少在中共中央看来,这场战争对新中国还是利大于弊。这是因为,如前所述,自新政权建立之初,毛泽东就再清楚不过地认识到新中国基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地缘政治等种种因素,在美苏冷战格局当中站位选择的有限性。在此基础上,加强与苏联的关系,取得来自苏联的援助,无疑是最有利于新中国的一种政治选择。这场战争明显地化解了他们与苏联人之间长期存在的许多隔阂,不仅推动了苏联对新中国的经济援助,而且极大地加速了新中国军队现代化的进程。这自然是符合毛泽东的期望的。

^①参见《苏联部长会议关于遣返战俘问题的决定》,1953年3月19日,APRE,3/65/830/66-71。

^②据军方统计,战争中阵亡11.4万人,医院接收伤员38.3万人,另外因病死亡1.3万人,被俘2.1万人,另有4000余人下落不明。参见徐焰前引书,第32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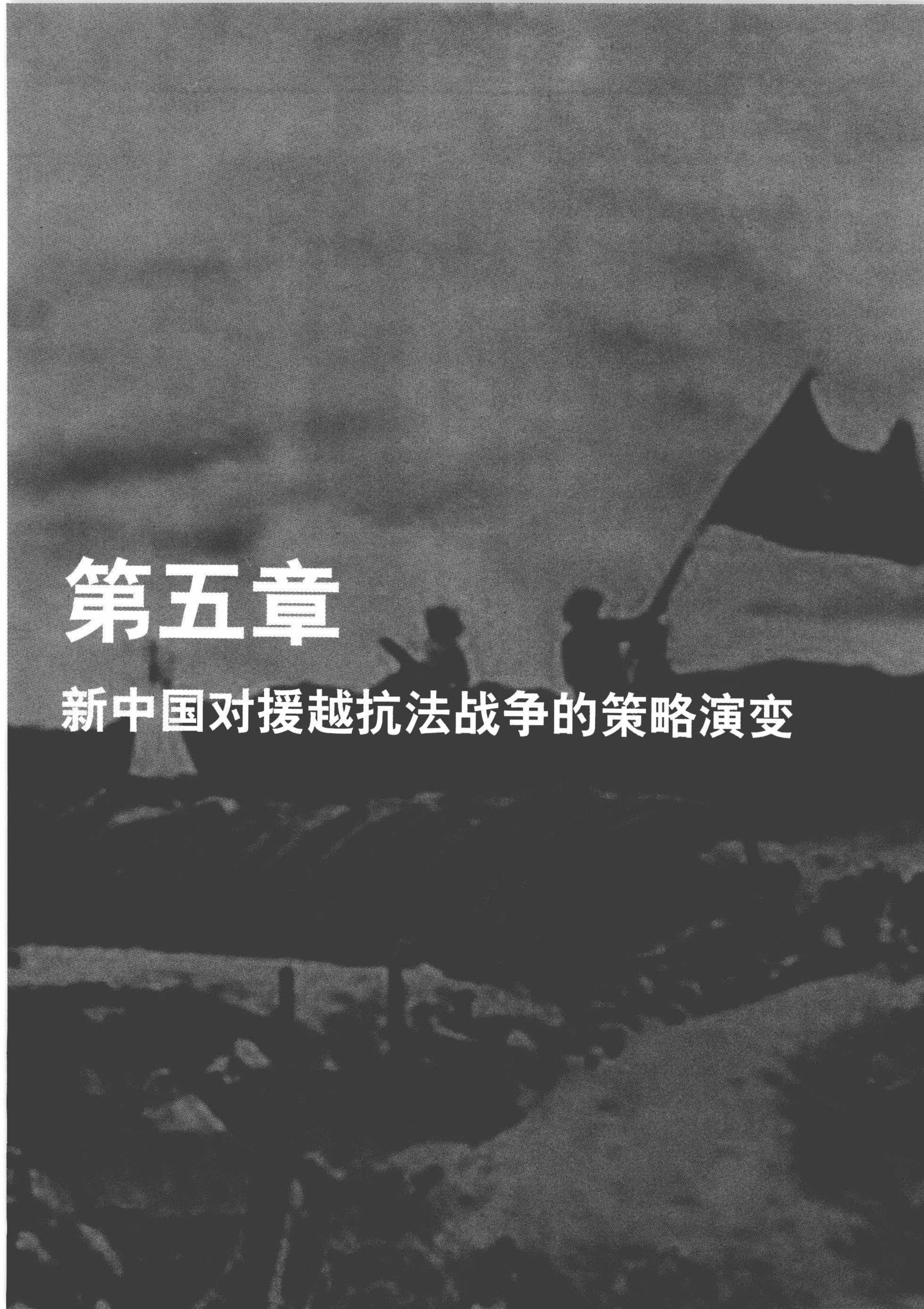


1953年7月27日交战双方正式签订朝鲜停战协定

除此之外,上百年来一向受人欺凌,从不曾在对外作战上取得骄人胜绩的中国军队,竟然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北朝鲜实际上已经基本沦陷的情况下,势如破竹般地把世界最强大的美国军队打回到三八线上去,并顽强地固守了下来,这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共新政权在国内民众中的威望。

这场战争对于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也有明显的提升。与此同时,由于这场战争教训了美国人,不仅被美国军队直接威胁边境的情况不复存在,而且在此后双方对立的20多年的时间里,虽然围绕中国大陆周边发生了不少战争,包括美国大规模卷入的越南战争,但是,美国政府一直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再度把新中国卷入到战争中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然也有利于新中国的国家安全。

原载《百年潮》,1997年第1—3期

A grainy,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mountainous landscape. In the foreground, several silhouettes of people are visible, some appearing to be in conversation or looking towards the mountains. The background shows a range of mountains under a cloudy sky. The overall tone is somber and historical.

第五章

新中国对援越抗法战争的策略演变

引言

就在新中国出兵朝鲜，卷入朝鲜战争的几乎同时，它又在中国南部疆界之外的越南，卷入到另外一场战争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印度支那战争”。这两场战争差不多同时演变成为中国抗美援朝战争和抗法援越战争，并非偶然，它们显然都与新中国自身的政治特点密切相关。如果说新中国被迫出动志愿军参加朝鲜战争，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举卷入，把战火燃烧到了鸭绿江边，严重威胁到了中国的国家安全，那么法国这个时候在越南充其量只是为了延续其一度丧失了的殖民统治，它并不构成对新中国安全的重大威胁，何以新中国政府仍旧给予了北越除了出兵之外的几乎一切形式的支援？这包括派出政治、军事顾问和技术支援人员、提供各种武器装备和物资、在自己境内为越南人民军装备和训练，以及由中央军委直接参与制定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等等。十分明显，无论是朝鲜战争也好，还是印度支那战争也好，促使新中国政府必欲给予高度关注和积极援助的，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关系到新中国自身的安全问题。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胜利了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他们必须要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和坚持自己的革命理念。

由于有了中国这个安全的大后方，由于有了中国的战争经验及其直接的军事和物资援助，越南独立同盟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就迅速由弱变强，扭转了战场形势，开始成为足以向法国殖民主义统治挑战的强大力量了。但就在双方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历史性转折之际，1954年一个日内瓦会议使越南和法国之间达成了划界停战的协议，数以万计的越南独立同盟的部队和干部不得不从越南南方以及老挝、柬埔寨撤往越南北方，原来设想中的解放全越南以及解放老挝、柬埔寨，建立革命的印度支那联邦的目标被迫放弃了，真正获得独立的只有半个越南。而力主划界停战的，恰恰是始终积极支持着印度支那民族解放战争的新中国领导人。新中国的对外政策为什么会有如此重大而急剧的改变呢？



胡志明

1. 解放印度支那?

1945年9月2日,即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情况下,通过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的“八月革命”,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告诞生,胡志明就任人民临时政府主席。但是,由于同盟国宣布印度支那北纬十六度线以南为英国军队受降区,以北为中国(即国民党)军队受降区,随后法国军队又在英国军队的支持下大举开入,力图恢复其被日本人夺去的殖民统治,胡志明领导的人民临时政府不可避免地陷入到困境之中。为了取得国民党军队的承认,胡志明不仅一度宣告解散了印度支那共产党,而且公开承诺越南今后将成为中立国家。但法国殖民主义者并不买账。随着1946年3月国民党军队撤出越南,法国人事实上就开始了取缔人民临时政府的军事行动。到这一年的12月,眼看法军已经进攻到首都河内和临时政府控制的越北地区,胡志明终于不得不公开发表宣言,建立越南独立同盟,发动抗法战争。

越南抗法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越南党过去只打过一些游击战争,部队既缺少训练又缺少正规战争的经验,再加上没有较先进的武器,面对装备精良,尤其是有优势空军支援的法国军队,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从一开始就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越南人民军只能依据越北山地建立中央根据地,在其他地区多半只能开展游击战,各地组织被法军分割,再加上交通不便,相

互来往都十分不易。中央根据地虽地处越北山地,又临近中国边界,但却经常遭到法军的扫荡与轰炸,边界通道及其重要战略要点均被法军所占。在这种情况下,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消息后,曾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事,抗法战争爆发后已经与中共中央建立起电台联络的胡志明几乎马上就派李班、阮山两人赶来北京,要求中共中央给予援助。

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毛泽东的革命理论,用武装夺取政权的方法,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因此,从延安时期,直至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都始终坚持着这样一个观点,即“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①。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中国共产党人胜利伊始就积极鼓励落后国家的共产党学习自己的榜样。尽管考虑到亚洲一些国家的革命活动还十分困难,“切忌张扬”,他们在宣传中国革命道路时不能不有所保留,但他们的态度是显而易见的。^②刘少奇公开告诉亚洲各国共产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创立革命的根据地,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这不仅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基本道路,而且也将“成为情形相类似的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争取解放的基本道路”^③。从这样的观点出发,根据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原则,无论新中国建立之后自身的建设和政权的巩固面临着何等重要的任务,中共领导人都注定会对周边国家共产党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抱以高度同情甚至是积极支持的态度。越南共产党领导的援助要求,自然会得到他们的响应。

中共中央的这种态度在此前与越南党的关系当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新中国建立之前的几年里,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北方,中共中央与

^①《毛泽东选集》,第529页。

^②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刘少奇在亚澳工会会议召开的三个月前给斯大林的信件,他当时担心在北京公开召开这种会议可能会对有关国家共产党走向武装斗争道路产生不利影响,给敌人提供打击革命力量的口实。但在苏联的要求下,最后会议还是在北京召开了,为避免与会的亚洲工会组织遇到麻烦,会议在涉及革命道路的措辞上倍加谨慎。但刘少奇还是谈到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只不过特意加上了“可能”两个字。参见刘少奇:《关于东亚民族革命运动策略问题给斯大林的信》,1949年8月14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卷,第39—42页。

^③刘少奇:《在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年11月16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卷,第134—135页。

胡志明及其领导下的党和政府除了电讯联络之外,几乎很少直接交往。但是,从中国革命的经验出发,中共领导人对越南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所取得的胜利,从一开始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当越南党为了保住已经取得的政权,解散了共产党并宣布保持中立后,中共中央立即在内部予以了批评。而当胡志明重新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发动抗法战争后,中共中央又很快表示了支持的态度。

1949年12月,胡志明派出的代表李班、阮山来到北京,要求中共向他们派遣军事干部,并提供三个师的装备和10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虽然毛泽东这时已经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访问,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还是马上给刚刚开到广西不久,尚未完全结束对白崇禧部队作战的林彪及陈赓所部发去电报,要求他们“侦察由广西与越南胡志明部队联络的道路情况,报告中央”,同时询问“在武器弹药及医药方面你们能否给他们若干帮助?”当得知在云南的国民党李弥、余程万两部有可能退入越南的情况后,刘少奇还特别担心李部“将给胡志明后方以极大威胁”,因而去电林彪询问“是否可令已经到达广西百色的三十八军立即在陈赓的率领下入滇截击李、余二部入越的道路”,以解胡志明之后忧。中共中央对越南抗法斗争的支持和关注,由此可见一斑。

在接待了胡志明的代表之后,为便于两党协调与提供援助,中共中央这时特别电告越南党,希望他们派一个政治上负责的代表团秘密来中国,讨论和决定建立两党关系及反帝斗争中的各项问题。对越南方面要求派遣军事干部前往帮助越南人民军作战的问题,刘少奇等很快即决定调派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带人前往越南了解情况,以便决定如何选派军事干部。当然,考虑到新中国刚刚建立,统一尚未实现,战争仍在进行,经济上更是极端困难等情况,在京的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商量后,只“答应给越南一部分武器弹药及医药”和一部分物资,没有满足越方提出的关于三个师的装备和1000万美元的要求。但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得到报告后,态度明显比国内中央更为积极。他表示,援助问题可以更慷慨一些,并支持派军事干部去协助指挥作战。他主张告诉越方:武器、弹药、医药物资等,目前只是先给一部分,以后再逐步增加,这样做也是为了便于越南党逐渐熟悉掌握。他同时要求中共中央转告罗贵波,到越南后“务须采取友好合作态度,多鼓励、不批评”,对越方要求中共派军事干部去协助指挥一事,则根据历史上的经验,强调“将来派去军事干部宜任副职

或参谋人员或充顾问,似不宜任正职”^①。

这段时间中共中央对支援越南抗法战争的重视,在许多事情上都有表现。1950年1月,越南党派黄文欢作为全权代表来到北京,中共中央予以了相当热情的欢迎。对靠近越南边界地区的党政军负责人,中共中央也再三强调要设法协助越南党解决问题,“和他们的代表竭诚讨论,尽可能吸收他们的意见,照顾他们的困难”。当毛泽东得知胡志明将来北京之后,更是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对越南要求援助事项,凡可能者均应答允之。刘少奇、朱德、董必武、聂荣臻均应去车站迎接。”鉴于越南党事实上是赞同和坚持武装斗争的,他明确认为对过去的问题应作历史的分析。故再三强调,他虽然同意“越共缺点问题待胡志明的负责代表来北京时再依实情酌量提出”,但在他看来,“胡志明过去将党隐蔽起来,及宣称越南可以处于中立地位,这两点是否原则错误,还值得考虑。因为越南坚持斗争并未因这两点而受损失”^②。

1950年1月中旬,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建立了外交关系。胡志明随即秘密赶往北京。得知毛泽东已经在苏联后,他又急切地通过中共中央与苏联党取得联系,要求苏联方面提供飞机,以便他飞往莫斯科,会见正在那里访问的毛泽东。2月初,胡志明到达莫斯科,与斯大林、毛泽东共商了有关越南党的建设、民族阵线、军事和外交等诸多问题。会谈中,中苏两党领导人都明确表示了决心援助越南取得抗法斗争胜利的态度。^③随后,中国方面很快组建了以韦国清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同时组织车队从柳州经南宁向边界运送越方所需



罗贵波晚年照

^①刘少奇:《在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年11月16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卷,第165、186—187页。

^②《中央致中南局电》,1950年1月16日;《军委关于援助越南问题给林彪等的电报》,1949年12月12日;《关于云南军情和援助越南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1949年12月24日;《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50年1月31日,同上引注3,第165、187—188、278、347页。

^③参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卷,第343—348页。



朱德与胡志明

的各种武器弹药和军事器材,甚至按照商定好的计划,将越南人民军三〇八师(缺一个团)和二〇九、一七四团秘密接入中国境内的云南砚山和广西靖西专门准备好的基地内,由云南、广西两军区负责为它们全面更换装备和进行训练。

1950年6月,越南党中央在反复与中共中央代表罗贵波,并通过罗贵波与中共中央商量后,决定发起边界战役,以便打破法军对越北根据地的封锁,接通中越交通线。为此,越南党要求中国帮助提供充分的后勤保障,特别要求中国军事顾问团立即赶到越北根据地,并要求另派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员协助进行整个战役的组织指挥。中共中央很快表示了同意。之后即根据越方要求成立



韦国清,前中国驻越南军事顾问团团长

了以广西军区副司令员李天佑为主任的支援委员会,负责领导战役所需粮食、弹药、药品等援助物资的筹集和运送工作,并在边界附近的中国境内,设立了两所专门收治越军伤员的野战医院。同时,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已经集结在广西南宁的军事顾问团立即启程入越,并指派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赴越,在军事顾问团的配合下,协助进行边界战役的组织指挥。

陈赓等人于7月上旬动身秘密前往越南。途中及到越北根据地后,接连不断地就边界战役的设想和具体方案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对此次战役十分重视,反复去电给予指示,要求陈赓等人努力帮助越南党“打开一个相当的局面”,作战时“务作充分准备,确有把握,然后动手,期于必胜”^①。9月16日,即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的第二天,边界战役开始打响。毛泽东随后一面高度关注朝鲜战争的形势,与斯大林磋商中国出兵援朝的可能性,并极力说服党内高级干部做出兵朝鲜的准备,一面仍旧亲自参与指导越南边界战役,批阅前线发来的战报并作出具体指示,要求越南人民军抓住敌人后务求

^①钱江:《在神秘的战争中——中国军事顾问团赴越南征战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

“坚决、彻底加以歼灭,即使伤亡较大也不要顾惜,不要动摇”^①。正是在中国方面的大力帮助下,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出兵朝鲜的前夕,边界战役就取得了重要的胜利。此役歼敌8个整营,毙俘敌约8000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收复5个市、13个县镇,法军在中越边界的防御体系完全崩溃,中越交通线被彻底打通,整个长达750公里的边界地区成了越南党巩固的根据地。

中国此后援越抗法斗争的进行,与抗美援朝战争几乎同步。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新中国政府尽管面临着恢复经济、朝鲜战争和政权巩固等一系列事关整个国家利益的复杂问题,理应缩短战线,减少外援,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中国革命胜利的惯性推动下,更多考虑的显然是自身的国际主义义务,而非单纯的国家利益。他们这时不仅从并不宽裕的国内部队中抽调了大量枪炮、弹药和各种物资给越南人民军,帮助其装备及训练步、炮、工兵等部队,同时还具体协助越南党中央组织了一系列重要的战役行动。从对法军事作战的角度,同时也是从争取解放整个印度支那的角度,中共中央这时还积极支持越南党把战争扩大到老挝和柬埔寨去,帮助解放老挝和柬埔寨的斗争。到1953年前后,抗法战争已经扩大到老挝和柬埔寨境内,并形成了以越南独立同盟为骨干的印度支那三国抵抗力量。^②

2. 走向日内瓦

新中国对援助越南及整个印度支那争取解放斗争的积极态度,与几乎同时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突出地反映出中共中央领导人勇于承担援助亚洲革

^①中国军事顾问团历史编写组:《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②参见《毛泽东致陈赓电》,1950年7月23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致陈赓电》,1950年7月26日;《毛泽东致陈赓电》,1950年7月28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致陈赓电》,1950年8月24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军委致陈赓电》,1950年10月6日;《毛泽东致陈赓电》,1950年10月10日;钱江:《在神秘的战争中——中国军事顾问团赴越南征战记》,第72—74、96—97页;中国军事顾问团历史编写组:《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21—22、56、60、88—89页;王贤根:《援越抗美实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42页。

命运动历史责任的一种决心。特别是1950年10月出兵朝鲜,两个月左右便将不可一世的美国军队及其所谓“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长驱数百里,重新夺回了已经丢掉的北朝鲜,并最终在南北朝鲜分界线三八线附近牢牢地站稳了脚跟,这件事使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帝国主义更多了几分藐视。结果,在中、苏、朝三方当中,承担着最主要作战责任的中国一方,反而是最后一个赞同与美国停战妥协的。^①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苏联领导层对朝鲜战争的态度急剧转变,再加上北朝鲜也迫切希望实现和平,中国政府虽然在战俘等问题上对美国的态度强烈不满,考虑到这种情况也采取了妥协的方针。7月,朝鲜战争在经过长达两年左右打打谈谈的局面之后,终于实现了停战。朝鲜停战,特别是苏联高层态度的转变,预示着整个国际关系,特别是苏美两大阵营之间的紧张关系将随着这一事态而开始转向缓和。经历了持续近三年的战争和紧张之后,受到苏共中央支持和主导的和平共处政策也逐渐得到了中共中央众多领导人的赞同。还在停战实现之前,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就已经注意到实现国际缓和的重要性与可能性了。他显然更希望看到一个可以让新中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作为中共党内倡导和平外交的最主要的代表者,他这时已强调指出:尽管两大阵营的对立仍然是基本的,但它并不意味着战争必然会发生。“如果新的战争能够被推迟,也就可能被制止。”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和平协商来解决一切国际纠纷。因为,“我们政策的基本点是敢于在制度不同的国家间实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②。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与美国人交手,也是他们所经历的第一次现代化的战争。尽管战争的结果鼓舞人心,但党内许多领导人已经看出,“小米加步枪”的胜利经验明显地不足以应付美国这种武装到牙齿的现代军事机器,双方在装备、火力以及海空方面的巨大差距,使新中国必须借助于苏联的军事装备才能有效地保持与美国在战场上作长时间军事较量的能力。

^①关于朝鲜停战谈判酝酿过程及苏联、朝鲜和中国对和谈的态度变化,可见杨奎松著:《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第12章。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05页。

这样一种事实也使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中央领导人清楚地看到了加速实现中国工业化,以便推进国防现代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孔千疮,百废待兴,经济恢复和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但战争的进行严重地制约着国家把主要力量投入到经济建设当中来。1950年,国家财政支出的52%是军费,其中60%花在了抗美援朝战争上。到1952年,虽然战争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军费开支仍然占到整个国家财政支出的33%,其中主要部分也用在在了抗美援朝战争上。据说,为了这场将近三年的战争,中国耗费了约100亿美元。^①尽管1952年周恩来率团访苏时已着重提出了苏联帮助中国实现工业化及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问题,但在战争结束之前,具体的援建项目还难以完全落实。包括毛泽东1950年初在苏联访问时签订的3亿美元贷款和此后直到战争结束前的苏联援助,大部分都不能不被用在了抗美援朝的战场上和部队的装备更新上。因此,随着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全面实施,特别是这一年6月15日毛泽东开始提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全面展开,在朝鲜划界停战,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以便集中力量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应该说也是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乐于看到的一种战略选择。

朝鲜停战了,新中国对印度支那战争的态度很快就开始成为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因为,同朝鲜战争一样,印度支那战争事实上也已成为中国同美国对抗的一个战争热点。还在1950年,法国恢复在越南的统治就得到了美国某种程度上的公开支持。^②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这一年的5月11日曾专门发表声明,扬言为阻遏中国的共产主义向东南亚蔓延,美国将向印度支那提供数千万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援助。此后,尽管朝鲜战争极大地牵制着美国的力量,但它仍旧一直在从外交上和物质上帮助法国进行战争。从1951年到1954年7月,美国政府仅计划中要提供给法国用于印度支那战场的援助数额,就高

^①参见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61页;姚旭:《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党史研究》,1980年第5期。

^②所谓某种程度,是指美国支持法国帮助越南保大政权抵抗共产主义,但不同意法国恢复对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体系。

达 20 多亿美元。^①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难免会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印度支那,中国与美国在印度支那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明显增大。

对美国可能介入印度支那战争的危險性的估计,无疑是中共中央这个时候政策考虑的主要出发点。在刚刚结束了朝鲜战争之后,再在印度支那同美、法等国展开一场新的军事较量,显然不是中共中央领导人所期望的。当年出兵抗美援朝,就曾在中共中央内部引起过激烈的争论,即使是高度重视国际主义,力主出兵的毛泽东,也不能不考虑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可能带来的一系列复杂问题,因而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好不容易结束了朝鲜战争,如果再度直接在印度支那与美国发生战争,不仅朝鲜停战所形成的有利于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将不复存在,中国将重新背上沉重的战争包袱,而且在印度支那作战的条件也与在朝鲜作战的条件大相径庭。当年之所以必须出兵朝鲜,其中的一个重要的考虑是因为中国的重工业都在东北三省,让美国骑到鸭绿江边来,东北地区将永无宁日。而之所以可以出兵朝鲜,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也是因为朝鲜距离中国的工业基地和军事援助的提供国苏联近在咫尺,足以保证战争所需物资和装备的及时供应。在印度支那作战则不具备这样的前提。不仅外部的威胁没有那样严重,而且在交通状况较差的情况下要想跨越整个中国将战争所需的物资和装备源源不断地运到南疆,也过于困难。更何况印度支那的地形地貌也不大适于大兵团作战。注意到这样一些因素,当苏联政府提出在印度支那也照朝鲜一样划界停战的设想后,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自然很快趋向于支持和平的选择了。

这个时候,恰好也存在着实现印度支那和平的机会。由于连续六年多持续战争,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乃至法国青年的生命,却眼睁睁地看着越南独立同盟的力量日渐强大,消灭胡志明政府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再加上朝鲜又实现了停战,法国国内民众的厌战心理与日俱增。对于这种情况,越南党显然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尽管他们与中国和苏联对和平条件的估计还不尽相同,但胡

^①据雷英夫在《忆日内瓦会议的军事谈判》(《中共党史资料》第 69 辑,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57 页)一文中称,美国这段时间的援助数额达 26 亿美元。但据 8 月 2 日《纽约时报》披露的情况,这段时间美国向印度支那投入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实际应为 12.35 亿美元,原先公布的估计数字中有近 10 亿美元在战争结束时尚未拨出。参见科拉尔·贝尔著, F.C. 贝纳姆编:《国际事务概览, 1954 年》, 云汀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91 页, 注 5。

志明在得到了苏联方面的建议之后，还是很快于1953年11月公开发表谈话作出了响应。他宣称：“在越南的战争是由法国政府挑起的。越南人民七八年来被迫拿起武器进行反抗侵略者的英勇战斗。但是，要是法国政府已从几年来的战争中吸取了教训，愿意通过协商来实现在越南的停战，并且采取和平方式解决越南问题，那么，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和政府将随时接受这种意图。”^①当然，胡志明要求法国必须停止侵略战争，尊重越南的独立。

在得到中越两党的同意之后，1954年1月，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美、英、法、苏四国召开的柏林外长会议上提出了缓和国际局势并讨论采取有关措施问题的提议，其中就包括在印度支那实现停战的问题。由于得到法国和英国的响应，结果在2月19日外长会议结束的时候，四国外长一致声明同意两个月后召开日内瓦会议，专门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在印度支那停战的问题。^②得到这一消息后，中越两国政府很快就此正式作出了积极的反响。积极倡导和平的周恩来明确表示：日内瓦会议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应该积极参与。但他首先担心的就是美国的态度。四国外长声明发表一周后，周恩来专门接见了印度大使，以便透过印度向美国等西方国家表明中国方面的这一看法。他说，举行日内瓦会议，从远东的具体问题来解决一些国际上迫切的问题，尤其是远东的和平问题，这是柏林会议的一个成就，也符合用协议的方法来解决国际纠纷的原则。但“越南和平的恢复问题，关键在于美国”。当然，不管美国是否会阻挠印度支那的停战，周恩来还是力主要争取在日内瓦解决一些问题，不但要争取达成某些协议，以利于打开经过大国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道路，而且应当乘机加强外交和国际活动，分化帝国主义阵营，破坏美国对新中国的封锁和禁运。在印度支那问题上，要争取南北以十六度线为界实现停战，通过和平统一、民族独立和自由选举的口号，促使法军撤出，反对美国干涉，努力使胡志明政府成为全越南人民选举出来的唯一合法政府。即使在会议上达不成任何协议，也要使这种和平谈判不致完全中断，争取形成边打边谈的局面，以增加法国内部的困难和法美之间的矛盾。在3月2日的中共中央书记

^①《胡志明选集》，第2集，第263页。

^②参见前引《国际事务概览，1954年》，第23、178页。

处会议上,周恩来的这一主张得到了批准。^①

印度支那这时的军事形势明显对越、老、柬三方有利。还在1953年秋天,中共中央就根据它所获得的法国印支远征军总司令纳瓦尔的军事计划,向越方提出了首先消灭莱州地区之敌,解放寮国^②北部和中部,然后逐步将战场推向寮南部及高棉^③,威胁西贡的战略方针。中国军事顾问团并据此制定了以夺取整个西北地区为目标的冬季作战计划。纳瓦尔显然也意识到越南西北地区的战略价值,因而不惜孤注一掷突然派6个营空降到越南西北靠近老挝边境的战略要地奠边府,进而陆续增加兵力,开辟机场,构筑工事,囤积军事物资,构成坚固防御的集团据点群,同时增兵上寮,派6个营窜占孟溪、孟夸等地,建立起联结上寮和奠边府的南乌江防线。但法军的这一行动正好为集中力量准备西北作战的越南人民军提供了一个歼敌的机会。中越双方迅速商定了奠边府战役计划,并毫不迟疑地将在中国境内装备训练的人民军榴弹、高炮部队,连同人民军原有炮兵、工兵部队,陆续调往奠边府周围。与此同时,人民军308师继续按照原定计划分两路向老挝南乌江及其以西地区进攻,十多天内歼敌五营,控制了南乌江流域全部地区,逼近琅勃拉邦。人民军西北部队148团则进军丰沙里,于1954年2月中旬全部解放了丰沙里省。同时开赴下寮的人民军101团先遣营向芒买省会发起了攻击,歼敌一营并占领阿速坡。然后在101团部和另一营的支持下迅速南下,解放了包括云晒、暹邦在内的高棉东北部地区,与下寮新解放区连成一片。而5联区人民军则解放了昆嵩市,全歼西原北部之敌,然后继续南下,逼近19号公路,迫使法军停止对富安地区的进攻,急调兵力加强波莱古市和西原南部的据点。法国之所以在柏林外长会议上同意召开日内瓦会议讨论印度支那停战问题,与其在印支战争中此时的被动形势不无关联。事实上,到2月中旬,人民军向上、中、下寮和西原北部的攻势都获得了很大成功,基本上实现了预定的打通印度支那南北战略交通线的计划,并控制了越南通向老挝和柬埔寨的6、7、8、9、12、19号六条东西向公路,法军在

^①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55—356页;参见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第二部:舌战日内瓦),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7—11页。

^②即老挝。

^③即柬埔寨。



越南军队庆祝奠边府战役胜利

印度支那的战略交通线大多都被切断。这样一来,其在奠边府投入的大量兵力,就不可避免地成了瓮中之鳖。

积极的打是为了争取和。越是临近日内瓦会议召开的日期,中共中央就越是主张要打得狠一些。“以打促和”方针的就是在这样一种形势下提出来的。^①在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确定之后,周恩来就专门打电报给这时在越南的中国军事顾问团,要求顾问团和人民军在日内瓦会议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前,“为了争取外交上的主动,能否与朝鲜停战前一

^①参见徐焰:《试论建国后毛泽东的战备思想》,《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3—244页。

样,在越南组织打几个漂亮的胜仗”^①。实施奠边府战役的问题于是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对此,越南党部分军事领导人对马上发动这样大规模的战役行动没有把握,态度犹豫,中共中央则明确主张一定要拿下奠边府。他们的意见是,目前情况下争取停战与和平是完全可能的,但“就此停战或先停战后谈判的方案均对我不利”,因为“如要停战,最好有一条比较固定的界线,能够保持一块比较完整的地区”,而这条界线也是“越往南划越好”。故越南党目前的“主要力量仍应放在指挥作战与发动群众”方面,“以打促和”,争取达成我所期望的划界结果。^②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国军事顾问团的说明的理由,越南党中央最终作出了围歼奠边府之敌的战役决定。

奠边府战役对于在日内瓦会议上取得外交的主动权,迫使法国政府同意划界停战,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越南人民军于3月13日正式打响了战役。战役的最初进展也相当顺利,人民军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建议,对法军实行了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法,势头很好。进入到3月底,人民军集中了308、312、316三个师和全部炮火攻击法军指挥机关所在地的芒清中心分区东面各高地及机场北面之敌,力图紧缩包围,控制机场,断敌空运,战斗进入纵深后却遇到挫折,形成了僵持,缺少大兵团作战经验的人民军官兵的作战情绪受到严重影响。不得已,中共中央军委急调工兵干部赶赴奠边府前线,帮助人民军部队挖暗壕通向敌据点的坑道,准备用炸药将其炸毁。与此同时,还增援了一个火箭炮团共24个炮营,以及派出大批汽车帮助运送弹药、器材和粮食,顾问团则指导人民军在奠边府周围修筑了大量工事。毛泽东这时对奠边府战役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不仅明确主张帮助越南人民军把奠边府拿下来,而且坚持要打痛法国人,直至拿下整个印度支那。他特别指示为越南人民军立即再组建4个炮兵团和2个工兵团,教员和顾问全部从入朝参战的中国炮兵部队中出,火炮不够就从中国炮兵部队中抽,装备和训练可以在越南北部进行,如果不方便就在中国广西进行。他甚至相信,根本的解决恐怕还必须要靠打仗,非打痛法国人不能解决问题。因此,在他看来,越南人民军不仅必须准备拿下奠边府,迅速

^①《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第88—99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58页。

^②参见郭明:《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8页。

占领老挝琅勃拉邦,而且要准备日内瓦会议没有结果,最迟于1954年冬1955年春夺取河内,之后好进攻西贡,解放整个印度支那。^①据此,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军事顾问团团团长韦国清,要求越南人民军必须不惜代价把奠边府打下来,同时具体指示了作战要领,特别强调要充分利用炮兵,很好地组织炮火,对敌据点应集中炮火分段分点逐渐摧毁之,打下一点后,迅即改造工事巩固一点,尔后逐段发展,紧缩包围。电报明确讲:一定不要吝惜炮弹,我们会及时补充。^②

4月1日,周恩来与胡志明、范文同等已经飞往莫斯科,会同苏联和朝鲜党的领导人磋商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方针、政策和谈判方案等问题,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全力争取印度支那实现停战的目标。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3月29日和4月5日就印度支那战争形势发出公开威胁,宣称至少已经有两千名中国共产党人在为胡志明提供军事方面和技术方面的指导。“在今天的情况下,共产党俄国和它的盟国共产党中国在政治体制上对东南亚施加的影响,不管它们采用的是哪一种手段,对整个自由世界来说都将是一种严重的威胁。美国认为不能消极地来承认这种可能性,而是应该采用联合行动来对付它。”杜勒斯为此甚至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建议,主张像朝鲜战争那样再度实行联合武装干涉,即使冒与中国再度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也要阻止“共产党俄国及其同盟者中国共产党把它们的政治制度强加给东南亚”,艾森豪威尔批准了杜勒斯这一建议。这一建议中包含着必要时轰炸中国华南地区重要军事基地和通往越南的运输线等极其严重的军事步骤。^③杜勒斯的这一方案,只是因为遭到其主要盟国英国的反对而被拖延了下来。但美国仍旧加紧了介入印支战争的步伐。美国这时紧急增援法军100架轰炸机和战斗机、50架运输机,并借给法国29架配有飞行员的C-119型运输机。美还派出两艘航空母舰进入北部湾进行登陆演习,并准备派遣B-29战略轰炸机大规模轰炸围攻奠边府的人民军。

中国政府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一情况。在周恩来被任命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的当天,即4月19日,他又一次接见了印

^①参见《毛泽东致彭德怀信》,1954年4月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474—475页。

^②参见《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第101页。

^③参见前引《国际事务概览,1954》,第35、37、39页。

度大使,告诉他说:美国意在取英国的殖民帝国而代之,因此,它极力想在亚洲保持紧张局势。朝鲜打不起来了,“它必须另外找一个有热战的地方,那就是印度支那”。现在美国极力阻挠在印度支那实现停火,要告诉英法等西方国家,他们面临着两条任选其一的道路,要么搞好和亚洲人民的关系,从而保存他们的一部分利益,要么拒绝这条道路,选择同美国一起走的道路,从而就会失掉一切。“中国代表团将尽一切努力设法达成协议,特别是就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达成协议。”^①

美国卷入战争危险的加剧显然也促使毛泽东注意保持谨慎态度和重新评价停战和谈的意义。他很快开始告诉军委领导人:估计越南有停战可能,前议方针停止实行,新建炮兵训练亦不宜在中国境内。此后,包括在奠边府战役大胜法军,进攻老挝和河内的大门已经打开之后,毛泽东也仍旧要求前方控制作战规模,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只保持适当压力,以争取日内瓦谈判取得成功。^②这反映出一向更看重武装斗争的毛泽东,也已倾向于支持党内多数领导人的意见,赞同通过妥协的办法来争取在印度支那实现停战与和平了。

3. 促成印支停战

中、越、苏三国领导人在莫斯科商讨日内瓦会议谈判方针时,奠边府战役刚刚开始不久,战争形势虽然明显地对越南党有利,但在中苏两党的多数领导人看来,这种战争形势并不意味着越南人有可能把法国人很快赶出印度支那。这不仅因为法军仍旧占据着沿海地区和各大城市,控制着将近一半的人口,尤其是因为美国人正跃跃欲试地想要进行干涉。在有了朝鲜战争的经验之后,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明显地不愿意在印度支那重现朝鲜战争那一幕。因此,当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基本方针确定之后,周恩来很快就致电胡志明和越南劳动党中央,建议越南党立即进行准备工作,组织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并拟订谈判的各种方案。正是周恩来再三主张,应当准备像朝鲜那样划定一条停火

^①《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360—361页。

^②参见《毛泽东致黄(克诚)、粟(裕)电》,1954年4月17日;《中央致广西省委转周恩来同志电》,1954年6月2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卷,第480、509页。

线,越往南越好,当然也要让敌方能够接受,最后成为将来的分界线,使自己能够保持一块比较完整的地区。^①对此,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三度开会研究,然而他们的看法多少与中共中央的看法存在着差异。除了不愿意看到一个分裂的越南以外,最重要的是越南独立同盟这时在越南北部、中部和南部都取得了不少根据地,它在将近 3/4 的地区已可以行使政权,敌人只占领着大城市、港口、主要交通线和重要的经济区域,划界停战将会迫使南部甚至中部地区的许多根据地被迫放弃,大批人民军和党的干部被迫北撤,这对于党内那些来自要撤退地区的领导干部来说是很难接受的。因此,尽管中、越、苏三党会议确定了谈判方针,越南党中央决定派范文同副总理代理外交部长出席日内瓦会议,原则上也同意接受东西划线南北分界实现停战的建议,但其中央内部的意见实际上并未完全统一。

5月7日,越南人民军利用强大的炮火和坑道炸药,彻底摧毁了法军防守奠边府的核心阵地,迫使法军投降,从而取得了奠边府大捷。此役歼灭法军 1.6 万人,俘虏 1 万人,生擒了法守军司令德卡斯特里准将。奠边府大捷之后,本来就对划界停战主张持怀疑态度的越南谈判代表范文同,转而相信战场形势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认为原来东西划线南北分界的方案应当改变,不如要求就地停战,稍加调整,等待普选,以便一举统一越南。与此同时,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根据越方介绍的情况商定的坚持越、老、柬三位一体一并解决,以便建立革命的印度支那联邦的设想,在谈判中也成为难以克服的和平障碍。范文同坚持印度支那三个国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应有一个完整的解决办法。^②而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与法、英两国代表以及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的代表进行外交接触的结果,却发现作为法国殖民地的印度支那联邦中的三国,在历史上其实曾经是不同的国家。战后三国事实上都已各自独立,老挝王国和柬埔寨王国已得到了世界上 30 多个国家政府的承认,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否认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只承认由越南支持的寮国与高棉的抗战政府,不接受法、英提出的印支三国问题必须分开解决的提议,是非常困难的。其实就连范文同自己也清楚三国情况差别很大,越南可以划界,柬埔寨完全没有划界的可能,在老挝要

^①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 358 页。

^②参见郭明前引书,第 49 页。



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与法国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会晤

求划界也缺少足够的资本。特别是在柬埔寨和老挝,抵抗力量的主力都是越南人民军。^①但承认分开解决,越南军队也就成了外国军队,必须撤出。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不仅南越暂时要被放弃,老、柬两国也势必会落入王国政府的控制之下。这与越南党以及寮国、高棉抵抗力量原先的设想实在相差太远。

围绕着这样一些问题,日内瓦会议期间各方发生了激烈的争

^①老挝这时有政府军2万人,寮国抵抗力量只有0.4万人,另外1.4万人是越南人民军的部队;柬埔寨政府军有1.5万人,而高棉抵抗力量则只有0.3万人,其中三分之一还是越南人民军的部队。

执。注意到越南党的方案不可能为对方所接受,美国代表力图利用这种争执而使会议无法达成和平结果,周恩来在与苏、越两国代表团协商后,于5月27日明确提出停火问题可以根据三国不同情况分别处理。此一建议推动会议于29日达成了三国完全同时停火协议,这是自谈判以来的第一个实质性的协议。30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强调了作出这一让步的必要性。他在电报中说:“印度支那三个成员国的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是非常显明而严格的。这种界限在法国建立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以前就已经存在,而且在三国人民当中也是如此看待的。”“柬埔寨、老挝两个王国政府在大多数人民看来仍然是合法的政府,并且是被世界上三十多个国家承认的政府。”因此,对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必须严格地以三个国家来对待”。他提请中共中央对这一点加以认真考虑,如同意即请电商越南劳动党中央。^①

中共中央很快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并取得了越南党中央的认可。在这个时候,法国以往主战的拉尼埃政府倒台,日内瓦谈判明显地受到影响。由于受到美国代表的鼓动,西方国家于6月15日中断了关于朝鲜问题的会议。而在老、柬问题的谈判中由于中、苏、越三方坚持不承认越盟的军队进入了这两个国家,谈判也陷于僵持状态,第二天也面临着西方国家终止关于印度支那问题会议的严峻局面。据此,中、苏、越三方代表于15日晚进行了紧急的内部磋商。周恩来直截了当地提出:目前谈判的关键问题是我方是否承认越军在高棉和寮国。如我坚决不承认,则高、寮问题无法谈下去,越南问题也将受牵连而谈不下去。所以应当承认过去有越南志愿军在高、寮作战,但有的已经撤出,如果还有,可以按照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办法办理。与此同时,越、老、柬三国问题应分别解决,应当考虑在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上作出让步。因为,我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力量过于薄弱,靠越南的力量在这两个国家打下去只能使现在的王国政府完全倒向美国,甚至促使美英搞东南亚条约,把美英等搞到一块去,不如使它们成为东南亚型的中立国家。^②次日,根据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周恩来通过

^① 参见《周恩来致毛泽东、刘少奇并报中央电》,1954年5月30日,参见《周恩来传》(三),第1126—1127页。

^② 参见曲星:《试论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的周恩来外交》,《研究周恩来——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57、264、266页。

会见会议两主席之一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和在限制性会议上发言,明确表示愿意就此作出让步。此举成功地挫败了美国代表准备中断关于印度支那问题讨论的企图,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终于出现了一线曙光。^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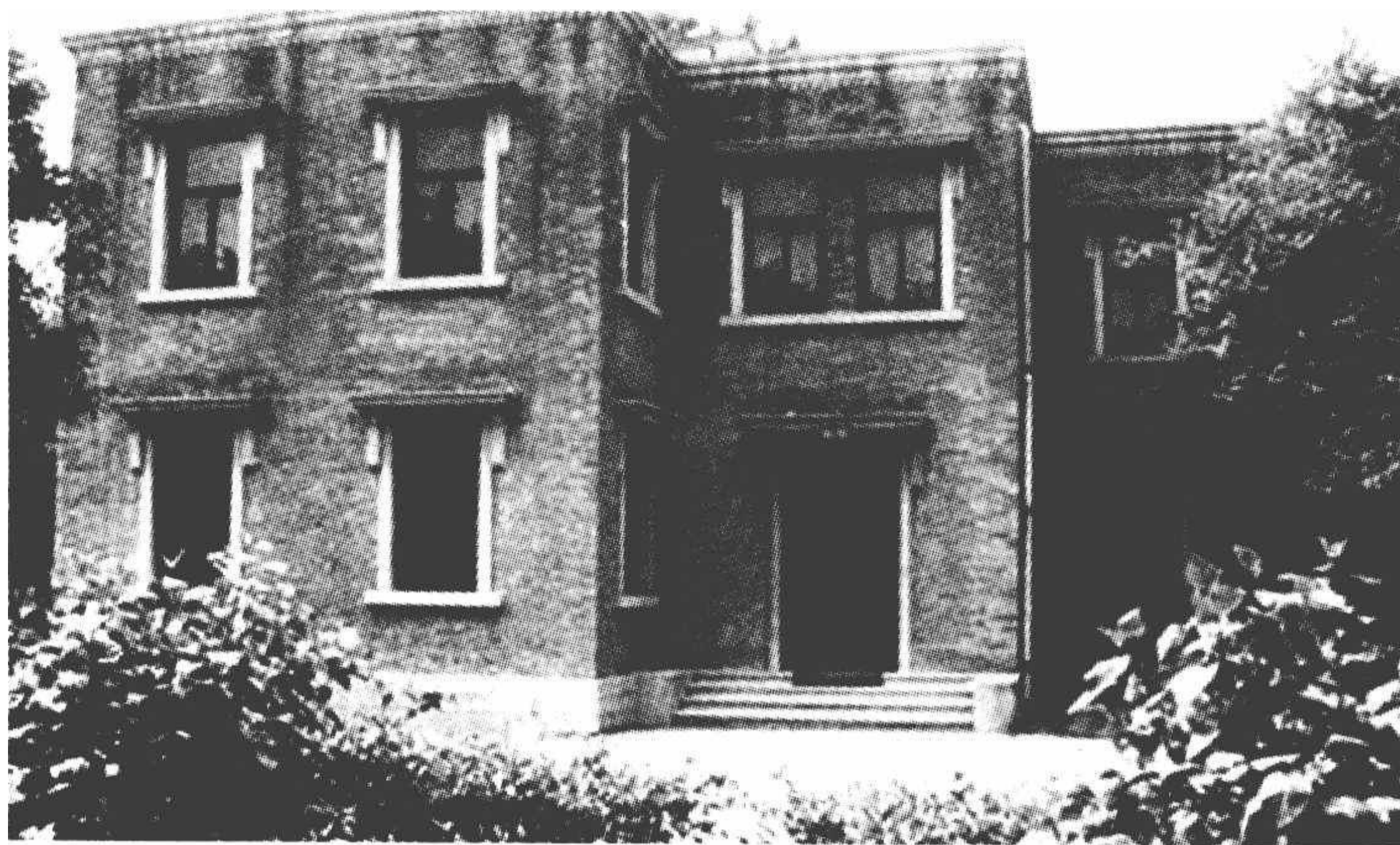
印支三国分开处理的问题解决后,如何实现停战的问题就迅速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了统一思想与谈判方针,中、苏、越三方代表于6月17日召开了专门会议,讨论越南劳动党中央13日来电提出的划区方案。但范文同对周恩来所提以越南为争取重点,而在高棉、寮国酌情让步,如高棉不划区,寮国只划边区的建议难以认同。周恩来随后致电毛泽东、刘少奇解释说,他的建议是基于三国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越南各方面的力量较强,不但可以保得住,而且能够逐渐巩固和扩大影响”。如果我们在高棉和寮国问题上作出让步,则越南就可以多要一些,求得补偿。问题是范文同甚至越南党中央对形势的估计都过于乐观,要价过高。特别是法国孟戴斯-弗朗斯内阁上台,于6月17日公开许诺以一月为期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否则自动辞职,这更是使越南党感到有坚持到底迫使法国政府让步的可能。在他们看来,着急的应该是法国人,而不应当是他们。据此,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在日内瓦会议外长不在期间,有必要于访印(度)后返国途中去广西、南宁一行,请越劳党中央的负责同志多来几位。由我向他们报告情况,说明重点划区的方针。目前形势是:如我能在军事会谈中提出合理的具体方案,即可争取与法国迅速解决问题,达成停战。这样既可推动法国新政府抵抗美国干涉。这对东西方都是有利的。所有这些关键性问题必须说清楚。这种看法妥否,请中央指示。”^②

中共中央很重视周恩来的建议,除迅速通知了越南劳动党中央以外,特别电示广西省委第一书记兼代主席陈漫院负责在广西布置会场,要求会场所在地要离边境不远,交通方便,并要严格保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还召集会议专门讨论了印度支那问题,并给周以进一步的指示。

7月2日,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之后赶往广西柳州参加预定的中越两党会谈。会谈3日开始5日结束,3天里共开了8次会议。根据武元甲的报告,奠

^①16日下午的限制性会议就柬埔寨和老挝停止敌对行动问题达成了进一步谈判的协议。参见李连庆前引书,第277—281页;《周恩来传》(三),1128页。

^②《周恩来致毛泽东、刘少奇并中共中央电》,1954年6月19日。



1954年7月3日至5日,周恩来与胡志明等在广西柳州举行会谈旧址

边府战役以后,形势对越南极为有利。敌军虽仍有47万人之多,但包括法军在内的远征军仅19万,24万是越南伪军,老挝军仅2万人左右,高棉军仅1.5万人左右。印度支那抗法力量已达到30多万人。敌军力量主要在越南,有40万左右,越北有18万,五联区有8万,南部12万均系伪军,而越南人民军则为28万,主要集中在五联区和中北部,实际力量对比强于敌人。

在听取了武元甲的报告后,周恩来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美国不干涉,法国照样增加兵力的情况打下去,我们多久才能取得整个印度支那?”武元甲表示,打得好,两三年就可以拿下。胡志明则表示“时间至少是三五年”。他承认:三个国家有不同的情况。越南先有党后有游击队,是慢慢地发展起来的。老挝和柬埔寨则无党的基础,干部也困难。老挝和柬埔寨的干部实际是越南人。而我们在那里的干部也不多,语言风俗也不同,当地干部的经验就少多了。另外,即使在越南,也是越北的情况较好,中越较南越要好,而我在南越的力量较差。同

时,目前我能够控制的地区也还不完整,由越北运东西至中越就需要三个月的时间,这样还常常有损失。武元甲以及中国顾问韦国清、罗贵波等也都强调交通是大问题,如果要打仗的话,还要首先花时间把公路修起来,否则困难更大。

据此,周恩来进一步增强了要说服越南党的信心。他指出:应当看到,印度支那问题不仅是印支三国与法国之间的问题了,它已经国际化,这是关键性的特点。这种国际化甚至超过了朝鲜问题国际化的范围和程度。在朝鲜,敌方有16个国家以联合国的名义参战,我方虽然只有中国一国出了志愿军,苏联没有卷入,但如果再往前一步,就会成为世界大战。之所以没有发生世界大战,是因为美苏两国都想把战争局部化。印度支那的问题也是如此,它影响着整个东南亚,影响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巴基斯坦、印度等许多国家。对澳洲、新西兰、锡兰、菲律宾也有影响,因此毛主席说:“稍一不慎,则影响10个国家近6亿人口。”实际上,由于印支问题直接影响了法国,因而也就随着影响了欧洲的形势。日内瓦会议导致法国改组内阁,好战的拉尼埃政府下台,主和的孟戴斯-弗朗斯政府上台,这足以说明印度支那战争对法国在欧洲的地位和其国内矛盾的影响巨大。同法国和下来,不仅能够挫败美国的阴谋,而且也能够团结更多的国家。为了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苏联就想要争取法国。

他同时解释说,大家都清楚,即使美国不干涉,解放全越南至少也需要三年时间。何况美国在干涉方面已经动员了半年。现在吴庭艳上了台,更值得注意。因为其言论表现完全亲美,实际是美国在指挥一切,因此美国帮助南越伪政权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我们所提方案要求过高,不能达成和平,美国势必会干涉。朝鲜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美国的增援,其增援速度之迅速,出乎意外。中国加上去,也只能打个平手,不能取胜。如果仅仅是李承晚那就好办了,没有美国的增援,李承晚早就被赶下海去了。现在印度支那又是这样一种情况。一旦美国卷进来,我们靠军事手段拿不到越南,条件只会更困难,甚至连现有的局面都可能保不住。考虑到这些情况,恐怕还是用和平的方法取得全越南好些。和平取得全越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现在看,印度、缅甸、印尼这些国家也不反对将来由越南民主共和国来统一越南。所以,在越南举行选举的可能性比朝鲜还要多些。当然,何时可以取得,需要时间和步骤。首先就需要印度支那三国把关系搞好,需要和东南亚各国把关系搞好。而要团结争取这些国家,都是和下来好。因为只有和平才能团结老挝和柬埔寨,战争只会使它们投向美国;只有和

平才可分化法美和英美,战争只会使法国强硬派重新上台,并把英美推到一起去,搞东南亚条约组织;同样如果和下来,南越伪政权也不会很快和美国联起手来,甚至有赶走吴庭艳的可能。总之,只要和下来,就可以孤立美国,壮大自己,最终达到统一越南的目的。

周恩来告诉与会者说,中国党已经与苏联党取得了一致,苏共中央也相信实现印度支那和平是当前最好的前途。莫洛托夫同志的意见是红河三角洲完全可以要到,并认为这是争取的重点。对老挝,他的意思是只要东北一块地区即可。柬埔寨则由本地解决。最主要点是在越南,因为如此划界可以成一局面,进退自如。我个人看法也是如此。美国一旦干涉,很可能是专门侵略越南,而不侵略中国。所以不如和平取得越南好。目前看,争取十六度线以北地区是有把握的,万一不成还可以考虑划在九号公路,即划在十七度线附近。

周恩来的发言从3日下午、晚上,一直继续到4日下午。4日下午周发言结束后,胡志明当场表了态。他说:现在越南是站在十字路口上,可能和,也可能战,主要方面是争取和,准备战。我们要帮助孟戴斯-弗朗斯,使他不下台,这对我们有利。在11月份以前,必须和法国搞好关系,取得和平,因为11月以前美国要选举,对干涉有顾虑,11月以后就不保险了。

胡志明的话等于做了结论,与会者一致表示赞成。当晚,中越双方有关人员连夜准备文件,第二天大家逐条讨论修改,很快通过了《关于日内瓦会议的方案和谈判问题》的会议文件。文件规定:我们应主动争取印度支那三国的停战具体化,首先是在越南的划区问题上,其次是在老挝抗战部队的集结区问题和柬埔寨停战的一般问题争取达成协议。周恩来最后强调指出:制止美国的干涉是我们力主和平的关键。但“经过选举,达成统一”是完全可能的。一定要让干部了解:第一,要干部努力工作才能争取到选举的胜利。第二,要形成选举运动,争取非选举不可。越南的特点是无论英、法和伪政权都不敢反对统一,这一点越南的条件比朝鲜、德国都好。^①

7月5日,越南党中央将会议确定的谈判方针和划区方案通知了留在日内瓦的范文同。通知强调,目前谈判的指导思想是采取积极推动的方针,不宜消极等待。具体方案是:在越南仍争取以十六度线停战,考虑到十六度线以北的

^①参见《柳州中越会议记录》,1954年7月3—5日,转见《周恩来传》(三),第1130—1131页。

九号公路是老挝出海必经之地,对方可能不会让步,故可在十六度线的基础上略作调整;在老挝则争取把靠近中国和越南的桑怒和丰沙里两省划为抵抗力量的集结区;在柬埔寨则只能争取政治解决。但范文同对有无必要做如此让步表示怀疑。直到12日周恩来返回日内瓦,他始终犹豫不决,没有采取措施去推动谈判。

眼看距离孟戴斯-弗朗斯承诺实现和平的最后期限只剩几天时间,周恩来一回到日内瓦,当晚就同范文同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周恩来以朝鲜战争忽略了美国干涉危险的教训和抗战后中共以退为进取得成功经验为例子,反复劝说,最终使范文同改变了态度。第二天,周恩来和范文同分别向法国代表提出了以北纬十六度线作为临时分界线的新方案。经过讨价还价,双方随后又各作让步,法国放弃了以十八度线划界的要求,越南放弃了以十六度线划界的要求,商定以十七度线以南、九号公路以北十二又二分之一英里处为军事分界线,达成了最终的妥协。

7月21日,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实现停止敌对行动的和平协议正式签字。这几项协议除了规定了分界线以外,还就国际监督、法军南撤和越南人民军北撤、两年后在全越南范围内举行普选、老挝抵抗部队可在桑怒、丰沙里两省集结、柬埔寨抵抗部队复员遣散,以及老、柬一年后实行大选等问题作出了相应的规定。^①中国政府在日内瓦会议上争取印度支那和平的努力至此算是按照预期的目标取得了成功。

4. 中越分歧的初现

从积极援助印度支那武装抗法,到全力促成日内瓦的和平协议,新中国对印度支那政策发生了重大的改变。这一政策变动的意义如何,从日内瓦会议期间直到今天都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估计当时的战争形势,即如果越南抵抗力量坚持打下去,美国是否一定会像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估计的那样进行武装干涉?几十年过去之后,研究美国已经公开的

^①参见《日内瓦会议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第260—269页;《新华月报》,1954年第8期。

各种档案资料,考察美国后来卷入印度支那战争的历史,似乎还是不能完全否认当时存在着这种可能。换言之,拒绝和平与妥协,仍旧带有某种冒险性。即使越南党不需要三五年时间就可以实现统一,军事进攻可能带来的危险仍旧是多方面的。正如周恩来所担心的那样,这种军事进攻很可能会使老挝、柬埔寨投向美国,会使整个东南亚转向反共,会使本来与美国存在矛盾的法国和英国在亚洲问题上被迫赞同美国的主张,会使美国阻挠和平的阴谋得逞,等等。出现这些情况的结果可能还是一样:或者是一个主战的法国政府和南越政权,或者是老挝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向美国求援,美国最终还是借机进行军事干涉。一旦出现这种结果,越盟所要面对敌人多半就更多了。

关于美国干涉可能以及越南党能否迅速实现统一的争论,很容易让人想起朝鲜战争。周恩来之所以特别以朝鲜战争为例强调对美国干涉要有足够的估计,正是因为当年也曾经出现过几乎同样的情况。由于最初对战争的进展过于乐观,没有预料到美国会如此之快地进行干涉,结果导致了军事上的严重后果。即使后来中国出兵保住了北朝鲜,也只能和美国打一个平手。何况朝鲜还为此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中国也因此付出了重大的牺牲。越南党这时严格说来还不如当年的朝鲜党有把握。朝鲜战争当时是以周计,这时越南党的军事统一时间表则须以年计,在这样长的时间里各种变数之多更是难以预测。^①说美国一定不会干涉,无论如何都缺少足够的依据。

只要存在着美国干涉的可能,对于尚未得到国际承认的越南独立同盟来说,签订日内瓦和平协定就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经历了三个月之久的漫长谈判达成的这个协定,使越南党得以完全控制北纬十七度线以北的越南1200万人口和土地,“越南民主共和国”从此也成了一个得到国际公认的名副其实的国家。美国不仅没有找到可以直接对越盟进行大规模军事进攻的理由,而且即使在60年代中后期美国直接出兵南越,并且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了野蛮的轰炸,它也不能不考虑到国际公认的这一事实,因而对其军事行动始终保持着一定的限制,即不让其军队跨过十七度线。这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存和巩固了越南党已有的胜利成果。虽然,从政治的角度,协定并没有促成实现普选

^①有关朝鲜战争爆发前对美国干涉的估计问题,可参见青石:《1950年解放台湾计划搁浅幕后》,《百年潮》,1997年第1期。

和统一,但美国特别是腐败的南越政权阻挠普选与统一,却为几年后共产党人重新在南方开展武装斗争提供了足以让世界大多数人同情的理由。而由于北方的巩固与建设,此后的印度支那战争无论如何艰苦,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存在毕竟使它有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前进基地和可靠后方。只要把一个分裂的朝鲜与一个最终取得统一的越南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坚持进攻未必就是有利的。越南党暂时的让步与放弃,结果反而是便利了后来的进攻与统一。

当然,对于新中国而言,它对印度支那的政策转变中仍旧存在着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这里面尤其需要检讨的问题,就是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的关系问题。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背景,任何一个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都难免会掺杂进执政党本身的意识形态因素,从而使其政策带有某种政治倾向性。但是,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目标,与现实政策作为一种追求实际利益的方式和手段之间,毕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把两者混淆起来,或者在政策考虑中过多地加入意识形态的因素,势必会造成政策功能的紊乱。如果说,一个强势政府在国内政策制定过程中较多地加入意识形态的考虑,通常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感觉到其副作用,并且这种副作用通常也更多地表现在政策层面上的话,那么一个弱国在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过多地加入意识形态的考虑,它所带来的副作用往往很快就会显露出来,并且难免还会引来道德层面的问题。这是因为,国内政策所面对的只是在一个利益统一体内的不同利益关系,而对外政策所面对的却是有着各自利益的主权国家。前者只要政府处于强势状态,目标与手段的混淆可能极大地改变现实的利益关系,但它们对统一体本身的影响却是相对缓慢的,对不同利益关系的这种改变可能带来的道德问题也很容易湮没在强势文化的政治背景之中。后者却完全不同。由于事实上不存在利益统一体,把不同利益主体相互间的联系通过意识形态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必定会带来道德层面的问题,即当出现不同的利益需求时,为自身的利益考虑是否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

可以清楚地看到,周恩来等提出划界停战的和平主张时,首先就面临着这样一种道德困惑。在柳州会议上周恩来就特别着重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即在印度支那寻求和平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任务是否有矛盾?之所以会提出这个问题,正是因为意识形态优先的思维方式与以现实利益为中心的政策考虑之间发生了矛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任务是解放印度支那,而寻求和

平将使这场解放战争半途中停顿下来，并使这一国际任务大打折扣。十分明显，在印度支那改行和平政策直接影响到的首先是越南党的利益，作为履行国际主义一方的中国党，无形中必须承担起此一政策是否与意识形态目标相违背的历史疑问。尽管周恩来再三说明二者之间并无矛盾，强调现实的力量对比，相信老、柬两国最好的前途是保持中立，在越南通过普选实现统一要比通过战争实现统一更现实，如此等等，但只要越南党原定的解放目标被打了折扣，只要事实证明越南的统一仍旧要靠战争来解决，中国党的这次政策转变就难免会成为一个要被越南人提到道德层面上来加以讨论的问题。

其实，存在这样的疑问是很自然的。一个距离我们最近的例子，就是1945年8月抗战结束之际斯大林要求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谈这一事件。比较印度支那三国的解决办法，斯大林当时可能更希望中国能够用老挝那种方式解决问题。他的基本看法也是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和战后要求和平的国际环境，共产党不可能用战争来完成解放国家的任务，它甚至还没有达到可以与国民党划界言和的程度，因此需要转而采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方式。这件事让毛泽东非常生气。而以后的事实也证明，斯大林所设想的和平民主没有出路，共产党仍旧需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因此，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对斯大林这一干预耿耿于怀，并从道德层面上给予严厉的批评，称斯大林此举是“不许革命”。但严格地说，上述两件事是颇为类似的。斯大林也好，周恩来也好，他们未必真的“不许革命”，未必有需要加以检讨的道德层面的问题。导致出现这种疑问的关键，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党人常常难以将意识形态与现实政策严格区别的缘故。

5. 结语

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①的提出，是中国外交政策从突出强调意识形态的“一边倒”，转向较多地考虑国家利益而开始走

^①此一原则初见于周恩来与印度谈判代表团1953年12月31日的谈话，后公开正式表述于日内瓦会议过程中，即周恩来6月下旬休会期间访问印度和缅甸时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参见《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63页。

向务实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标志。在已经习惯于国际主义的思维方式之后,突然把自己一国的利益摆到政策考虑的首要位置上来,甚至以此为转移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一时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困惑与矛盾是可想而知的。让人遗憾的是,周恩来所倡导的这样一种政策转变的趋势并没有能够顺利地发展下去。几年之后,当毛泽东发现苏联“不革命”以后,中国对外政策上的意识形态考虑又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虽然究竟是意识形态的考虑多一点,还是现实利益的考虑多一点,在不同的时期表现有所不同。但受到毛泽东“反帝”“反修”思想影响的中国对外政策越来越表现出“革命外交”的色彩,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甚至明确赞同否定1954年周恩来在日内瓦所做过的和平努力,并不止一次地对自己当年同意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向兄弟党作自我批评。^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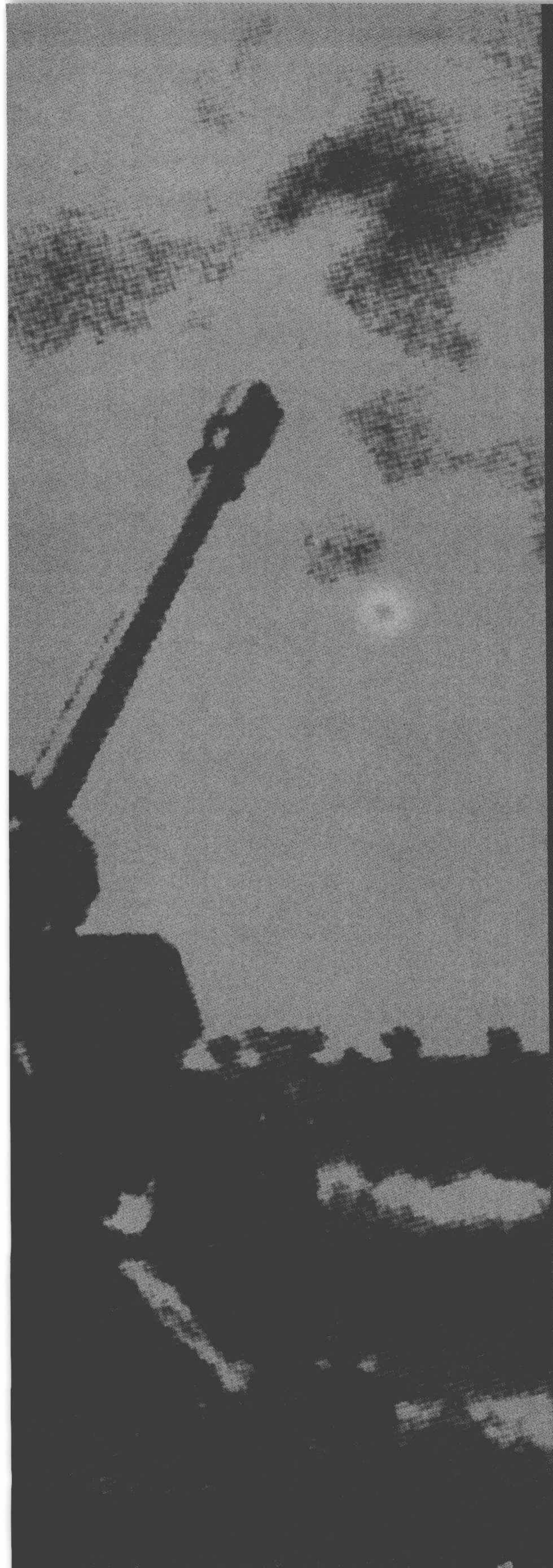
在中国,对外政策重新回到周恩来1954年所倡导的路线上来,即把外交政策同最大限度地谋求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目标联系起来,而不是过多地同意意识形态的目标联系起来,是70年代以后的事情了。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①参见《毛泽东接见越南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3年6月4日。

第六章

两次台海危机的由来及其幕后



引言

新中国与美国的关系，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就纠缠在台湾问题上了。原本只是国共内战延续问题的两岸关系，由于1950年6月27日美国宣布派遣第七舰队介入台湾海峡，并宣称“台湾地位未定”，竟然变成了中美之间的外交问题，甚至成为两国间维护各自利益的一个涉及国家尊严和信用的政治军事问题。

台湾问题对新中国之所以重要，除了几乎所有中国人都确信它是中国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外，还在于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共才能够名正言顺地宣布它完成了祖国的统一大业。毛泽东成就其历史辉煌的最后一步，受阻于美国第七舰队，这无论如何都会成为他的一块心病。1950年以后的中国政府，长期高擎反美大旗，坚持激烈的反帝政策，甚至以此为线来区分敌友，均与此有关。

但是，对于经济及军事实力十分虚弱的新中国来说，解决台湾问题，绝不是轻言一战所能奏效的。尽管新政府从来没有放弃过武力解放台湾的方针与口号，但却深知，以其眼前所能看到的发展能力，要想很快成就跨越台湾海峡的海空作战实力，实非力所能

及。与美国对抗不是最好的办法,急于解决台湾问题的中共领导人,自然会改换手法。对纵横捭阖之术烂熟于心的毛泽东,对此并非毫无认识。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之后,中国政府支持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甚至主动向美国伸出橄榄枝,就反映出毛有心用迂回的战术来解决这一问题。只可惜,在朝鲜战场上吃到苦头的美国人,早已把共产党中国视同洪水猛兽了。对外政策极度僵化的美国当局,反而把新中国的和平外交尝试,看成是中共进一步向外扩张的一种更加危险的策略手法,来加以应对。如此一来,毛泽东力求中美直接对话解决问题的设想,自然无从实现。

其实,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已经使对立的双方都彻底地意识形态化了。结果是每一方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对方妖魔化。尝试对美缓和的失败,反过来只能更加刺激毛泽东。因为具有太强的悲情意识和自卑心理,作为落后国家领导人的毛泽东常常表现得极度自尊。正是这种心理使毛泽东在感受到美国的歧视之后,转而放弃了对美争取缓和的方针,必欲通过制造台海危机和其他紧张局势的方法,来给美国政府制造麻烦,通过迫使美国让步妥协,以赢得其在政治和外交上的尊严与胜利。这种政策上的大起大落,最典型不过地反映出了新中国外交的初期特点。

1. 在和平共处方针提出的背后

中国革命的胜利,最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引以为豪的,就是他们在继承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同时,创造出了一条更适合于落后国家革命的崭新道路。他们开始注意到中国革命经验的特殊意义,是在1943年中共中央领导人公开发表歌颂“毛泽东思想”之际。当经过延安整风之后的这些领导人纷纷发表文章表态拥护毛泽东的绝对领导地位的同时,他们事实上已经开始相信,如果说欧洲国家的革命应当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榜样的话,那么,世界大多数被压迫民族就应当以中国革命为榜样,走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解放道路。^①如今,当他们进一步相信用“小米加步枪”,就彻底战胜了几百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之后,他们自然更加坚定了这种信念。最能够说明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对自己的经验充满自豪感的例子,就是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世界工人理事会亚洲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

刘少奇的这次讲话,就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一个月之后。他依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强调认为:“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基本形式——这就是武装斗争,是人民解放军的战斗行动。”为此,他不顾中国新政府可能受到美、英等大国,特别是周边各国政府反对和抵制的情况,公开“号召亚洲——印度支那国家、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国的工人阶级公开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主张“在已经存在人民解放军的国家要为巩固这些部队而奋斗,而在没有建立这些军队的国家应当为建立这样的军队而奋斗”^②。

毫无疑问,对于那些只有在各国工人当中公开活动,才能确保自己的影响力的亚洲各国工会组织的代表人物来说,刘少奇的这种说法无疑是惊世骇俗

^①参见刘少奇:《清算党内的孟塞维主义思想》;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解放日报》,1943年7月6、8、13日,等。

^②《谢巴耶夫关于亚洲国家工会和妇女大会事宜与刘少奇的会谈备忘录》(1949年12月26日);刘少奇:《在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年11月16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第130—138页。

的。但显而易见的是,就连斯大林这时也坚定地站到了中国人一边。新中国对朝鲜和越南党的军事援助,以及共产党情报局公开批评日共和印共“和平革命”的做法,声称“中国、越南、马来亚和其他国家的例子说明了武装斗争”应当“成为许多殖民地与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形式”^①。以至于不仅日本、印度等国共产党人被迫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而且苏联不惜冒与美国冲突的风险,暗中支持朝鲜党用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满足了毛泽东的自尊心。当朝鲜战争因美国干预而发生危机之际,毛泽东力排众议,出兵援助,与此自然不无关系。

但是,输出革命的做法,并没有给新中国自身带来太多的利益。不仅日本、印度和朝鲜共产党的革命行动相继失利,中国也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介入台湾海峡,意外地丧失了夺取台湾,完成统一大业的重要机遇。新中国固然依靠苏联的援助,在朝鲜战场上成功地挫败了美国人消灭北朝鲜政权的战争计划,但中国与美国之间在实力上的巨大差距也因此暴露无遗。因此,即使是考虑到解决台湾问题的需要,随着1953年在朝鲜实现停战,苏联方面紧接着提出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也很快地调整了自己的外交方针,明确提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②“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

2. 以打促谈的外交尝试

比较1949年和1954年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可以清楚地看出期间的变化。在1949—1950年间,新中国坚决实行“一边倒”政策,鼓动各国共产党人展开武装斗争,出兵朝鲜并援助越南,而从1954年开始,中国政府却出面劝阻越南

^①孙耀文:《共产党情报局——一个特殊的国际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14—321页。

^②毛泽东:《与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四次谈话》,1954年10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4年7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69—370、334页。

党不要再坚持武装斗争的方针,要求马来亚共产党改取和平道路,甚至解散了在国外华侨中的华人共产党组织,向周边国家政府建议和平共处,并公开保证不支持这些国家内部的革命运动。不难看出,新中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调整。为了推动和平共处外交方针的全面实施,毛泽东本人这时也利用各种外事场合,反复宣传中国这一新的外交政策。

但是,另一方面,毛泽东并没有放弃他固有的革命理念和成功的革命经验。面对50年代初武装革命浪潮的低落,毛泽东并不像苏共领导人那样悲观。因为他更多地看到的,是中国出兵把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军队挡在了三八线以南,保住了北朝鲜;是中国为越南人民军装备部队,提供后勤,派遣军事顾问,实行的抗法援越战争,在军事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他看来,朝鲜和越南党的存在与巩固都表明,中国革命的经验并没有过时,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仍然有其旺盛的生命力。因此,尽管毛泽东这时积极配合国务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宣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他同时却依旧相信“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观点并没有过时。

1954年8月,即在毛泽东刚刚批准了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和平努力之后,他意外地收到了中央宣传部上报的一份材料,其中附有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英译本问题的一封信和中央宣传部对波立特来信的答复。波立特来信提出:英共编译《毛泽东选集》的小组认为有必要删去选集第二卷中《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段话,而他相信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假使我们发表了这一切,就会给我们在美国的同志招致很多困难,而且因为这一切也不符合一九五一年二月出版的我们的纲领——《英国到社会主义之路》,对于若干公式经过极端认真的考虑之后,纲领认为,鉴于变化了的国际形势,苏联夺取政权的方式并不适用于英国。”波立特提到的这两段话,前者是毛泽东所认定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即“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后者是毛泽东引为自豪的中国革命的独特经验,即中国革命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不需要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来教育工人和准备武装起义,不需要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先城市后乡村地来夺取政权,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其夺取政权的方式,则是先农村而后城市。显而易见,中宣部的领导人受到缓和政策与和平共处方针的影响,误以为可以在

这个问题上作出妥协,因此复信对英共的顾虑表示了理解和同意。但毛泽东见到报告后马上表示了不满。他特别批示道:“中宣部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同意英国党的错误提议。”他同时特别把这一批示转送给刘少奇等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一阅,以提醒他们这个问题的重要性。^①

上面的情况说明,一方面,中共是一个革命党,它有着强烈的革命信念和引以为自豪的革命经验;另一方面,中共又已经是一个执政党,它必须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努力谋求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确保自己国内政策能够成功实施和国家经济建设得到稳步发展,这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确是一个摆在它面前的两难的课题。十分明显,至少在毛泽东这里,认可苏联党和平共处的提议,赞同用妥协和缓和的方法解决国家关系的问题,为此不惜暂时放弃自己的理想,甚至暂时牺牲掉一些小党的利益,说到底还是基于整个斗争形势的状况和现实力量对比的考量,是为了满足眼前的国家利益需要的一种政策选择。

和平共处的方针在1954年正式提出之后,在外交上很快就给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周边国家政府的疑惧心理明显地减少了,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迅速增加,对外贸易的开展变得容易了,中国政府的代表开始出现在亚非各国的会议当中,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和封锁的政策开始被冲破了。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也不能根本改变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敌视态度。美国继续支持在台湾的蒋政权,继续反对新中国政府取代国民党政府进入联合国,继续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尤其是美国坚持台湾地位未定,必欲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台湾的军事行动,使共产党人无法最终完成国家统一的大目标,这不能不极大地刺激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共产党的领导人。^②他们不止一次地讲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不提出解放台湾,保持不了祖国的完整版图,我们就会犯错误,也对不起自己的祖先。”^③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仅仅从国家利益的

^①参见毛泽东:《关于不同意英译本〈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所作删节的批语》,1954年8月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530—532页;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6日,《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29—532页。

^②按照毛泽东原来的计划,至少在1951年前后就应该可以解决台湾问题了。让中共领导人没有想到的是,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马上就宣布“台湾地位未定”,并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从而不仅危及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地位,而且把退到台湾岛去的蒋介石政府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

^③转引自《周恩来外交文选》,第84页。

角度,新中国政府想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而它与美国政府之间事实上也很难真正做到和平共处。

考虑到新中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几乎没有与美国军队在海上作战的可能性,因此,从解放台湾,彻底消灭国民党政权,达成统一中国版图的现实需要出发,中国政府在推行和平共处政策之初,自然不会不设想与美国达成缓和与和解的可能性。达成这种缓和有两种途径,其一是通过向亚洲周边国家和全世界宣传中国和平共处的方针,使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不能得逞。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人)的目的”。他特别解释过他的这一看法,说他之所以在1954年下半年以后开始积极赞成,甚至对周边国家领导人公开宣传和平共处的方针,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发现,在日内瓦会议上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即所谓:“现在英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各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都是不喜欢美国的,所以,这个局势很有希望。”中国短时期内不可能冒着同美国作战的风险来解放台湾,却未必不能通过外交的手段最终迫使美国认识到武装保护台湾得不偿失,从而自动地把第七舰队撤出台湾海峡。尽管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可能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但他至少注意到,只要能把美国孤立起来,美国自己内部也一定会发生分裂的。因而他深信:“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①的。

其二,利用各种国际场合,主动向美国示以善意,争取实现两国之间的外交接触,逐步打破美国不承认新中国政府的僵化政策。显然是出于这样一种目的,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主动向美国代表示好,争取与美国政府开始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展开交涉,以求达到逐步建立直接外交接触渠道的目的。但是,这一努力明显地未能取得成功。当毛泽东得知美国代表始终充满敌意,甚至拒绝与周恩来握手的消息之后,他很快就开始担心中国的这一主动,会不会被美国人误以为是一种示弱的表示。只用了三年左右时间就打败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和在朝鲜战场上同美国直接交手的经历,都使他在对美国的问题上保持着相当强的民族自尊心。他明确认为不该采取这样的行动。他后来解释说:我当时指示在日内瓦会议上和美国人接触,这与我自已一

^①《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33—334页。

贯的想法并不一致,看来还是原来的想法好,即坚持和美国斗争,不和美国政府发展关系。因为,这涉及中国人是否真正站起来了的民族尊严问题。^①

美国政府对新中国政府的强烈敌视态度,使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对美国绝不能片面地强调和平共处,而必须进行斗争。恰好朝鲜问题和越南问题划界解决的结果,给了毛泽东向美国人宣示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强硬立场的一个机会。本来,周恩来在日内瓦的任务中并没有提出台湾问题的内容,毛泽东却在会议结束之际注意到,除了南北朝鲜、南北越南以外,台海两岸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状态,也是远东重要的战争策源地之一。“现在朝鲜战争停了,印度支那战争停了,剩下下来的就是美国加紧援助台湾进行骚扰性的战争”了,如果我们这时不提出台湾问题,结果难免会造成普遍的理解。人们或者会认为台湾问题已经中立化了,或者会认为中国政府也会愿意仿照朝鲜和越南的办法就台湾问题作出妥协。故毛泽东当即致电还在日内瓦的周恩来,提出:“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②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迅速受命发表社论,再度强硬地宣称:“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休止。”^③8月1日,朱德总司令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上公开告诫说:中国人民要解放台湾,决不容外国来干涉。^④据此,周恩来在从日内瓦回国途中顺访莫斯科时,也不能不向并不愿意看到远东出现新的紧张局面的苏联领导人解释说:中国这样做,实在是别无选择的。因为美国是不会甘心于日内瓦会议的失败的,必将继续执行其制造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扩大军事基础,准备战争和敌视中国的政策。“最近一个时期美国与蒋介石正在商议订立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并且有把封

^①参见《张闻天年谱》,下卷,中央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7—1098页。

^②转引自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337页。

^③《人民日报》(社论),1954年7月23日。

^④参见《人民日报》,1954年8月1日。



1953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会见蒋经国和顾维钧

锁我国的范围扩大到广东沿海及东京湾地区的可能”，因此，“现在我们面前仍然存在一个战争，即对台湾蒋介石匪帮之间的战争，现在我们面前仍然存在一个任务，即解放台湾的任务”。“提出这个任务的作用，不仅在于击破美蒋军事条约，而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警惕性，从而激发人民的热情，以推动国家建设任务的完成，并可以利用这个斗争来加强我们的国防力量，学会海上斗争的本领。”^①

一方面要促进国际缓和，宣传和平共处，一方面却要在台湾海峡保持战争状态，尽管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带有策略的性质，但它无疑造成了某种矛盾的现象。而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并不是不知道国民党

^①转引自曲星：《中国外交5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页。

方面这时正在积极谋求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拖美国人下水。他在批准周恩来赴日内瓦与美国代表进行外交接触之时,就已经明确了要破坏蒋介石政府这一政治图谋的基本方针。^①他讲,我们就是要用与美国谈判美国人最关心的侨民遣返问题作诱饵,促使美国不跟台湾订立共同防御条约。周恩来7月初回国汇报时,毛泽东清楚地谈到了他的这一设想。他说:“我们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条约的可能,还要想一些办法,并且要作宣传。”除了在公开的宣传中骂美国搞“台独”,骂蒋介石卖国以外,外交上尤其要做些工作。比如可以表示愿意在侨民问题上与美国政府进行接触,“以迫使美国跟台湾不要订条约”。否则的话,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一旦签订,中美关系,以及台湾问题的解决,都可能“成为很长时期的僵局”^②。正是为此,直到炮击金门、马祖前夕,周恩来也仍然在强调说:解放台湾固然“要采取军事斗争的方法”,但对美国,只要它还没有直接介入到这场冲突中来,就“要采取外交斗争的方法”,即要离间美蒋关系。^③

通过外交的办法,显示某种善意的和和解的态度,对美国政府这时未必不能发生某些效果。这是因为,美国政府这时对台湾方面要求订立共同防御条约的做法并不感兴趣。还在1953年3月19日,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就受命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Dullers, John F.)正式提出了缔结共同防御条约的建议,希望借此把美军拴在台湾和台湾海峡。对此,杜勒斯当场就表示拒绝。^④此后,台湾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再度多次向美方提出这一要求,直到1954年8月以前,美国方面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尤其是日内瓦会议之后,中国表现出和解的姿态,美国因继续坚持强硬立场的做法倍感孤立,其在台湾问题上不能不更加小心谨慎,不愿意因蒋介石必欲反攻大陆而被拖上国民党的战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继续发动和平攻势,理应使美国更难接受台湾的建议,而未必不能达成破坏台湾很快与美国订立共同防御条约的目的。

毛泽东当然知道在这个时候制造解放台湾的战争空气,会对拖延中的美

^①周恩来6月3日发给毛泽东、刘少奇的电报中特别讲到,中国代表团已经告诉英国方面,愿意经过英国介绍与美国进行直接接触。依照周恩来的行事风格,这种重大外交行动,注定是经过了中共中央同意的。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75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333—334页。

^③参见《周恩来年谱》,上卷,第412页。

^④参见FRUS, 1952—1954, Vol. 14, Part 1, p.158.



1954年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和马祖

蒋关于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产生相当的刺激。但是,第一,国民党军占据的浙江沿海大陈岛等岛屿对进出上海的商船威胁甚大,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的时候了。既然迟早都要动武,为何不乘此时机显示一下中国政府必欲解放台湾的决心呢?第二,他这时显然相信对美国刺激一下未必是坏事,它未必会促使美蒋靠得更紧。他甚至认为,既然美国一直拖着不想被蒋扯下水,中国政府表明自己对台湾问题的强硬态度,反而可能如周恩来所说,起到“击破美蒋军事条约”的作用。第三,朝鲜和越南相继停战,整个世界走向缓和,中国力倡和平共处,

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对国内民众起到麻痹的作用，最终甚至可能还会因此而束缚住自己解放台湾的手脚，使世人对台湾问题的解决产生错觉。打一下，不仅可以告诫世人不要把台湾问题与朝鲜、越南问题相提并论，而且也“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警惕性，从而激发人民的热情，以推动国家建设任务的完成”。

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的支配下，日内瓦和平协定墨迹未干，毛泽东就掀起了解放台湾的政治宣传运动。随后，9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更受命炮击金门和马祖。此举使犹豫不决中的美国政府作出了批准就美蒋共同防御条约与国民党人进行谈判的决定，紧接着，美国与台湾方面于12月2日就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的草案，次年1月24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更正式通过了这一条约。虽然，这是毛泽东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最为担心的局面，即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成为很长时期的僵局”，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马祖，且首次对盘踞在浙江沿海岛屿的国民党军队成功地实施了陆海空配合的立体进攻，以及中国政府于11月23日不顾美国政府的高度关切，坚持判处13名被俘美国军事情报人员4—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的强硬态度，也或多或少地对美国政府发生了震慑作用，迫使美国官方不得不开始考虑对过去僵化的对华政策加以调整。

3. 赶超英美的背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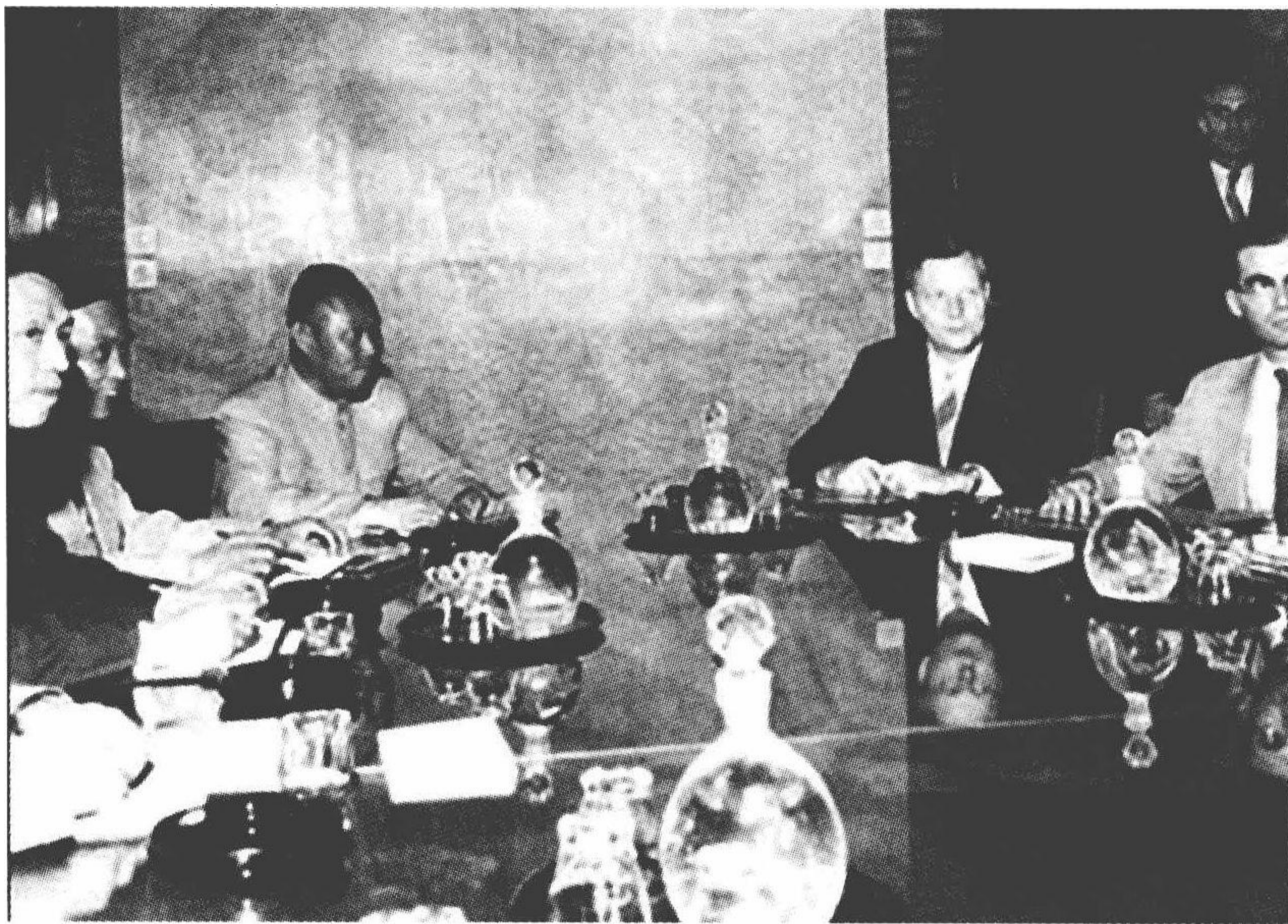
1954—1955年的台海危机，使毛泽东更进一步强烈地意识到，跟美国这样的国家打交道，除非自己拥有足够的实力，否则就只能永远处于被动地位，受人白眼，甚至被人所摆布。毛泽东这时的对美策略更多地源自于其过去国内对国民党政治军事“打打谈谈”的斗争经验。在过去国共两党实力差距较大的情况下，他曾不止一次地通过“以打促谈”的办法，争取到暂时的和平，以确保自身的利益。而如今在中美两个国家对立的情况下，毛泽东一度显然也相信“打打谈谈”、“以打促谈”是一个有效的法宝。炮击金门、马祖，并不等于就要中止争取中美接触的外交尝试。即使在美蒋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之后，注意到美国压迫蒋介石主动撤退了在浙江沿海大陈岛的守军之后，中国各报刊相继开始减弱了前一段如火如荼的反美宣传。周恩来也多次受命宣布，解决目前僵局的



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言

最直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中美之间直接谈判。^①注意到加剧台海紧张关系的做法影响了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刚刚树立起来的和平形象,周恩来还在4月出席万隆亚非会议之际,进一步受命向亚非各国政府,同时也是向美国人再度表示和平的善意。他公开说: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

^①参见《周恩来年谱》,上卷,第448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102页。



王炳南(左三)与美驻波大使柯·约翰(右三)举行会谈

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具体到台湾问题的解决上,中共中央还第一次批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透露说:中国政府并非一定要诉诸武力,它愿意也准备同蒋介石进行谈判,以便能够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①

为了促使美国真正调整它的对华政策,促使美国政府下决心派代表和中国政府的代表一同坐到谈判桌前来,中国政府甚至还主动宣布要释放若干已经被判刑的被俘美国空军人员。^②毛泽东也在几乎同一时间主动透过外国来访者向美国转达自己的和平意愿说:台湾问题可以用谈判的方法来

^①参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05—106、111页。

^②参见“Memorandum of the Substance of a Conversation, Peking, May 26, 1955”, FRUS,1955-1957, Vol. 2, China, pp.581-583.

解决,中国尤其希望和美国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就是“不知道美国干不干?”^①所有这些外交努力到底发生了某种效力。1955年8月1日,中美双方大使级的外交代表终于坐在了日内瓦的谈判桌前。

然而,和过去对付国民党时的情况不同,毛泽东这时的“以打促谈”,却不是想求得在中美之间保持暂时的和平局面。中美两国之间这时并不存在当年国共两党之间那种危险的局面,因为事实上中美之间并没有发生美国直接侵略新中国或直接威胁到新中国生存的情况。中美之间这时的问题根本上是美国敌视中国,坚持支持台湾海峡对面的国民党政权,而毛泽东则坚持要美国作出妥协,改变其敌视态度,放弃对台湾国民党的支持和取消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打”的策略固然可以使美国多少改变轻视新中国的态度,而不得不改变拒不与新中国接触的强硬态度,但由于中国不仅没有直接向美国挑战的实力,甚至也不具备夺取台湾的能力,因此双方即使能够派代表坐下来谈判,却不可能达到迫使美国改变政策的目的。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举行没有能够为解决台湾问题起到任何作用。美国政府坚持中国必须首先声明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否则坚持协防台湾的态度,以及很快拒绝在会谈中讨论台湾问题的做法,不能不再度激起了毛泽东的极大不满。一年以后,毛泽东在与印尼总统苏加诺的谈话中直言不讳地表达了他的这种愤懑的情绪。苏加诺主张中国应当早日加入联合国,毛泽东却表示“慢一点好”。苏加诺不解地问毛:“为什么中国不急于参加联合国?”毛坦言:“问题是台湾。”“只要在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就不进去”,“一万年也不进去”。因为,美国、英国、法国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以及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西德等等,他们都不承认中国,或者还在投蒋介石的票。美、英、法,再加上一个蒋介石,又都是安理会的成员,安理会成员有否决权,即使有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了邀请中国参加联合国的提案,这个问题也解决不了。因此,毛泽东已经不再对这些外交努力抱多少希望了。他明显认为,根本的问题还是实力的问题。用他的话来说:“我们是弱国,不是强国。美国怕苏联,但是不怕我们,它知道我们的底子。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是一个强国,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

^①毛泽东:《同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谈话》(1955年5月26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412—413页。

六亿人口。人家看我们不起,而且他们手里还有一个大东西,叫做原子弹。我们连一个小的都没有。”要让人家承认你,接受你,就只好挨人家的白眼。我们宁肯不加入联合国,也不要这些国家的外交承认。毛泽东相信,解决这个问题,办法只有两种,一是“尽快收回台湾”,一是“把自己建设强大”^①。在美国坚持干涉政策的情况下,前一种办法实际上做不到,因此毛泽东这时急于想要实现的其实只是后一种办法,即先把自己建设强大,然后再来与美国人谈收回台湾的问题。

中国明明是一个大国,却因为贫弱落后而被资本主义强国看不起,不仅得不到承认,而且连所有国家都可以进去的联合国都不能进,这种屈辱的外交体验给了毛泽东相当强烈的刺激。1955年秋天,注意到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国代表想尽办法不和中国代表讨论台湾问题,毛泽东就已经憋着一口气,暗下决心要靠迅速提升自己国家的实力来迫使美国改变态度了。他明确告诉那些曾经尝试着推进中国工商业发展的企业家们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一亿多人口,我国有六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哪一天赶上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现在 we 不像样子嘛,要受人欺负。”“我们一定要争这一口气。”^②

争一口气的想法随着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在1956年出人意料地顺利完成,被进一步激发起来了。1956年夏天,毛泽东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进一步提出了赶超美国的问题。他极具鼓动性地告诫大会的代表们说:“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有那么多人,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③

尽管毛泽东经常在讲,希望和美、英、法帝国主义国家迟一些建交,说对进

^①毛泽东:《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问题》,1956年9月30日,《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3—274页。

^②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1955年10月29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500页。

^③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96页。

人联合国没有多大兴趣,甚至准备一万年也不进联合国,但这些话其实恰恰反映出他内心里对自己国家的外交境遇愤愤不平且极度焦虑。以中国经济之落后,毛泽东深知要想靠自己的力量赶上和超过美国是何等的不容易。1955年秋他第一次提出要赶上和超过美国的想法时,他不能不提出要准备一百年,力争五十年,计划七十五年的设想。1956年夏他再次提出这一设想时,虽然相信中国落后于美国不过六十年,也还是不能不表示要用五六十年来赶超美国。然而,以毛泽东的性格,他真的会等五六十年再来解决台湾问题、联合国问题,以及与美国的关系问题吗?当然不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直到1956年底,即使他对苏联已有颇多批评之后,依旧会理直气壮地告诉国人说,“一边倒”政策没有错。为什么?他解释说:“因为一边是强大的帝国主义,我们中国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如果站在苏联、美国之间,看起来很好,独立了,其实是不会独立的。美国是不好依靠的,它可能会给你一些东西,但不会给你很多。帝国主义怎么会给我们国家吃饱呢?帝国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都是压迫的,压迫了几十年、几百年,从来没给它们吃饱过。帝国主义国家的军队,曾烧了我们的圆明园,夺走了我们的香港、台湾。”有谁会真心帮助我们建设强国的工业基础呢?只有苏联。“大工厂我们还不会设计,现在谁替我们设计的呢?例如化学、钢铁、炼油、坦克、汽车、飞机等工厂,谁给我们设计的呢?”“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①

新中国的工业基础基本上是靠苏联的帮助建立起来的。苏联政府总共承接了156个中国建设现代化工业急需的援建项目,涉及冶金、机械、汽车、煤炭、石油、电力、电讯和化工等各个部门,包括7个钢铁联合企业、24个电站、27个煤井和洗煤厂、10个冶金企业、7个化学工厂和十几个机械制造工业以及其他工业部门的工厂。毛泽东清楚地了解,这些工业企业构成了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建设的核心,并将成为今后中国工业发展的决定性基础。^②但是,毛泽东对这一工业发展的速度并不那么满意。3年实现经济恢复,3年完成

^①毛泽东:《“一边倒”对不对?》,1956年12月8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78—279页;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1页。

^②参见孟宪章主编:《中苏经济贸易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1页。

社会主义改造,6年就走完了苏联用19年才走完的道路,^①这种速度使他很自然地不满意在工业化问题上总要被动地跟着苏联走。他从1955年底到1956年春,连续几个月时间听取政府各个经济工作部门汇报,提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十大关系问题,说到底就是要“调动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为把中国加速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②

不满足于苏联人的经验,想要进一步加速经济建设,迅速提升国力,促使毛泽东在1955年直至1956年上半年,在对外关系问题上保持着十分谨慎的态度,这也是他积极倡导和宣传和平共处思想的一个最重要的时期。然而,1956年初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Khrushchev, Nikita Sergeyevich)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否定斯大林,主张“和平过渡”,对毛泽东的对外关系思想明显地产生了某种冲击。从他自这一年春天起对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的越来越强烈的批评中,可以逐渐地发现,他对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笼统地宣扬和平共处的政策,正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动摇。^③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党的问题,明显地与太过注重世界缓和与和平共处的倾向有关。而太过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缓和与和平,难免会使一些国家的共产党逐渐走到背离自己的革命理想,害怕帝国主义,且畏惧战争的可悲地步。

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最高统帅斯大林被共产党人自己描绘成凶残的暴君,共产党的形象空前受损。大批深感理想破灭的共产党员退出了共产党,西欧国家一些共产党不能不更进一步公开否定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波兰、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甚至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性骚乱,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受到严重挑战。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使毛泽东对能否把意识形态与对外政策截然分开,一方面坚持革命的目标与理念,一方面大力推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做法,开始抱以怀疑的态度。

毛泽东非常注重意识形态,他深信美国对新中国的歧视与刁难,基本上与

^①俄国革命后用了将近12年的时间,即从1917—1929年才过渡到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然后又用了7年时间,即从1929—1936年才最终完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

^②参见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第82—83页。

^③关于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这些批评,可参见毛泽东:《接见法国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1956年10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4、344—345页。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美国对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仇视有关。因此，他不能不相信中国对美国的外交斗争，其实也是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斗争息息相关的。站在这样一种角度看问题，他当然不太赞同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问题上自揭疮疤，或在其他事关共产主义运动未来命运的问题上，只讲缓和与和平，不讲革命与战争，向资本主义世界示弱。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心态，毛泽东逐渐开始反感赫鲁晓夫的国际缓和政策，不可避免。^①

1957年夏秋之际，一个喜讯传来，在美国多次试验失败的情况下，苏联卫星首先上了天。这种情况，给了深信社会主义必优于资本主义的毛泽东以极大的鼓舞。随后，莫斯科同意向中国提供导弹运载及原子弹制造技术，双方很快于10月15日就此签订了相关的协定，这更使毛泽东

^①参见《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34、341—43页。并见同篇名记录稿，《毛泽东思想万岁》，1967年，第171—173页。

倍感兴奋。苏联先于美国成功试射卫星上天,这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在高科技领域已经走在了美国的前面;而苏联同意向中国转让导弹和核弹这种尖端的制造技术,这不仅显示了中国的地位大大提升,而且极大地满足了毛泽东急于使中国成为世界强国,以抗衡美国的强烈渴望。他曾再三强调,无论怎样困难,勒紧裤腰带也要造出原子弹来。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只有掌握了原子弹,才能跻身世界强国之列,最终迫使美国真正坐到谈判桌前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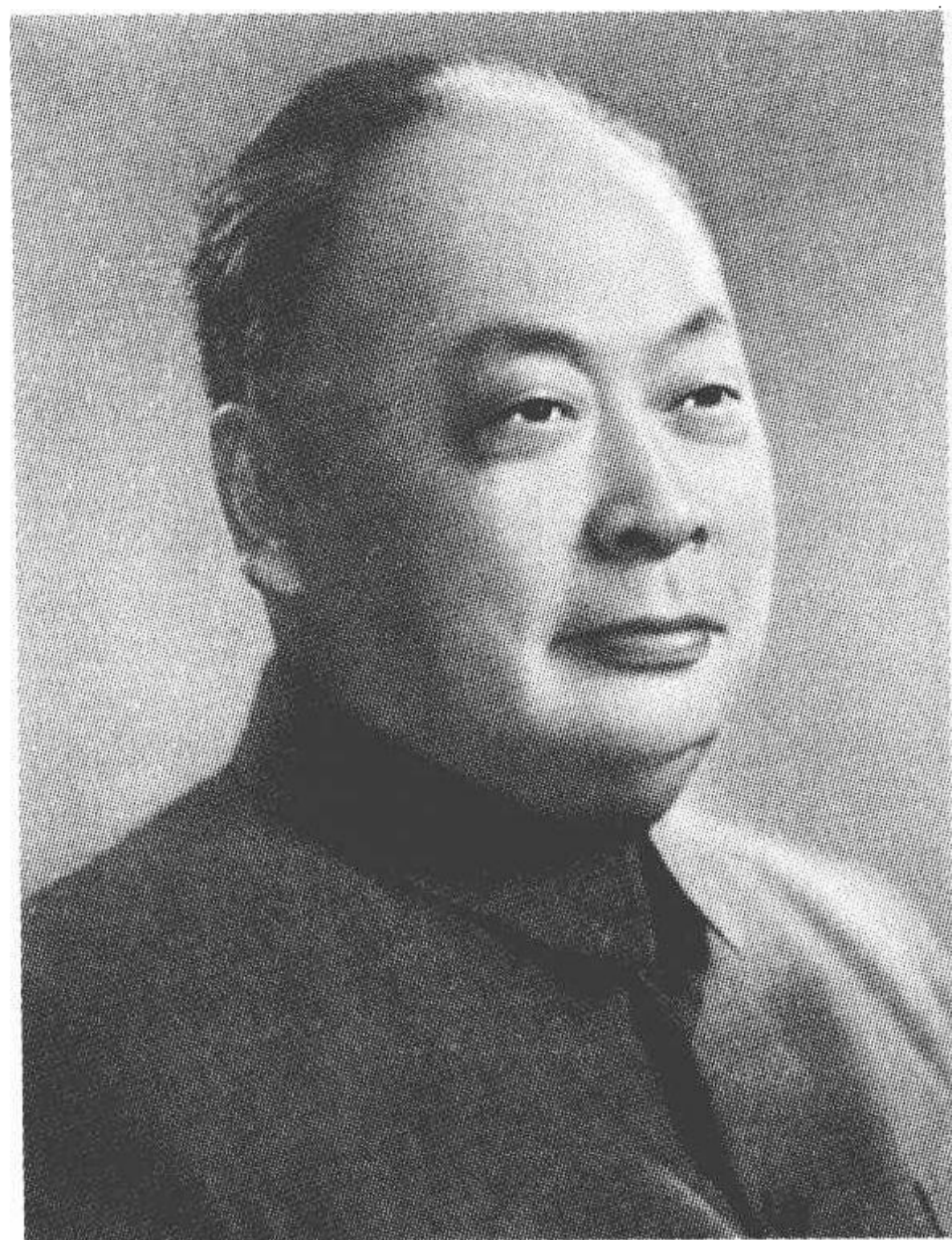
为了推动社会主义阵营中众多畏惧美国的共产党人不要害怕革命与战争,毛泽东于这一年的11月亲赴莫斯科,趁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机会,来为各国共产党人打气。^①但是,他此行最大的收获,多半并不是说服了那些更乐于看到世界和平共处的共产党领导人,因为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人早已放弃了暴力革命的观点,他们不可能支持毛泽东对美国采取斗争的态度。毛泽东意外收获的,是经济大跃进的雄心。当时,他从赫鲁晓夫那里得知,苏共中央政治局已经作出决议,准备公开提出15年在经济上赶上美国的计划。赶超美国,这原本就是毛泽东朝思暮想的一个目标。如今苏联人公开立下了“军令状”,毛泽东自然备受刺激,他马上就提出了一个要在15年内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计划。不过,他内心里瞄准的,其实还是美国。他希望能够乘此东风,用最短的时间把经济搞上去,迅速提升中国的国力,以便根本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

4. 炮击金门决策的摇摆

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毛泽东马上开始着手做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都和他试图调整中国的对外政策有密切的关联。

第一件事就是开始批评和平共处,加强对外政策中的斗争性。据吴冷西记述,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11月21日回到北京后,第二天晚上就召集了政治局常委会。他在着重介绍了代表团在莫斯科如何宣传和坚持中国党在斯大林问题,以及和平过渡等问题上的原则意见之后,特别指出道:在这次会上

^①参见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第321—329页。



1958年担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元帅

我们还有两个问题没有讲,一个是我们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对欧洲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的分析有意见;另一个是我们不同意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和平共处总路线的提法。毛泽东说:“现在国际上一般都公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是否做得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美国首先就做不到,尼赫鲁是不是完全照这样做也还要看。我们是坚持这么做的。从外交政策和国与国的关系方面来讲,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这是正确的。但是,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个共产党的对外关系的总路线,就不能只限于和平

共处。因为这里还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问题;还有执政的共产党,也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支持世界革命的问题,声援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执政的共产党的问题;还有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运动的问题;还有支持整个国际工人运动的问题。总之,还有一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问题。所以不能把和平共处作为一个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①

和平共处不能作为一个党的对外关系总路线,那么,作为国家的对外政策,中国党提出并且正在实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还能不能继续呢?毛泽东这时明显地希望能够把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政策划分开来,因而明确讲:国与国的关系还是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但是,有没有可能一方面坚持世界革命理念,直接或间接、公开或秘密地支持其他国家共产党、工人运动以及民族独立运动,一方面又同当事国政府在国家关系上互相尊重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地和平共处呢?显然,这几乎是难以办到的。互相尊重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就包含着不得以任何形式支持建交

^①转引自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页。

国家内部共产党、工人运动或民族独立运动的要求。而只要坚持支持其他国家内部共产党、工人运动或民族独立运动,就不可能真正做到在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当中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也正是为什么,毛泽东这时固然强调在国家关系上还是应当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行事,但他在这以后却再也不公开宣传“和平共处”的外交思想了。不仅不宣传,而且对此前的对外政策也开始有目的地加以调整。

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委婉地指出,中国此前在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也有着与苏联相似的问题。他明确认为,即使是国家间关系,也要有所划分。正确的对外关系也还是要强调又团结又斗争,只不过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对亚非拉美民族主义国家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有区别,重要的问题在于,仅仅满足于和平共处是不行的。^①2月初,自1954年以来积极依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推动外交工作的周恩来,被免去了外交部部长的职务,改由更多军人气质,更多虎气的陈毅元帅来对外代表中国。而这一年外交工作开始革命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全面断绝对日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事情的直接起因是日本右翼分子扯下并撕毁了中国在长崎展览会会场上的中国国旗,日本岸信介政府以中日两国没有外交关系为由,拒不向中国方面道歉引发的。但毛泽东则认为这是对日政策过分软弱,只重贸易,不重政治种下的恶果。为此,周恩来甚至不得不做了自我批评。^②根据毛泽东在外交工作中要加强斗争的新思维,外交部专门召开了务虚会,端正思想。务虚的结果,周恩来以往的和平外交方针难免被批评为“右倾保守”。按照外交部务虚会后确定下来的方针,中国今后的对外政策应该向“斗争是绝对的,冷战是不可避免的,而妥协则是相对的,暂时的”^③这样一种革命化的方向转变。

^①参见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1958年1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16页。

^②有关这一事件的起因及其中方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可参见王泰平前引书,第18—19页;《安东诺夫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1958年7月26日。在苏联驻华代办安东诺夫的这一报告中曾就中国断绝对日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强大措施提出过委婉的批评,称:“中国这时的对日措施多少有些偏激的地方,比如‘不应该急于急剧收缩与日本的文化联系,因为这实际上是限制了向中国向日本宣传自己的机会’”。

^③张闻天:《在布拉格使节会上的最后发言》,1958年7月14日,《张闻天文集》,第四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



《人民日报》刊登各地亩产万斤的报道

第二件事就是发动大跃进运动，力求在加强革命化的同时，争取把生产促上去，早日改变中美之间力量对比悬殊的状况。毛泽东深信，运用中国自己的经验，比如战争经验、群众动员经验以及政治工作经验等等，完全可能在经济增长方面创造出新的奇迹来，使中国在迈向强国的路上走得更快一点，让美国人再也不敢无视中国。事实上，从莫斯科回来之后，他就明显地憋着一股气。在1月南宁会议上他曾很不服气地对与会代表们说：“我就不信，搞建设比打仗还难？！”^①

^①转引自郑谦、韩钢著：《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



山西省故县的“小土群”一角(小高炉、土法炼钢铁、群众运动)

要想在不长的时间里就赶上美国，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地进行生产建设显然不行，必须来一个“大跃进”。在毛泽东的鼓动下，生产大跃进的运动被迅速发动起来了。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夏粮的产量就到处大放“卫星”，各地上报的粮食亩产几十倍上百倍地增长，这极大地鼓舞了毛泽东进一步在工业上创造奇迹的想法。^①随着他的一声号令，全国上下 9000 万人轰轰烈烈地掀起了大炼钢铁的运动，各地同样捷报频传，钢铁产量也是直线上升。赶超英国已经不是问题，^②毛泽东马上开始把赶超的目标锁定在了美国身上。从 1958 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宣布准备 15 年左右赶

^①参见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 年 9 月 5 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 380 页。

^②据当时的资料，英国年产钢 2000 万吨左右，而由毛泽东主持的北戴河会议则提出，1958 年的钢产量要达到 1080 万—1150 万吨左右，下一年度则要超过 2000 万吨。

上英国,再用20到30年的时间赶上美国,^①到5月份召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时,毛泽东就已经在内部提出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赶上美国的15年奋斗目标。^②又过了一个月,他估计:“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有可能的。”^③主张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外,明年就要超过英国。^④进入到9月初,他已经不再注意英国了。他直率地要求党的领导人,要有大手笔,要解放思想,鼓动他们:“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⑤

外交从来都是内政的一种延续。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这种估计和幻想,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其处理对外事务的心态发生改变。1958年夏天之所以会接连发生毛泽东斥责苏联和挑战美国的重大事件,与此不无关联。

斥责苏联的直接原因是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的问题。在中国建设大功率的长波电台在当时是中苏两方军事部门的共同需要,然而毛泽东强调主权,坚持电台的所有权要属于中国,故主张中国出资,中苏共同使用;而苏联军方则坚持双方出资,共同拥有,共同使用。双方为此从4月交涉到7月,始终未能解决问题。这件事已经让毛很不高兴,苏共中央政治局随后又针对中方要求苏方提供核潜艇及其在中国设厂制造核潜艇一事,令其大使向毛泽东说明希望通过在中国建立联合潜艇舰队的方式,一方面满足中方加强海防的需要,一方面也为苏联海军对付太平洋上的美国人提供便利。两件事加在一起,使正在为大跃进欢欣鼓舞的毛泽东异常愤怒。他为此大发雷霆,声色俱厉地斥责苏联大使,并且在游泳池边批评赶来解释原委的赫鲁晓夫,认为问题的关键是苏联领导人“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认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断言苏方是因为掌握了一点原子能,就觉得了不起,看不起人,“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⑥。毛泽东的怒气虽然因赫鲁晓夫亲来北京,反复解释,最终得

①参见《人民日报》(社论),1958年1月1日。

②参见《八大第二次会议各代表团活动情况》第十四号,1958年5月21日。

③毛泽东:《关于向军委会议印发〈两年超过英国〉报告的批语》,1958年6月2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278页。

④参见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381页。

⑤毛泽东:《对北戴河会议工业类文件的意见》,1958年9月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368页。

⑥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3—324页。



1958年7月31日毛泽东在机场迎接赫鲁晓夫

以化解,但中苏两国的同盟关系明显地受到影响。在随后的台海危机过程中,毛泽东下令炮击金门不向苏方打招呼;事发后苏方询问,中方强硬表示自己承担后果,绝不拖苏联下水;苏方提议向中方福建前线派驻一个携带导弹的苏联空军大队,以震慑美国,毛则强调中国只要苏联导弹,不要苏联部队,认为苏方此举仍是想控制自己。^①这些都清楚地反映出大跃进高潮中的毛泽东,在涉及民族尊严的问题上,正变得十分敏感。

^①参见吴冷西前引书(上),第187页。

挑战美国,再度决定炮击金门,同样与毛泽东昂扬的民族自尊心有关。其直接原因,也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轻视。本来,中美两国间自1955年以来一直保持着大使级会谈这种接触的方式,虽然会谈本身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但它作为美国被迫承认以新中国政府为谈判对象的一种外交形式,仍旧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因此,中方虽然不满意这种会谈方式,却一直坚持保持这样一种接触的渠道。到1957年底,早就对谈判失去兴趣的美国方面,以谈判代表调离,只能以代办出面与中方接触的方式,意图借此停止与中方的这种外交接触。美国人的这种做法,在中国方面看来,无疑是污辱性的。鉴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举行,纯粹是中方用炮击金门的办法逼迫美国重视自己得来的,毛泽东不能不设想,美国如今蓄意中止谈判,也与其不再重视中国的心态有关。

美国如此轻视中国,这不能不极大地刺伤了毛泽东的民族自尊心。自1958年2月起,中国政府外交部几度受命要求美方重新选派大级使代表续开中美会谈,清楚地反映出毛泽东等人的强烈不满。美国方面拒不答复的傲慢态度,更进一步刺激了毛泽东。中国正一日千里地跃进着,美国依然不把中国放在眼里,这难免让他倍加愤怒。在两度要求美国立即重开谈判,强硬要求讨论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得不到答复之后,6月30日,中国政府干脆发出了最后通牒式的声明,强硬地宣称,美国方面除非在15天之内同意恢复谈判,否则中国方面将不能不认为美国决心要使谈判破裂,由此而带来的一切后果只能由美国方面负责。^①这一声明清楚地显示,毛泽东对美国人已经开始失去耐心了。

为了让美国知道轻视中国的后果,毛泽东决心要在台湾海峡再度制造一些紧张局势,即所谓利用战争边缘政策,“给美国人一点颜色看”^②。7月14日,也就是中国政府给美国最后通牒中所提期限的最后一天,国防部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粟裕受命在北京召开了作战会议,具体落实了炮击金门及海、空军配合的问题。由于几年来已在东南沿海地区成功兴建了鹰厦铁路和福建、江西两省的军用机场,及其海军基地,工程兵部队也已按计划完成了一切战前工程保

^①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438—439页;并参见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编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译:《国际事务概览(1956—195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724页。

^②吴冷西前引书,第189页。

障工作。因此,这一次的炮击行动和规模都明显地不同于1954年9月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炮击甚至夺取金门岛,实际上已有了相当的把握。仅参加炮击行动的炮兵部队就有30多个营,一次性打击就可以发射10万发炮弹以上。^①而恰好在中国军方具体部署炮击行动的当天,中东的伊拉克爆发政变,政变组织者宣布伊拉克退出由美英组织的巴格达条约组织。次日,因怕连锁反应,美国决定出兵支持亲美的黎巴嫩政权,英国军队也迅速在约旦登陆。这种情况更进一步激起了毛泽东向帝国主义斗争的决心: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牵制美帝国主义!18日晚,毛泽东召集紧急会议,亲自进行了作战的部署和动员。根据前线的具体情况,中共中央军委随后决定将炮击金门的行动定在7月26日下午或27日早晨。^②

就在中国给美国所提最后期限的当天,即7月14日,美国方面却作出了回应。它虽然故意要拖后几天再指派代表,并要求改变谈判地点,毕竟还是接受了中国方面恢复谈判的要求。从外交斗争的角度,毛泽东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随着进一步有消息传来,说明美国政府已经内定由驻波兰大使为美方代表与中国复谈,再加上22日毛泽东训斥了苏联大使后,赫鲁晓夫正准备赶来北京解释一切,^③故毛再三考虑之后,最终也还是改变了原来的炮击计划。在炮击马上就要开始的当天,即27日上午,他写信给彭德怀等说:“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马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放,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④

然而,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共产党人如何在不放弃意识形态原则和目标的条件下,灵活运用外交手段,最大限度地争取国家利益,始终是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1954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之后,中国的外交工作一度有过一个相

^①参见侯晓佳:《1958年中国炮击金门的决策背景与处理过程》,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未刊稿),2002年4月。

^②参见《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87页。

^③赫鲁晓夫7月30日赶来北京亲自向毛泽东进行解释。但目前尚不清楚毛泽东究竟哪一天得知赫鲁晓夫将要来华解释的消息。

^④毛泽东:《关于把握打金门时机给彭德怀、黄克诚的信》,1958年7月27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326页。

对灵活和平稳发展的时期。随着中苏之间围绕着斯大林问题、和平过渡及和平共处问题,在意识形态上出现分歧,意识形态原则与外交工作需要之间的矛盾现象,又再度突显了出来。到这个时候,在整个外交工作已经开始趋向革命化的情况下,毛泽东的对美斗争决策,自然也难以完全立足于国家利益本身,而脱离意识形态斗争的考量。

中东事件发生后,积极倡导和平过渡与和平共处的赫鲁晓夫,意外地作出了相当革命化的反应。在他的命令下,苏联军队在靠近中东及巴格达条约组织成员国土耳其边境附近的中亚地区和保加利亚,开始组织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公开威慑美英军队,以声援阿拉伯反对美英侵略的民族主义运动。这种情况不能不使毛泽东处于两难的境地。十分明显,最积极地倡言革命,声称不怕战争,不怕帝国主义的中国,如果满足于美国与中国重开谈判的让步,而不作出援助中东革命的有力反应,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于情于理都说不通。结果,意识形态的考量终于再度占了上风。毛泽东不能不重新考虑炮击金门的问题。

当然,炮击金门、马祖也有中国自身战略上的好处。金门、马祖长期以来都是台湾国民党军队用来骚扰大陆东南沿海的重要跳板,过去由于交通和空军的限制,一直没有办法有效地解决问题。而今各方面条件均已具备,福建以及整个东南沿海地区的党政军民自然强烈地要求压制甚至夺取金门、马祖,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对金门、马祖的作战只是迟早的问题,未必真的能等到不知何年何月的“彼方无理进攻”时再说。

既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和从解决东南沿海安全的角度,都有打金门、马祖的必要,那么问题的关键也就集中到它对中美关系可能的影响上来了。毛泽东这时显然不希望此举会使美国收回刚刚在中美大使级会谈问题上所作出的让步,更不愿引起美国直接的军事干预。他在7月27日给彭德怀等信的末尾所以会强调“我战即克”和“不打无把握之仗”,即显示出他对美国可能的反应相当重视。因为人们这时毕竟从文字上看不出美国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及其1955年1月美国国会通过的《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是否意味着美国也承担起了对台湾和澎湖以外的金门、马祖等中国沿海岛屿的防御任务。^①如果炮击金门会引起美国的直接干预,哪怕是促使美国转

^①参见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页。

而再度拒绝大使级会谈,都不是毛泽东所希望看到的。

在反复研究了美国对7月底解放军空军大规模迁场入闽的反应之后,毛泽东在8月18日,即在中东事件爆发一个多月之后,作出了炮击金门的新的决定。随即,他召集彭德怀等连续开会,研究了炮击金门的具体行动方案,决定边打边看,探明美国的态度和台湾当局的动向后,再做下一步的计划。^①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决定炮击的过程中,高度重视不要伤及美国顾问人员的问题。在8月21日下午讨论炮击方案时,毛泽东明显地对发动突然袭击式的大规模炮击感到担心。他询问报告人叶飞说:“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叶飞答可能会。毛再问:“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国人?”叶飞答:“无法避免。”^②毛泽东在连夜反复考虑后,第二天就提出,还是先打几百发,由小到大比较好。经过叶飞等人的争取,毛泽东才勉强同意先打10000发。而又过了一夜思考之后,他还是坚持不能打到美国人。在他经过叶飞发往前线的指示中称:此次炮击先不打地面目标,只打水面船只,使用炮弹3000到6000发;打地面时,不打其指挥机构;尤其不要打美国军舰及岛上的美国人。这一决定突出地反映出毛泽东对中美关系的重视。直到彭德怀明确表示希望按照福建前线指挥部的意见进行炮击,并强调“估计美军不会参加”后,毛泽东才在最后关头同意照最初的方案实施炮击,仍着重打敌指挥机构、炮兵阵地、雷达站和料罗湾的舰艇等。^③

5. 斗争策略的再度调整

8月23日下午5时30分开始,解放军从福建前线面对金门、马祖30公里的海岸线阵地上,向金门排炮猛轰,在不到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发射炮弹近20000发。次日,炮击的重点转向了封锁金门岛。中国共产党人持续的炮击行动,果然引起了美国方面的高度紧张。毛泽东的战争边缘政策再次面临考验。

美国方面对中国共产党人炮击金门的行动,很快就表明了态度。杜勒斯公

^①参见王彦:《炮击金门》,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00页。

^②《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654—655页。

^③参见罗元生:《百战将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67—269页。



1958年炮击金门作战中福建前线部队战前动员

开警告说,中国共产党人如果强行夺取金门、马祖,将会引起严重后果。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 Dwight D.)随后也公开声称,金门、马祖对于保卫国民党中国本土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美国不会放弃对“中华民国”的责任。^①随着8月28日福建前线对金门国民党军播放了《告蒋军官兵书》,宣称解放金门迫在眉睫,^②美国军方当即制定了应急计划,决定为国民党军向金门提供补给的军舰护航,负责防卫台湾、澎湖的上空,在中共进攻金门、马祖时,可考虑国民党的自卫权,包括对中共投入战斗的炮兵阵地和空军基地进行袭击。^③根据来自海外新闻界的种种消息,^④毛泽东显

①参见《参考资料》,1958年8月24、28日。

②参见沈卫平:《八二三炮击金马》第九章。

③参见FRUS,1958-1960, Vol.19, pp.96-99.

④参见《参考资料》,1958年8月29、30日,9月2日。

然很快地了解到了美国的这种态度。他马上调整了此前的方针，通过中央军委，于9月2日发出了《关于对台湾及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第一次明确提出，对金门、马祖问题，不去登陆，多少年内也不去登陆，另外准备20年不打台湾，因为这不单纯是个台湾问题。^①

为了让美国人了解中国方面的这种态度，毛泽东决定自4日起停止炮击三天，让国民党向金门放手输送各种急需的物资。^②他对这一做法的解释是：“总是炮轰就没有意思了，看情况就停下来，等过两三个月，他们麻痹了再打。”而在随后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他则明白地讲：“金门、马祖这样几炮，我就没有料到现在这个世界闹得这样满天风雨，烟雾冲天。”美国竟然要在我们这里来个“大包干”。“我们现在手里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跟一个有原子弹的敌人开战，不是好办法。”因此，尽管包括张治中在内的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此想不通，他还是坚持反复做劝说工作。他解释说：美国最好“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定岛一切包过去，我看他就舒服了”。到时候倒霉的不是我们，是它“上了我们的绞索，美国人的颈吊在我们中国人的铁的绞索上面”。因为美国与台湾已订了条约，弄成了个死结，走都走不掉。现在它“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他的头更接近我们。我哪一天踢他一脚，他（都）走不掉”^③。

话虽这么说，毛泽东还是没有完全放弃取得金门、马祖的想法。在他看来，不用武力，未必就不能用其他方法来取得。1955年1月解放军准备夺取浙江沿海的大陈岛时，还没有进攻，只拿下附近的一江山岛，美国就逼着蒋介石从大陈岛主动撤退了。这次能不能再重演一次1955年的大陈岛事件，像当年那样，拿出废此朝食的气势，迫使美国逼着蒋介石让驻守金门、马祖的国民党军“这十一万人走路”^④呢？

为了诱迫美蒋撤出金门、马祖，中共中央于9月6日先由周恩来出面发表

^①参见尹启明、程亚光：《第一任国防部长》，广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15—216页。

^②参见王尚荣将军编写组编：《王尚荣将军》，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432页。

^③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5、8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384、386、392页；吴冷西前引书，第185、190页。

^④前引《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声明,表明中国政府愿意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态度,^①继而由毛泽东于9月7日再度下令炮击金门,毛明令这次“规模要比8月23日还要大,准备打3万发”,还要动用海岸炮和鱼雷快艇打击蒋舰,^②以便让国民党人明白他们是守不住金门、马祖的。周恩来在随后接见新加坡记者曹聚仁时,亦要其转告台湾方面:金门、马祖的国民党军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与岛共存亡;二是全师而还;三是在美国的逼迫下撤退。周恩来称,最好的选择是全师而还,因为国民党在金、马的驻军占整个国民党军队的三分之一,这个数字中国大陆并不在乎,回到台湾对蒋介石却有作用,可以用来作为对美国讲话的资本。最不光彩的是自己不撤反而被美国逼着撤退。^③

对周恩来的声明和解放军再度大规模炮击金门,美国方面很快就作出了反应,同意马上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共中央据此研究了具体的谈判对策。毛泽东明显地赞同在美国最关心的不对台湾、澎湖动武的问题略作让步,以换取美国压迫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会议内定的谈判底线是,声明台湾、澎湖是中国的领土,金门、马祖等是中国大陆内海岛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适当方法,在适当时候,解放这些领土;直接威胁厦门、福州两海口的为国民党军队所占据的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必须收复。如果国民党军队愿意主动地从这些岛屿撤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不予追击。中国政府在要求美军从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的同时,也可以作出承诺,在收复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之后,将争取用和平方法解放台湾和澎湖,并且在一定时期内避免对台湾和澎湖使用武力。^④

承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澎湖,并保证在一定时期内不对台湾、澎湖使用武力,这在中国政府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为了争取美国协助迫蒋撤退金门、马祖驻军,而作出如此大的让步,反映了毛泽东这时急于取得金门、马祖的心情。但是,毛泽东同时告诉周恩来,要中国代表在谈判中不要急于和盘托出中国的方案,可以在三四天甚至一周内先实行侦察战,摸一摸对方的底线再说,

^①参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167—168页。

^②参见王彦前引书,第167页。

^③参见《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61—462页。

^④参见FRUS,1958-1960, Vol.XIX, pp.190-195.

以免被美国人视同示弱。^①不料,中国代表王炳南在9月15日双方第一次会谈中就亮出了中方的底牌,这让毛泽东深感恼火。负有具体指导责任的周恩来不得不接连致信毛泽东承担责任,并重定了对策。新的对策突出强调了斗争性,不仅拒绝与美方代表讨论具体问题,而且要义正词严地要求美国从台湾海峡撤走一切武装力量,停止向中国领海、领空的一切军事挑衅和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周恩来同时还向毛泽东请示,针对美国这时提出的停火要求,从各方面扩大要求美国从台湾海峡撤军的活动,包括发表驳斥杜勒斯联大演说的外长声明;动员各地报纸、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广泛响应;要求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配合中国的行动,等等。^②中国代表随即在第二次中美会谈中表现出强硬立场,完全不理睬美国代表提出的草案,只谈原则,不涉及任何具体问题。其要求美国撤军的措辞尖锐,质疑美国停火建议的态度不容妥协。^③对此,毛泽东欣然首肯,称就是要采取“这种新方针、新策略”,“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并且说:“这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须形态”^④。

本来是要夺得金门、马祖而对美取妥协策略,如今转而实行攻势的、高屋建瓴的“新方针、新策略”,反映出毛泽东对金门、马祖的策略再度发生了变化。美国政府这时很重视中方9月15日提出的方案,在与中国代表会谈得不到回应后,9月30日杜勒斯干脆公开声言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借以向中方示意愿意讨论以金门、马祖交换台湾、澎湖安全的问题。^⑤然而,毛泽东已再度改变了此前的想法。他在10月初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了一个新的“联蒋抗美”的策略。因为毛发觉:“把金门、马祖让给我们是杜勒斯的方针,他想以撤出金门、马祖交换我们不收复台湾以及澎湖列岛。”如果因为夺取金、马而使台湾远离了中国大陆,便利了美国的图谋,那将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因此,他转而发现:“我们跟蒋介石有共同点:第一是蒋不愿撤出金马,我让金马留在蒋手中有利于就近保持接触,要打就打,要停就停,对美一紧一松,主

^①参见《关于金门炮击办法等问题给周恩来、黄克诚的信》,1958年9月1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416页。

^②参见《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第462—463页。

^③参见FRUS,1958-1960, Vol.XIX, pp.209-218.

^④《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第463—464页。

^⑤参见《参考资料》,1958年10月1日。

动权在我。第二是蒋介石要死守台湾,我们在一个相当时期内不打算也不可能解放台湾。第三是我在蒋介石同美国人的斗争中保持‘中立’,让蒋介石跟美国人斗,实际上是支持蒋介石跟美国人斗。美国想霸占台湾,逼蒋介石完全成为美国的附庸。蒋介石和蒋经国都还有一点反美的积极性”,鉴于“最近台北发生蒋介石策动人打砸美国大使馆的事情。这些迹象表明,我们和蒋介石是有共同点的,是可以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联合反美,不让美国完全霸占台湾”^①。

随后,毛泽东并托人转告蒋介石,说只要蒋能抵制美国,我们就可以跟他合作。^②既然要向蒋介石国民党示以善意,大规模惩罚性的炮击自然就不再需要了,第二次台海危机至此迅速化解。

6. 和平外交方针的作用逐步削弱

这次大规模炮击金门,前后不过一个多月,从最初的还美国人以颜色,同时惩罚国民党借金门、马祖骚扰大陆;到准备夺取金门、马祖,牵制美国,支援中东革命;到诱美逼蒋撤守金门、马祖;最后又一改初衷,为“联蒋抗美”,将金门、马祖原璧还蒋以壮其势,毛泽东的策略几经反复,频繁变动。然而,从单纯外交斗争的角度,他对自己策略的调整还是相当自信的。

成功地把美国套在了握在中国六亿人民手里的绞索上,是毛泽东随后解释这次行动意义的一个最重要的说法。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凡是搞了军事基地的,就被一条绞索绞住了”。美国在台湾有军事基地,就等于自己往自己脖子上套上了一条绞索。美国与台湾还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更是等于打了个死结,想脱都脱不开。本来台湾还远一点,这次炮击金门、马祖,美国又自己钻了进来,非要承担保护的责任不可。“我看也套上去了。”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在金门、马祖有十一万军队,“只要有这两堆在这个地方,他们(就)得关心。这是他们的阶级利益、阶级感情”。“不能见死不救。”但金门、马祖毕竟距离中国太近了,把头伸到这么近的地方来,实际上对美国并不是好事情。我们想什么时

^①吴冷西前引书,第184、190页。

^②参见《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476页。

候踢它一下,就可以什么时候踢它一下。^①

除了绞索政策以外,毛泽东强调最多的还在于支援了中东革命和进一步证实了美帝国主义的纸老虎本质。关于支援了中东革命的问题,是说这次炮击金门,“中东各国可是欢迎啦,特别是一个阿联,一个伊拉克,每天吹,说我们这个事情好。因为我们这一搞,美国人对它们那里的压力就轻了”^②。至于证实了美帝国主义的纸老虎本质,则是因为毛泽东在炮战中发现,美国人其实也还是在玩战争边缘政策。当中国9月4日宣布了十二海里领海线之后,美国军舰一遇炮击就迅速退到十二海里领海线以外,证实了美国口口声声说要保护金门、马祖,实际上也不敢深入到中国内海来向中国挑衅。而美国原来刻意拖延大使级会谈,一打金门,马上就指派大使,催着谈判,也显示美国并不愿意与中国在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这些情况都让毛泽东颇觉满足。分析世界大势,讲点豪言壮语,大谈他的纸老虎理论和不怕鬼的故事,说明“帝国主义一天一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一天好起来”,从来就是他用来动员民众、鼓舞士气、振奋国内外共产党人反帝斗争精神的一种手段。大规模炮击金门的行动,再度验证了他对美国虚弱本质的判断,更让他有了新的谈资。^③

那么,毛泽东对这次炮击的结果是否就全无遗憾了呢?也不是。伴随着国内轰轰烈烈的“解放台湾”的宣传运动,解放军在占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下,仅仅因为美国扬言干预,而无法夺取这两个沿海小岛的现实,到底还是使毛泽东内心感到不快。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召开,毛泽东特地写下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一反他过去强调一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态度,强调帝国主义还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在战术上必须重视它。^④由此不难看出他对美国在这次台海危机中的干预,还是有些耿耿于怀,不能不试图对党内做些交代和解释工作。

^①参见前引《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但严格地说,在美国明确表示不愿意对金门、马祖承担协防义务后,毛的这种说法已很难成立。

^②前引《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③毛泽东在1958年11月底批示发给与会者参考的关于西方世界如何分裂和美国内部如何困难之类的报告或新闻报道,就有五六篇之多。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581、589、599、606、608页。

^④参见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1958年12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610—613页。

从第一次台海危机的处理,到第二次台海危机的处理,越来越清楚地反映出中美关系以及台湾问题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为了解决台湾问题,毛泽东必须和美国人斗智斗勇。但中美之间实力的悬殊,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对立,使得他几乎无法通过军事或外交来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虽然极大地提升了毛泽东向美国挑战的勇气,现实较量的结果,除了把美国人重新逼上了谈判桌外,一切照旧回到了原先的起点上来。随着群众性的大炼钢铁运动被事实证明完全不可能带来钢铁产量的飞速增长,毛泽东不能不意识到,想在短时期内赶上和超过美国,从而改变中美实力对比的现状,迫使美国人重视自己,只能是一种幻想。因此,除非美国被极大削弱,否则中国要想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根本解决台湾问题,进入联合国和取得美国承认,都鲜有可能性。

如何才能达到极大削弱美国的目的呢?从11月美国民主党在选举中胜出,杜勒斯的共和党落败中,毛泽东相信自己看到了炮击金门所带来的某种效果。^①他不仅估计民主党的对华政策可能较保守的共和党会有所改变,而且相信,危机造成的紧张空气对美国不利。只要斗下去,美国的政策非变不可,“早晚要承认中国和接纳中国参加联合国”^②。因此,炮击金门之后,他开始经常强调制造“紧张”局势的好处,甚至直言:“我是喜欢紧张的。”他坚信这是使美国陷于被动,并可能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的一计要着。故“局势愈紧张愈好,各国共产党可以比较迅速地发展,革命会更快一些”^③。

受到毛泽东这种态度的影响,中国1959年以后一段时间里的对外政策明显地表现出两种趋向。

首先是,和平外交的方针还在延续,和平共处的调子仍在唱。如周恩来在1959年4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仍在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始终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即使进入到1960年,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也一面肯定地认为美国虽然换了执政党,其帝国主义的本质未

^①毛泽东显然相信炮击金门可以影响美国大选。11月2日他曾电示称:“建议明三日(逢单)大打一天,打一万发以上,对一切军事目标都打。以影响美国选举,争取民主党获胜,挫败共和党。”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第490页。

^②《林克日记》(未刊稿),第70页。

^③《毛泽东接见拉美十五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3月3日。

变,还在准备战争,且要长期霸占台湾,它不可能接受中国的条件从台湾撤兵;一面又强调战争未必会很快打起来。故会议主张,中国既要警惕可能到来的战争危险,立足于打,不寄希望于解决问题,又要拉住美国谈判,不主动破裂,同时与周边国家加紧解决边界问题,以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①

其次是,意识形态对外交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和平共处的外交思路明显地被怀疑和动摇。周恩来在1960年10月的讲话当中就开始对“和平共处”加以限制了,强调:“跟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并不是说取消了斗争、取消了竞赛。用和平方式进行两个制度的斗争,用和平方式进行各种不同意见的斗争,这样来争取持久和平。”11月初,毛泽东召集杭州工作会议,讨论杜勒斯关于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三篇讲话。为适应毛泽东的想法,周又进一步把和平共处分成了三种情况,说一种是列宁的和平共处,即是要通过暂时的和平共处来获取消灭对手的资本;第二种是麦克米伦的和平共处,就是要维持现状;第三种则是杜勒斯的和平共处,意在保存资本主义,消灭社会主义。

等到杭州会议开过,清楚了解了毛泽东的看法后,再谈到和平共处时,周恩来的讲话就与毛泽东基本上趋于一致了。他开始批评过分强调和平共处的做法,说:“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忽视这一斗争,甚至把和平共处说成那么好,两个世界的斗争不提了,很危险。”包括对民族主义国家的和平运动,也要有分析。“如果笼统地讲和平,不加区别地讲和平,那是为了欺骗,也可以造成一批和平主义者。什么战争都反对,就只有让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继续被压迫、被镇压,而社会主义把自己孤立起来。”

这一年12月,再谈到和平共处问题时,周恩来已不再从正面谈论和平共处了,而是讲:“美帝国主义的战略方针是用和平共处的办法,用军事基地把我们围起来,并把中间地带都搞起来,然后促使我们内部变化,并保卫自己。”因此,我们无论要挫败美国的阴谋,还是要解决台湾问题,都必须“要想更大的问题,想远一点”。这个“更大的问题”,说到底其实就是推动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斗争,尤其是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②

^①参见吴冷西前引书,第236—248页。

^②参见《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第494、504、506、510—511、514—515、526、540页。



1959年10月1日赫鲁晓夫应邀
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庆典

7. 结语

逐渐把外交工作与意识形态的目标混同起来，是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中国外交的一大特色。除了美国必欲敌视和干涉中国所造成的反感情绪起作用之外，中苏两党分歧的公开化无疑是推动毛泽东必欲坚守意识形态阵地的一个关键所在。坚信对付美国，必须“以‘战争边缘政策’来对付‘战争边缘

政策’”^①的毛泽东,一直极其反感赫鲁晓夫的缓和政策,认为这是苏联党害怕帝国主义的表现。还在1958年炮击金门之前,毛泽东就已经在中共内部明确批评苏联的对外政策了。依据毛泽东的意见,外交部当时就特别告诫自己的外交官们说:“我们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是有差别的,“总的说来,它们对美国还有些怕”。而我们则要“孤立和打击美帝国主义,消灭恐美病,使人们有信心,敢于同美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对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对民主主义国家又联合又斗争,以联合为主,可斗可不斗者暂时不斗;(非斗不可者)敢于把它斗倒”。对于一切帝国主义及其反动派,“愈是害怕,它就进攻得愈厉害,愈是强硬,它就愈要转入防御”^②。

1959年赫鲁晓夫积极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极力宣传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力图根本缓和美苏关系,更加引起了毛泽东的疑惑。紧接着,苏联方面于6月26日通知中共中央,因与美国等国谈判禁止核试验的需要,不得不暂缓执行1957年10月15日签订的新技术协定,暂时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③进而,苏共中央又不顾中共中央的劝告,下令苏联塔斯社于9月9日发表声明,对中印边界冲突事件表示“遗憾”,批评它等于是为美苏缓和和两国首脑互访设置障碍。这些都让中国方面极其不满。^④双方随即更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访美归来的赫鲁晓夫9月30日带着政治局委员苏斯洛夫(Suslov, Mikhail)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Gromyko, Andrei)来到北京,直截了当地批评中国扣押5名美国间谍,批评中国在西藏问题上的政策和与印度为边界问题而起冲突,并且声称“台湾问题不仅给美国人制造了麻烦,也给我们自己带来了困难”。他甚至质问毛泽东等人:为什么你们不能像当年列宁批准在苏联的领土建立一个“远东共和国”那样,让台湾暂时脱离大陆,等条件成熟后再行收回呢?^⑤

赫鲁晓夫为争取与美国实现缓和与和平,不惜向自己的同志兴师问罪,这

①《毛泽东接见拉美十五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记录》。

②《张闻天年谱》下卷,第1098页。

③参见《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上编,第32页;《聂荣臻年谱》下卷,第680页。

④参见吴冷西前引书,第205—212页。

⑤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of comrade KHRUSHCHEV N.S. with the Chairman of the CC CCP Mao Zedong, 2 October 1959.


种情况使毛泽东进一步从根本上开始认定，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方针大可质疑，它难免会导致修正主义思想的泛滥。从1960年4月开始，借列宁诞辰90周年的机会，毛泽东开始发动抵制苏联和倡导世界革命主张的大规模的宣传攻势。^①随后，中国很快开始举起了“反帝反修”两面大旗。毛泽东批评苏联是修正主义的重要依据，就是认定赫鲁晓夫之流抹杀阶级斗争，反对一切战争与革命，鼓吹对立阶级之间、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阵营之间、被压迫民族与殖民统治之间调和妥协、和平共处。尽管，由于毛泽东高度重视中美大使级会谈，为此始终没有否定“和平共处”这一外交用语，对美国坚持“谈而不速，谈而不破”^②，在处理同毗邻国家关系时，还一度强调要争取和平解决一切争端，创造和平环境，但是，毛泽东1960年春天已经在内部明确讲：“和平共处是没有的”，至少，我们“和帝国主义没有和平共处，只有冷战共处”^③。中国的对外政策注定要发生重大变动了。

原载《史学月刊》，2002年第11—12期

^①为纪念列宁诞辰，中共中央同时组织了三篇分量极重的理论文章和讲话，针对苏联党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思想，力陈列宁主义的阶级革命和世界革命理论的正确性。参见红旗杂志编辑部：《列宁主义万岁》，《红旗》杂志，1960年第8期；人民日报编辑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人民日报》，1960年4月22日；陆定一：《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人民日报》，1960年4月23日。

^②吴冷西前引书（上），第247页。

^③《毛泽东与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的谈话》，1960年5月21日；《毛泽东与丹麦共产党主席耶尔森的谈话》，1960年5月28日。



第七章

19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转向
的历史考察



引言

1960年代,是中国对外政策急剧变动,中国外交陷入严重动荡和自我孤立境地的一段灾难性的时期。

在这方面,最为明显的证据就是,从1949年到1959年十年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有36个;1970年到1979年十年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有66个;而从1960年到1969年十年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16个。而且1966—1969年四年时间里,不仅没有与一个国家建交,反而还因为输出革命或激进宣传,致使总共53个建交国或半建交国中,近30个国家先后与中国发生外交纠纷,一些驻外使馆被迫关闭或外交关系降格,印尼等四五个国家还先后与中国断交。^①在此期间,中国与周边的印度和苏联,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边境军事冲突,出兵近30万人帮助越南进行抗美战争,鼓励和支持缅甸等东南亚国家革命党实行或恢复武装斗争,还在中国境内设立军事学校帮助训练各国革命分子,资助他们回国组织暴力革命。

1960年代的中国外交为何会全面走向“反帝反修”,并最终走入死胡同?这一外交政策的急剧转向又是如何发生的?迄今为止,人们多半会把它归咎于中苏两党的交恶和中国国内政策的激进化。^②这些原因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但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较量,特别是处在美苏冷战格局下,又极度反感受此格局牵制的毛泽东的造反心态,也极大地影响着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动。

①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并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www.fmprc.gov.cn/chn/lbfw/jjbiao/t9650.htm>。王书中提到的当时建交国与半建交国为48个,是因为没有把当时的断交国数计算在内。

②参见牛军:《1962年: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李向前:《1964年中国内外政策的起因》,(香港)《二十一世纪》,2003年7月号。另外像张强的《6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的演变与调整》(《党史研究与资料》,2001年第5期)等文章,也讨论到这一阶段的中国对外政策演变等问题,但如同大陆学者所写的几乎所有的中国外交史著作一样,作者通常都并不特别在意这一阶段中国对外政策趋向激进的具体影响及其深层次原因。

1. 和平共处,还是冷战共处?

众所周知,刚刚跨入1960年春天,中共中央就发出了改变对外政策的讯号。这就是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主持起草定稿的《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借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机发表的这三篇文章,公开揭起了反对苏联提倡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政策的政治旗帜,明确认为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和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的观点没有过时,帝国主义依旧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和革命人民的死敌,帮助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理当是已经取得胜利的共产党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①

但是,《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的公开发表,一方面是中共中央对战争形势高度戒备的结果,^②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赫鲁晓夫在2月4日华沙条约国家首脑会议上公开指责中国好战,特别是对赫鲁晓夫借着酒劲儿含沙射影地辱骂毛泽东一事作出的激烈反应。因此,当几天后,发现苏联因在苏联领空发现并击落美国U-2高空侦察机一事,与美国发生了碰撞,赫鲁晓夫态度强硬,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拒绝道歉,毛泽东又倍感振奋,转而原谅了赫鲁晓夫的粗鲁行为,明确指示要大造声势,支持赫鲁晓夫,抨击艾森豪威尔。^③随后,中国各地连续一周时间举行大规模的群众性游行示威,声势浩大地支持苏联反对美国的入侵行为,给人印象,中苏关系依旧牢不可破。

事实上,在1960年1月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中共中央曾经确定,对赫鲁晓夫仍以团结为主,以便对付美国。^④因此,新的形势显然适合于这一政策

^①《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陆定一:《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参见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编:《学习文件汇编》,第一集,北京出版社1963年版,第55—161页。

^②1959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杭州讨论国际形势后,于1960年1月14日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听取了林彪的国防问题的报告。报告明确提出要准备打仗,一切从战争的需要出发,要建立军事工业体系。军事防御采取“北顶南放”的方针,国防工业要尽可能利用山地等。

^{③④}参见吴冷西前引书,第268—269、246页。

的继续实施。但是,一方面仍要争取保持缓和,争取和平建设时间,一方面又强硬地提出了反帝革命的政治宣示,这已经清楚地反映出,中国对外政策的表述出现了混乱的情况。

如这个时候吴冷西听邓小平在书记处会上传达称,毛泽东得知美苏领导人公开互相指责的消息后,曾专门就对外政策再度进行过指示。强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有过和平共处,多半是冷战共处,也就是双方始终剑拔弩张,有种种局部战争,但并没有打起世界大战来。他说:我们的方针是争取缓和,争取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即使是冷战共处也好,因为总比打大仗要好。我们能争取10年、15年也好,更长的时间更好,使我们能把我国的建设搞好。这个冷战共处的时期延长得越久越对我们有利。^①

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显然还没有考虑成熟。因为,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毛泽东还分别与英国的蒙哥马利(Montgomery, Tim)以及与朝鲜劳动党领导人金日成谈到过同样的话题,意思却明显地有所不同。在与前英军元帅蒙哥马利谈话时,他的说法比较委婉些。说:“现在的局势我看不是热战破裂,也不是和平共处,而是第三种:冷战共处。”对于这位英国客人,他客气地表示,他并非不愿看到“冷战共处”转化成“和平共处”,但他同时也没有忘记强调说: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也没什么不好。因为局势越是紧张,就会有越多的人起来反对美国。^②而在与同为共产党人,而且同样备受美国压迫的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谈话当中,他就讲得直白多了。他明确讲:不要相信和帝国主义可以和平共处,“和平共处是没有的,在古巴、阿尔及利亚、菲律宾、巴拉圭都有游击战。和帝国主义没有和平共处,只有冷战共处”^③。

既要表现出中国仍希望缓和,主张和平,因而口头上还不能放弃“和平共处”的说法,同时又要说明自己并不相信存在着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强调帝国主义时代革命与战争的必然性,这就使得中苏双方在6月初于北京召开的世界工会理事会的会议上再度发生了激烈争论。周恩来在会议召开第二天就公开表明了中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他一方面仍旧提“和平共处”,一方面则强

^①参见吴冷西前引书,第271页。

^②参见《同蒙哥马利的谈话》,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八卷,第181—182页。

^③《毛主席与金日成同志谈话记录》,1960年5月21日。

调：和平“必须依靠人民自己起来同帝国主义斗争”，“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是永远得不到和平的”，“帝国主义侵略和好战的本性是不可能改变的”，要“彻底揭穿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叛徒面目”。中国工会代表刘长胜在大会上发言中对此解释得更明白。他说：我们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一贯坚持冷战政策，坚持扩军备战，制造紧张局势，我们只有同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有可能使冷战不至于发展成为热战。事实上，在帝国主义时代，战争是不可能避免的。因此，中国方面不能接受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和剥削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战争“可以避免”的观点。^①

对于中方表述的这种名为“和平共处”，实为“冷战共处”的观点，敏感的苏联人当然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苏共中央书记科兹洛夫报告讲得明白：中国人只是表面上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实际上只倾向于把这一原则看成是一时的策略手段，他们不相信在当代条件下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他还特别提到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在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维·瓦·格里申的非正式谈话当中的说法，即在中国方面看来，“有关和平共处可能性的论断只能使美帝国主义高兴”。科兹洛夫相信，刘宁一的谈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中方这时其实根本就不承认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存在着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为此，他们就连强调“和平共处”都认为可能会有利于美帝国主义而不利于各国共产党人。^②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领导人明明不相信“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到处强调只有“冷战共处”，同时在公开场合仍不根本放弃“和平共处”的提法呢？一个原因恐怕是因为这个时候毛泽东仍旧对“大跃进”运动抱有期望。据吴冷西回忆，在这一年1月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还在讲：“国内形势是好的”，中国“如果能在国际上发生什么影响的话，主要靠我们自己把国内工作做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把事情办好”。为此，他提出争取要“10年、15年”的和平建设时期。^③而在随后的一些批示中，他也依旧坚持认为：

^①参见《人民日报》，1960年6月9日。

^②参见沈志华：《关于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若干问题——科兹洛夫布加勒斯特会议总结报告评估》；李丹慧：《关于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若干问题》。

^③参见吴冷西前引书，第247页。

“看来,连续大跃进是可能的。”^①显然,只要毛相信存在着可以利用一段和平发展时期继续推动大跃进运动,尽快赶上美国,从实用的角度,他就不打算完全放弃“和平共处”的公开宣传。

另一个原因则恐怕仍旧是来自于毛对对美关系的重视。急于赶美超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感情上不能忍受美国的轻视,在利益上不能忍受美国继续阻挠中国解放台湾。然而,1960年间,恰好赶上美国总统大选,一向与中国为敌的共和党政府受到相对开明的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Kennedy, John F.)的挑战。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显然对肯尼迪上台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抱有相当的期待。

还在1957年10月,当时是参议员的肯尼迪就曾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刊文认为:中国和欧洲正在形成新的政治力量中心。1958年夏,肯尼迪就对华政策及其美国对台政策与副总统尼克松发生辩论,再度引起毛泽东的重视。^②当年11月,《纽约时报》公布了由肯尼迪等民主党参议员推动,并得到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授权的《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仑公司研究报告》(简称《康仑报告》)。该报告突出强调了共产党中国的极端重要性。报告前所未有地承认:共产党政府“是近代中国历来最坚强、最团结的政府”,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迅速增长,“极可能在二十世纪后期成为世界上的一个主要强国”。因此,报告断言:“对于美国将来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来说,决定怎样的对



美国总统肯尼迪

^①毛泽东:《对七省市和十四个重点企业一季度工业生产安排情况的批语》,1960年1月23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页。

^②参见《毛主席接见美国作家斯诺的谈话》,1958年10月22日。

华政策,其意义将是再重要也没有的了。”^①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康仑报告》对中国的重视,显然让毛泽东十分受用。

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信息显示美国越来越看重中国,毛泽东对美国对华和对台政策变动可能极度敏感。1960年1月初,注意到美国有削弱台湾在国际组织中代表资格的报道,颇感振奋的毛泽东当即批示:“蒋帮力争加入、恢复国际组织。我们相反,在三年、五年、十年内,对一切国际组织,毫不在乎,要美就我,我不就美。最后一定要美国服从我们。这种做法,可能较好些。”^②对于有关美国有迹象要增加与中国的接触,并会利用华沙会谈做进一步试探的消息,毛泽东也一样坚持不急于求成。政治局常委据此讨论决定:对美关系的基本方针是:“谈而不破,谈而不速。”即一方面要拉住美国与它谈判,不主动破裂,另一方面不要急于求成,不能根据美国的条件来建交。^③

随后,美国民主党及其总统候选人肯尼迪在对华政策上的表态更加直白。4月,民主党政策委员会主席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专文,呼吁“重新考虑中国问题”,根据中国的现实和美国的利益制定对华政策。肯尼迪也不断公开发表演说,批评共和党政府的对华政策,要求正视红色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在阻止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上的受挫,反对过度帮助台湾,主张美国应通过在日内瓦禁止核试验的会谈,谨慎地促进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宣称只要中国放弃好战的敌视美国的政策,美国就应当与中国“建立和平的关系”,同中国“和平相处”^④。肯尼迪的上述言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台湾当局的激烈抗议,因而也自然会进一步引发毛泽东和中国政府的某种好感与期待。10月,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约见美国友人斯诺,有意透过斯诺向美方承诺:对于台湾问题,“我们要谈判解决,不要武力解决”。“金门、马祖我们也不去打。”“因此,战争的危险是没有

^①何慧译:《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仑公司研究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218、263页。

^②毛泽东:《在关于国际情况的一期简讯上的批语》,1960年1月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4、6页。

^③参见吴冷西前引书,第247页。

^④引自罗斯玛丽·福特:《60年代国内政局与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义:美国国内因素与对华政策》,参见姜长斌编:《从对峙走向缓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第540页;《肯尼迪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对华政策等问题》,《参考资料》,1960年7月17日;理查德·尼克松著、伍任译:《尼克松回忆录》(上),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83—284页。

的。”^①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1961年1月20日肯尼迪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后,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破天荒地被要求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向美方代表表示说,希望肯尼迪政府在“中美关系的进展方面有所建树”^②。

由此不难看出,虽然在1960年间,中共与苏共之间围绕着该不该与美国缓和和该不该奉行和平共处方针等问题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但是,这并不妨碍毛泽东和中国最高决策层基于自身的利益对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给予高度的重视。事实上,中共自50年代中期以来对苏联的强烈不满,根本上并非意识形态问题,而是民族国家利益的问题。换言之,毛泽东愤然于赫鲁晓夫者,最为主要的,还是赫鲁晓夫没有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协助中国解决美国霸占台湾的问题,反而与中国的头号敌人美国谋求缓和,甚至为此不惜损害中国的利益。^③显然,在毛泽东看来,作为中国的盟国,又是世界上唯一能够与美国对抗的苏联,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助长美国对中国的歧视态度,因而更加不利于中国与美国谈判解决台湾问题。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批判,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基于对身为盟友的苏联的一种强烈的道德谴责,只不过毛泽东所熟悉的这种批判的武器,只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及其观念罢了。也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并不曾因为谴责苏联的阶级背叛,就放弃为自身利益而改善对美关系的努力。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对苏联的这种谴责,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中国自己的外交手脚。美台关系原本就是中美关系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再用对立的阶级关系来定义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其结果只能使自己背负起沉重的政治包袱,而无从解套。

^①毛泽东:《同斯诺谈台湾问题及其他》,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48—454页; Edgar Snow,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 Red China Today*. New York, Rand on House, 1962, pp.91, 159-161.

^②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83页。

^③除对赫鲁晓夫不顾中方不满坚持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苏美首脑会谈外,中方最为反感的还有苏方为适应与美国谈判限制核试验的需要,拒绝按照双方协定的时间表提供核样品,以及赫鲁晓夫公然主张台湾问题应当像苏俄当年承认远东共和国那样,暂时听任其独立,等国家强大之后再来解决等问题。

2. 全面对抗,还是力求转圜?

1961年肯尼迪上台后,美国新政府一度在对华政策上显示出某种松动的迹象。肯尼迪在许多场合都讲过希望与中国缓和关系的话,新组成的国务院明确指示美国参加中美大使会谈的美方代表,必要时可以表示美国愿意向中国提供食品方面的帮助。新上任的国务卿腊斯克也公开宣布说:美国希望把中共纳入裁军谈判。^①

对于肯尼迪政府释放出来的这类信息,中国政府也在一定场合作出了回应。如陈毅外长就利用出国访问之机公开表态说:现在的问题是中国还看不出肯尼迪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什么新的改变,因为其近来的表现“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基本上并没有什么变化”。中美两国之间问题的要害,是美国霸占着中国的台湾,因此,要改善中美关系,关键“要看美国的新总统能否采取主动”,看“美国政府是不是可以先做出一点贡献”^②。

肯尼迪政府对中国政府公开态度的感受,差不多也是相同的。如肯尼迪这时在与新西兰首相霍利亚克的会谈中就说:他对中国的政策是非常开明的,始终希望与中共发展某种关系。但他就任后的事实证明,如同对待美国往届政府一样,中共对美国新政府仍然怀有强烈的敌意。这种情况说明,中共并不希望与美国改善关系。因此,美国也很难立即承认中共政权。^③

显而易见,中美两国政府这时的对外政策都受到极大的牵制。因为要顾及美国参众两院及其共和党人的看法,肯尼迪上台伊始,就不能不公开声称中国与苏联都对美国构成最大的挑战,而“共产党中国侵略的压力正威胁着从印度和南越的边界,到为保卫自己新获得的独立而奋斗的老挝丛林这一整个地区的安全”^④。因此,肯尼迪首次公开发表对华政策演说时,就明确表示将会延续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的政策,即继续履行对台湾当局的政治和安全承诺,反对

^①参见戴万钦:《甘乃迪政府对中苏共分类之认知与反应》,台北正中书局1992年版,第30页。

^②《人民日报》,1961年4月3、6日。

^③参见FRUS, 1961-63, Vol.22, pp.21-22.

^④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 Kennedy, 1961,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2, Vol.1, pp.329-330.

在目前的形势下允许“红色中国”进入联合国,支持台湾当局保留其在联合国的位置。^①同时,他先后下令派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南中国海,派特种部队进入越南南方,并且对同样毗邻中国的老挝进行军事干预。这些情况自然使中国方面很难对肯尼迪政府产生好感。

而因为公开打出了列宁主义大旗,并且直言批评苏联热衷于同美国搞缓和,中国政府不能不刻意站在坚决反帝的革命立场上,采取实际行动来帮助周边国家的革命党及其武装斗争。自1958年后,毛泽东加强了援助国外革命的措施,中国对外援助的经费数额逐年增多。1958年还是2.76亿元人民币,1959年就增加到3.50亿元,1960年再增加到3.63亿元,1961年更增加到5.19亿元,1962年干脆猛增到8.54亿元,1963年又增到9.61亿元,1964年则增加到12.16亿元,这一年的外援数已几乎相当于1950—1955年6年外援数的总和了。^②而外援的逐年增多,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中国介入各国革命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增加。除去继续支援中国长期的革命伙伴朝鲜和越南外,从1958年声援伊拉克革命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运动,到1959年推动越南劳动党和老挝爱国阵线重新开展武装斗争,^③再到1960—1961年与越南秘密出兵老挝,通过南塔战役等大规模作战,帮助老挝人民革命党一举夺取了与中国云南接壤的南塔、乌多姆赛、丰沙里几省,中国决心加强支持东南亚民族革命运动的态势显而易见。

但是,直到1961年,乃至1962年上半年为止,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公开场合下也还是更倾向于缓和,而非革命的。对1960年7月苏联政府断然宣布撤退援华专家一事,中方明显地保持了克制的态度。中苏两党之间的争论,也因为中方主动参与81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和刘少奇访苏而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包括对越南南方及老挝问题的介入,中国政府也都保持着某种限度,邓小平明确讲:中国的方针是支持他们打出一个局面,同时扩大统一战线,等条件成熟了,再召开国际会议来解决问题。因此,当有关国家提议就老挝问题举行国际会议后,中国明确表态赞同,进而从1961年5月到1962年7月,中国与

^①参见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John F. Kennedy, 1961,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2, Vol.1, pp.329-330, pp. 259-260.

^②综合1950—1964年历年国家预算决算报告所得。

^③参见《毛主席接见老挝人民党主席凯山·冯维汉的谈话》,1959年10月4日。

美、苏、英、法等 14 个国家的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专门会议,最终达成了和平协议,在老挝组成了有左、中、右三方参加的临时民族团结政府。^①

之所以会存在着这种矛盾的现象,显然是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自 1960 年秋起,大跃进运动所造成的全国范围的经济危机和各地农村发生的严重饥荒,已经成为不可掩盖的事实。各地虽极力向上封锁消息,却还是有不少严重饿死人的消息报到了毛泽东那里。^②毛自知问题严重,一时间亦闷闷不乐,心情沉重。他因此开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痛斥“一平二调”等平均主义做法,^③甚至不得不承认自己和中央都受了地方的骗,说:这几年中央对下面的情况不摸底,其原因就是那些官僚主义分子封锁了消息。^④鉴于粮食、棉花、油料、生猪、食糖、卷烟以及各主要轻工业生产全部严重萎缩或减产,人民生活极其困难,1961 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也破天荒地承认:“农业两年歉收”,1960 年“农业生产计划和依靠农业供给原料的轻工业生产计划都没有能够完成”^⑤。国内经济形势如此严重的急剧逆转滑坡,显然是毛泽东料想不到的。从 1961 年开始,毛不能不两次三番地在党内公开做自我批评,并且在 1962 年 1 月集中全国县以上干部 7000 余人到北京开会,让大家“出气”,以便为这些精神上备受打击的干部鼓劲儿和打气。^⑥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会牵制他在对外政策上进一步采取更加激进的做法。

不过,对毛泽东这时更具牵制力的其实还是另一个因素的影响。由于曾经一鼓作气打败了由美国武装和扶持的国民党几百万军队,创立了新中国;在朝

①参见马金案:《援越援老抗美亲历记》(连载六),《东南亚纵横》,2002 年第 3—4 期。

②如河南信阳地区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和桂林地区大量饿死人的情况,毛均看到,毛并对中央关于河南、山东、甘肃、贵州发生严重饥荒,出现大批饿死人情况的报告有所批示。1960 年底毛亦曾写信给正准备下基层调查的身边工作人员,要他们对饥饿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说“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可见毛很了解此次灾难的程度。参见《对中组部、中监委关于信阳问题的调查材料的批语》,1960 年 10 月 26 日;《给即将下放的身边工作人员的信》,1960 年 12 月 26 日;《对中央关于河南、山东、甘肃、贵州的严重情况的指示的批示》,1960 年 12 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 326、399 页。

③指人民公社成立以来各地盛行的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和县、社两级可以无偿调走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财物的做法。

④参见郑谦、韩钢:《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第 234 页。

⑤《人民日报》,1961 年 1 月 1 日。

⑥参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22 页。

朝鲜战场上又以弱对强成功地直接教训过当时不可一世的美国军人；在经济恢复和经济建设方面，10年时间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所有这些都让毛泽东等人非常自豪。但另一方面，和苏联，特别是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国力及其经济的基础，又相差甚远，用毛泽东的话来讲，中国还只是一个小指头，被人看不起。这种反差极大的情况，自然让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对外关系问题上极其敏感。尤其是美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以及在外交承认和经济对策问题上，都采取着敌视中国的政策，使得中国不仅无法完成其自身的统一大业，而且无法获得应有的国际承认和国际活动空间，这种情况只能让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愈加感到屈辱和愤慨。

由此也就造成了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即他们一方面极力表现出自己不在乎西方国家的外交承认，不在乎进不进联合国的态度，甚至不惜为此公开与西方对抗，支持反帝革命。就是存在着与美国改善外交关系的机会，他们也往往会因为强烈的自尊心而不愿示弱于人，故再三强调策略手法。比如陈毅这时就明确主张：“中美关系，保留一定距离比较好，现在还没有到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到美国人确实完全输光，对他很不利了，不解决不行了，那时水到渠成，可以解决。”^①另一方面，他们又深知中国要想获得确实的国际地位，包括解决中国统一的问题，非得到美国的承认并与美国交往不可，因而又非常想要改善与美国等国的关系。这使得他们极为重视西方国家官方或民间舆论中透露出来的各种信息，尤其是那些可能促使美国和西方世界改变对中国看法，进而导致双方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的种种迹象。发生在1960—1961年间毛泽东与前英国陆军元帅，刚刚退休不久的蒙哥马利之间的交往，就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了这种情况。

蒙哥马利能够受到中方邀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在欧洲的声望和在东西方关系问题上的态度不同一般。蒙哥马利不仅在对德战争期间战绩辉煌，声名鹊起，而且在战后长期担任英国总参谋长、西欧联盟各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委员会常任主席等要职。1951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最高司令部成立后，美国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最高司令部司令，蒙哥马利则就任最高副司令。在西方军事领袖当中，蒙哥马利也是力主东西方缓和的极少数将领之一。因此，请蒙哥马利

^①《陈毅同志关于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的报告》，1961年3月，广东省档案馆藏档，248/1/40/39。



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在上海会见蒙哥马利

来华访问,不仅是旨在争取影响英国,乃至西欧国家的一种策略,同时也是旨在影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一种尝试。

蒙哥马利于1960年5月下旬来华访问。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接见了,与他进行了谈话。毛在谈话中着重谈的是国际形势,尤其是美国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他解释了中美冲突所在,以及美国在东西方关系中的作用,指出当今世界到处存在着紧张局势,实际上处在“冷战共处”的状态,但强调中国并不想用战争来解决中美两国间的问题。^①

^①参见《同蒙哥马利的谈话》,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81—193页。

蒙哥马利回国后，于6月12日在英国报纸上发表了蒙哥马利的访华观感。他在文章中对中国颇多好评，以亲身经历证明新旧中国两重天，中国革命不可避免。称赞毛泽东“是一个十分有吸引力的人，非常有才智，处理问题很讲实际，对西方世界情况的了解是惊人的”。说中国需要和平，以便从事长期艰巨的建设，因此不会对外进行侵略，也并不试图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它的共产主义思想。他断言，因为中国人民的勤劳能干和新政权的统合能力极强，因此50年后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据此，他建议：“西方世界最好与这个新中国交朋友。”

新华社很快注意到蒙哥马利的这篇观感，并将它译成中文刊登在6月16日下午版的《参考资料》上，毛泽东读到此文后十分兴奋，当即批转其妻江青，称：“此件可看，很有兴趣。蒙哥马利和我、总理会谈，他盛赞了中国人民的大（干）劲，要和平，不侵略，五十年内大有可为。他说中国革命是正确的，不可避免的。”^①

因为蒙哥马利的这种态度让毛深感振奋，他马上又调阅了世界知识出版社3月就已翻译出版的蒙哥马利的一本谈论东西方关系问题的集子。尽管书中蒙哥马利很少谈到中国问题，但他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政策的批评和应当把争取一个和平友好的中国作为西方国家最主要的政治目标之一的说法，还是让毛十分欣赏，他马上批示要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都读读此书，称此书“很有意思，（乃）必读之书”^②。

紧接着，外交部办公厅再报蒙哥马利9日在某公司宴会上的讲演内容，蒙哥马利在讲演中又一次公开称赞了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并力主西方应当设法与苏联和中国这些共产主义国家和平共存。毛泽东饶有兴趣地读后，再度深受触动。显然，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已经身为英国贵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蒙哥马利，何以会有如此开明的看法？他不能不怀疑，整个西方世界是否已经处在不得不承认新中国地位和作用的转折关头了。为此，他再度

^①《对蒙哥马利〈我同毛的会谈〉一文的批语》，1960年6月20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219—220页。

^②《对蒙哥马利〈一种清醒的做法〉一书的批语》，1960年6月21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222—223页。



1961年9月23日毛泽东在武汉接见蒙哥马利

将此文批转江青，并特别写道：“应当研究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①

因为注意到蒙哥马利的亲华态度和对西方，包括对美国的宣传作用十分重要，毛泽东和周恩来明确指示外交部在适当时机可再邀蒙哥马利来华。因此，1961年9月，蒙哥马利再度被请来中国，毛泽东这回破天荒地一连见了三次。这次谈话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毛泽东向蒙哥马利介绍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从毛谈话的主旨看，他显然是在强调中国革命，包括中国经济建设的艰难与不易，用以说明新中国虽然已经有了很强大的足以保卫自己国家的军队，但它与西方的差距还非常大，自身的问题还非常多。^②

^①《对外交部〈摘报蒙哥马利在德拉鲁公司宴会上的讲话〉的批示》，1960年6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第228—229页。

^②参见《毛主席接见蒙哥马利的谈话》，1961年9月22—24日。

蒙哥马利的两度来访,并没有对中美关系,哪怕是对中国与英国等西欧国家之间的关系,带来任何哪怕是微小的改变。但联系到毛泽东在处理与美国关系的问题上从来习惯于透过他比较信任的外国友人,如埃德加·斯诺,来传达某种希望缓和的信息,^①毛泽东这时对蒙哥马利言论及其作用的高度重视,事实上反映出,即使在中国已经举起反帝革命大旗的情况下,毛泽东等人其实也还是暗自期待着双方关系出现某种积极的变化,并尝试着发出某种讯号的。

3. 美国刺激中国,还是中国刺激美国?

进入到1962年,中国对肯尼迪政府所寄予的期待可以说彻底破灭了。最让中国方面不可容忍的,是一直声称想要和中国改善关系的肯尼迪政府,在1961年联合国就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会员国问题而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当中,不仅没有作出任何哪怕是形式上的友善姿态,反而带头提出了一个明显是旨在刁难和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入联的提案。该提案提出:任何关于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提案,不能以简单多数通过,而必须经过联合国大会2/3的成员国表决同意方为有效。这一提案以61票同意、34票反对、7票弃权而被采纳。^②实际上,还在得知美国政府的这种态度之后,毛泽东就在对外国友人的谈话当中怒不可遏地表示了他的愤懑。他宣称:“真正的马列主义都要反帝,首先是反美帝”,不反对这个美国帝国主义,“这还算共产党吗?还算马克思主义者吗?”^③

而让中国方面进一步印证肯尼迪政府敌视中国更甚的,则是其接连表现出好战的特点。这突出地表现在1961年春夏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对社会主义古巴的武装偷袭行动,以及美国政府不顾国内外的强烈质疑,断然向越南南方派出特种部队,实施“特种战争”。尤其是针对毗邻中国边境的越南的这一军事行动,让中国方面深受刺激。

^①前述1960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通过接见斯诺来表达愿意与美国缓和关系的信息,以及1970年10月毛泽东、周恩来再度通过邀请斯诺访华并登上天安门城楼,来向美国政府传递愿意缓和关系的信息,都说明了这是中国领导人处理对美关系的一种旨在保持自尊的情况下示以善意的特有方式。

^②参见FRUS, 1961-1963, Vol.22, p. 162.

^③《毛主席接见委内瑞拉客人的谈话》,1961年12月5日。

在此之前,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中共其他领导人,在与越南、老挝领导人的会谈与谈话当中,虽然极力鼓励和赞扬这两个国家开展的武装斗争行动,也下大力气给予直接的物资方面的,甚至是军事方面的支持,但是,他们始终在强调的一点是,打要打,一定不要把美国人引进来。特别是注意到美国开始派出特种部队进入越南南方,宣布将为南越军队提供后勤补给方面的支持后,中共中央更是颇为担心。为此,在1961年中共领导人与越南党领导人谈话当中,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这种看法。比如,11月中共领导人集体接见越南劳动党总书记胡志明时,就直接谈到了这个问题。

邓小平说:“我们同黎笋同志谈到南越有几种前途,最好是南北统一,最坏是美国出兵,把南越变成完全的殖民地……”即使不能很快实现最好的前途,也一定要避免最坏的前途。周恩来说:美国出兵是个大问题,但目前美国国内对出兵问题还有争论。因此,“小打(如目前打游击战)、中打(即在境内大打)、大打(美国出兵),可考虑中打”,一定不要大打。胡志明则对中国领导人的说法不以为然。他说:“关于美国出兵的可能性问题,我的看法是,可能性不大。”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美国都靠别人打仗”;“在朝鲜战争中,美国人死了很多”;“美国如果一定要派兵到南越增援,它会利用蒋介石军队和东南亚集团的军队”的。对此,邓小平坚持说: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大意,“游击战要打,但要小打。小打,美国不会出兵。大打,占西贡、堤岸等大城市,把吴庭艳政府完全推翻,美国就有可能出兵,因为别的办法都来不及”^①。

然而,随后的形势发展明显地出乎中共中央的预料。虽然越南在南方并没有去攻打大城市,因为南越当局无力应付,美国还是以提供后勤保障为名,向越南南方派出了它的特种部队,并且直接卷入到作战行动中来了。^②在中国方面看来,这等于是另一次朝鲜战争的危险又出现了。为了遏止战争进一步向北越扩展,出现中国不得不再度出兵的情况,中国政府在1962年夏天与越南领导人在北京举行了专门会议,共同分析了美国特种部队进入越南南方后所造成的严重局势。中国政府破天荒地作出决定,立即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

^①《毛主席和胡志明主席的谈话》,1961年11月14日。

^②美国驻越军事人员从1961年初的875人,到1963年已增加到16000多人。

个步兵营的枪炮,^①以便最大限度地加强越南的军事力量,抵御和牵制住美国。

与此同时,1962年元旦伊始蒋介石国民党的动向,也极大地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戒备。由于肯尼迪秘密批准了中央情报局的建议,允许台湾当局对中国大陆沿海进行小股袭击行动,蒋介石于元旦当天雄心勃勃地发表文告,号召“全民动员、迎接这一国民革命反攻复国的总决战”^②。随后陆续有情报显示,国民党方面确在加紧准备大规模“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据此,周恩来于6月初迅速指示正在休假中的王炳南返回华沙,与美国代表接触,告诫美国政府必须对蒋介石的冒险行动负责,不要玩火。^③毛泽东则于6月8日召集军方领导人,亲自部署备战。他明确指示:现在虽然西北有苏联修正主义分子在新疆少数民族中进行颠覆活动,在西南有尼赫鲁挑起中印边境冲突,但是,我们的战略方向还是东南,“这是我们的要害”,一定不能让国民党登陆,同时还要防止其空降军队,占领一个中心城市。他据此提出了“备战动员”的方针,进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在军事方面补充了4个满员师,并动员了新兵25万余人,并向福建前线地区调集了7个师,十几万人。^④为了“使人民普遍有所准备”,毛泽东还于6月18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专门给各级党委下发指示,要求各地要迅速将国民党准备进行军事冒险的意图告知全体民众。^⑤

6月23日,新华社受命发出台湾国民党意图窜犯大陆沿海地区的电讯稿。次日,《人民日报》公开刊发了这篇稿子。外交部部长陈毅也同时发表声明,指出:我国正密切注视美国和国民党部队对中国沿海岛屿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如果美国一定要利用蒋介石匪帮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只有奉陪到底。”“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的全部责任。”^⑥中国政府这一系列公开宣示,促使肯尼迪于6月27日公开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①参见《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59页。

②《中华民国纪事》(一九六二年),台北“国”史馆编印1978年版。

③参见王炳南前引书,第90页;并见《参考消息》,1962年6月27日。

④参见《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的报告》,1962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6—1227页。

⑤参见《对新华社关于蒋军准备窜犯我沿海地区电讯稿的修改和批语》,1962年11月12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第102页。

⑥《人民日报》,1962年6月23日。

就此作出反应。尽管他强调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纯粹是防御性的,美国不支持蒋介石在台海地区使用武力,但是,中国方面并不真的相信美国政府的说法。从中国方面这时大举向东南沿海地区集中兵力,并且在内部发行的《内部参考》《参考消息》等报刊不断报道的有关美蒋正就国民党“反攻”问题进行商谈之类的系列消息可以看出,它确实按照毛所要求的,把东南方向的威胁看成是重中之重,做着战争准备,并且认定了国民党此举有美国在幕后主使。

中国这时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许多地方的饥荒造成靠近边界地区的民众大举外逃,在中共中央看来,美国选择在这个时候接连在毗邻中国南方边境地区的越南和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制造紧张局势,甚至直接诉诸武力挑衅的方式,这显然是一种赤裸裸的政治颠覆行动和严重的战争威胁。再加上这个时候新疆伊(犁)塔(城)地区发生少数民族集体向苏联逃亡事件,^①印度又在西藏边境地区制造麻烦,这些都极大地加剧了中共中央的危机感,也彻底破灭了毛泽东对争取美国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残存的幻想。

1962年7月,围绕着如何估计经济形势,在农村要不要由人民公社的大集体,暂时退到分田到户,或实行包产到户,以便恢复农业经济的问题,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发生意见分歧。联系到现实的国际政治压力,毛泽东迅速把这一切联系起来,上纲上线,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尖锐指出:当前国际国内都有一个共同性问题,就是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对我们这样的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现在在国内形势估计以及农村发展政策问题上,已经出现右的苗头,在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出现了右的苗头。^②

由于毛泽东把形势估计问题视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立场问题,导致党内所有自1962年年初七千人大会以后形成的各种不同意见,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等此前曾多次就对外政策问题向中共中央提出意见,主张在我国目前条件下,对外援助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

^①有关此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可参见李丹慧:《对1962年新疆伊塔事件起因的历史考察》,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6—514页。

^②参见《毛泽东传》(下),第1229—1235页。



长期担任中央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左一)

和乱开支票,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主张不要泛泛地否定和平共处的提法,而应当相信通过同帝国主义的反复的坚决的斗争,终能迫使帝国主义国家同我国建立起不同程度的和平共处关系。^①根据这一观点,中国出席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的代表,也较多地强调了和平的立场。毛泽东得知后,极为不满,甚至于尖锐地得出结论称:1962年上半年一个短时期内,我们党内少数同志相当发了狂,主张“三和一少”,就是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少援助一点。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迁就了赫鲁晓夫,把我们自己搞得很狼狈。我们必须反对我们

^①参见《关于支持别国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问题——实事求是,量力而行》,1962年3月31日,参见《王稼祥选集》,第444—445、446—460页。

自己内部的修正主义,因为他们“向资产阶级投降”^①。

在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问题,周恩来则依据毛的这一思想,具体分析了中国在当前国际阶级斗争形势中的斗争策略问题。他明确归纳出了三大斗争任务,即反帝、反修和反对各国反动派。他说:“我们跟美帝的矛盾是个主要矛盾”;我们跟修正主义的斗争开始进入到“短兵相接”的阶段;我们对“反动民族主义”也必须坚决揭露,并敢于斗争。他并且用极具鼓动的口吻宣布道:“同志们说得对,马列主义真理,世界革命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北京了。……我们现在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②

八届十中全会之后的中共中央,迅速开始实践反帝、反修、反对各国反动派的革命外交路线。基于毛泽东再三强调的,要把反美斗争作为主要斗争方向的要求,中共中央这时对西北方向的新疆伊塔事件采取了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而对西南方向上印度武装在边界地区接连不断地在双方有争议地区进行侵扰的行为,则毫不犹豫地实施了“外科手术”式的军事反击,一举消除了已有数年之久的来自印度方面的边界威胁。结果,等到台湾国民党人准备停当,开始接连对大陆发起小规模突袭活动之时,中国方面以逸待劳,从10月至12月轻而易举地先后在广东沿海地区歼灭了从海上登陆和空投的九股台湾武装特务,计172人,缴获了一批美制通讯器材和枪支弹药。^③

因为确定了大力援助各国革命运动的基本对外政策方针,中国自1962年起即大幅度增加援外支出,以便援助各种赞同进行反对美国和反对本国反动统治力量的革命的政党和组织。除前述第二个五年计划前后援外款项逐年增加的情况,我们这里还可以从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援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变动的情况,清楚地了解1962年这种援外支出额度变动的幅度究竟有多大。

根据相关统计,1950—1955年这6年期间,中国用于援助外国党和外国组

^①《毛主席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1964年3月23日,并见丛进等著:《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77页;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567页。

^②《周恩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报告》,1962年9月26日。

^③参见FRUS, 1961-1963, Vol.22, pp.337-338.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

织的款项，占这几年国家财政支出的1.2%左右。1957年，一度达到1.73%。但进入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后，援外支出的数量却大幅减少，1958年只占国家财政支出的1.257%，1959年占1.2%，1960年占0.7%。但十分明显的是，1961—1962年经济严重困难，财政收入大幅减少，援外支出却仍在增加。1961年比1960年只增加了1900万元。1962年比1961年猛增了3.35亿元，占到了当年财政支出的2.79%。此后，1963年为9.6亿元，占财政支出的2.84%，1964年为12.5亿元，占3.15%，1965年为18亿元，占3.95%，1970年占3.5%，1971年占5.1%，1972年占6.65%，1973年占7.2%，1974年占6.3%。^①这些援外支出数字的变化，最直接不过地显示出了中国对外政策从1962年开始迅速转趋激进的情况。

那么，1962年中国对外政策发生的这种急剧变化，究竟是何种因素

^①参见财政部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第二辑（国家预算决算，1950—1981），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版，第157、195、227、245、269、290、328页。

造成的呢？关于这一点，美国学者小阿瑟·施莱辛格对肯尼迪政府此后的政策变化有过深入的考察，并得出结论称：“1962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古巴导弹危机、中印边界冲突和中国支持越南的民族革命战争等等，均强化了肯尼迪政府中敌视中国的情绪，使美国的决策者深信，中国是对美国更直接和更危险的威胁。”^①从已经开放的美国档案或许可以印证施莱辛格的这一论点。但是，他没有注意到的是，在充满猜疑和敌意的氛围之中，这种对对方政策意图的误读，从来都是双方面的。事实上，1961—1962年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美国在联合国刻意制造障碍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入联的难度，开始大举派遣特种部队进入越南南方作战，“放蒋出笼”大举突袭大陆沿海地区，以及组织流亡分子武装袭击社会主义的古巴等等，同样也强化了毛泽东及其中国政府的危机感，因而刺激了其敌视美国的情绪。中国的决策者们同样深信，必须全力应对美国这个中国最直接和最危险的敌人。

4. 既要世界革命，也要统一战线？

在1963年毛泽东的各种谈话及指示当中，相比较于1962年变化最为显著的一点，就是他再也不对美国政府抱有任何幻想，而是逐渐地开始强调备战问题，并把改变国际政治力量格局的希望，寄托在各国革命党及其武装斗争的前途上面去了。

如2月19日，在张国华向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中印边界冲突问题时，毛泽东在插话中特别提醒与会者：“你们要注意，你们都要准备打仗，不要以为天下太平，要注意军事。只搞文化，不搞武化，是不行的。各省、各大区、中央的同志都要注意。”^②

如3月6日，毛泽东在接见巴西共产党（新党）代表团时明确讲：“马列主义者就是要搞革命。不革命算是什么共产党？不革命的，在人民看来同资产阶级政党没有多大区别。这样的党没有存在的必要。”他并且告诉在座的客人说，

^①小阿瑟·施莱辛格著，仲宜译：《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643页。

^②《毛泽东在张国华同志向中央工作会议报告中印边界斗争问题时的插话》，1963年2月19日。



毛泽东与来访的巴西共产党总书记若昂·阿马索纳斯

他已经把中国 1927 年大革命失败的经验告诉了那些仍然在走议会道路的各国共产党人,如印尼党、日本党等,请他们注意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建议他们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准备,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在军事上也进行准备”^①。

4月26日,毛泽东接见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时进一步讲:要准备打仗,“你们要我们援助,我们全力以赴。要我们出兵,我们出兵,要武器可以无代价供给,要财政援助我们尽可能地充分援助。对你们为什么要有代价呢?要买,要还账,这没有道理,不是国际主义。这实际是援助我们,不是援助你们。你们打了帝国主义,我们就巩固了嘛!我认为这是真理,其他都是假话”^②。

^①《毛主席接见巴西共(新党)代表团谈话记录》,1963年3月6日。

^②《毛主席接见朝鲜《劳动新闻》代表团谈话记录》,1963年4月26日。

据此,总参谋长罗瑞卿受命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越,与越南领导人具体研究美国进攻北越的情况下双方配合作战等问题。毛泽东当着越南劳动党代表团的面承认中国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犯过错误,说“有一个时期我们曾经劝你们只搞政治斗争,不搞武装斗争,你们是正确的”。双方还共同研究了日内瓦会议后老挝局势右转的情况,准备重新恢复对老挝寮国革命力量的实力援助。毛泽东甚至提出:“现在老挝没有越南军队,富马还不是说有越南军队。”我看不妨再来一个两个三个南塔战役,富马到时候完全站到美国一边去,联合政府垮台也不要紧。因为“老挝斗争不仅关系到老挝民族,也关系到东南亚和世界被压迫民族”,总是现在这个样子不行。“我看老挝问题闯不了什么大祸。”^①与此同时,按照《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的建议》中亚、非、拉广大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区和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的估计,^②中国政府已开始在国内秘密设立训练基地,邀请亚、非、拉美各国共产党及各种革命团体派人来华学习从事武装斗争的理论、经验和军事技术,主张各国革命党人尽可能把领导中心搬到农村去,以便发展武装,展开革命。^③毛泽东的原则是:“不论是共产党还是民族主义者,只要真心反帝,我们就支持。”如果对他们的要求不热情,不给予满足,我们就不配称为国际主义者。根据这一精神,许多落后国家的革命分子辗转来到中国要求援助和接受培训,到年底时,已经有一些接受短期培训的人员完成了学习,并得到了相应的经费援助,回国开展武装斗争去了。^④

基于这样一种对外政策,共产主义世界中谁主张和新中国的死敌美国缓和关系,谁就是中国的斗争对象。自1月27日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以《人民日报》社论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接连发表《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等重要文章。《再论》一文甚至长达10万字之多,全面批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

①《毛主席接见越南劳动党代表团的谈话》,1963年6月4日。

②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1963年6月14日,《学习文件汇编》,第三集,第28—29页。

③参见《毛泽东接见秘共左派代表何塞·索托马约等的谈话》,1963年12月12日。

④参见《毛主席接见哥伦比亚“工学农运动”学习代表团的谈话》,1963年12月5日;《毛主席接见秘共左派代表何塞·索托马约等的谈话》,1963年12月12日。

和平过渡之类的修正主义论调,系统阐述列宁主义的革命与战争的观点。尤其是3月30日以中共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可谓拉开了中苏意识形态大辩论的序幕,引发了随后中苏两党之间长达两年之久的全面论战。^①

对于这场论战的意义,刘少奇在2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有过明确的说法,就是:“这次斗争关系到整个世界革命的前途,关系到人类的前途(毛插话: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前途),世界革命还要不要搞,还要不要继续革命,人类到底是解放还是让资产阶级永世压迫下去,是这么个问题。”“我们的方针有这么几句话:坚持原则反对修正;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革命反对投降;坚持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②

与此相呼应的,是中国国内政治自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也开始迅速左转。中共中央自2月起即决定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③5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制定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并很快在党内传达贯彻。“前十条”认为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党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把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文件传达毛泽东的话说,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④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又讨论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后十条”)。“后十条”在贯彻“前十条”指导思想的情况下,更进一步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方针和思想路线。^⑤

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一年里,中共中央在实际政策上却还是

^①参见《学习文件汇编》,第二集、第三集。

^②《刘少奇关于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1963年2月25日。

^③最初的“四清”旨在“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以后逐渐演变成“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④参见《关于印发〈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通知》,1963年5月20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309—329页。

^⑤参见《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的批语、通知和对〈后十条〉的修改》,1963年10—11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86—391页。

处在一种摇摆不定的过渡状态中。

比如,在反帝问题上,毛泽东仍旧强调“美国有很多困难,国际国内到处碰钉子”。借用美国人文章中的说法,称“美国好比一棵被虫吃空了的树一样,外面枝叶茂盛,内部空虚”。因此,他明确肯定1961年在越南问题上要小打不大打的方针,说“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相结合,只小打不大打”^①的方针,是对的。

比如,在反修问题上,刘少奇也特别说明:“和某些修正主义党可以搞统一战线式的联合,不公开的完全破裂,实际上各搞各的。因为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矛盾不可能消除的。估计苏中打不起来。”^②

再比如,在反对各国反动派的问题上,中国方面这时也未四面出击。恰恰相反,对于周边国家的一些亲华的所谓资产阶级政府,依旧采取了相对缓和的政策。刘少奇于4—5月间特地以国家主席身份,前往缅甸、印尼、柬埔寨等国进行了友好访问。缅甸奈温政府因为搞社会主义,国际国内很孤立,毛特别指示要让奈温多维持几年。故奈温6月提出无条件地与缅甸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北京方面特意敦促在北京的缅甸共产党领导人德钦巴登顶等回国直接参加谈判。毛泽东在与德钦巴登顶的谈话中还明确讲:要争取谈成,要“做奈温的工作,团结一切反帝力量,只反对帝国主义走狗和买办资产阶级”^③。

从毛泽东这时对外战略指导思想,也可以看出,他这时总体上也还是重视统一战线策略方针的。比如,他在9月28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重提其“中间地带”的观点,讲:“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个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④言外之意,对亚、非、拉美大多数国家,以及对欧洲、日本、加拿大和东欧各国,还是要当做与美、苏有矛盾,因而具有争取利用可能的“中间地带”来看待,不能一味视同敌人。

①②《毛主席接见越南劳动党代表团的谈话》,1963年6月4日。

③《毛主席同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谈话记录》,1963年8月27日。

④《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6—507页。



1963年8月毛泽东与来访的缅甸共产党副主席德钦巴登顶交谈

影响到在国内问题上，毛泽东直到1963年夏也还明确认为，经济调整的方针还应继续，说1963年、1964年、1965年仍应作为调整的年代。^①换言之，虽然中共中央1963年在国内开始全面推动阶级斗争，在国际继高举起反帝大旗之后，又开始全面发动起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并且暗中开始大力援助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但是，中国外交政策还延续着此前的惯性，没有发生急剧的转变。由此也就不难了解，何以1962年中国援外支出大幅上扬到占当年财政支出2.79%之后，1963年的援外支出只增加了1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较1962年只增长了0.05%。

^①参见薄一波：《关于一九六四年计划的问题》，《党的文献》，1998年4期。

5. 战备防美,还是战备防苏?

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异乎寻常地召见了在中国的几名外国友人,即前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李敦白(Rittenberg, Sidney)和爱泼斯坦(Epstein, Israel),以及前美国国务院官员柯弗兰(Coe, Frank)和刚刚来华定居的美国经济学家爱德乐(Adler, Sol)等人。谈话伊始,毛照例先客气地与客人们闲谈片刻,聊聊所见所闻及各自经历。但十分钟后,毛即直言相告:“现在,(我们)在外交上遇到两个问题,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一个是,美国现在主要是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第二个是,美国现在是不是在积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有人说是。”

斯特朗明确表示自己是外行,但认为美国目前恐怕主要还是想要保住它已经取得的東西,除非它占有很大的优势,否则它不会同苏联打仗的。

李敦白认为柯弗兰更有资格谈这个话题,而柯也认为,美国现在在全世界各处都处于守势中,对苏联、东欧虽有攻势,但只是政治攻势而已。

爱泼斯坦则介绍了美国报纸一般的说法:在当前,在短期内,苏联是主要敌人;从长期来看,中国是主要敌人。

毛泽东也讲了他自己的看法,说:“帝国主义是实用主义,长期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太久了。现在他们看不起我们,认为我们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而苏联是一个工业大国,是两大原子弹强国之一。美国对苏联东欧的攻势,不可能不受到抵抗,美苏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但他也承认,“看一看历史,美国总是要到最后才参加国际战争的。第一次大战如此,第二次大战也是如此。现在美国手伸得太长,用四川人的话来说,是十个手指按住了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①。

在这次谈话前不久,即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副总统约翰逊(Johnson, Lyndon B.)继任总统一职,美国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如何认识今后几年的国际形势,以便决定相应对策,成为毛泽东面临的一个难

^①《毛主席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柯弗兰、爱德乐、爱泼斯坦、李敦白等外国友人的谈话》,1964年1月17日。



毛泽东会见爱泼斯坦(左二)、斯特朗(右一)、李敦白(左一)

题。作为坚定的列宁主义者,毛始终坚定地相信“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而他又曾不止一次地讲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打过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隔了二十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中间,是不是有可能给我们同样多的和平时间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呢?在1956年初毛泽东讲这个话的时候,当时距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有10年时间了,因此他当时期望还能有11—12年的和平时间。^①而如今,又过去了将近9年时间,如果按照21年和平时间的算法,距离新的世界战争的到来,则只有两三年左右的时间了。相信战争不可避免,同时只看到美苏妥协,却看不到大规模战争迹象的毛泽东,不能不感到相当的困惑。故尽管在中国的这几个美国人对美国国际事务

^①参见《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1月20日。

和国家安全问题并无研究,毛泽东还是专门把他们找来,希望能够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见解。结果,他发现,他们和他一样,也看不出美国有发动世界大战的迹象,而且相信美国短时间内也不会把中国当成自己的主要敌人。

但是,总参谋部作战部4月25日向副总长杨成武提交了一份报告,杨5月9日上报给罗瑞卿,罗当天分送毛泽东等中央常委。报告中称:“我们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从我们接触到的几个方面来看,问题是很多的,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一)工业过于集中。14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就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50%的化学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包括:飞机制造工业的72.7%,舰艇制造业的77.8%,无线电工业的59%,兵器制造工业的44%)。(二)大城市人口多。据1962年底的统计,全国有14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有20个50万人至100万人口的城市。这些城市大部分都在沿海地区,易遭空袭。战时如何组织城市防空,疏散城市人口,保障坚持生产,消除空袭,特别是核袭击后果等问题,尚无有效措施。(三)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一般多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易在敌人轰炸时一起遭到破坏。同时,这些交通要点,都还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战争初期,交通可能陷入瘫痪。(四)所有水库,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我国现有容量达到1亿—350亿立方米的大水库232个,其中52个位于主要交通线附近,有17个位于15个重要城市附近。此外,尚有不少中、小型水库位于政治、经济、军事要地和交通干线的要害位置……被同时破坏后,北京市及周围广大地区将遭洪水冲击,并且危及天津……我们认为,上述问题,是关系到全军、全民和直接影响卫国战争进程的一些重大问题。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积极措施,以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①

还在一年前,毛泽东就在强调备战问题了。总参谋部作战部的这份报告,正是基于毛对战争危险的估计而调查起草的。它的结论又再度触动了毛泽东对战争可能很快到来的那根敏感的神经。显然,如果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平年代的时限来看,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时间可能就在几年之内。注意到这一

^①《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1964年4月25日,参见《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

点,毛泽东随后即对中央计划小组汇报的“三五”计划提出了疑问,对李富春等按照他此前继续调整的方针制定的以农轻重为序着重恢复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计划的方案,表示不大赞成。说:“(甘肃)酒泉和(四川)攀枝花钢铁厂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个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①

到了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的说法就变得更加清晰和坚决了。他明确提出了三线建设的主张。说沿海边疆地区是第一线,京广线沿线中部地区,包括包钢、武钢、湘潭钢铁厂等都属于第二线,西南西北腹地是第三线。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建设应当放到第三线上来。毛解释说: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知道帝国主义哪天会发动战争,但不能再拖了,我们必须马上做准备。“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罗瑞卿讲到总参作战部的报告内容时,毛泽东特别插话称:“北京出了问题,只要有攀枝花,就解决问题了。北京淹了,有攀枝花嘛!”刘少奇和邓小平随后都补充说:这是因为“酒泉过去和西南一样是大后方,现在变了,也算二线”。因为北面出了大修正主义,西北的概念变了。到时候我们也要学蒋介石那样,靠西南吃饭,往西南钻。^②

6月8—11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多次谈到战备问题。他重申: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打仗。但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攀枝花搞不起来,我睡不着觉。你们不搞攀枝花,我骑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稿费去搞。^③

16日,毛泽东在对各大区书记的讲话中又谈到三线建设的问题,称:几年前我们计划北顶南放,我看不一定从南边先开始。敌人一定要从东北来?还是

^①《毛泽东在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的插话》,1964年5月10、11日,《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

^②参见《刘少奇、邓小平在各中央局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5月28日,参见《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

^③参见《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6月,《党的文献》,1996年第3期;薄一波:《关于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1199—1200页。

日军的老路,我看不一定。……我们计划北顶南放,如果南边放美国不进来,北边顶又顶不住怎么办?会不会来一个中间突破?比如美国可能搞空降兵,占领北京;敌人有可能走八国联军的老路,从天津、塘沽进来。“总而言之,要准备打。”各地要赶快趁和平时期搞点枪,等到打起来割断了,就搞不成了。^①

进入到7月间,毛泽东已经再明确不过地说明了他之所以要在攀枝花建钢铁基地的原因。他在政治局会上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

但是,毛泽东这时对战争形势的估计,更多地还是基于历史经验,在时间上所做的计算,因此,8月初爆发东京湾事件^②,毛也并不感到意外。他得知消息后,仍旧认为自己的判断不错。他当即下令改变原定去黄河沿岸考察的计划,批示道:“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③

按照毛泽东年初对外国党领导人的谈话精神,中国党从今以后对外要实行“三斗一多”。“这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和马列主义的政党和马列主义派别。”^④因此,中共中央这时已经多次向越南方面作过承诺,并且通过中越老三方会议的形式,具体商量过在必要条件下出兵援越的问题。按照三方会商的结果,中方曾明确表示:“美国走一步,中国走一步;美国出兵,中国也出兵。”^⑤就在美国轰炸越南北方几天前,毛泽东还亲自对越南党的领导人表态说:“如果美国人轰炸越南北方或在越南北方登陆,我们就要打了,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他要想想,中国人不是没有腿的,美国人能出兵,中国人就不会出吗?”^⑥

但是,毛泽东真的希望直接与美国交战吗?非也。毛对战争形势的判断及高度戒备,说到底还是笃信列宁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果。其反复计算战争爆发的

^①参见陈小鲁:《陈毅与中国外交》,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第152页;并参见《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472、477—478页。

^②东京湾,又称北部湾,1964年8月2日越南海军三艘快艇袭击了美国距离越南口岸23海里的美国舰只。美海军当即进行了还击,美国总统约翰逊随即下令对北越展开报复性轰炸。

^③转引自陈东林:《硝烟弥漫的西部开发——60年代三线建设决策始末》,《党史博览》,2001年第1期。

^④《毛主席会见威尔科克斯夫妇的谈话》,1964年2月9日。

^⑤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二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20—221页。

^⑥《毛主席接见陈子平等越南客人的谈话》,1964年7月2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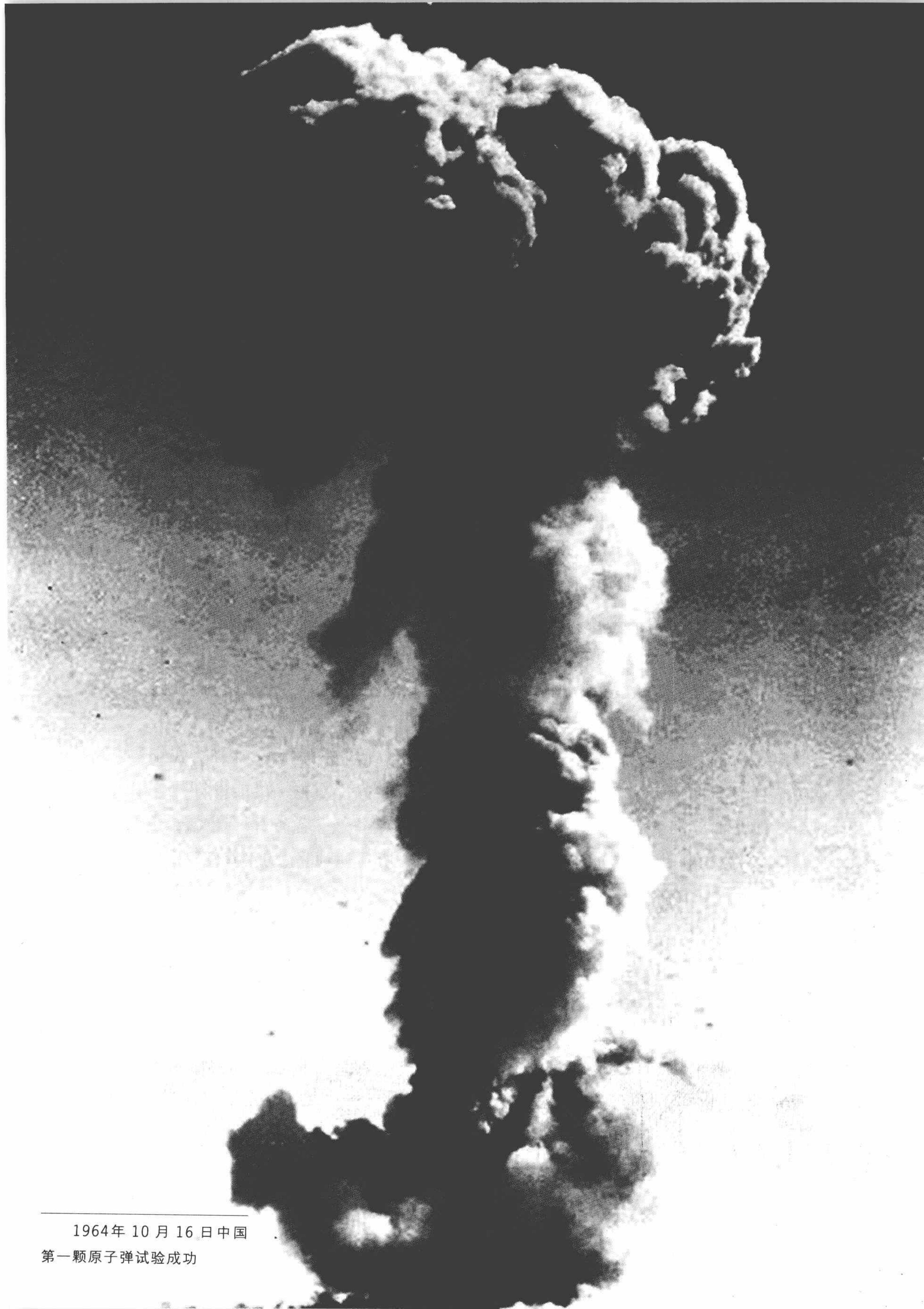
时间,并不是盼望战争早来,而是在相信战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希望能够早有预防和准备罢了。注意到东京湾事件发生后美方公开解释说事发突然,上面并不知情,似无扩大事态的态度,毛马上不提打仗的事了。他转而开始劝说越南方面“不去惹美国”。他明确讲:“看来,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一定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最好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只打像现在这样的仗,不打大仗,只打小仗,像南越那样。”对于越南党领导人关于“东南亚如果发生战争,会起很大变化。这个地区共产党都有基础,搞革命一定胜利”的说法,毛泽东表示说:“整个形势的变动,要经过艰苦斗争。国际形势没有大变动,泰国和缅甸不能完全解决,但南越和老挝问题可能基本上解决。”因此,他表示:“很赞成越共中央政治局关于采取巧妙办法,不去惹美国的决定。”^①

当然,毛泽东仍是两手准备。一方面,他非常重视美国不想扩大战争的任何蛛丝马迹,并且基于历史的经验,怀疑美国会基于社会制度的对立而发动对中国的战争。用他的话来说:帝国主义战争的目的是争夺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并不是想要改变对方的社会制度。比如,当年德国就并不是先打苏联,而是先打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也没有去打苏联,而是去打同样是资本主义的中国和东南亚各国。^②

另一方面,美国轰炸越南北方,还是多少证明了毛泽东的担心。因此,在东京湾事件发生两周后,毛又两度发出指示称:“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中共中央也因此作出决定:(一)一切新建项目,均不在第一线,特别是15个有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设。(二)第一线,特别是15个大城市的现有续建项目,除明年、后年即可完工投产见效的以外,其余一律要缩小规模,不再扩建,尽早收尾。(三)在第一线现有老企业,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城市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一个车间、特别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的,能一分为二的,都要分一部分到三线、二线;能迁移的,也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迁移。(四)从明年起,不再新建大中水库。(五)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

^①《毛主席接见黎笋的谈话》,1964年8月13日。

^②参见《毛主席同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的谈话》,1964年9月13日。



1964年10月16日中国
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

也应一分为二。(六)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①

只不过,在1964年夏天过后,毛泽东对战争方向的担心又出现了新的变化。这是因为,毛泽东在7月间曾一度公开声称: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是100年前从中国清朝手里强占去的,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②毛的这段谈话披露后,引起苏方强烈反弹,不仅公开抗议,而且马上开始向中苏边界调兵遣将。如此一来,南大门来自美国的威胁尚未减弱,北面苏联这边又大兵压境,这种情况不能不一度又使毛泽东紧张起来了。10月上旬,他曾几度对外国兄弟党的领导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即:“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苏联“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有没有可能?”等等。^③足以见毛对这一新的形势亦颇感意外。

10月16日,中国政府不无自豪地公开宣告,中国成功地爆破了一颗原子弹。这一宣告毫无疑问极大地满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但是,早在10年前就盼望着自己拥有原子弹的毛泽东,这时却感觉不到拥有原子弹后的威慑力和安全感,反而更加担心来自美苏的核打击。因此,仅仅几天后,他就再度尖锐地提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强调我们不仅要在战略部署、后方设施、作战准备和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同时,也要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④

^①参见《李富春等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的报告》,1964年8月19日,《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九册,第133—135页。

^②参见《毛主席接见日本社会党人佐佐木更三等人的谈话》,1964年7月4日。

^③参见《毛主席接见崔庸健的谈话》,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接见巴卢库的谈话》,1964年9月10日。

^④参见徐焰:《试论建国后毛泽东的战备思想》,《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第249页。

6. 积极避战,还是全力促战?

毛泽东再三强调战备,反复强调要立足于战争,准备打仗,其实恰恰说明了他内心对战争危险高度焦虑,不想打仗。因此,眼看南北战争威胁加剧,他不得不重施故伎,1965年再度把斯诺请来,于1月9日向他大谈了一通国际形势,中心在于说明中国政府并不想与美国打仗,也没有向中越边境地区集结军队,希望他能够让美国政府知道:“我们不会打出去,只有美国打进来,我们才打。这点历史作证。我们忙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打出去是犯罪的,为什么要打出去?南越根本不需要我们去,他们自己可以对付。”^①

但是,随后发生的情况把中国政府再度推到了战争的边缘。

这一年2月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武装成功地袭击了波莱古美军基地,击毁、击伤美国飞机20架,击毙、击伤美军100多名。美国方面大为震惊,约翰逊总统下令实施早已制定好的“火箭行动”轰炸计划,对越南北方再次进行报复性的轰炸。而为了彻底破坏北越对南方武装斗争的援助,美国方面又进一步实施了“滚雷计划”,开始对北越进行持续的战略轰炸,试图毁灭其北方的军事和工业设施。不仅如此,因为不满南越军队的作战能力,约翰逊总统还正式批准美海军陆战队3500人于3月初在越南南方的岬港登陆,投入对越南南方游击队的作战行动。仅几个月时间,美国派至越南的军队数量,就超过了10万人。至此,越南战争全面升级。

毫无疑问,美军的大举介入和对北越的轰炸,使中国方面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为避免再度发生类似朝鲜战争那样的情况,尤其是为了避免两面作战,中共中央迅速于4月2日通过周恩来转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方面转达中方的信息。因为没有得到回应,又进一步于5月28日和30日通过周恩来和陈毅,分别转请印尼第一副总理和英国代办,向美国政府转达了中国方面不希望与美国直接战争的态度。随后,6月8日,8月20日,周恩来又利用访问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机会,再度委托两国首脑向美方转达中方信息。其原则与1950年10月初中国政府准备出兵前向美方转达的信息几乎毫无二致。这

^①《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57页。

就是:(一)中国不主动挑起反美战争。(二)中国说话算数,朝鲜战争可以证明。(三)中国做了准备,目前全国都在动员。(四)只要美国轰炸中国,就是向中国发动战争。战争是没有界限的。^①换言之,中方一而再再而三地找关系转达信息,就是想要告诉美方,只要美国不轰炸中国,中国就不会出兵越南主动对美作战。

需要了解的是,中国方面这一时期战争的危机感异常强烈。从3月到7月,毛泽东曾数度强调:“现在我们正在准备美国人来打……美国把战火烧到我们的家门口”来了。不仅如此,他对苏联的趁火打劫也相当警惕。他为此不止一次地询问外国友人:“可不可能美国和苏联共同对中国开战呢?……你们看,美、苏合作打中国的可能性怎么样?”注意到毛泽东随后几度以半肯定的口吻谈到:“苏修可能在陆上对我们来个大包抄,置你的工事于无用;也可能再从海上来一路,在山东登陆,苏修配合美帝打进来,不是以长江为界,而是以淮河为界”,不难发现,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还非常担心出现两面作战的危险。^②

不过,一向承诺全力援助越南的中共中央,面对越南遭受美国大举侵略,要想不出兵也是不可能的了。这种情况确实让中共中央有些为难。在4月12日讨论援越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明确讲:要坚持后发制人,留有余地,将备战与长期计划相结合。包括“援越抗美”的口号,周也主张暂时先不要提,说是因为与抗美援朝不一样,那时是以我为主,“我们现在是支援越南反美斗争,还是以越南为主”。刘少奇也讲:现在确实很难,我们地面部队一赴越,战争就难免会被引到中国来。但是,难道越南请我们去我们还不去?过去表示过,要我们去就去,要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现在退缩不得。^③

为了实践自己的诺言,从1965年2月至3月,中国方面就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宣传行动。如发表声明,举行群众性集会示威等。4月初,越南党领导人黎笋率团来华,具体提出了请中国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的要求,中国领导人研究后,同意派遣志愿飞行人员和士兵,以及公路、桥梁修造人员等赴越,同时准备提供10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援助。中越双方签订了有关中国向越南北方派

^①参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445、457、474页。

^②参见《毛主席会见马共领导人洪韬、裴文、文凯和外国专家柯弗兰、爱德乐、爱波斯坦的谈话》,1965年3月19日;《毛主席会见印尼共代表团的谈话》,1965年7月4日。

^③参见《周恩来年谱》(中),第724页。

出支援部队的协议后，总参谋部即下达命令，正式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工程队”，赴越执行抢修、改建铁路，构筑国防工程和修筑机场等项任务。人大常委会这时也作出决议，号召全国人民做好充分准备，在越南人民需要时派出自己的人员同越南人民一起共同战斗。考虑到战争危险，中共中央则以中发(65)第208号文件将加强备战指示稿下发至县团级党委。指示稿中明确写道：“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应当加强备战工作。在全党县委以上的干部中，应当加强备战思想，密切注意越南战局的发展。要估计到敌人可能冒险。我们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应当准备应付最严重的情况。……我们对于小打、中打以至大打，都要有所准备。”^①

一方面，毛泽东十分担心大战到来，因而高度重视战备，极力避免卷入战争，尤其要避免两面作战；另一方面，他这时仍旧格外看重世界革命，极力想要通过周边国家的革命和反抗来牵制美国，从而巩固自身的安全。因此，还在1964年，他就全面推动国内的各种战备工作的同时，继续扮演着推动周边国家，乃至拉美各国武装斗争的重要角色。毛泽东明确讲：“最好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只打像现在这样的仗，不打大仗，只打小仗，像南越那样。”^②因此，他对越南南方的抗美战争非常满意，多次表扬，并希望把这种小规模局部战争推广到周边更多国家中去。

比如，鉴于老挝右派和中派的力量始终占据着优势，左派力量发展不起来，毛泽东一直很不满意。在同越南党领导人商量办法时他特别谈到这一点，称：“老挝打的仗也怪，这个国家有二百多万人口，打了几十年，打不出什么名堂。总得想个办法，搞三四千人，编成六七个营，训练成不信佛教，能打仗的军队，你看有没有这个可能？不然战争永远不能结束。”因此，他明确赞同越南出兵帮助老挝革命。对于越南希望中国方面也出兵帮助的问题，他也并不反对，只是表示要以越南为主。而他对出兵问题的基本意见是：“如果出兵，一定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真正能够做到帮助老挝打歼灭战，歼灭敌人数千名，狠狠地打击老挝反革命，并且协助老挝同志做好群众工作。”^③

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第359—360页。

②《毛主席接见黎笋的谈话》，1964年8月13日。

③《毛主席同越劳动党代表团的谈话》，1964年1月30日。

又如，毛泽东对美国总是能够利用泰国来作为其控制东南亚的跳板和基地一点，非常不安，明确主张应当在泰国发动武装革命。他为此特别提出：“如果得不到泰国帮助，美国要打仗也不好办。美国不仅要用基地，还要利用泰国陆军打仗。因此，对泰国很值得注意，要设法帮助泰国搞一些武装力量，能够在五年、十年内把泰国革命搞起来就好了。”^①

在1965年，毛泽东一面积极避免与美苏发生大规模战争，一面还是坚持鼓动各国革命。他坚称：“帝国主义也好，修正主义也好，各国反动派也好，都是可以打倒的。只要我们的政策正确，路线正确，人民总是会逐步觉醒起来，同我们站在一起的。不管有多少个赫鲁晓夫，不管古巴领导人怎么样，不管印尼右派怎么样猖狂，要想把人民革命的局面转变过来，是不可能的。只不过人民的胜利也许要经过相当的时间就是了。”^②

如何引起人民革命走向胜利？毛泽东这时的态度很明确，就是要到农村去。在与巴西和印尼共产党人的谈话当中，毛泽东都再三说明了他的这一观点。正是基于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林彪于9月3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20周年》一文。文称：“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从全世界范围看问题，如果说北美、西欧是‘世界的城市’，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就是‘世界的农村’。”“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③

林彪的文章，以及与政府和平共处十几年的印尼共产党一朝倾覆，似乎更进一步证明了武装夺取政权，特别是开展农村武装斗争的极端必要性。还在8月初，在与印尼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就曾直截了当地鼓动他们：“印尼右派是有决心夺取政权的，你们有没有决心？”印尼共产党的代表当即表示了很强的敢于夺权的信心。然而，不过一个多月后，因为过分相信军队中的左

①《毛主席接见黎笋的谈话》，1964年8月13日。

②《毛主席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外国朋友的谈话》，1965年11月24日。

③转引自《人民日报》，1965年9月3日。

派力量,同时党又集中在城市中,印尼共产党刚刚开始做夺权的准备,就招来了印尼军方的血腥报复和镇压,数百万党员很快便土崩瓦解了。^①毛泽东因此明确批评印尼共产党称:印尼党的失败,就在于它没有真正重视农村和农民,没有到农村去。但是,他同时仍旧对印尼共产党的革命寄予期望。

由上不难了解,中国这时对外政策的一个基本要点是,既要尽一切可能避免中国与美苏直接发生战争,又要尽一切可能推动各国人民进行反抗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的革命战争。

7. 全面激进,还是狂热失控?

1966年,毛泽东发起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国社会顿时被卷入到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之中。由于“文化大革命”把所谓的阶级斗争推向了最极端的形式,从而造成一切对外工作也都被视同为国与国之间的阶级斗争,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工作,一度完全被对外宣传中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鼓吹和煽动世界革命的方针所取代。就连外交部部长陈毅也公开告诫外交官们说:“中国革命胜利了,还要世界革命胜利,还有成千成万阶级弟兄受苦受难,我们还有国际主义的义务,还要把我们的力量百倍地加强,还有敌人,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美帝国主义在向我们进攻。”搞好使领馆工作,就是要“扩大主席思想和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推动世界革命”^②。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这时更是经常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论文章,大谈世界革命伟大时代已经到来,宣称美帝、苏修和一切反动派“被彻底埋葬的日子已经不远了”^③。毛泽东也公开号召:“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④当然,他也同样十分推崇林彪的说法,即中国对世界革命起决定因素,

^①史称“九三〇”事件。

^②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2、134页。

^③《人民日报》社论,1967年5月1日。

^④转引自《人民日报》,1966年10月26日。

“中国不倒”，“世界就有希望”，“中国一片红，就等于整个欧洲一片红”。毛特别指示应当将林的这个讲话录音播放给全军人员和全体红卫兵听。据此，中共中央专门印发了这篇讲话。^①

带着这样一种狂热，中国的红卫兵冲击国际列车，在外国列车上张贴标语和毛主席画像、散发中共中央九评苏共公开信的小册子；参加外国艺术节演出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在演出过程中每演一个节目或念毛主席语录，或高呼反帝口号，与外国观众对着干；中国驻外人员，从外交官到新闻记者，不顾所驻国政府反对，到处发送宣传品和毛泽东像章，并参加当地华人华侨组织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活动，煽动革命造反；香港发生劳资纠纷，左派支持罢工，与香港当局冲突，学红卫兵到处张贴大字报，受到港英当局压制，中共港澳工委及中国外交部均出面支持“香港同胞学习、宣传、运用和捍卫毛泽东思想”，《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号召港九同胞组织起来“向着万恶的英帝国主义展开斗争”、“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最终导致了北京的造反派们围攻并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

把革命与外交混为一谈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67年间围绕着是支持马来亚共产党，还是给予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以外交承认的问题上，毛泽东所做的选择。当时，中国外交部已经有意承认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并表示了这样的意愿。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对毛表示了异议，毛泽东当即表态：“匆匆忙忙干什么。你承认他，他不承认你。同外交部谈一谈，这样的事情应该事先同他们（指马共）商量。”相反，当陈平提出希望中国以较大的力量来援助东南亚革命，争取同时在几个国家大搞，以便牵制美国的提议时，毛泽东当场表示赞同陈平的意见。他明确讲：关键是要开展武装斗争。“苏联道路也好，中国道路也好，十月革命不就是打么。什么道路？打就是道路。”为了帮助马共扩大政治宣传和影响，他对陈平提出的请中国方面帮助建立对马来亚民众进行革命宣传的马语广播电台的要求，也毫不犹豫地表示了认可。^②

同样的情况，一直表示希望帮助缅甸奈温军人政府存在下去的中共中央，

^①参见马齐彬、陈文斌、林蕴晖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91页。

^②参见《毛主席接见马共总书记陈平等的谈话》，1967年1月17日。



1967年8月22日红卫兵围攻冲击英国驻华代办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态度也发生了很大改变。先是缅共中一些人跟着中国在缅甸也搞“文化大革命”，中国使馆与新华社驻仰光分社人员一起卷入其中，在缅甸公开宣传毛泽东思想，散发毛主席像章等，导致缅甸政府下令禁止，进而引发华侨及其学生与缅甸政府之间的对抗，缅甸迅速出现反华骚乱。中国方面随即表态支持缅甸华人，事件愈演愈烈，华侨学校、新华社分社、中国武官处、经济参赞处及使馆本部，均遭冲击。中方因此又是照会，又是抗议，又是数十万群众示威游行，双方斗争不断升级。毛泽东并且批准提出“打倒奈温”的口号，《人民日报》

也发表社论斥责缅甸政府是反革命法西斯。于是“打倒奈温”、“绞死奈温”、“油炸奈温”的口号一时响彻北京街头，上百万群众包围缅甸驻华大使馆示威抗议，中共中央并且批准缅甸共产党在华领导人公开活动，新华社还广播了缅甸共产党发表的声明。^①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根本改变了对建交国缅甸政府的政策，决定支持其反对党推翻其政府了。

随后，中共中央明确批准并协助已来华17年之久的大批缅甸共产党人和少数民族武装分子回缅甸去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毛泽东甚至明确地告诉老挝人民党和缅共的领导人说：你们可以到中国边境那些与老挝和缅甸民族接近的少数民族中去征兵嘛！这是他们的国际主义义务，而中国边境地区可以作为你们的后方嘛！为了保证在中国受训结束的缅共人员能够安全地回到缅甸去开展武装斗争和缅甸的革命者能够集体到中国来学习军事和进行装备，中国军队还专门组织了护送部队，深入到缅甸境内，通过直接与缅甸政府军作战的办法，来掩护缅共人员在中缅边界地区的进出。^②

这时大批派人来华学习军事的还有印度等国的共产党和革命者。如印共左派到1967年就已派出三批学员来华秘密学习游击战争的方法。他们都是通过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找到中国大使馆，由大使馆派向导按指定路线进入中国，学成后再到西藏进行武装实习，然后再回到印度去。毛泽东还特别约见了印共左派第二批学习代表团的成员。毛明确批评印共搞合法斗争，跟政府搞妥协，对人民进行欺骗。说“和平过渡，将来搞社会主义，那是一些假话”。他断言：“印度现在是一个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国家。印度人民要把这一套统统搞掉，建立自己的政权机关。”“你们从推翻地方政权，夺取地方政权机构，夺取土地这样的方式开始”，是对的。毛泽东并且许诺说：“将来印度革命人民建立了政府，就和你们订一个条约，把这条线（指中印边界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以南九万平方公里的那些地方都给你们，但现在我们一寸土地都不让。”^③

^①参见马继森前引书，第148—149页。

^②参见《毛泽东接见缅共柯生（德钦巴登顶）等谈话记录》，1967年11月26日。据说第一批来华训练和装备的缅甸人员有333人。

^③《毛主席接见印共左派大吉岭县委第二批学习代表团的谈话》，1967年12月13日。

由于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均已陷入低谷，而对中国的直接战争威胁反而不甚严重，因此中国方面这时明显不再重视外交工作，而是一心一意地想要推进世界革命的进程了。毛泽东这时甚至想要把武装斗争推广到有着美军基地的泰国去。为此他多次要求老挝党帮助泰国人建立武装。说现在泰国境内发展游击战争很重要，最好把解放区扩大到泰国去。因为主要的敌后地区在泰国，不在你们本国。你们把泰国赤化了，这个地方它就走不掉了。是不是可以组织一支队伍打到泰国去？他说：“一定要打到泰国去。”你可以来，我为什么不可以去呀？谁让美国飞机以泰国为基地起飞轰炸老挝的解放区呢。当他得知在中国的帮助下，泰共已经开始建立起一些游击区和小块的根据地时，他高兴地告诉泰国共产党人：泰国革命发展起来是件大事。这就把东南亚的几个主要国家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亚连起来了。他并多次对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说：泰国共产党搞得很好，很有前途，很有希望。^①

很显然，眼看越南战争对美国形成了极大的压力，东南亚各国共产党也陆续开始展开了武装斗争，毛泽东一度颇感欣慰。他宣称：“各国人民我看也快起来了，包括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有搞和平运动的，有打游击的，有在思考问题的，也有许多人尚未觉悟。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这叫做革命。能够相信，只有十月革命，或者中国革命、越南革命、老挝革命，其他地方就不革命了吗？不可能嘛！如果其他地方不革命，那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灵了。”^②

仅仅两三年时间，中国因为“文化大革命”所掀起的狂热革命浪潮，不顾一切向外输出革命思想，导致同本来就不多的建交国或半建交国接连发生外交纠纷和冲突，甚至造成双方断交。1966—1967年中国先后与建交或半建交的总共40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都发生了严重外交纠纷。其中有：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东德、法国、英国、瑞典、瑞士、阿尔及利亚、也门、突尼斯、刚果、肯尼亚、马里、蒙古、印度、尼泊尔、锡兰、缅甸、柬埔寨等。不少国家则对中国采取了戒备措施，有的关闭了其驻华使馆，有的干脆中断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这期间先后与中国断交的国家就有4个，即印尼、加纳、中非、贝宁。

^①参见《毛主席接见老挝人民党代表团的谈话》，1967年11月30日；《毛泽东接见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等谈话记录》，1970年7月7日；《毛泽东接见泰共江洪、张实等谈话记录》，1967年11月9日。

^②《毛泽东接见老挝人民党总书记凯山等谈话记录》，1970年7月7日。

而因为坚持以反帝必反修来衡量敌我友,还导致中共先后同仅剩的几个“兄弟党”,如朝鲜、越南、日本等国共产党,也发生了纠纷甚至冲突。由此影响到经济贸易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关系都全面萎缩,国际交往也越来越少,中国由此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境地。

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其实也很清楚。他承认:“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①但他显然还并不想对外交政策作出新的调整,因为通过国内的“文化大革命”他注意到: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乱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且“凡是乱得彻底的地方,形势就好”^②。而且,他一直认为,从理论上和实际上讲,“日本人民不翻身,南朝鲜、菲律宾、柬埔寨、老挝、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不把帝国主义赶走,不把本国垄断资本或者亲帝国主义分子打倒,我们这个国家也不能得到最后解放”,即台湾问题也不能真正得到解决。换言之,援助各国人民革命,这实际上是援助我们自己,“打了帝国主义,我们就巩固了嘛!我认为这是真理,其他都是假话”^③。

8. “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

不过,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68年,已经过去了23年时间,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21年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两年,却还是丝毫也看不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影子,这件事情还是让毛泽东想不明白。1968年8月20日,苏联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侵入了捷克斯洛伐克,使得中共中央紧张了一下,但欧美世界对此并无太大的反响,一切很快又平静下来。包括越南战争在内的许多地方的紧张形势,迄今为止也始终只是局限在局部的范围之内,总也不能变成更大范围的冲突与战争,难道是列宁主义的理论不灵了?

在1968年底,毛泽东感到自己对世界未来发展趋势的问题越发看不明

^①《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李富春等人的谈话》,1969年3月22日,转引自王永钦:《1969年——中美关系的转折点》,《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

^②《毛主席接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的谈话》,1967年9月30日。

^③《毛泽东接见索马里总理的谈话》,1963年8月9日;《毛泽东接见宫本显治的谈话》,1966年3月28日;并见《毛泽东接见朝鲜代表团的谈话》。



毛泽东会见来访的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中央主席希尔(左二)

白了。他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就是战争”这样的论断，是不是“不灵了”？

11月28日，毛泽东特意找到来访的对欧美国家比较熟悉的澳共(马列)中央主席希尔，与他进行了长篇谈话。这是他第一次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与一位外国党的领导人讨论战争与革命的问题。^①

毛泽东问：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帝国主

^①《毛主席接见澳共(马列)中央主席希尔的谈话》，1968年11月28日。

义究竟怎么办？就是说，它要不要打世界大战？或者暂时不打，过一会打？

希尔认为帝国主义国家虽然有发生冲突的危险性，它们现在面临极大的困难，一时还没有力量发动世界规模的战争。

毛泽东随后谈了他的困惑所在，即：就实力而言，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是有条件打的，其次日本、西德、意大利这些战败国也有打的条件。但英国和法国看来是不大想打的。就是日本和西德，现在也看不出它们想打仗。因为它们本国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比如西德想统一德国，日本想收回冲绳，取得真正的独立。另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好像也与第一次大战以后的情况有些不同。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国脱离不了战胜国，不但在财政方面和投资方面，而且在国际和军事方面也脱离不了战胜国。这就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不同。再比如，按照过去两次世界大战的规律，美国这个国家都是要别的国家先打，打个两年后它才会参战。而现在美国在朝鲜、越南都首当其冲，在欧洲还有20万部队，在越南有50万，在朝鲜也有7万多。另外在日本、台湾、菲律宾、泰国也都驻有军队。这就是说，它的兵力已经很分散了，打些小仗还可以，要打大仗就困难了。

但是，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帝国主义就是战争。“长期不打仗，资本家就不高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不论美国、苏联还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似乎都应该是要打仗了。但为什么看不出来呢？毛泽东很坦率地表示：“我对这个问题没有把握，所以想请教你。”

当然，毛泽东表示：对于我们的国家，对于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对于工人运动和对于学生，以及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发展壮大来说，我们并不希望马上打仗，能够“再有五年的（和平）时间，就会比较好了”。问题是，“日本一九四五年投降到现在已经有二十三年了，再有五年，就是二十八年，二十八年不打仗吗？”这好像有点说不通。因为，按照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它们是离不开战争的。会不会因为有了原子弹的关系呢？因为“这个东西不大好碰，它们自己也知道。赫鲁晓夫的理论是原子弹打起来就会毁灭地球，没有战胜者。美国也这么说”。何况，这两个国家的人数相等，美国现在在越南就感到兵力困难，真正要打大仗它们更会感到人力不足。“它们倒不怕消灭别国人口，它们怕消灭本国的人口。”毕竟它们希望靠自己国的人来统一这个世界。

毛泽东最后表示：“我只出这么个题目，我也作，请你也作”，我们都考虑

一下：“是战争呢，还是革命？是发生战争后引起革命呢，还是革命能制止战争？总而言之，现在既不打仗，又不革命，这种状态不会维持很久了。”

从毛泽东的上述谈话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习惯于阶级斗争思维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的论断的毛泽东，从内心里极度渴望战争与革命的到来。以中国当时的生存环境，这也是最好的一种出路与前途。因此，对于二十几年既不打仗，又不革命的国际现状，颇感难耐，因而也十分困惑。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观点出发，他甚至还不止一次地谈到过寄希望于美国内部爆发革命。但是，尽管他对列宁主义的这类论断已经开始有所怀疑，他却并没有改变既有的思路和逻辑，依旧渴望会有新的变局很快出现：或者爆发大规模的战争，或者爆发大规模的革命。

因此，当1969年3月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中共中央政治报告对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依旧坚持了列宁主义的这一观点。报告宣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和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的科学论断“并没有过时”。“一方面，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蓬勃高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日益为广大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所掌握。”“另一方面，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陷于政治经济的危机，内外交困，走投无路，他们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毛主席最近指出：‘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根据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可以断定，如果帝、修、反把第三次世界大战强加在世界人民头上，那只会大大加速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全世界人民起来革命，把一切帝、修、反统统送进坟墓。”^①

9. 结语

综上所述，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确实在持续激进的转变过程中。这种转变的过程，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达到了它的顶点。但是，这种激进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情况。即一方面，它始终是处于一种渐进的状态，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对中国自身利益影响最大的中美关系的变动而变动的；另一方面，其

^①《红旗》杂志，1969年第5期。

咄咄逼人的政策转变背后，很大程度上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中国自身利益的强烈诉求在起作用，因此，除了“文化大革命”中短时间的混乱情况以外，其政策的激进程度自然也不能不以它对中国自身的利害关系为转移。毫无疑问，由于毛泽东和中共自身的意识形态特点及其思维惯性的作用，中国对外关系的渐趋激进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注意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中国自身利益的关切程度及其诉求的强烈程度，我们也不难发觉，美国对华政策对中国这一时期对外政策的牵制作用也是巨大的。换言之，如果美国不是采取过分敌视中国的政策，毛泽东的对外政策走向，在相当程度上未必不会有所改变。同样的情况，也正是因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始终把中国自身的利益放在其对外政策考量的首要位置上，由此也才会有70年初中国对外政策出人意料的大幅度调整与修正。

原载《冷战国际史研究》，2008年第6期



第八章

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对美缓和

引言

新中国外交政策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革命化发展，到 1969 年终于走到了它的极点。从反帝发展到反修，从“文攻”发展到“武卫”，随着珍宝岛一战“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中国转瞬进入到核战争的边缘。战争危机的突现，终于促使毛泽东改变了自己的政策。于是，一切又柳暗花明起来。

有关珍宝岛事件与中国缓和对美政策的关系问题，无论在中苏关系史上，还是在中美关系史当中，都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如今，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同意说，珍宝岛事件对中国改变对美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问题是，珍宝岛事件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它本身是否被赋予了外交意图？事件对中国外交政策影响的程度究竟有多大？中美关系随后的缓和，是毛泽东运用外交战略即“英明决策”的结果呢，还是审时度势而进行的一种实用主义的外交选择？^①

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当越来越多的资料说明 1969 年 3 月间发生的战斗中国是主动者之后，似乎更加增强了涉足这个问题研究的学者对毛泽东运筹帷幄的崇敬心理。^②但是，在谈论这场战斗的外交目的的同时，许多关键性的环节却被研究者们忽略了，包括 1969 年秋冬发生的那一段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对战争的极度担忧。

事实上，类似的情况在中共历史上并不是头一次出现了，比如大跃进。如果我们不了解毛历来的思维及行为特点，看不到珍宝岛事件所导致的一系列政治、军事和外交后果的极端严重性，那么，我们怎么去估计毛泽东的预见性都可能是合理的。但问题是，毛常常冒险，也常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二者间却未必贯穿了一条逻辑的红线。

①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比较引人注目的有前中国外交官熊向晖的回忆《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载《中共党史资料》，第 42 辑；俄国学者冈察洛夫和乌索夫为前苏联驻华公使 A. 叶利扎维金回忆《柯西金同周恩来在北京机场的会谈》一文写的前言与评述，载（俄）《远东问题》，1992 年第 5 期；中国学者徐焰的《1969 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党史研究资料》，1994 年第 5 期；李丹慧的《1969 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与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 年第 5 期。

②从熊向晖到叶利扎维金到李丹慧，中俄两国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大致相同的结论——尽管语言的表述方式可能略有不同——即这一事件是毛泽东为拉拢美国而采取的重要步骤，而中美缓和的实现则是这一战略运用的成功结果。

1. 中苏边界纠纷的由来

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文化大革命”已经闹了差不多整整三年时间。中国在“造反有理”的鼓噪声中很快闹成了一个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局面。到了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时,就连多次表示“不怕乱”的毛泽东也开始提出:“文化大革命”是不是该结束了?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他自问自答地说:都讲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究竟什么叫到底?我估计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天就差不多了。^①宣布开始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看成是毛泽东打算1969年基本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信号。

但是,天下大乱,要想达到天下大治,就没那么容易了。想不到的是,内乱未平,外患又起,中苏边界这时又开始发生严重冲突事件。一时间,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中苏边界摩擦早在1964年以前就开始了。由于1959年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偏袒印度,并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撤退了所有专家,中止了一切援建项目的合同,两国关系交恶,双方已不止一次地就边界问题相互指责。不过,边界问题的升级,很大程度上还是1964年以后开始的。^②

1964年,为解决两国边界争端,中苏开始举行边界谈判。此前,赫鲁晓夫于1963年12月31日有意向世界各国首脑散发了一份公开信,名义上是呼吁用和平方法而不要使用武力来解决边界问题,实际上是暗含着指责中国的外交政策。对此,《人民日报》首先于4月26日发表评论文章,尖锐抨击赫鲁晓夫“放弃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和边界问题”的呼吁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效劳的

^①参见金春明、席宣:《“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209页。

^②自1960年中苏开始交恶以后,两国边界纠纷自1964年10月以前共发生1000余起。但自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两国边界纠纷猛增到4189起,增加了一倍半。参见《中国政府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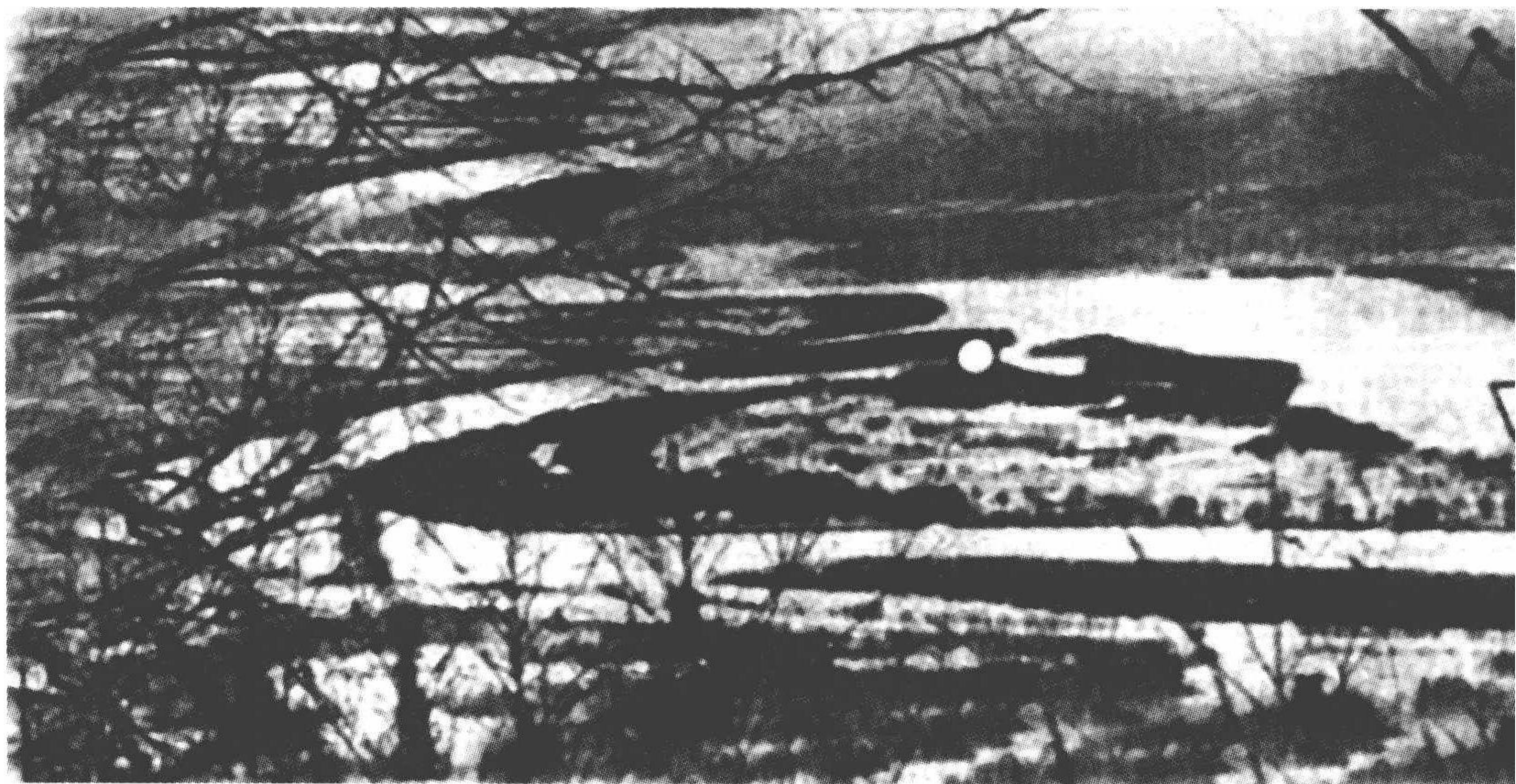


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毛泽东

新骗局”^①。而毛泽东在7月10日与日本社会党人士谈论反帝反修时,更进一步批评说:

苏联占的地方太多了,外蒙古、千岛群岛、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德国、波兰、芬兰的一部分,凡是能够划过去的,他都要划。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新疆、黑龙江划过去。……苏联领土已经够大了,有两千多万平方公里。一百多年前,已经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堪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

^①《人民日报》,1964年4月26日。



珍宝岛鸟瞰

他们算这个账呢。^①

毛泽东真的是想和苏联清算历史疆域的旧账，索要那 150 万平方公里土地吗？当然不是。海阔天空、广征博引，是毛泽东特有的一种谈话方式。注意到这样谈论领土问题，可能引起误解之后，9 月 10 日，毛泽东借着与法国客人谈话的机会，专门解释了自己的意图，强调旧事重提，其实只是“采取攻势，说些空话”，使赫鲁晓夫“紧张一下”，并没有改变边界现状的意思，目的还是想要以目前边界现状为基础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②但苏联军方正想加强自

^①《毛泽东接见佐佐木更三、黑田寿男等日本社会党中左派人士的谈话》，1964 年 7 月 10 日。

^②参见《毛泽东接见法国技术展览会负责人及法国大使的谈话》，1964 年 9 月 10 日。

身的地位,于是借机大做文章,不仅公开扬言要保卫神圣的苏联边界,而且推动政治局批准大规模向中苏边界地区调兵遣将,甚至与蒙古订立新的互助条约,重新派军队进入蒙古,帮助没有常备军的蒙古镇守中蒙边界。这样一来,过去那些在旧的边界条约中本来有些就含混不清的地段,很快就成了双方军队摩擦和冲突的导火线。两国边界纠纷迅速增加。

进入到“文化大革命”期间,中苏边界纠纷主要集中到东段边界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靠中国一侧的两个小岛,即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珍宝岛和七里沁岛的归属问题上。大部分冲突都发生在这里。冲突多半是由苏方挑起的。据前苏联驻华外交官叶利扎维金回忆,1966—1967 年仅苏联驻华使馆就不止一次地主张在这个地区“对中国人上岛给予回击”。一方宣称这些江心岛是自己的领土,坚持上岛,一方必欲将对方赶走,并想方设法“给予回击”,冲突的发生自然愈演愈烈。

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 1968 年 1 月 5 日。那一次苏军出动装甲车冲撞上岛从事正常生产活动的中国边民,当场撞死、轧死中国边民 4 人,造成了中苏边界纠纷中第一起严重的流血事件。^①此事之后,苏军行动收敛了一些。但 1968 年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成功之后,特别是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结束,开始筹备中共九大之后,两国边界纠纷重又加剧起来。1968 年 12 月 27 日,苏军出动装甲车登上珍宝岛,拦截中国边防巡逻队,并以棍棒殴打中国边防巡逻人员。紧接着,1969 年 1 月 23 日,双方再度在珍宝岛上发生斗殴,中方 28 人被打伤,部分武器被抢。从 2 月 6 日到 25 日,双方在珍宝岛又连续发生了五起类似事件。7 日,苏军人员甚至用冲锋枪向中国巡逻队方向发射了 6 个点射。

终于,3 月 2 日,中苏两国的边防部队在珍宝岛上发生了两国间第一起边界武装冲突。15 日又再度发生更大规模的激烈冲突,双方甚至动用了重武器。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珍宝岛事件。

珍宝岛之战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苏联,都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响。莫斯科那边反华示威接连不断,中国使领馆被围,汽车被砸。在中国,仅在 3 月 4 日到 12 日不足 10 天的时间里,29 个省、市、自治区参加示威游行的军民就已达到 1.5 亿人,4 亿人次以上。^①而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从听取珍宝岛作战汇报之初,

^①参见《人民日报》,1969 年 3 月 13 日。



中国边防部队击毁的苏军坦克

毛泽东首先强调的就是要准备打仗,而且要准备大打。从3月5日起,他不止一次地提出,中苏之间有爆发战争的严重危险,号召全国人民“要准备打仗”^①。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更突出强调了战争准备的问题,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有大打、早打、打常规战,甚至打核大战的足够思想准备。^②

2. 珍宝岛事件的经过

对于珍宝岛事件,中苏两国当时的反应和认识颇为不同。在中国方面,这一事件除了促成战备热潮以外,它更多地其实成了被用来唤起全党全军战斗

^①《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的讲话》,1969年3月15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等。

^②参见《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

意志的动员令。

珍宝岛事件后中方的内部通报突出强调了苏联入侵的危险，指出：“近年来，苏修大量增兵中苏边境，集结了一百多个师的庞大兵力，占全国总兵力的百分之四十多，将近二分之一。苏修还把蒙古变成一个反华的巨大的军事基地，调集大量军队进驻蒙古，部署在中蒙边境上。”^①

当然，苏联当时在军事上的优势并不仅仅表现在边境兵力的数量上。从90年代的有关研究成果看，苏军部署在中苏边境上的军队其实不足当年所说的一半，但不论是常规武器、核武器，还是两国的综合国力，中国都比苏联弱得多。中国军队这时的轻重武器大都还是40年代设计的。仅以珍宝岛之战为例，“中国军队只有徒步的步兵和部分炮兵、工兵，既无坦克、装甲车，也无空中支援；苏军步兵则全部摩托化，不仅有占优势的炮兵，还有大量坦克、装甲车及空军飞机和直升机可直接用于支援作战，因而在技术装备、火力上居于绝对优势”。甚至，中国方面当时为作战部队配备的75毫米无后坐力炮和40毫米火箭筒，连苏军的主战坦克都打不透。^②

毛泽东对此不是不清楚的。无论在听取汇报时，还是在中共九大的发言中，他都突出表扬了前线指战员的勇敢牺牲精神，强调对苏联要破除迷信，以己之长克敌之短，必要时要准备把敌人放进来打，让它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毛泽东说：珍宝岛战斗已经证明了，没有打过仗的也可以打仗，没有优势装备照样可以打胜仗。说我们一没有用飞机，二没有用坦克、装甲车，三没有用指挥车，打了9个小时，敌人三次冲锋，还不是都被我们打垮了。说我们不是不要飞机、坦克、装甲车，但主要是靠勇敢，要破除迷信。这次珍宝岛就破除了迷信。什么飞机、坦克、装甲车之类，现在到处的经验都证明，可以对付。^③

毛泽东的话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人民解放军一向是讲觉悟、讲勇敢的。作为一场自卫反击战，尽管中国方面火力及装备上都还处于劣势，但珍宝岛这场仗无论战斗组织还是作战结果，也都比较成功。当时的一些介绍材料对这场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编：《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介绍材料》，北京，1969年（油印）。

^②参见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中共党史资料》，1994年第5期。

^③参见《毛泽东在九大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69年4月14日；《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69年4月28日。



1969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

仗是这样说明的：

3月2号8点40分，我边防巡逻队30人分成两个组，前往珍宝岛进行巡逻。刚出来，苏修就发现了，他们立刻从两个方向派出来一辆卡车、两辆装甲车、一辆指挥车和70个人上岛围堵我们。9点17分，尾追我第一巡逻组的敌人置我警告于不顾首先开枪，我边防战士就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人，我必犯人”的教导，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给敌人以严重的杀伤。第二巡逻组一

听枪响,也马上开枪,一下就报销了对方7个。打到9点50分,战斗就胜利结束了,打死打伤敌人60余人,其中打死50余人,击毁敌人装甲车、指挥车、卡车各一辆,击伤装甲车一辆。^①

将近两周后,战斗再次在珍宝岛打响。这一次,苏军增加了大量的坦克、装甲车和大口径火炮,据说可能有一个摩托化步兵团、一个坦克营和四个大口径炮营。但是,根据当时的介绍材料称:

战士们根据毛主席“不斗则已,斗则必胜”的教导,做了充分准备,先于14日夜上岛并在江叉埋设了反坦克地雷。敌人15日凌晨3点出动6辆装甲车、30多人上岛,我又派更多兵力上岛增援。到8点2分敌人发起了第一次冲击,激战了一个多小时,我击毁了敌人装甲车两辆,敌人的残兵退回到了自己的岸上。9点40分敌人又在岸上炮火和坦克炮火的掩护下发起第二次进攻,我沉着应战,集中火力干掉了敌人两辆装甲车,击伤一辆,并击毁敌人一辆坦克,又炸毁敌人一辆坦克,打了两个多小时,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以后,敌人在中午1点35分用岸上的大口径火炮和坦克、装甲车的火力向我方岸上猛轰了两个小时之久,到3点13分又出动10辆坦克、14辆装甲车和100多步兵向岛上进攻。战士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敢把敌人放近打,三百米不打,二百米不打,八十米不打,七十米不打,放到五十米,突然开火”。我们岸上的火炮也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借有利时机猛烈开火,一下子打掉了敌人一辆坦克,四辆装甲车,击伤两辆,大量地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然后又猛轰敌方岸上的边防站和掩蔽所,一顿猛轰就打死了他们的上校边防总队长伊凡诺夫和一个中校。这一天打死了他们60多人,击毁坦克两辆、装甲车七辆,击伤坦克两辆、装甲车四辆。^②

^{①②}前引《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介绍材料》,1969年。

从上述介绍中可以看出,珍宝岛之战在中国方面确实是解放军以劣势装备同苏联军队优势装备的一次较量。在这场较量中,解放军从一开始就做了较充分的准备。第一组人员引诱苏军,第二组抓住适当时机果断开火。15日的战斗中,中苏双方都有所准备,但中方的准备显然更加充分。因此,尽管中方装备落后,指战员们的勇敢牺牲精神却得到了发挥。只是,在当时“文化大革命”那种极其特殊的气氛中,出于精神鼓动目的而进行的舆论宣传,却多少有些走向了唯意志论。由于毛泽东强调了要破除苏联的迷信,结果,在许多宣传材料中,不仅两军装备和火力上的差距成了无足轻重的事,而且从“政治挂帅”的观点出发,苏联军队也被形容成一支“政治上蜕化变质,战斗中贪生怕死”的军队。称“苏修侵略军钻在‘乌龟壳’里,他们是瞎子和聋子,只能在战场上乱爬、瞎滚”,夸大作战的战果显然也是为了证明这一点。说我们英雄的边防战士,有毛泽东思想这个强大的思想武器,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一个个和造反派一样”,很容易就把苏修的“乌龟壳”打成了一堆废铁。说是“靠政治、靠人的觉悟,靠勇敢,一句话,就是靠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①,战无不胜。

3. 北京决策的内幕

珍宝岛之战以后中国方面的一连串反应,给人的印象是,苏联入侵的危险已迫在眉睫。但根据近年来中俄两国披露的各种档案资料,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中国领土珍宝岛上打的这场仗,不仅是中苏边界长期冲突的继续,而且是中国方面一让再让、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有计划、有准备地发动的一次边界自卫反击作战。

早在1968年1月5日苏军有意在七里沁岛挑起流血事件两周后,考虑到即将到来的中苏边界会谈,中央军委就曾于24日电示沈阳军区、北京军区等单位,主张用军事斗争配合外交斗争,明确提出了针锋相对、后发制人的方针,要求边防部队注意选择有利时间、地点和情况,事先做好准备,多设想几种可能,拟订行动方案,一旦受到苏军攻击,退让无效,即可采取相应的自卫措施,争取“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根据中央军委的建议,沈阳军区曾专门从值班部

^①《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介绍材料》,1969年。



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陪同毛泽东接见沈阳军区部分团以上领导干部

队中抽调了部分精干人员进入七里沁岛附近，秘密做好了反击的准备。可是，恰值东欧国家形势不稳，苏军一时收敛了在东部边界的越界行动，结果中方准备好的这次反击行动未能实施。^①

珍宝岛 1969 年的反击准备，其实仍是 1968 年七里沁岛反击准备的继续。由于 1968 年 12 月 28 日，特别是 1969 年 1 月 23 日珍宝岛再度发生严重事件，根据中央军委一年前指示的精神，黑龙江省军区首先提出了反干涉斗争的自卫还击斗争方案，主张派精干部队上岛潜伏，在苏方以武力强行干涉我巡逻分队执行任务时，给其以沉重

^①参见徐焰前引文，并见李丹慧：《1969 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 年第 3 期。

教训。正值九大召开前夕,黑龙江省军区的报告虽经沈阳军区同意,上报中央后仍经过了慎重的考虑。直到2月以来苏军挑衅更加严重,总参谋部和外交部才分别于2月19日同意了黑龙江省军区的斗争方案,总参谋部并给予了具体的指示。经中央军委批准后,沈阳军区迅速进行了周密的战斗部署,由此才发生了3月2日和3月15日的自卫反击作战行动。

据当年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回忆:这次自卫反击战实际上经过中央批准,早有准备,15日的战斗并且是北京直接指挥的。当时正准备开“九大”,大军区首长均已来到北京,因此,中央军委专门在京西宾馆开了一个房间,架设了专线,由陈锡联负责直接与前线联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负责掌握国际方面的情报,随时向周恩来汇报,并由周恩来下最后决心。陈锡联说:

为了最初的战斗,我们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一个连二三百人,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和配备,打得干脆利落。3月2日战斗结束后,我们知道他们要来,就在江叉口大量埋了地雷。他们首先从西边来了辆坦克,我们给炸了,他们不敢走了。从正面来了30多人,炮火掩护。我们当时在岛上也没有什么人,但炮火都准备好了。在一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岛上,几十辆车、十几辆坦克、装甲车,我请示总理:现在是开炮的时候了,得到总理的同意,我就让开炮。打了有半个小时,珍宝岛变成一片火海,把他们的车辆都打了。他们没有再增援部队,也用炮向我们射击,我们也用炮回敬他们,打了一会儿,那天的战斗就结束了。^①

3月15日战斗结束,毛泽东听取汇报时,很高兴,一再讲,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了。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但同时也明确提出:到此为止,“不要打了”^②。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此后珍宝岛的边防部队除了用炮火封锁不让苏军拖走那辆被反坦克地雷炸毁的T62坦克以外,在岛上只留了少量部队,让苏军前

^①《陈锡联采访录音》,1995年7月。

^②《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的讲话》,1969年3月15日;陈锡联采访录音。

来收拾战场,没有再和苏军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即使苏军随后一度出于报复的目的,对珍宝岛进行了狂轰滥炸,中方也没有进一步采取使对抗升级的步骤。在毛泽东看来,整个事情到此就结束了。

3月22日,毛泽东当时在中央“文化大革命”碰头会上讲:对这次边界事件,我是比较乐观的。2日的冲突,他们上边的人也不知道,政治局也没有讨论,同我们一样。就连珍宝岛在什么地方,许多人也不知道。因此,他明确主张,九大政治报告对这次边界冲突,不要讲得那么严重。^①

可以看出,珍宝岛之战从中国方面来说,直接目的不过是想给苏方以教训,使其收敛在边境上的各种挑衅行动。其中既不包含任何准备与苏联开战的意图,也未必有诱敌深入的意思。毛泽东所谓“不要打了”的说法,本身就显示出他不想扩大事态。

但奇怪的是,毛泽东一面限制自卫反击战的规模,指示“不要打了”,一面却又在那里大讲特讲“要准备打仗”,要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甚至要准备让苏联打进来。与此同时,他又解释说,“要准备打仗”,是指“无论哪一年”,我们都要准备打仗。“不管他来不来,我们(都)应该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②周恩来在这时的会议上也明确要大家不要为战争而过分担心,说苏联近期不可能发动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因为它的东部地区尚未开发,还没有建立起进攻的可靠基地。当然,他也说,通过珍宝岛的战斗,也暴露出苏联士兵不会近战夜战,炮兵的作用也不大。至于它在装甲车和坦克上的技术优势,在我反坦克手段加强后也不难被削弱。^③言外之意,战争打不起来,就是打起来,也不怕。

4. 莫斯科的反应

不论中国决策层对珍宝岛之战的后果如何考虑,珍宝岛一仗确实是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是出乎莫斯科意料之外的,打得苏联人一时目瞪口呆。从俄

^①参见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当代中国研究》,1997年第4期。

^②《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1949年4月28日。

^③参见冈察洛夫、乌索夫的前言与评述,《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第2期。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

国近年公布的档案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反应与中国方面当时的反应很不相同。

战斗最初打响时，苏联决策层似乎满腹狐疑，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们一面向东欧国家共产党发出了情况通报，对中国边防部队有预谋的近距离袭击苏联士兵的做法进行了强烈的谴责，^①一面暗中部署有限的报复行动，但其领导人却仍旧继续出访，似乎没有考虑到冲突扩大的严重可能。

根据国防部的部署，苏军负责前线指挥的边防总队指挥官

列昂诺夫上校 15 日凌晨 3 时左右派遣部队悄悄登岛潜伏，也想打中国巡逻队一个措手不及。没想到上午战斗打响后，就发现中方潜伏得比他还早，准备得比他还充分，自己的兵力和火力都不占太多优势。鉴于这种情况，他急忙电告上峰请求援兵，结果层层上报，报到莫斯科，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去了印度，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刚刚登上匈牙利火车，竟没人能够拍板调兵。直拖到中午时分，国防部值班人员才好不容易与勃列日涅夫取得了联系，得到了可以增援的指令。^②而等援兵出动，当天的战斗早已结束，列昂诺夫也被打死了。

珍宝岛之战在莫斯科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苏共政治局紧张磋商，一些人忧心忡忡，弄不清中国方面是否有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意图，另一些人则火冒三丈，尤其是政治局里的军人情绪特别激昂。这边苏联外交部力主电示其驻华大使馆迅速开始组织从中国撤侨，首先尽快撤退妇女和儿童，以防战争突起。那

^①参见 Christian F. Ostermann, *East German Documents on the Border Conflict*, 1969,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Winter, 1995-1996, pp.189-191.

^②参见冈察洛夫、乌索夫的前言与评述。

边格列奇科大声疾呼应当“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的威胁”，扬言至少应该首先无限制地使用西方称为“巨型炸弹”的几百万吨级炸弹，必要时甚至应当考虑对中国的核基地先发制人地实施核打击。^①

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高频通讯装置直接打电话给中国外交部，要求接通毛泽东或周恩来，不想被正因“苏修”公然武装侵略我珍宝岛怒火中烧的接线员臭骂了一顿。^②柯西金放下电话又急忙给苏联驻华使馆的临时代办打电话，要他代为联络。但随后中国外交部给苏方的正式通知，仍旧拒绝了柯西金关于通过电话直接交谈的建议，要求对方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③29日，苏联政府发表公开声明，一面扬言要用武力对付中国的挑衅，一面又暗示事情仍有协商解决的可能。^④然而，无论是对于苏联军方在珍宝岛的炮击行动，还是对苏联政府接连发出的声明和照会，中国方面很长时间都没有给予答复。不仅如此，中国的舆论还大力宣传“要准备打仗”。这种情况进一步刺激了苏方强硬派的神经。苏联军方的《红星报》公开发表文章，声称要给“现代冒险家”以摧毁性的核打击。苏军决策层一方面紧急向中苏东段边界大批调运军队，一方面暗中部署，寻找机会，要对中国方面实施更大规模的报复行动。

关于对中国采取何种报复行动的规模问题，在苏联最高决策层始终存在着尖锐的争论。5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一项措辞强硬，指责苏联挑起珍宝岛事件，讨好美帝，蓄意反华，但主张边界停火、恢复谈判的公开声明。^⑤苏共政治局领导人对此看法不一，格列奇科等坚持报复，不惜与中国开战，而柯西金强调高层接触，缓和关系，避免把中国逼上梁山。^⑥基于一种妥协，苏方于7月26日通过外交渠道秘密提议两国总理直接会晤，^⑦但苏联军方对此断言：“中国人只有实际上感到最可怕的威胁——苏联对中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之后，

^①参见舍甫琴科：《与莫斯科决裂》，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195页；Ostermann前引文，第187页。

^②参见前引陈锡联采访录音；Ostermann前引文。

^③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第286页。

^④参见（苏联）《真理报》，1969年7月4日。

^⑤参见《人民日报》，1969年5月25日。

^⑥参见舍甫琴科前引书，第194—195页。

^⑦参见冈察洛夫、乌索夫的前言与评述。

才会坐到谈判桌前来。”^①

结果,中国方面始终没有作出反应。^②因此,苏联军方经过长时间策划的报复行动得到了批准。苏方此次的报复行动避开了其运力较弱的东段边界,而是在对东段边界的增援已经大致到位的情况下,精心选择了自己补给线较短,而中国方面交通不便、鞭长莫及的中苏西段边界作为实施其报复行动的地区。

8月13日,经过一连串试探性的挑衅之后,苏联军队300余人在2架直升机和数十辆装甲车辆的掩护下,预先埋伏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边界线苏方一侧,待当日进行正常巡逻的只有30余人的中国边防巡逻队进入其伏击围时,突然越过边界发动突袭。经过4个小时的战斗,一举歼灭了这支中国巡逻队。^③

采取如此严重的报复行动,苏方是做了大战的准备的。因为,在众多苏联领导人看来,长期坚持“枪杆子里出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毛泽东,完全可能采取极端行动。苏联报刊为此一直在宣传中国有发动战争的企图。因此,在军事思想上早就信奉先发制人的观点的苏联最高决策层,自报复行动之后,不仅加紧战争准备,而且已经考虑到采取先发制人的做法。8月18日,苏联驻华盛顿领事馆的代表显然是受命探询美国政府的态度的。他几乎是毫不隐讳地问美国政府的有关人士:如果苏联打击中国的核设施,美国将会采取何种态度?随后,苏联秘密通知其东欧盟国,宣称它有可能先发制人地打击中国的核设施。^④与此同时,苏联《真理报》也发表编辑部文章,制造舆论。它告诫全世界务必认识到中国的危险,并扬言:“在当前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有效的致命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如果爆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⑤

尽管中苏两国事实上可能都没有向对方开战的意图,但事情走到这种地步,战争的危险却真的迫在眉睫了。任何一种微小的错误,都可能引燃这个已经处于高热中的火药桶。

①(俄)《共青团真理报》,1992年2月15日。

②周恩来9月11日在与柯西金谈话时明确讲,当时那个时候“我们不能接待您”。

③参见徐焰前引文。

④参见亨利·基辛格著:《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201页。

⑤(俄)《真理报》,1969年8月28日。

5. 对战争的极度担忧

事态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看来也未必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珍宝岛事件后,在中国最高决策层内部其实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是以林彪为首的,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为主要成员的军委办事组的意见,他们深信苏联会借机报复,对苏联发动大规模入侵的可能性估计较高;另一种是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为代表的一些老帅们的意见。还在2月19日,鉴于美英报纸有消息说苏联要出兵中国,苏联也在远东秘密进行军事演习,使深信苏联的战略重心在欧洲的毛泽东感到难以理解,于是提议四位老帅“研究一下国际问题”。珍宝岛事件刚一爆发,毛虽然估计上比较乐观,相信打不起来,还是一度提醒四位老帅可以研究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提出他们的看法。但事件过去一个月后,毛已不大在意这一点了。^①直到6月间,即新疆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前,周恩来才又具体部署了这件事,安排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四位老帅研究国际形势和美苏的动向,判断苏联有无发动对华战争的可能。^②而四位老帅7月11日得出的第一份研究报告的基本倾向是认为大战一时打不起来。^③这个看法显然比较符合毛泽东的估计。因此,苏联突然选择在补给困难的遥远的新疆地区采取如此严重的报复行动,同时又如此明显地急于想要实施核打击,不能不让毛泽东深感意外。

事情很清楚,不管毛泽东怎样强调“要准备打仗”,主张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事实上中国并未真正做好战争准备。除了接连召开过一系列战备会议,如5月上旬的战略工作座谈会,6月20日至7月4日召开的“三北”地区作

^①从已有的资料情况看,毛最初提要四老帅研究国际问题是在1969年2月19日。珍宝岛事件爆发后,毛在3月22日又再度提到这个问题,问陈毅等人“你们研究国际问题怎么样了?”4月19日,毛又在中共九大召开期间的一次文革小组碰头会上提出,希望老帅们在国际、国防问题上提出意见。但到4月28日九届一中全会谈话时,毛虽然又谈到四位老帅的问题,却没有再提研究国际和国防的问题。而是讲,希望他们去研究有关各工厂的问题,看看那里的领导权是不是真的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了。《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的讲话》;王永钦前引文。

^②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01页;王永钦前引文;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中共党史资料》,第42期。

^③参见熊向晖前引文。

战会议,以及军委办事组座谈会等,林彪等人极力强调国防开支要成倍增加以外,具体的大战准备实际上尚未开始。^①毛泽东、周恩来都不止一次地讲,让苏联人打进来比较有利,可以使它陷在人民的包围中间;就是核战争也没什么可怕,中国地广人多,苏联丢几颗原子弹也没有了什么了不起,何况我们也有原子弹。但是,在东北可以打人民战争,在新疆怎么打人民战争?真要丢原子弹,先得把人口疏散开来才能发挥地广人多的长处,现在人口和大工业都还大量集中在大城市里,真的打核战争,岂能不吃亏?毛泽东这时也感到了原子弹的威胁,明确讲: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②

不难看出,毛泽东几个月前讲“要准备打仗”,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国内动员的需要,相信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了,相信有备才能无患。但随着越来越多关于苏联蠢蠢欲动的战争消息传来,情况迅速开始发生变化了。

据报,五、六月间,苏联在中苏和中蒙边界地区的军事活动大幅增加,大批军队被从欧洲调往远东。苏联远东和外蒙古相继修缮和新修建了一批军用机场,苏军正在距离中国主要核设施只有400英里的地方进行侦察和搜集气象数据,矛头直接针对中国核基地。与此同时,苏联开始开动舆论机器,大肆攻击中国,并与其盟国统一口径。随后,苏联更向美国和其盟国就向中国进行核打击一事进行试探。^③

事态一下子发展到如此严重,得知苏联确有先发制人的可能之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都相当紧张,意识到先发制人是苏联传统的战略观念,苏军武装入侵捷克本身就是一个例证,表明它随时都可能发动对中国的陆空袭击,甚至是实施核打击,对此必须急谋应对之策。

8月27日,在得知苏联正向东欧国家试探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响应的消息之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紧急发布文件,宣布成立由周恩来任组长的人民防空领导小组,迅速组织疏散城市人口,迁移工厂,号召厂矿企业职工和城市居民自力更生,立即开始深挖洞,广积粮,以备核大战之需。^④

^①参见郑谦:《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中共党史资料》,第41期。

^②参见熊向晖前引文。

^③参见王成至:《美国决策层对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判断与对策》,《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④参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1969年8月27日。

8月28日,中共中央又紧急发出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令》,特别要求新疆党政军民随时准备对付苏联的大举进攻,防止突然袭击。^①与此同时,中央军委也命令东北、华北和西北的部队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

在此前后,美国和英国的报纸都在醒目位置登出消息,断言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以及北京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和苏联关系如此对立,形势如此紧张,以致9月3日中国党仅有的几个执政党朋友、越南党领导人胡志明逝世时,因获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也将赴河内吊唁,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于4日参加吊唁活动后,当天便匆匆回国,连追悼会都没有参加。

6. 中苏总理的机场折冲

正在这战云密布之时,突然从河内传来了一个苏方有意缓和的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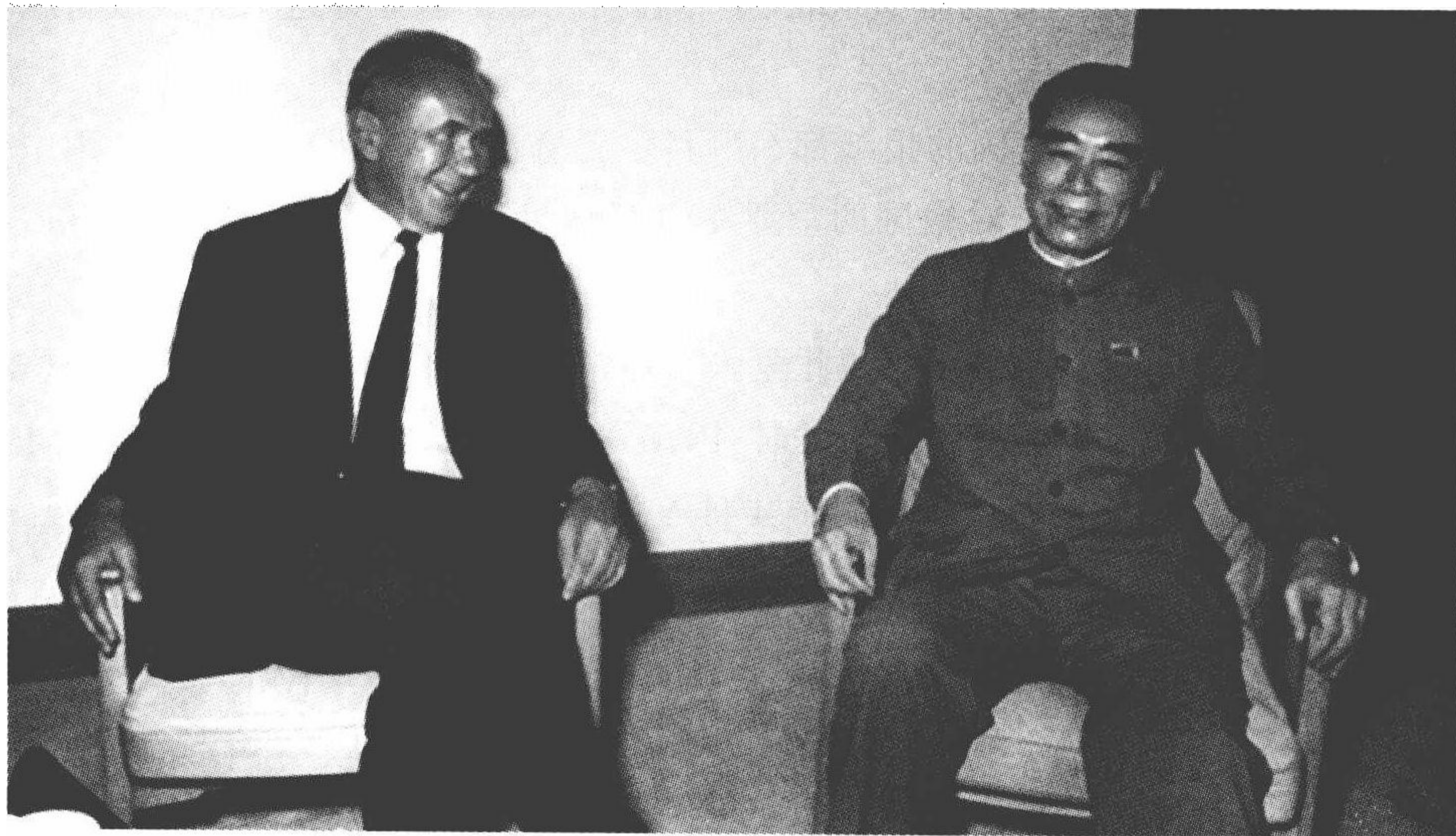
6日,苏联总理柯西金率苏联代表团去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在河内停留期间,苏联代表团的成员受命请越南外交部亚洲司代为征询中国党政代表团团长李先念,柯西金希望能够在11日返回途中经过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②

李先念得到消息后,当即要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报告了北京。尽管这个时候又有消息说,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的一位工作人员同美国同行谈话时又再度发出战争威胁,扬言中苏冲突不可避免,^③毛泽东虽然颇多怀疑,反复考虑,还是在10日表示了赞同的意见,只是强调地点只能在北京机场,形式只能是非正式的路过停留性质。由于答复的时间迟误,中国驻越南使馆10日8时收到电报时,柯西金的飞机早已起飞。不得已,这边越南方面通知苏联大使传递消息;那边周恩来当天晚上指示外交部召见苏联临时代办叶利扎维金,告知中国

^①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令》,1969年8月28日。

^②参见《王幼平日记》(未刊稿)。

^③参见基辛格前引书,第202页。



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晤柯西金

方面赞同安排两国总理会晤的提议,周恩来愿意在北京机场会见柯西金。^①

终于,刚刚飞抵塔什干的柯西金得到了消息,迅速改变了航线,经伊库茨克飞往北京,从而使两国总理得以于11日在北京机场进行了为时3个半小时的会晤。

在这次会晤中,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要求柯西金明确解释有关苏联要先发制人地对中国的核基地进行核打击的传言。他坦率地说:

^①参见前引《王幼平日记》。

你们说我们想打核大战,我们的核武器的水平,你们最清楚。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对于边界问题,周表示:中国方面提出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问题,并不是想要废除历史上的那些边界条约。我们所主张的,不过是在承认历史条约的前提下来考虑并解决有争议地区的问题。至于中国的战争威胁问题,周更明确解释说,你们总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①

会谈的气氛比较坦诚。双方在互派大使、扩大贸易和两国间通车通航等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最后,周恩来提议以两国政府换文的形式把会谈成果肯定下来,柯西金表示同意。但柯西金刚刚飞离北京,中国外交部就给苏联大使馆打电话说,明天,9月12日,中国报刊刊登两国总理会晤的消息时,将要删去已经协商好的文稿中的一句话,即“会谈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②。而柯西金回国后,也通知中方说,他们已经对边防部队下达了避免冲突的指示,没有必要再与中国政府就此换文了。

不管双方最高层在审定这次会谈的内容时采取了怎样一种态度,高度紧张的战争形势照理说是出现了明显的转机。18日,周恩来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议双方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进攻对方的义务。^③26日,柯西金复函周恩来,建议“实行严格的监督以遵守苏中两国间的空中界线”,并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的国家间的专项协定。^④战争的乌云正在渐渐散开。

但是,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转折,中国方面的反应却十分复杂。联系到苏联方面一系列军事和外交行为,林彪等人深信其中必有阴谋,毛泽东也深表怀疑。就在9月13日周恩来上报了与柯西金会谈的全部材料之后,中共中央于9月16日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了讨论。结果,估计苏联有意施放烟幕弹的

^①《周恩来与柯西金会谈纪要》,1969年9月11日;叶利扎维金前引文。

^②叶利扎维金前引文。

^{③④}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21—322、323页。

意见占了明显上风。在第二天公布的庆祝国庆 20 周年的口号中,毛泽东亲笔加上了这样的内容: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打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①

紧接着,18日、22日,中共中央又接连举行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战争的可能性问题。根据四位元帅 17 日提交的形势分析报告,不少领导人明确认为,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为其大举侵略施放烟幕,如同珍珠港事变前日本派特使来栖去美国迷惑罗斯福一样。他们的根据是,柯西金在谈话中并未保证不向中国发动核战争;其返回莫斯科时,只有二三流人物到机场迎接,说明柯西金的缓和承诺不代表苏共政治局;苏联外交官仍在宣称中苏冲突无法避免,苏联国防部官员的说法和其他渠道的消息都显示,苏联战略火箭部队确已做好出其不意地打击中国的部署。^②毛泽东明显地支持了这样的判断。会议为此决定了一系列紧急战备措施。包括大规模从东部沿海地区向靠近苏联边界的“三北”地区调动军队。据此,周恩来一面通知外交部等各部委要迅速拟定疏散隐蔽重要机密档案的方案,一面开始进行战备动员。他在 22 日紧急召集的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上讲话称:“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准备打仗,这是一个新的战略部署。要真正做到有备无患。”^③

9月30日,为预防苏军乘中国国庆节像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发动突然袭击,林彪指示全军进入一等战备,并下令疏散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在跑道上设置障碍物,给留在机场的值班人员配发武器,防备敌机空降。他同时还主张马上放掉密云水库的存水,以免苏方轰炸大坝冲淹北京,后仅因周恩来反对而作罢。^④

^①《人民日报》,1969年9月17日,并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66页。

^②参见熊向晖前引文。

^③王永钦前引文。

^④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25页;郑谦前引文。

鉴于苏联边界谈判代表团即将来京参加预定10月20日开始的中苏边界谈判,中共中央根据苏联当时的战略动向和一些情报资料,再度怀疑苏联很可能把谈判作为向我发动突然袭击的一种烟幕。^①注意到有情报声称,苏联正在秘密改装运送苏联代表团来北京的专机,使之能够装载配备核弹头的空对地导弹,毛泽东明确讲: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②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政治局的决定,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立即实行了疏散行动。在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几天前,已全部疏散完毕。毛泽东14日去了武汉,林彪15日去了苏州,周恩来率留守北京的负责人以及总参谋部转移到西山可以防御原子弹的战备指挥中心办公。^③16日,与周恩来一同留京的总参谋长黄永胜奉命向有关各部发出了建立全军战略预备队的指令,同时成立了前进指挥所,作为中央军委的作战指挥中心。18日,撤至苏州的林彪口授了一份发给黄永胜的紧急指示,在要求全军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同时,特别指示任何导弹的发射,都必须获得毛泽东的批准。在兼任林彪办公室主任的叶群将电报内容通过电话口头报告了毛身边的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之后,前指作战部即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命令》为名,将前指成立以来的第一份指令发给了全军。^④17日,刚刚撤到苏州的林彪又擅自指示在京的黄永胜命令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随即,不仅全军或进入前沿工事,或紧急疏散,而且许多大中城市也紧急进行了防空演习和大规模疏散行动。仅军队疏散就达94万余人,4000多架飞机和600余艘舰艇。^⑤联系到当时大批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

①参见《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372页。

②参见熊向晖前引文。

③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29页;郑谦前引文。

④第一号命令全文如下:“1969年10月18日21时半林副主席指示:一、近两天来,美帝苏修等有许多异常情况。苏修谈判代表团预定明(19)日来京,我们必须百倍警惕,防止苏修搞欺骗,尤其19、20日应特别注意。二、各军区特别是‘三北’各军区对重武器,如坦克、飞机、大炮要立即疏散隐蔽。三、沿海各军区也应加强戒备,防止美帝、苏修可能突然袭击,不要麻痹大意。四、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兵器的生产,如40[毫米]火箭筒、反坦克炮等(包括无后坐力炮和85[毫米]反坦克炮)。五、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六、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执行情况,迅速报告。”转见约翰·刘易斯、薛理泰:《中国军事决策机制及台海冲突》,香港明镜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⑤参见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125页。

校,所有高等学校下放地方或迁往外地,重要档案纷纷秘密运往西南存放,各大中城市大挖人防工事,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相继被卷入到这一紧急战备行动之中,整个气氛之紧张可想而知。

然而,战争并没有到来。

7. 对美外交的意外启动

1969年有关中苏战争的这场“虚惊”,牵扯面之广,影响面之大,实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但是,这场虚惊倒也带来了两点好处,一是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一是一向敌对的中美两国因此有了接触的可能,并由于这种接触很快走向了建交的过程。

“九大”前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全国已经开始进入“斗、批、改”阶段,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已经成立,但因派性而造成的武斗之风仍未停息,并还有进一步扩大蔓延的可能。据此,中共中央7月23日专门发出布告,要求武斗双方立即无条件停止武斗,解散武斗组织,上交武器,拆除一切战斗据点,依法惩办坏人,实行归口再联合。^①而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8月13日新疆铁列克提事件发生后,内乱问题成为战备的严重障碍。因此,中共中央8月28日命令不得不以更严厉的措辞和更坚决的态度重申7月布告的内容,严令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撤除一切武斗据点,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解放军。^②这一命令迅速发生效力,各地出现了传达贯彻命令的高潮。当时诸如武斗、派性、分裂、无政府主义等直接危及稳定和战备的因素,都受到了相当的打击,社会秩序有所恢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毛泽东希望全国因此动员起来的设想。

关于对美接触问题看来也是中国珍宝岛事件后取得的一个意外的收获。严格地说,毛泽东的对美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其世界革命理念与国家利益的双重基础上的。随着60年代中苏两党日趋对立,毛对美战略中更多地掺入了革命的色彩。“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强化了他对美国

^①参见郑谦前引文。

^②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17页。

的敌视态度。一直到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经过毛泽东修改和审定过的政治报告仍旧一方面说明美帝苏修如何“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一方面突出强调它们共同反华的本质,强调警惕它们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尽管刚刚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高度紧张,报告却按照毛泽东的主张,继续强调说: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但是,毛泽东并非对这种四面出击式的战法毫无顾虑和担心。还在“九大”期间,当毛还不特别担心苏联大举入侵之际,他就已经在谈论“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这样的话题,显示出对那些长期依靠中国的世界各国革命党和革命组织不死不活,对中国毫无帮助的不满,继而主张以后要减少对这些党和组织的援助。^①这表明,毛泽东推动世界革命的热情已经在明显降温。

随着苏联入侵的危险日渐加剧,毛泽东不能不重新对美、苏的作用进行评估。过去,他始终相信美国是中国以及一切革命人民的最大威胁,苏联不过是起着“帮凶”的作用。现在,这样的认识在现实当中多少有些行不通了。当6月初,瑞典大使问周恩来,美国和苏联哪个对世界和平和对中国的安全威胁最大时,周的回答已经变得含糊其辞了。他说:“现在还在发展,还要看。”显然,中共中央的估计正在发生变化。

在“九大”结束一个多月之后,周恩来开始强调进一步分析国际形势的必要性。^②他为此具体安排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和徐向前四位老师一边在工厂“蹲点”,一边就有关的国际问题进行一些深入的讨论,说比较成熟的意见可以上报毛泽东。当然,无论毛还是周,他们这时的这种安排看来还不像一些研究者所强调的那样具有鲜明的目的性,周恩来甚至不急于要老师们拿出什么结果来,每个月只要求他们议上个两三次,这使得老师们的研讨多少有点“神仙会”的架势。^③而从四位老师根据几次讨论于7月11日才最后形成的第一份书面报告中,也可以看出,即使是老师们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分析,这时也还

^①参见《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的讲话》,1969年3月22日。

^②周恩来明确讲,毛认为对国际形势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第301页。

^③周在老师们的“国际问题研究小组”活动安排情况的报告上特别说明,老师们的任务一是下放蹲点,二是讨论国际形势,三是评论国防问题。时间安排是每周三天蹲点,其余时间看材料,每月只讨论三天即可。参见熊向晖前引文。

脱不开美苏“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这样一种政治化的分析模式。只不过,老师们比较敏锐地感觉到,美苏的争夺还是主要的,它们勾结起来反华和单独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暂时似乎都还不大可能。^①

对美国政策的重视,仍旧是源于美国方面的主动。在四老师7月11日的研究报告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方面几乎没有可能将美苏截然分开。他们判断美苏战略重心在欧洲,不大可能对中国开战,但也不能不强调要做好美苏突然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充分准备。毕竟,美国与中国仍处于尖锐对立之中。^②这是因为,即使中苏之间发生了如此严重的军事冲突,美国政府却在很长时间没有发现这是一个抑制苏联的极好机会。不仅如此,美国政府反而一再发出警告,断言好战的中国对美国更具威胁。如珍宝岛事件还在白热化的3月14日,尼克松(Richard M. Nixon)总统就在公开声明中宣称:“中国对我国人民的威胁以及一次意外进攻的危险是不能忽视的。”^③

7月以后的情况则明显不同了。7月21日,美国国务院主动宣布放宽对华贸易和去中国旅行的限制;26日,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派人转交了一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写给周恩来的信,要求访华,并对中美二十年交恶表示遗憾;7月2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出访期间公开表示,继续孤立中国对亚洲不利。8月4日,尼克松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改变了3月中旬的说法,称在两个共产党大国当中,苏联更具有侵略性。8月8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堪培拉公开发表谈话,声称美国始终在努力打开同中国来往的渠道。与此同时,巴基斯坦等方面都有消息传来,称美国政府有意与中国方面进行接触。针对这种情况,四位老师显然注意到利用美苏矛盾的问题。只是,他们的研究继续断定,美国此举更多地其实是想要利用中苏矛盾来向苏联施压。与其让美国抓住这根稻草,不如保持高姿态,对其接触要求置之不理,再憋它一段时间。因此,一直到新疆铁列克提事件发生,与美国接触的问题并未提出。^④

铁列克提事件后的严重形势,是促使老师们,多半也是促使毛泽东和当时的外交部门想到并提出打美国牌问题的关键性原因。8月底,面对战争威胁,老

• ①②参见熊向晖前引文。

③基辛格:《白宫岁月》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

④参见熊向晖前引文。

帅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三国时诸葛亮“东联孙吴，北拒曹魏”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例子。外交部显然也有类似的想法。只是，考虑到当时与正处在反美前线的越南的关系，特别是考虑到改变对美政策的重大政治后果，外交部提出，有关利用美苏矛盾的原则可以提，但如何利用，不宜具体，尤其现在不宜恢复中美大使会谈。因此，老师们在9月17日的第二份报告中，仅仅强调了对美、苏斗争，原则上要坚定，策略上要灵活，主张选择适当时机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当然，据说陈毅曾考虑，如果有机会单独向周恩来汇报时，将以他个人名义提出争取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更有利于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的想法。^①但没有证据表明他确实去向周恩来提出了他的建议。^②

无论如何，在估计苏联可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严重形势下，四位老师注意到美国政府表现出来的缓和姿态，率先提出了打美国牌的设想。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经过反复权衡之后，也认识到了这一策略手段的战略意义，因而下决心摆脱一切束缚，批准同美国接触并全面缓和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不少研究者喜欢引用毛泽东这个时候的护士长吴旭君的一段回忆。回忆称：

在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毛看完一份报告，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好题目，好做文章了。”吴问道：“你是指中苏分裂了，美国人高兴吧？”毛答称：“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了‘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吴说：“中苏分裂，大大减少了欧亚两个大国对美国的压力及联合向美国进攻的可能性。这就会改变美国现有的战略理论，从而最终会影响其外交政策及对中国的态度。对吗？中、美、苏三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对吗？”毛说：“又等，又不等。随机应变。这是需要由双方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

^①参见熊向晖前引文。

^②参见李连庆：《冷暖岁月——一波三折的中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70页。

现实。”^①

这段对话往往被简单地看成是毛泽东故意安排了珍宝岛冲突“打给美国人看”的最好的诠释。但严格说来,这段对话的真实性或者说确切性多少令人怀疑。因为吴作为一名护士长,如此老练地与毛讨论外交战略理论问题,颇难让人相信。同时,这段对话究竟讲在什么时候,也是一个问题。讲在不同的时间,情况也就不同。

事实上,即使毛真有这样的考虑,多半也应当是在7月得到美国转变对华政策的信息之后,而不会是在这之前。因为,在这以前,中国方面得到的消息清楚地表明,美国政府方面的态度还是完全敌对的。即使在珍宝岛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官员还在继续声称中国是亚洲和平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美国必须设法对付中国这一潜在威胁。^②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相信毛泽东会有这种欣赏的表示。相反,在7月美国显露出愿意缓和对华关系的意图之后,特别是8月铁列克提事件发生,战争危机迫在眉睫之后,毛泽东迅速改变看法,捕捉到并设法抓住这个机会不放,以便通过与美国的缓和来达到牵制苏联、避免战争的目的,倒是更合乎逻辑。尽管这样做仍旧未必是毛泽东内心深处所希望的,但考虑到这次战争危机毕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毛泽东对其严重性的估计也是空前绝后的,他毅然抛弃意识形态的顾虑,重新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拾起统一战线、“以夷制夷”的法宝,是可以想象的。

8. 结语

1969年秋冬战争形势和战争估计之严重,确实超出后人的想象。周恩来在中南海办公室的工作台历,日复一日地记录着他每天的工作日程,然而自1969年10月20日至1970年2月这几个月的时间却令人惊异地出现了空白。只有了解上面这段历史的人才能理解,这其实是当时战争危机的产物。是战争的危机迫使周恩来撤离他日常的工作地点,直到1970年2月基本解除苏联突袭的

^①吴旭君:《毛泽东的心事》,《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4—645页。

^②参见熊向晖前引文。

警报之后他才又得以回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正常工作。

但即使在进入到 1970 年之后,在毛泽东看来,苏联入侵的危险仍旧严重存在。他反复强调:要“用战备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这一年 2 月 15 日至 3 月 21 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也仍旧把对付国外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大规模入侵当做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当然,这个时候的战争估计到底同 1969 年秋冬有些不同了。不过,这场虚惊到底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差不多在整个 1970 年,中国对苏联入侵还都处于高度戒备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经历过战争年代,善于审时度势的毛泽东抓住这一千载一时的外交机遇,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也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1969 年 12 月初,中国驻波兰外交人员受命开始了与美国外交官的直接接触。与此同时,据说基辛格也下令美国驻波兰大使设法同中国驻波兰外交官进行接触。不论双方接触的具体经过如何,中美两国政府于一个月后,即 1970 年 1 月 8 日,正式宣布华沙大使级会谈将于 20 日重新恢复。在重新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中国代表受命正式通知美方,中国政府愿意在更高级别或通过其他渠道深入商谈两国关系问题。

不难看出,正是在珍宝岛事件后这样一种极其特殊的背景下,中国对美国的大门渐渐地打开了。

原载《党史研究资料》,1997 年第 12 期



第九章

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中方变奏

引言

几乎所有谈论中美缓和经过的研究,都肯定,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直到1978年卡特政府下决心与中国建交之前,中美缓和的进程遭遇了一段“停滞”和“曲折”。^①而导致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一般侧重研究中国外交史的学者多半相信,这是因为尼克松访华后即遭遇“水门事件”,“无暇顾及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继任者福特则致力于美苏缓和且受到国会台湾院外集团的左右。^②不仅熟悉这一时期中国外交,而且熟悉美国外交情况的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的研究者,则注意到,尼克松回国后不久即“努力谋求同苏联搞‘缓和’,在中美关系上仅满足于互设联络处……实际上有意推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时间”^③。较前两者更加关注中国政治史的学者,则除了一样强调“水门事件”的影响和美苏缓和的作用之外,还认为中国方面的作用也应提到。他们的说法是:1973年以后,“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发生逆转。周恩来纠‘左’的努力受到挫折。……中国对美国的批评也增加了”^④。

在1972年《上海公报》发表之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动权已完全掌握在美国政府的手里。美国态度暧昧,中国方面“批评”与否,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快慢,严格说来无足轻重。说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也对这个阶段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停滞”和“曲折”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目前似乎还没有看到真正有力的证据。^⑤但问题在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这种

①有关这种情况,只要翻看一下研究中国外交的相关著作即可了解。如王泰平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三卷第八章第五节标题即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曲折”;曲星的《中国外交50年》第十一章第三节标题也是“中美建交谈判的曲折与《建交公报》”,该节第一目的标题则更是直击此意,为“尼克松下台与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停滞”。

②曲星前引书,第389页。

③王泰平前引书,第368页。有关尼克松访华后转而实现美苏首脑互访,达成限制战略武器临时协议和反弹道导弹条约,使美苏缓和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的相关情况,亦可参见雷蒙德·加特霍夫著,伍牛、王薇译:《冷战史——遏制与共存备忘录》,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285—286页。

④宫力:《通向建交之路的艰难跋涉——1972—1978年的中国对美政策》,冷战中国网。

⑤何慧在《尼克松与中国——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明确认为造成这段时期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发生“停滞”的原因中,“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但该书并未就此举例说明和展开讨论。见该书第177—186页。

“左”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仅仅使中国对美批评增加了呢,还是造成中国对整个国际形势的认识和政策上较前都有所变化?如果有所变化,其表现形式如何,与此前的认识和政策又有怎样的联系或区别呢?特别是,这种情况与数月之后,即1974年毛泽东所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有着怎样一种内在的联系呢?很显然,过去的研究者在分析说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经过时,基本上都不曾对上述问题进行过具体的考察。

事实上,忽视对1973年以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逆转”在对外政策上所造成的影响的考察,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此前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过于注重宏大叙事的一种粗放式的研究方法的延续。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就是,迄今为止,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系统梳理研究中苏关系全面破裂后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革命化”情况的研究成果。与此相反,差不多所有关心中国这一时期对外政策变动情况的研究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毛泽东如何一举成就了由“反帝反修”向“联美制苏”的政策转变的问题上。由此得出的结论也非常简单,那就是,来自苏联的现实威胁,迫使毛泽东不能不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以致不惜与自己过去最主要的敌人携手合作。但是,人们显然没有注意到把这一政策的变化与其后的“三个世界”理论相联系,从而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更不曾回答这样一个令人颇感困惑的问题,即毛泽东是怎样调适他的这种角色转变的?要知道,作为一个自60年代以来突出强调自己的世界革命抱负,强调与“美帝”不共戴天,并以此画线来区别敌我友的阶级革命家,如此突然地放弃他所一贯坚持的阶级立场,转向国家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立场,无论对他自己,还是对他的众多追随者;无论是在观念政策上,还是在心理情感上,都是一个极难适应的问题,不可能不经过一个转圜或过渡的阶段。

当然,并非所有的研究者都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比如,有学者就敏感地注意到:“当时中国对外方面的公开言论充满了激进的革命高调,即便是在中美关系有了缓和甚至改善的情况下,这一情况也没有改变多少。”作者的解释是:“中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却正是在这种革命高调中(毛泽东把这叫做‘放空炮’),在不被人注意的潜流下,逐渐发生着重大的变化。”^①然而,问题在于,当年的哪些观点、理论或政策宣示是属于作者所说的那些“激进的革命高调”,哪些不是?这些所谓“激进的革命高调”,真的仅仅是为了维持自身外在的革命形象做给人看的“放空炮”?何以证明它们不是毛泽东革命立场或革命情感的某种宣示?更何况,这些所谓的“高调”,有没有程度上或者内容上的变化呢?比如,“反帝反修”和“反对两霸”是否都是“激进的革命高调”?如果是的话,它们有没有不同,又为什么不同呢?事实上,这恰恰是我们总结整理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对外政策变动的一个关键所在。厘清了新中国从“打倒帝修反”的世界革命主张,到对美和解外交政策的提出,到“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抗苏”主张,再到高举“反对两霸”大旗的“三个世界”观点的形成等,这一系列重大政策或策略转变的内在联系,我们能够对那个时代对外政策的种种剧变的原因和线索,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

^①宫力:《中国的高层决策与中美关系解冻》,姜长斌等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第711页。



1970年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

1. 在革命与缓和之间摇摆

就在中国全方位地贯彻向国际上一切帝、修、反开战的世界革命路线的关键时刻,1969年继珍宝岛事件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紧张局势,成为极大困扰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一个严重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毛泽东从来就是新中国最具有“大无畏”精神的革命领袖。但是,如前所述,他对世界革命的期待和对战争随时可能到来的这种判断,却并不意味着他希望战争早日降临到中国头上来。作为一个长期指挥军事,有着大量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革命者,毛泽东其实又是一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既坚持革命的意识形态,又注重实力原则。换言之,毛泽东高度重视援助各国革命,却并不真的想拿中国的安全来冒险;

相信战争迟早要来,却并不希望它早来。因此,不论毛泽东讲过多少希望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话,当真的战争危险突然降临的时候,他会选择对美缓和,其实是可想而知的。

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对美外交方案的最初动机,明显地还是一种基于策略的考量,即试图牵制苏联,避免战争。他没有,也不可能迅速改变自己的阶级革命的传统思维习惯。但是,他突然转向,不顾各兄弟党的感受,从反帝革命的立场上后退,转而争取与各国革命人民的死敌——美帝国主义握手言和,也并非纯粹是出于避战的现实考量。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毛泽东一直希望推动各国革命来打击牵制美国,连续数年的努力之后,他突然发现,真到关键时刻,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运动真的能够帮得上自己。这种情况显然让毛泽东感到沮丧。不要说援助一大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武装斗争不见成效,就是近在周边的东南亚和南亚各国的武装斗争,也始终要靠中国方面的指导、帮助,甚至是直接的军事指挥,才能维持有限的发展。唯一有实力、能战斗的越南党,也因为苏联的介入,转而像周恩来所批评的那样,变得“不争气”起来。

毛泽东这时明显地对战争与革命的问题颇多疑惑。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去了21年,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68年,已经过去了23年,却仍然看不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影子。不仅看不到大战的影子,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遍地开花的情况也不复存在。不仅过去“世界无产阶级祖国”的苏联变修了,而且世界上100多个共产党都不信马列了。中国党几年来承担起推动、援助世界革命的重担,却始终只见星火闪现,不见燎原之势。这种情况让毛泽东感到某种程度的沮丧,因而才会有“现在既不打仗,又不革命”的不解和抱怨。

但不解也好,抱怨也好,说到底反映出来的还是深藏于毛泽东内心深处的革命情结。毛泽东可以基于现实的危险,一时做180度的策略转变,和自己的敌人美国进行外交接触,然而,一旦时机到来,或出现新的革命迹象,他照样还会重新燃起革命的热情。这也正是为什么,当1970年春天,中美双方已经开始就展开更高层级外交接触问题正式进行商谈之后,毛泽东的态度又一次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这一年的2月12日,鉴于接通了与美国政府之间的联络渠道,中央政治局通过决定,欢迎美国政府派部长级代表或派总统特使前来北京谈判中美关

系的问题。经毛批准后,2月20日中方代表在中美大使级会谈时将此一决定告诉了美方。然而,3月18日,得到美国支持的朗诺(Lon Nol)将军发动政变,宣告废黜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30日,美军又出兵柬埔寨。这种情况使得原本局限在越南南部和老挝部分地区的印度支那战争,扩大到了整个印度支那半岛,并引发了美国国内强大的反对声浪。一直焦虑看不到革命浪潮的毛泽东,明显地马上兴奋起来,对这场战争的扩大和它可能在整个东南亚地区造成的革命效应,寄予了极大的期望。^①

4—5月间,毛泽东几度提示周恩来等说:目前的国际形势,已经发展到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潮,必须加以运用。而在与越南和老挝党的领导人的谈话当中,毛泽东又开始在各种谈话中信心满满地宣称:不仅“东南亚是一个马蜂窝”,“我看各国人民也快起来了,包括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能够相信只有十月革命,或者中国革命、越南革命、老挝革命,其他地方就不革命了吗?不可能嘛!”“其他地方不革命,那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灵了。”因此,“当今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②。

据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再度开会,决定推迟中美会谈,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声明,支持国际反美革命斗争、印度支那三国四方会议和西哈努克领导的柬埔寨政府,并且召集国内群众集会和组织游行示威,由毛泽东、林彪出席北京群众大会,轰轰烈烈,以示声援。对此,毛泽东欣然批示:“照办”^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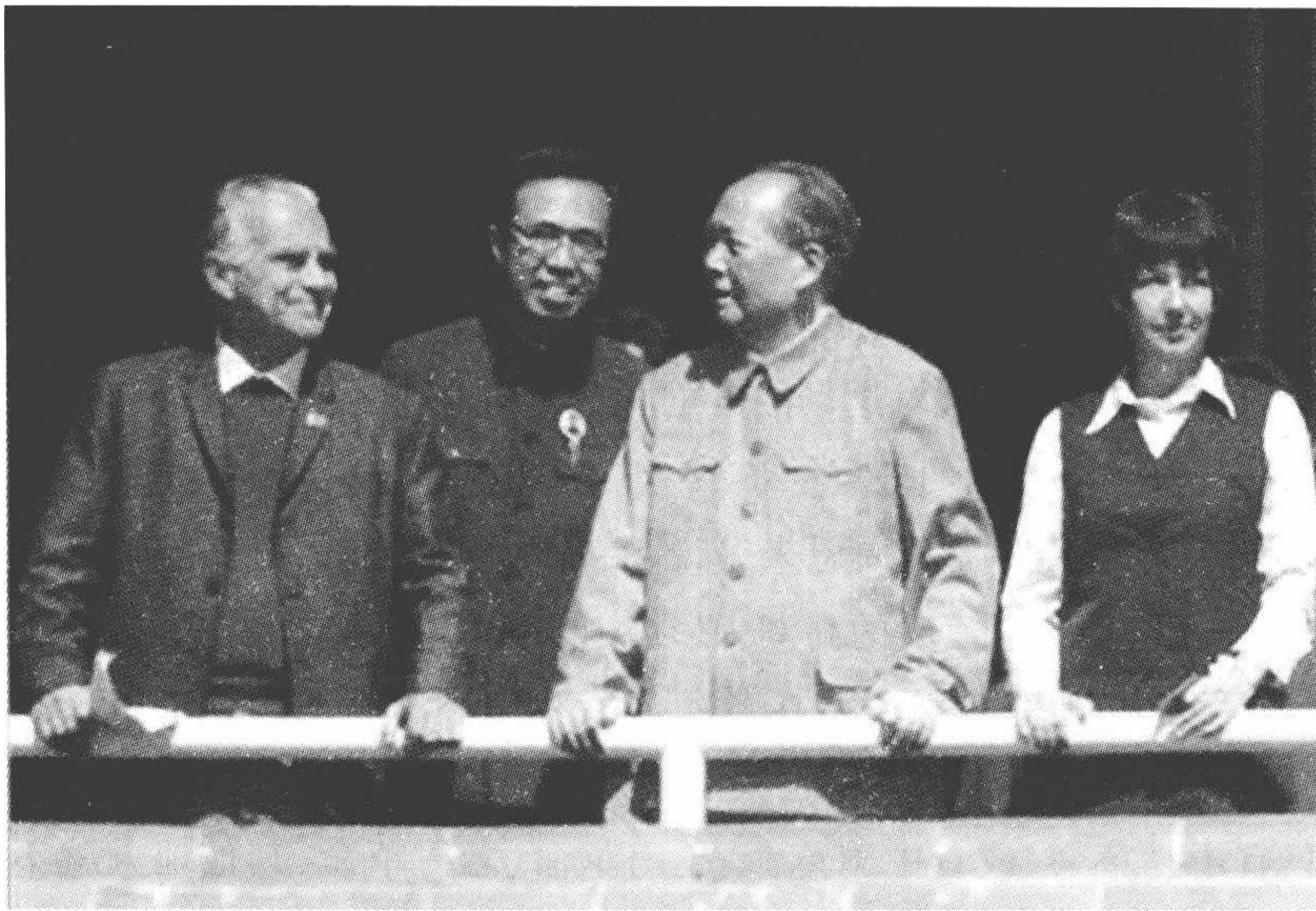
在已经开启了中美缓和的大门之后,毛泽东又断然停止两国间的这种接触,转而于1970年5月20日亲自参加支持西哈努克反抗美国干涉的群众集会示威行动,并且公开发表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他特别强调:“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④这种情况充分反映出毛泽东所批准的对美外交,在这个时候不过就是一种策略手段而已。毛泽东此前的世界革命理想和热情,依旧有其巨大的惯性作用。

^①毛泽东这时并对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十分重视,他甚至认为美国可能比苏联要先出现革命形势。

^②《毛泽东与黎笋的谈话》,1970年5月11日;《毛泽东与凯山·丰威汉的谈话》,1970年7月7日,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0年版,第317—324页。

^③《周恩来年谱》(下),第367页。

^④《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84页。



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和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

2. “打仗是打仗,外交是外交”

1970年下半年,随着美国军队撤出柬埔寨,东南亚的局势又重新恢复到先前的状态。周恩来等显然希望重新恢复中美和解的尝试,因此,不仅推动释放美籍犯人华理柱主教(Bishop James Walsh),而且推动邀请毛泽东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夫妇来华,并安排其在10月1日上了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见了面。周恩来还在外交部的安排意见上批示:建议主席在最近几天接见斯诺一次。但是,毛泽东虽批示同意,随后却又将此事置之脑后不提,显示他对马上进行策略调整还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①

足以说明毛泽东这时对调整此前政策在心理上和政策上颇难转圜的

^①参见孔东梅:《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一个例子,是中缅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的问题。这时缅甸政府派人来京表示希望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周恩来等表示赞成。但考虑到中缅复交对依靠中国开展武装斗争的缅共可能带来的刺激,周恩来和外交部都建议由毛出面做劝说工作。故10月1日,中方也有意将在京的缅共中央副主席德钦巴登顶安排到了天安门城楼上参加检阅,并见毛泽东。毛泽东固然不反对中缅复交,但是,他在把外交部关于缅甸奈温政府希望和中国恢复1967年以来基本中断了的外交关系的消息转告给德钦巴登顶时,却明确表示说:“奈温、吴努,这两派都是反共反人民的”,“即使我们同奈温政府恢复国家关系,也不会影响你们打仗。……你们再好好打一下,把缅甸东北部大片地区打下来,把腊戍打下来,有十几万、二十几万人口,那就好办了,你们就有发言权了”。“打仗是打仗,外交是外交。”“我们同四十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基本上是靠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是靠这些国家的政府。苏联是靠这些国家的政府,不是靠这些国家的人民,这是路线问题。”^①

毛泽东这时开始逐渐下定决心对美和解的情况,也颇为相似。首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断释放缓和善意。从10月开始,尼克松就一再作出姿态表示愿意与中国和解。他不仅公开谈话表示希望访问中国,并且接连委托巴基斯坦总统和罗马尼亚总统向中国方面转达希望选派高级代表秘密访问北京的愿望。^②这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转圜的台阶。其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还是需要给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因此,他反反复复一直考虑到这一年的12月18日,在读到斯诺发表在意大利《时代》周刊上的一篇文章,注意到斯诺认为中国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并不排除美国人的观点后,他的思想才好像豁然开朗。据毛的护士回忆,他这时几乎是突然之间兴奋起来的,以至于一夜未眠,凌晨5点钟就要护士打电话给他在外交部工作的侄女王海容,叫王马上把斯诺找来谈话。^③

毛泽东告诉斯诺的想法很简单,尼克松既然有求于自己,到处写信和找人传话,说要派代表来中国,为什么不让他来?尼克松固然是最反动的垄断资本

^①《毛泽东会见缅共中央副主席德钦巴登顶的谈话》,1970年10月1日。

^②王泰平前引书,第350—351页。

^③孔东梅前引书,第64—66页。



周恩来会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

家的代表,但正因为如此,他的欺骗性也小一点,且敢于采取与中国和解的步骤。因此,像解决中美关系中最为棘手的台湾问题等等,“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当然,毛泽东对能否解决问题并不抱太大希望。问题是,既然判断这个时候可能逼着尼克松解决一点问题,就应该利用好这个机会。用毛的话来说就是:“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都行。”^①

话放出去了,但是,真到要公开让美国人来时,考虑到它可能带来的巨大政治影响,不仅毛泽东,就是力推中美接触的周恩来和外交部,也都变得犹豫不决了。在随后发生的“乒乓外交”的问题上,这一点就表现得格外明显。

^①《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2—594页。

1971年3月底,虽然中国方面已经在着手向美国政府释放和解的信息,但它还是被参加日本名古屋世乒赛的美国乒乓球队提出的访华要求难住了。外交部研究再三,也没有敢于表示欢迎。它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表示,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应该着重考虑政治影响,因为“美左派和有影响的人物均尚未访华,由乒乓球队打头阵,政治上不很有利”。故报告建议告诉美国球队:“现在访华时机还不成熟。”对此,周恩来也一样不敢表示异议,只好批示“拟同意”。毛泽东接到报告后,同样犹豫不决。压了两天反复考虑,最后还是画圈同意。直到报告已经批还之后,他还在反复琢磨中,仍感到难以定夺。毛身边的护士对此一经过有很细致的回忆。她写道:那些天,毛总是有些心事。“文件退走后的当天晚上,毛提前吃了安眠药要睡觉。晚上十一点多,我陪毛吃饭。吃完饭时,由于安眠药的作用,他已经困极了,趴在桌子上似乎要昏昏欲睡了。但他突然说话,嘟嘟啾啾的,我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要让我给外交部的王海容打电话,声音低沉而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护士怕听错了,之后又特意大声询问,并且反问道:“您吃过安眠药了,您说的话算数吗?”毛着急了,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①

从反帝革命,转向对美和解之难,还可以从1971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美会谈问题提交给毛泽东和林彪的报告中看出来。由于尼克松明确表示了愿意前来中国访问,与中国领导人直接讨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因此,中共中央这时将建立中美两国国家关系问题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中方这时考虑中美关系问题的主要出发点,是想要借机解决台湾问题。但报告同时却不能回答中美和解是否可能影响反帝革命运动的问题。对此,报告只好择要进行解释,这包括:

(一)对于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因为“几年之内,还不能预言美国有爆发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可能”,故中美这时建立正常关系,不会对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造成负面影响。恰恰相反,“当年中国大革命前夕,苏俄一方面派代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另一方面派大使驻北京与北洋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列宁当时采取这样的外交路线,是起了动员中国人民群众的作用

^①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香港利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308页。



周恩来会见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博士

的”。

(二)对于印度支那抗美战争,中美两国接触“可能有一时波动,但谈清楚了会更有助于印支抗战和巴黎谈判,因为尼克松已认清美苏争霸的焦点在中东和欧洲,还不是远东”。

(三)对于中国人民反帝反修的斗争士气,因为“今天的形势是我们不断同帝、修、反斗争胜利的结果,也是美帝内外交困和美苏争霸世界的必然趋势”,故可能谈出结果。谈得好,可以使美苏两霸相争加剧,增强中国自身的实力;即使谈不好,“也正好更加暴露其反动面目,提高人民觉悟”^①。

^①《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1971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革”十年资料选编》,第一辑(中),第122—125页。

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精神,中方在7月和11月两度接待了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周恩来在会谈过程中与基辛格集中讨论了台湾问题的解决办法。在基辛格基本上接受了中方关于撤军、废约、不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条件之后,双方最后开始起草尼克松访华公报。从公报内容确定的经过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毛泽东最关心的,并不是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有怎样的让步以及中美两国如何宣布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共识。他所关心的,是作为中美和解的一种公开宣示,绝不能搞出一个“屁公报”。所谓“屁公报”,就是在公报中给人印象,好像中国真的对美妥协了,放弃了此前的革命立场。

10月20日,毛泽东专门就这个问题告诫了周恩来。周恩来据此推翻了美方的公报稿,指示外交部另搞了一个对案。但毛泽东看后仍旧不满意,认为中国的革命立场没有反映出来,“一点神气也没有”。他尖锐地表示:我讲过多少次了,国际形势,天下大乱嘛!“他们不是讲什么和平、安全、不谋求霸权吗?我们就要讲革命,讲解放全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讲大国不应该欺负小国。不突出这个,我看不那么妥当。”^①

毛泽东在这里的意图显而易见,他还是想照1970年10月1日与缅共领导人德钦巴登顶所讲的那个原则行事,即“打仗是打仗,外交是外交”,与美国国家关系正常化,不会影响中国支援世界革命的基本立场。在毛泽东的坚持下,1972年2月28日尼克松访华后双方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就出现了各唱各的调的情况。中方在公报中公开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②中共中央并且为此向国内通告称:邀请尼克松访华,是毛主席“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壮大自己”的重要外交策略。我在谈判中不仅没有做无原则的妥协,而且表明了我所关心的不仅是台湾一地,我将坚持不渝地支持印支三国四方的各项主张。只要美国不停止侵略,我就继续支持印支人民打下去。在公报中,我也“旗帜鲜明,坚持了一贯原则立场,戳穿了苏修的诽谤,鼓舞了世界人民”^③。

^①魏史言:《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67—69页。

^②《人民日报》,1972年2月29日。

^③《中共中央关于中美联合公报的通知》,1972年3月7日,《“文革”十年资料选编》,第一辑(下),第167—171页。

3. “联美制苏”的奇想与挫折

对美和解的政策对中国外交关系所带来的收获,几乎是立竿见影的。因为美国改变态度,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终于投票通过决议,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联合国会员国。这一年里,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达到14个。1972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达到17个。其中尤以欧美日本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时与中国建交者为多。这种情况明显地使过去在军事上和统战问题上惯用“各个击破”策略的毛泽东产生了一种奇想,即能不能利用美国和中国对苏联扩张主义的共同的担心,建立起从欧洲、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到中国、日本和美国这样一条针对苏联的战略线,并团结这条战略线以外的一大片国家,来首先击垮苏联呢?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与基辛格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了这样一种设想。毛泽东说:过去中美两国是仇人,现在是朋友。而苏联对欧亚两洲的威胁现在不仅存在,并且还在增长。今天我们应当搞一条横线,从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到土耳其和欧洲,这样“可以共同对付一个混蛋”^①。

把对美和解政策,进一步发展到“联美制苏”,说到底,仍是毛泽东策略思想的一种运用。还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就曾明确提出:我们对帝国主义是一概反对的,但是又要根据其危害大小和现时危害与否,来制定不同的外交策略。其基本原则就是:“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②但是,一方面继续高唱“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支持各国革命人民的革命斗争”^③,一方面却转而实行联美策略,其内在的逻辑,必须作出合理的解释来。

针对这个时候中美正式宣布将互设联络处和毛泽东提出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策略主张,外交部很快就作出了具体的解释。2月25日,中共中央

^①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 Moscow*, edited by William Burr, New Press, 2000, pp. 86-101.

^②毛泽东:《论政策》,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761—762页。

^③《新年献词》,《人民日报》,1973年1月1日。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投票通过决议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会员国

正式认可并转发了这一解释意见。外交部所作的解释是：中美关系的改善，并不改变中国反对美苏两霸的原则立场。中国今后的对外方针依然是反对两霸，只是，这种反对不能是平行的，而要有主有次。今天“打击揭露的重点应是苏修”。因此，中美关系的改善将有利于我们同苏修

的斗争。^①注意到周恩来 1970 年 6 月对阿尔巴尼亚客人解释中国当时为什么突然又高唱反对美帝的疑问时所说：“这是一个时候打击的重点，而实质上暴露和孤立了苏修”^②，可知这种解释在中共中央看来，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外交部的上述解释固然符合毛泽东“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和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的一贯策略思想，但是，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毛的做法的。这时，包括阿尔巴尼亚在内的大批过去追随中国反帝反修的革命党及其各种左派组织，纷纷开始对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向发出强烈的质疑。而尤其让毛泽东这时感到恼火的是，他批准采取对美和解政策和设想“联美制苏”策略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他坚信美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妥协与勾结，因此中国有充分的可能来“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然而，就在尼克松 1972 年 2 月访华之后不久，他就改赴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等人签订了《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和《美苏关系基本原则》，双方承诺“不以牺牲对方的利益为代价谋求单方面的优势”。1973 年 6 月，勃列日涅夫又应邀访问了华盛顿，美苏再度签署了《美苏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协定》《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以及《美苏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等 13 个文件，使美苏缓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③这种情况显然让毛泽东深感被动。因为事情很明显，美苏关系的这种缓和，印证了这时阿尔巴尼亚等一批小党对中国党的批评和指责，证明毛泽东的对美和解及离间美苏的策略，从根本上就是一种错误。

恰恰在这个时候，外交部美国处在其内部刊物《新情况》153 期发表了一篇针对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会谈问题的调研报告。报告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④。这篇报告因为突出强调了美苏勾结的趋势，因而一下子触到了毛泽东的痛处。毛为此大发雷霆。他随后甩开主持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和外交部其他主要领导人，而把张春桥、王洪文等叫去，尖锐地表示：“美、苏两家开了两次会。外交部的观点，不如几个大使馆。”“一说欺骗更大，又说美苏主宰的气氛更浓。”“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

^①参见宫力：《通向建交之路的艰难跋涉——1872—1978 年的中国对美政策》，中国冷战网。

^②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23 页。

^③参见高文谦前引书，第 286 页。

^④宗道一：《1973 年外交部“153〈新情况〉事件”始末》，《党史研究资料》，2001 年第 5 期。

系。”中央“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现在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①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尖锐批评外交部的同时,也直率地说明了他批准对美和解政策的原因和理由。他宣称:阿尔巴尼亚死也不同意让美国从越南撤出去,“说是世界革命风暴在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勾结美帝。“专门勾结美帝、日本、西德、英国这些坏人的是我”,“你奈何得了我吗?”“列宁屡次说过,碰到强盗,要么被杀死,要么交出自己的手枪和汽车。他主张交出手枪和汽车,等到有朝一日有机会,把这些强盗统统消灭,手枪、汽车都收回。”说“‘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当年俄国革命成功,面对外部威胁,为避免内外两面作战,“列宁就是主张割地赔款,签和约”。等到“后来地也没有割,款也没有赔,条约一张废纸,就像尼克松讲的”。他并且举自身的例子说:过去我们也跟蒋介石妥协过两次,最后还不是我们胜利了?^②

注意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何以一面对美和解,一面仍旧继续坚持高唱以往的革命高调。这显然并不像毛泽东对尼克松公开宣称的那样,这是什么“放空炮”,它们恰恰是毛这时内在心理的一种反映。正是在毛泽东的坚持下,周恩来在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当中,仍旧开章明义地写上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那些论断,坚持认为“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只是,报告这回突出强调了毛泽东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即:“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今天,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它们天天喊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撤军。目的就是争霸世界。它们既争夺又勾结,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勾结是相对的、暂时的。”^③如此等等。

但是,无论毛泽东对美苏关系的看法是否符合实际,他“联美制苏”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战略构想,却无从实现。不仅美苏首脑不断互访和接连签

^①《周恩来年谱》(四),第604页;高文谦前引书,第454—455页。

^②参见李丹慧前引书,第50页。

^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73年9月1日。

订各种条约的现实,使毛感到丧气,而且从基辛格这一年里两度来访的谈话当中,毛泽东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出,随着美国从越南这个泥潭中拔出脚来,它在中苏之间已经处于越来越有利的地位,不那么需要打中国这张牌了。在11月12日两个人的谈话当中,毛泽东的受挫感表现得尤其明显。当时,毛泽东一上来就吹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不想基辛格却乘机强调苏联可能进攻中国,美国决不允许中国的安全受到破坏。这让已经深感被动,但自尊心极强的毛泽东顿时感到强烈的不满,甚至是屈辱。^①

其实,美国人居高临下的这种态度,还在一年多以前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Alexander M. Haig)准将率先遣组来华为尼克松访华做技术性安排时,就曾经表露无遗。当时黑格转达尼克松和基辛格的想法说,苏联正在利用次大陆包围中国,美国决心帮助维持中国的生存。毛泽东听到这一说法时,当即发怒道:“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他替我们担心啊,猫哭耗子!”为此,毛泽东要求周恩来等一定要给美国人一点颜色,主张把原来公报草案里面的“人民要进步,改成人民要革命”。说:“他们就怕革命,他们愈怕,我们愈要提。”如果因此谈吹了,也没什么了不起。“我看啊,过不了几年他还是要来的。”^②消息传到上海之后,负责接待黑格一行的上海方面,马上就采取了“菜无好菜”、“脸无好脸”的接待降温措施,弄得美国人一度莫名其妙,十分困扰。^③

联系到1972年年初黑格访华时讲类似的话所引起的那场风波,不难了解基辛格在毛更加敏感的情况下旧话重提,可能造成怎样一种后果。很显然,毛泽东马上就把这种愤懑的情绪发泄了出来。经常在毛身边,得知了毛泽东这一态度的两位主要翻译王海容、唐闻生,政治斗争的神经也马上高度警觉了起来。恰好周恩来因为错过了毛泽东醒着的时间,来不及向毛请示与基辛格会谈军事合作问题的准备方案,也不清楚毛泽东发怒的情况,其在随后的谈判中没有特别在意应当表现强硬的态度。于是,王、唐很容易就发现了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时太过软弱的问题。基辛格刚走,毛泽东就得到了消息,随即召集有

^①参见《毛泽东传》(下),第1669—1670页。

^②魏史言:《黑格率先遣组为尼克松访华安排的经过》,《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三辑,第78—79页。

^③参见孔东梅前引书,第118—119页。

关人员开会,批评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时说了错话,丧失了立场,进而更是提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周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①从11月21日开始,在将近两周之久的时间里,政治局每天晚上召开全体会议或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周恩来几年来主持对美外交所犯的右倾投降错误。会议归纳周恩来的错误,“总的来说,是忘记了联合时要防右的规律,根本原因是忘了主席的教导,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力量”,未能正确把握外交路线应与支持革命相一致的原则。^②如此高规格长时间的政治批判,既是毛泽东在对美缓和过程中内心冲突、屈辱的一种感情发泄,也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出毛对周推动的这对美缓和和工作效果的某种怀疑态度,和一心想把这对美妥协的策略所带来的失败后果转嫁到周恩来头上去的一种复杂心理。

经过这样一场有组织的批判斗争之后,不难想象中国此后对美国的认识和态度,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前行。

4. “三个世界”观点的提出

毛泽东旨在“联美制苏”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战略奇想,其实只是灵光一闪而已。尽管1974年1月初,毛泽东在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的谈话当中又提到了类似的话题,却已不再把它同反对苏联的问题直接联系在一起了。而且,不过一个半月之后,毛泽东就提出了他的“三个世界”的观点,从此再不提“一条线”、“一大片”了。

毛泽东“三个世界”的观点和“一条线”、“一大片”的设想,有着根本的区别。他在2月22日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Kenneth Kaunda)的谈话中是这样描述他的这一新的国际观的。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③而经过毛泽东认可,由邓小

^①参见高文谦前引书,第417页。

^②此段归纳和引文源于参加了政治局会议的乔冠华随后在外交部的传达报告,乔虽未直接说明这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集体意见,但依当时形势,可以判断这绝非乔个人意见,基本上应当是乔对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意见的一种概括。参见王幼平前引书。

^③《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00—601页。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

平4月10日在联合国大会上所阐述的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则更进一步把毛的这一观点系统化和理论化了。

按照邓小平报告中的说法,毛泽东的观点就是:“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它们用不同的方式都想把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因为,“两个超级大国既然要争夺世界的霸权,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它们之间的妥协和勾结,只能是局部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它们之争夺则是全面的、长期的、绝对的”。但是,“一切过高估计两霸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而是团结起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①。

^①转引自《人民日报》,1974年4月12日。

不难了解,毛泽东这一观点的核心之点,不仅不在“联美制苏”,而且也不是“反帝反修”或“打倒帝修反”之类的世界革命主张的再现,它是以反对美苏两霸为基本目标的。因此其试图主要依靠的斗争力量,既不是美国,或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不是各国革命党,而是寄希望于第三世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

和毛泽东刚刚放弃的带有昙花一现意味的“一条线”、“一大片”的设想不同,“三个世界”的观点,正如周恩来所说,是毛泽东考虑了很长时间,反复推敲研究后才提出来的一个观点。^①早在1946年,毛泽东就已经针对美苏之间可能到来的对峙局面,提出了一个“中间地带”的观点。即强调在对立的美苏两个大国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广泛的中间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②。美苏冷战开始后,由于出现了两大阵营,中国革命成功也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站到了与美国对峙的苏联阵营一边,毛泽东一度不再用“中间地带”的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关系问题。但到1958年,鉴于美国疲于应付中东事件和台海危机的情况,毛泽东又开始重视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带”^③。一直到中苏关系破裂前,毛泽东基本上都是从美苏冷战大格局的角度来谈论这个“中间地带”的。而由于注意到欧洲一些国家,包括英、法等国都与美国有矛盾,故从统一战线策略的角度,他这时还开始注意把这些国家与美国再度区别开来,也视之为“中间地带”的一部分,甚至称它们是“人民的间接同盟军”^④。

中苏关系破裂后,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的认识开始放大,并且开始接受“第三世界”的说法,时而会把两者混用。比如他在1963年9月提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也)是不满意的。”^⑤1964年1月则提出:有两个第三世界,“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

^①参见曲星:《中国外交50年》,第373页。

^②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1191页。

^③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国际形势》,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50页。

^④《毛泽东与安井郁的谈话》,1962年1月3日。

^⑤《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6—507页。

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①。由于“第三世界”这一概念有其特指的含义,故他在1970年又曾使用过中间势力的提法,称“第一中间势力是第三世界”,英、法、德等是“第二中间势力”^②。鉴于他这时明显的是把美苏一并视为反对的对象,因此,这一说法实际上已经开始构成“三个世界”观点的雏形。只不过,在整个60年代,因为对中间地带尚未能从阶级及其革命的层面作出确切的区分,再加上毛泽东这时更看重的,还是以各国革命党为主要动力的世界反帝革命,因此,他这时多半只是把“中间地带”视为反帝革命的一种间接同盟军罢了。

毛泽东从“中间地带”的思想,开始具体地转入到“三个世界”的观点,已经是1973年了。在这一年里,他第一次认同当时通行的解释,明确了自己对“第三世界”这一概念的界定。他断言,“第三世界”就是指发展中国家,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因为这是自美苏冷战以来,包括中国高举反帝反修大旗以来,毛泽东第一次确切地指出了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因此,在这一年入夏之际,外交部还专门向驻外使节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新的指示。^③

由毛泽东上述认识转变的经过可以看出,“三个世界”的观点,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毛泽东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产物,是他用来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划分敌我友的新的分析模式。其形成的过程之所以如此漫长和复杂,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中国自身在美苏冷战格局中地位不断变动,始终难以确定;二是世界革命的实践和以“帝、修、反”为敌的认识,一直在冲击着毛对国际上敌我友的判断标准。他之所以到了1974年才最终形成并确定了这一观点,则是因为随着中国对美和解,此前聚集在中国反帝反修大旗下的革命阵营已经分崩离析,他再也不可能重启世界革命的闸门了。他为此一度提出的“一条线”、“一大片”的设想,很快就发现不切实际。于是,他只能重新回到他过去所熟悉的国际统一战线这一思路上来,进而运用压迫和被压迫这一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将自己此前不注重阶级分析的“中间地带”观点梳理为强调阶级关系的“三个世界”理论。

^①《毛泽东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柯弗兰、爱德乐、爱波斯坦、李敦白等的谈话》,1964年1月17日。

^②《毛泽东接见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的谈话》,1970年10月1日。

^③参见王幼平前引书。

当然,毛泽东在这里所强调的阶级关系,并非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而是从国家关系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也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摆脱世界革命思想的束缚。因为按照过去世界革命的分析模式,阶级分析的方法是将社会关系与国际关系合二为一的,因此也才会有“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这样的斗争目标的明确规定。如今,要从国际统一战线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就必须要将二者区分开来,一切以反对美苏两霸为标准,从而所谓各国“反动派”自然也就应当视为联合争取的对象了。

不难想象,对于在国内高唱“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来说,这样一种转变也未必符合他的愿望。由此我们也就看到了处在这种转变过程中的毛泽东极为尴尬和困窘的一面。因为要实践他刚刚确定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中国不能不陆续和那些过去因为敌视共产主义而被视为“各国反动派”的外国政府发展外交关系。这一年5月,中国确定要和马来西亚建交。在双方宣布建交的前两天,即5月29日,毛泽东会见了来访的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Tun Abdul Razak)。拉扎克明确提出: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利用中马建交的机会,请中国政府帮助彻底解决马来亚共产党在马泰边境搞武装斗争的问题。毛泽东开始自然是打“太极拳”,推托说:“这个事情也难呢,麻烦得很。……我们也没有接触多少年。”拉则提出:“如果你们同他们有接触,你们就告诉他们不要再打了,走出来帮助我们建设一个幸福、统一的国家。”毛坚持说:“这个难。这些人才不听我们的呢!”拉紧追不放,说:“那我们就要被迫打他们了。”毛则表示:“那是你们的内政,我们不好干涉。”拉马上接过毛的话说:“那我可以告诉他们,你们和他们没有关系,你们已经承认了我们的政府……”毛显然感到很不自在,当即反应道:“怎么没有关系?!不好这么说。”拉仍不改口,继续表示:“我要对他们说,我和你谈了这件事,你说你们和他们没有关系,这些事是我们的内政。”毛也倔犟地坚持道:“有关系!不能讲没关系!但是我们不干涉你们的内政。……你讲我们没有关系,那就不好呢!”拉进一步试探说:“过去有关系,现在没有了。”毛马上反应说:“现在也有关系,将来还有!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呢!怎么没关系呢?”^①

^①《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的谈话》,1974年5月29日,《“文革”十年资料选编》,第一辑(下),第43—54页。



1974年5月毛泽东会见来访的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

马共是与中共有着密切联系的一个小党,他的总书记这时还住在北京。而将近10年前,也正是毛泽东鼓励马共重新回到丛林中去,发动武装斗争的。如今,因为要实行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中国不能不和镇压马共的马来西亚政府发生外交关系。但是,毛泽东情感的天平倾向哪一边,由上述对话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当然,无论毛泽东在意识形态上和自身情感上偏向哪一方,在国际政治关系上选择统治者,而非革命者,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唯一选择了。毛泽东虽然心有不甘,却也无可奈何。这里面的真正原因,无疑与毛外交观念的成熟与否无关。有关这种情况,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对扎伊尔总统的一次谈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坦率地却又是无可奈何地告诉这位总统说:过去那些年,“我们恨不得把你们统统推翻。(因为)我们是支持革命的,是支持革命人民的,可是这些人不争气,推不倒你啊,那也没有办法啊,只有跟你打交道”^①。

^①《毛泽东会见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恩西瓦比时的谈话》,1973年7月29日,《“文革”十年资料选编》,第一辑(中),第222—224页。

“这些人不争气”！由此我们也很容易想起前引周恩来批评越南党“不争气”的说法。尽管这两个“不争气”，一个是侧重于从实力对比上讲的，一个是侧重从思想倾向即革命性方面讲的，但归根结底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毛泽东从世界革命的立场和主张后退下来，转而提出“一条线”、“一大片”也好，提出“三个世界”也好，并不是他改变了自己的革命观念和理想，而是因为此前的实践和中国对美缓和外交推动后世界革命阵营的四分五裂，使他更加清楚地看出，靠“这些人”还行不通。

5. 结语

在确立了“三个世界”的理论之后，继续在国际政治问题上强调“革命”两个字已经变得不那么协调了。1974年底，毛泽东终于在这一点上也作出了让步。他在与周恩来等人谈到国际形势时，特别提到说：“现在可以不提当前世界主要倾向是革命”^①了。从此，这一在中国报刊上宣传了长达10年之久的观点，再也不复存在了。不论毛泽东内心里怎样想，中国的对外政策，由此开始与此前在革命的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对外政策，渐行渐远了。

随着毛泽东很快去世，邓小平时代到来，就连“三个世界”的理论也渐渐不大被人提起了。因为，“三个世界”理论的核心就是要在国家关系问题上搞统战（联纵抗横），而外交统战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确保中国的国家利益不受侵害。一旦世界革命的目标不复存在，一切旨在维护自身利害关系，那么“三个世界”理论中原有的“反霸”目标，也难免会显得多余了。邓小平时代“三个世界”理论最终在中国的各种报刊宣传当中遁迹无形，实在也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

原载《冷战国际史研究》，2007年第4期

^①转引自徐达深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9—1160页。

参考文献及资料要目

文献资料：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2—1963*,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 Moscow*, edited by William Burr, New Press, 2000.

苏联外交部编,宗伊、潘益柯译:《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1—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

《日内瓦会议文件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1954年版。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18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5—24)》,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财政部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史料》,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版。

徐达深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1—5)》,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1—4),台北1980年版。

孟宪章主编:《中苏经济贸易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公司2000年版。

马齐彬、陈文斌、林蕴晖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中

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年版。

复旦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组编:《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1 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7 年版。

郭明:《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毛泽东文集(1—8)》,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1996 年版。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毛泽东传(1049—1976)》(上、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毛泽东军事文集(1—6)》,中央文献出版社、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9 年版。

彼得·卡尔沃科西雷编著,王希荣等译:《国际事务概览,1949—1950》,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1 年版。

科拉尔·贝尔著,F.C.贝纳姆编,云汀等译:《国际事务概览,1954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编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译:《国际事务概览,1956—1958 年》,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0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3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年版。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编写组编：《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上、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张闻天文集》(1—4)，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5 年版。

《张闻天年谱》(上、下)，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年版。

北京市委：《学习文件汇编》(1—3)，1964 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编：《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介绍材料》，1969 年。

何慧译：《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美国康仑公司研究报告》，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0 年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11)，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20)，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1—5)，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2005 年版。

《斯大林文选》(1934—1952)，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

拉津斯基著，李慧生等译：《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新华出版社 1997 年版。

萨纳柯耶、崔布列夫斯基编，北京外国语学院 1971 届工农兵学员译：《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文件集》，三联书店 1978 年版。

《魏德迈报告》，(台北)光复书局 1959 年版。

报刊：

《二十一世纪》

《人民日报》

《中共党史研究》

《中共党史资料》

《历史研究》

《东南亚纵横》

《国史参考资料》

《参考消息》

《参考资料》

《党史研究资料》

《党的文献》

《新华日报》

《新华月报》

《解放日报》

回忆录、日记：

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舍甫琴科：《与莫斯科决裂》，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6 年版。

王世杰：《王世杰日记》（手稿本），台北，“中研院”近代研究所，1990 年。

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香港利文出版社 1995 年版。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5 年版。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1—2），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北幼狮书店 1973 年版。

列多夫斯基等著，彭卓吾译：《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东方出版社 2004 年版。

叶飞：《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

艾奇逊著，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研究组译：《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 1969 年版。

亨利·基辛格著：《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新华出版社 1981 年版。

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理查德·尼克松著，伍任译：《尼克松回忆录》（上、下），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

孔东梅：《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吉拉斯：《和斯大林的谈话》，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W.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合著，南京大学历史系英美对外关系研

究室译:《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三联书店 1978 年版。

《缅怀毛泽东》(上、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0 年版。

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三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

温斯顿·丘吉尔著,北京编译社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6),商务印书馆 1975 年版。

《聂荣臻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版。

专著:

Allen S.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Macmillan, 1960.

Bruce Cumings,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Princeton, 1990.

Glenn D. Paige, *The Korean Decision, June 24–30, 1950*,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85.

Omar N. Bradley and Clay Blair, *A General's Life: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3.

Rosemary Foot, *The Wrong War: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1950–1953*,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5.

小阿瑟·施莱辛格著,仲宜译:《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三联书店 1981 年版。

李连庆:《大外交家周恩来》(1—3),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4 年版。

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年版。

《王尚荣将军》编写组:《王尚荣将军》,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0 年版。

徐则浩:《王稼祥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年版。

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年版。

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1957—1969)》,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

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2 年版。

曲星:《中国外交 50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1911—1949)》,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中国军事顾问团历史编写组:《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版。

伊·卡顿著,陈亮等译:《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新华出版社 1980 年版。

姜长斌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版。

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郑谦、韩钢:《毛泽东之路·晚年岁月》,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4 年版。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中苏最高机密档案》,香港天地图书公司 1998 年版,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金春明、席宣:《“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版。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年版。

何慧:《尼克松与中国——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戴万钦:《甘乃迪政府对中苏共分类之认知与反应》,台北正中书局 1992 年版。

钱江:《在神秘的战争中——中国军事顾问团赴越南征战记》,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孙耀文:《共产党情报局——一个特殊的国际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罗元生:《百战将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9 年版。

《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丛进等著：《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爱德温·马丁著，姜中才等译：《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的反应》，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 年版。

沈志华、杨奎松、齐德学编译：《关于朝鲜战争研究的新材料和新观点》，军事科学院，1996 年。

约翰·佩顿·戴维斯著，罗清等译：《抓住龙尾——戴维斯在华回忆录》，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

雷蒙德·加特霍夫著，伍牛、王薇译：《冷战史——遏制与共存备忘录》，新华出版社 2003 年版。

张小明：《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7 年版。

《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罗瑞卿传》编写组：《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年版。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7 年版。

王彦：《炮击金门》，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

迈克尔·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邹谠著，王宁等译：《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美国史研究室编：《美国历史问题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年版。

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 1987 年版。

Gordon H.Chang 著，梅寅生译：《敌乎？友乎？——美国分化中苏联盟内幕》，台北金禾出版社 1992 年版。

王贤根：《援越抗美实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0 年版。

王焰等著:《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版。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 2003 年版。

尹启明、程亚光:《第一任国防部长》,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0 年版。

叶戈罗夫主编,安徽大学苏联问题研究所译:《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39—1945)》,第 8 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

图片来源

1.《新中国外交(1949-1959)》, <http://www.fmprc.gov.cn/chn/other/xzgwj1.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2.《新中国外交(1960-1969)》, <http://www.fmprc.gov.cn/chn/other/xzgwj2.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3.《新中国外交(1970-1979)》, <http://www.fmprc.gov.cn/chn/other/xzgwj3.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4. <http://www.idcpc.org.cn/ziliao/tupian/tupianji.htm>.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网站。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研究组编:《毛泽东画传(1893-1976)》,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编:《周恩来画传(1898-1976)》,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7. 张树德主编:《陈毅元帅画传》, 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8.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9. 刘树勇主编:《目击世界100年》, 广东旅游出版社1999年版。

10. 洛兰·格伦农等编:《20世纪人类全纪录》,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版。

11.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2.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3. 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中苏关系见证录》,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14. 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上册, 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15. 廉正保主编:《建国初期的外交部》,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本书图片由刘建平提供, 特此致谢。

社印

封面
书名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美苏冷战与中国革命

引言

- 1 . 一个并非题外的话题：“俄国”
- 2 . 意识形态：不可调和的分歧
- 3 . 斯大林：一种观念，两种角色
- 4 . 中共：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 5 . 冷战：在亚洲已经开始
- 6 . 结语

第二章 美领馆事件与新中国对美政策的确立

引言

- 1 . 美领馆事件的发生
- 2 . 中共“挤走”方针的形成
- 3 . 要不要与美国建交？
- 4 . 外交接触的尝试
- 5 . 毛泽东宣布“一边倒”
- 6 . 结语

第三章 中苏结盟与中苏两党的民族主义碰撞

引言

- 1 . 毛泽东访苏的愿望与担心
- 2 .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
- 3 . 谈判桌上的“平等”之争
- 4 . 民族主义的双重效应
- 5 . 结语

第四章 中国出兵朝鲜的因与果

引言

- 1 . 冷战的阴影
- 2 . 莫斯科的目标
- 3 . 错误的结果
- 4 . 毛泽东决断决行
- 5 . 优势缘何丧失？
- 6 . 朝鲜停战不可免
- 7 . 结语

第五章 新中国对援越抗法战争的策略演变

引言

- 1 . 解放印度支那？
- 2 . 走向日内瓦
- 3 . 促成印支停战
- 4 . 中越分歧的初现
- 5 . 结语

第六章 两次台海危机的由来及其幕后

引言

- 1 . 在和平共处方针提出的背后
- 2 . 以打促谈的外交尝试
- 3 . 赶超英美的背后
- 4 . 炮击金门决策的摇摆
- 5 . 斗争策略的再度调整
- 6 . 和平外交方针的作用逐步削弱
- 7 . 结语

第七章 19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转向的历史考察

引言

- 1 . 和平共处，还是冷战共处？
- 2 . 全面对抗，还是力求转圜？
- 3 . 美国刺激中国，还是中国刺激美国？
- 4 . 既要世界革命，也要统一战线？
- 5 . 战备防美，还是战备防苏？
- 6 . 积极避战，还是全力促战？
- 7 . 全面激进，还是狂热失控？
- 8 . “ 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 ” ？
- 9 . 结语

第八章 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对美缓和 引言

- 1 . 中苏边界纠纷的由来
- 2 . 珍宝岛事件的经过
- 3 . 北京决策的内幕
- 4 . 莫斯科的反应
- 5 . 对战争的极度担忧
- 6 . 中苏总理的机场折冲
- 7 . 对美外交的意外启动
- 8 . 结语

第九章 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中方变奏 引言

- 1 . 在革命与缓和之间摇摆
- 2 . “ 打仗是打仗，外交是外交 ”
- 3 . “ 联美制苏 ” 的奇想与挫折
- 4 . “ 三个世界 ” 观点的提出
- 5 . 结语

参考文献及资料要目

图片来源